

中共党史资料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编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5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中共党史资料

第五辑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2 023 2854 2

中共党史资料

第五辑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一二〇一工厂排版

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25印张 186,000字

1983年7月第1版 1983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01—150,000

书号 11310·1 定价 1.00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文 献

把知识和经验留给后代.....周恩来 (1)

专 题 报 告

“伍豪事件”的前前后后

.....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中央文献研究室 (7)
中央党史研究室

回 忆 录

聂荣臻回忆录

——红军时期..... (18)

第一章 在中央苏区..... (18)

一、到中央苏区去..... (18)

二、到一军团工作，参加打漳州..... (24)

三、水口战役和乐安、宜黄战役..... (38)

四、到建宁、黎川、泰宁开辟新苏区，鏖战浒湾
..... (45)

五、反第四次“围剿”..... (51)

六、第五次反“围剿”之前..... (62)

七、参加第五次反“围剿”	(70)
八、政治思想工作	(85)
第二章 长征	(94)
九、突破敌人一、二、三道封锁线	(94)
十、奔袭道州，强渡湘江，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	(101)
十一、黎平会议和渡乌江	(112)
十二、打开遵义，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120)
十三、四渡赤水和遵义会议后的余波	(128)
十四、过彝族区，强渡大渡河	(139)
十五、翻越夹金山与四方面军会师	(150)
十六、过草地，与张国焘的斗争	(154)
十七、出腊子口，在吴旗镇打骑兵结束长征	(164)
十八、打直罗镇，献奠基礼	(172)
第三章 在陕北	(179)
十九、东征	(179)
二十、西征和红军三大主力会师	(189)
二十一、山城堡战斗	(200)

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

.....李维汉	(209)
八七会议后的政治形势和党中央所做的主要工作	(209)
十一月扩大会议的召开和我对几个决议案的看法	(223)

盲动主义“总策略”的执行和我去两湖巡视的情况	(256)
共产国际的二月决议和“左”倾盲动主义的基本结束	(279)
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思想根源和历史背景	(290)

专 题 访 问

黎川事件的真相

——访肖劲光同志 李泽才 张炜 (305)

读 者 · 作 者 · 编 者

回忆周恩来同志和美国记者李勃曼谈话的

一些情况 吴 青 (317)

对《一九三五年前后北方局的情况》一文的

补正 孔 原 (321)

把知识和经验留给后代*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周 恩 来

这是个别开生面的会，只请了年满六十岁的政协委员参加。陈毅和彭真两位副主席例外，他们是“候补老人”。我也只有到今年才敢召开这个会，因为今年刚过六十岁。陈毅同志喜欢用《秋江》里的一句台词，说过了六十岁又是一个新花甲。老道理新解，很好。

这几天我参加了政协分组会，见大家精神很饱满，在新中国大家都获得了新生。现在六十岁以上的委员有三百八十三人，占全体委员的三分之一还多。老年人占的比例很大也证明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扩大了。老年人得到了新生是可喜的事，但也要辩证地看问题。按照自然规律，人满了六十岁，今后的日子总是比中青年人少一点了。有些人不服老，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但有时熬夜多了就会出点小毛病。陈叔老也不服老，最近得了流行性感冒以后，才说服老了。老年人不能和充满生命力的年轻人比，但要

* 这是在政协全国委员会茶话会上的讲话。

做到人老精神不老。据说过去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不超过四十岁，现在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改善了，医疗卫生条件也比旧社会好得多，大家精神愉快，长寿的人也越来越多。希望大家在新社会多活几年，多做事，即使多看几年也是好的。

在分组会上听了几位老先生的发言，很有感触，觉得有必要和大家谈谈工作安排的问题，希望过了六十岁的委员都能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作为对社会的贡献。这是从已故的程砚秋同志那里得到的启示。程砚秋同志的艺术修养很高，解放后在政治上和作风上也有很大进步，但总还是有点孤僻。在旧社会，他是孤身奋斗出来的，养成了洁身自好的习气，不大收徒弟，因此他的唱腔也就流传不广。解放以后，我曾劝他收徒弟。今年纪念他逝世一周年时，算了一下，他的徒弟不过十几个。程派唱腔又难学，徒弟们还没有学得好，他就去世了，录下来的唱片也不多。从这个问题联想到，凡有一技之长的老年人，总是多给社会留下一些东西好。

在座的委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具体工作岗位的，担任着科学、医药、工程、教育等方面的工作。这部分同志很忙，有的连写东西的时间也没有。老舍同志有一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将”了我一“军”，要求给他安排些时间搞业务。对这部分同志要加以照顾，不要弄得太紧张。高龄的委员精力集中使用，工作的年头可以更长一些。到

各地视察既是政协委员的权利，也是他们的义务，但是要量力而行，有的可以不去，也可以就近视察。这次张文伯先生提出在北京附近视察，我们就赞成。以后，可以把老年人组织在一起视察，少看多休息，不能和年轻人一样对待。另一种是年老体弱没有具体工作岗位的，但他们都有一定的知识和经验，过去这方面的工作组织得不好，没有能使他们的力量发挥出来。许多人在历史、科技、文化、艺术或其他方面是有研究的，如果自己不能动笔，可以带徒弟写点东西。

我们都是过六十岁的人了，至少是戊戌年出生的。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极大的时期，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记载下来。在座的都经历过四个朝代：清朝、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和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史料很值得收集。时间过得很快，开国至今已经十年了，如果不抓紧，有些史料就收集不到了。五四运动距今才四十年，那时候的事情现在的青年们已经不大了解了，对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的情况他们就更不熟悉了。现在当然首先要研究现实问题，反映新的情况，但对过去的东西也需要研究，新的东西总是从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过去编的府志、县志，保留了许多有用的史料。收集旧社会的典型事迹也很有价值，如近百年来有代表性的人物、家庭和家族的情况就值得研究，看看他们是如何产生、发展和衰亡的。那些典型人物，他们所代表的那个社会虽然灭

亡了，有的本人也死亡了，但事迹可以作为史料记载下来。我国大小凉山有过半奴隶制，现在已经进行了民主改革。西藏是农奴制，再过几年也要改革的。有些东西不赶快记载下来就会消失。从最落后的到最先进的都要记载下来。要勇于暴露旧的东西，“五四”时代就提倡叛逆精神。一个人的转变不是偶然的。我如果有时间，也愿意写点东西暴露自己的封建家庭。对袁世凯我不熟悉，谁要写蒋介石的历史，我还可以供给一些资料，两次国共合作我和他来往不少。暴露旧的东西，使后人知道老根子，这样就不会割断历史。人们都赞扬我国的古代文化，其中就包括很丰富的历史记载，不仅有正史，还有野史、笔记等。汉文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要把自己所掌握的历史遗产贡献出来。

顾颉刚先生说他想做些考据，但是政治运动很多，虽然有所得，却把时间都占了，在考据方面的贡献就少了。做考据工作只靠个人不行，要组织起来，也可以带点徒弟。

写东西不一定只限于文化史。在座的有搞军事的，可以写军事史，如从八旗、绿营、湘军、淮军、新军一直到国民党军队的发展史，都可以写。在座的还有不少工商业者，可以写我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也可以写其中的一个行业，如银行、纺织业等。其他如政治史、经济史、外交史也都可以写。

政协是联系各方面的，要注意组织这项工作。全国政

协要开常委会，成立工作组，其中有收集历史资料的组。各位委员回去，可以利用地方政协和文史馆两个机构做做这项工作。在具体做法上要从容一点，不要象青年人那样，喜欢放“卫星”，也不要规定一个月写多少字，有精力的时候可以多做些。收集史料的工作一定要从容一点。

昨天有两个黄埔军校的朋友讲起三·二〇事变和皖南事变，听起来很有味，但我因有事只听了一个半小时就告辞了。有些朋友的观点不一定正确，那可以共同研究，但先要把史料记载下来。例如昨天两个朋友讲的三·二〇事变的情况就可以补充已有史料的不足。他们说，在事变发生前一星期蒋介石想走。乍一听不容易理解，这次事变是蒋介石向共产党的进攻，怎么他又想跑走呢？青年人听了根本不会相信，但根据蒋介石一贯的作风来看，这是可能的。蒋介石在陈炯明、孙中山手下时都曾拂袖而去。在黄埔军校时他同苏联顾问闹翻了，也是走了又请回来的。他当权后，这种事又有过三次：一九二七年下野去日本，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前躲回奉化，一九四九年和平谈判时退居幕后要李宗仁代总统。他常以退为进。三·二〇事变前他可能想走，等到摸清我们毫无戒备的时候，就大举进攻。历史是曲折的。我早说过蒋介石是最好的反面教员。蒋介石这一集团是很有些东西可写的，在座的不少人熟悉这方面的情况。

今天梁思成没有来，康同璧先生来了，他们二位如果

对维新派有兴趣也可以写。去年学术界对戊戌变法作了评价，也还可以重新估量。国外有专门研究戊戌变法的，但我国研究这个问题的人很少。

现在先提一提这件事，大家好作安排，具体的组织工作由政协常委会秘书处与各方面联系。

上面这些话可能对六十岁以上的人有些用，所以耽误大家不少时间。

“伍豪事件”的前前后后

所谓“伍豪事件”，是三十年代由国民党特务机关炮制，在“文化大革命”中又为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拿来诬陷和攻击周恩来同志的一桩我党历史上罕见的反革命阴谋事件。“文化大革命”中，当江青反革命集团再三利用由国民党特务假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欺骗群众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曾经明确指出此系“国民党造谣污蔑”，周恩来同志作了多次严正的声明，陈云同志根据事实也作了有力的证明，但由于未在党内传达，知道真实情况的人很少。现在，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虽已数年，但流毒未彻底清除，党内外仍可能有一部分不明真相的人，受其欺骗。为了弄清真相，使全党同志从这一事件中受到教育，我们采取郑重的负责的态度根据已经收集到的材料，扼要整理如下。

一、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真相

一九三二年二月间，国民党反动派用周恩来同志的一个别名“伍豪”的名义，在上海《时报》、《新闻报》、《时事新

报》、《申报》等以及国内其他地方的一些报纸上，刊登了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国民党反动派妄图通过这则启事，达到诬蔑周恩来同志和瓦解我党在白区的革命力量的目的。

当时我国的政治形势是：国民党反动派对我革命根据地发动的三次“围剿”，都在红军的反“围剿”中遭到惨败。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家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际，国民党反动派不仅不抗日，反而提出“攘外必先安内”，企图集中力量消灭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他们积极准备第四次“围剿”，同时阴谋一举消灭当时设在上海的我党中央。他们搜捕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这时期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长并主管中央情报保卫工作，他的工作对国民党反动派威胁很大。这是国民党反动派伪造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政治背景。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原为我党政治局候补委员、从事党中央情报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国民党反动派有了一举破坏我党中央的可能。幸而我党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党员钱壮飞同志等及时向党中央报告了这一消息，周恩来同志得知后，在陈云等同志协助下，立即采取紧急措施，转移中央机关和改变负责人住处，改变党的工作方法，等等，使局势转危为安。六月二十二日，又发生向忠发被捕叛变事件，周恩来同志又采取了果断措施。这

样，一再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利用叛徒将我党中央一网打尽的阴谋。敌人深知粉碎他们阴谋的真正组织者是周恩来同志，恨之入骨，乃于九月一日下令“悬赏通缉”周恩来同志等，继而又于十一月底在上海各报刊登《顾顺章悬赏通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等紧急启事》，企图用金钱收买叛徒告密。但这些均告无效。于是乃于一九三二年二月刊登出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目的是想在我党广大党员和工人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使我党涣散解体。

据曾因逮捕顾顺章而获得蒋介石嘉奖的国民党中央特务黄凯（一九三二年二月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驻沪调查员）一九五三年供称，这个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是他和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张冲合谋伪造的。张冲执笔，黄凯派人送上海各报刊载。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五日上午，送到申报馆广告门市部。广告处律师看了后认为，这个启事称二百四十三人脱党而具名只“伍豪”一人，有明显漏洞，“决定十六日暂不刊出”。但二月十六、十七日，《时报早晨号外》首先刊出了这一启事。十八日，《新闻报》也刊登了。十九日，国民党设在上海的新闻检查处派人到申报馆质问为何不登这个启事，《申报》遂于二十、二十一日刊登。《时事新报》也在这两天刊登。

二、当时在上海的临时中央采取了多种措施反击国民党的伪造启事

早在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报纸上刊登这个伪造启事之前两个多月，周恩来同志已经按照党的决定，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他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上旬离开上海，中旬经福建永定进入苏区，十二月底到达瑞金。足见，伪造启事在上海各报刊出时，他已不在上海。当时在上海的临时中央迅速地采取了各种措施，反击国民党的造谣诬蔑。

当时，《申报》在上海影响最大，党和申报馆有一定的关系。二月十八日，党派人给申报馆广告处送去党所代写的“伍豪启事”，以否定国民党反动派的伪造启事。但申报馆广告处律师看后说：《申报》没有刊登《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所以不便刊登“伍豪启事”。

二月二十日，党在上海散发了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传单。这一传单由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宣传部署名，题为《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传单指出：“最近在时报、新闻报各反动报纸堆中所登载的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的广告，就是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无耻造谣的一例”。“无论这些狗东西怎样造谣诬蔑，并不能动摇共产党在劳苦群众中的威信！”

二月二十日，《申报》也刊登了伪造启事。因此，党又派同志于当日上午到申报馆询问：已登《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为何不登“伍豪启事”？申报馆广告处律师答称：铺保手续不合，不能刊登“伍豪启事”。几经交涉后，终于在申报馆总经理史量才、顾问陶行知的支持下，同意用广告处的名义在报上公开答复：“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这是当时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国民党反动派的伪造启事的一种方法。正如陈云同志在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三日指出的：“当时临时中央设法登了一个小广告，用报馆回答伍豪先生的方式，间接说明伍豪有一个否认并揭穿国民党造谣的声明，但因为保人关系，不能登出。用这个小广告使白区和全党同志知道国民党的阴谋，不受其欺骗。”

二月二十七日，在上海出版的党报《实报》第十一期上，刊登了党所代写的另一《伍豪启事》。《伍豪启事》指出：《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是国民党造谣诬蔑的新把戏”，“一切国民党对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与我个人自己的造谣诬蔑，绝对不能挽救国民党于灭亡的！”同期《实报》还发表了题为《国民党造谣诬蔑的又一标本》的文章。文章指出：“疯狂的白色恐怖，以卑鄙的造谣，……假借伍豪同志的名义来污蔑伍豪同志（共产党的领袖之一）、污蔑中国共产党。”

接着，党还采取了更加明确有力的公开辟谣措施，以

周恩来同志的另一别名周少山的名义，请法国律师巴和代登启事以否认伪造启事，进一步肃清其影响。巴和律师为《申报》常年法律顾问，经付以重金后，在三月四日的《申报》上刊出《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启事说：“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这一启事公开刊登后，便在党内外进一步澄清了问题。

一九三二年二月，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也曾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布告。布告中说：“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等于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日左右连日登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的冒名启事，宣称脱离共产党，而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

据国民党特务黄凯于一九五三年六月供称，伪造启事“丝毫未达预期的效果”，“好久并无人来向各机关秘密自首”。国民党反动派演出的伪造启事这一丑剧，最后不得不毫无结果而终。

三、江青等人企图利用伪造启事 诬蔑陷害周恩来同志

由上可见，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是国民党反动派炮制出来用以造谣诬蔑我们党和周恩来同志的，这是历史上早已澄清了的问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等人却一再妄图用这一伪造启事来诬陷、攻击周恩来同志。

一九六七年夏，天津的一些红卫兵在查阅旧报纸时发现了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当他们知道伍豪是周恩来同志的别名后，于五月十二日将载有这一伪造启事的报纸的抄件送与江青。江青收到后，不作任何调查研究，采取突然袭击手段，于五月十七日给林彪、周恩来、康生三人写了一封信，把伪造启事的抄件摆在他们三人面前，信中阴险地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这封信实际上是逼周恩来同志作出交待的通牒。面对这个挑衅，周恩来同志迅速地、断然地予以反驳。五月十九日，他在江青的信上写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这一天，周恩来同志查阅了上海各旧报，亲自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信，并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

二年的有关事件编为《大事记》，一并送给毛泽东同志。信中说：“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的伪造启事”，“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

毛泽东同志看了周恩来同志送去的信和材料以后批：“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一九六七年底，北京有一个学生向毛泽东同志写信重提此事，毛泽东同志于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批：“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毛泽东同志又在一次谈话中说：“象许世友这样六十多岁的人，他都不知道这件事是敌人伪造的。可见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很不容易。”毛泽东同志除了上述两次亲自澄清伪造启事外，还曾经嘱周恩来同志在适当的会议上给同志们讲一讲，录下音，存入档案，使后人了解此事。

江青等人则企图利用伪造启事陷害周恩来同志。一九六七年十月，江青在北京市钓鱼台接见吴法宪等人时说：“我这里什么人的材料都有，……这一口袋是周总理的材料。”同一时期，“四人帮”把持下的上海市革委会的《抓叛徒》简报中，列入“伍豪启事”一条。一九六八年五月，上海档案馆的造反派头头刘和德将诬蔑周恩来同志的材料密封起来交给了吴法宪。

周恩来同志注意到江青等人居心叵测，因而曾就此事多次作了严正声明。除上述外，一九六七年十月和十一月，

他先后将载有伪造启事的报纸和他给毛泽东同志的信拍照存档。一九六八年一月十日他给江青写了一封信，通知她将有关材料拍照存档的事，信中并说：“此事在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二年，凡熟习上海政情和共运的，均知其为伪造。我在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下半年开的中央座谈会上已原原本本谈过，今年有暇，我当在小碰头会上再谈此事，并予录音，记入中央档案。”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日谢富治家属记载，谢富治在死之前说：“所谓‘伍豪启事’是国民党伪造的，毛主席讲过这启事是假的，毛主席和康生等同志早就知道这件事的真象。”现已查明，康生的确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曾先后在涉及这个问题的两份材料上批道：“这完全是造谣诬蔑”，“实际上当时周恩来同志早已到苏区去了，根本不存在这样事”。一九七二年二月十八日，他口授了一个记录，出面证实：“所谓‘伍豪启事’完全是国民党特务的伪造，用来攻击诬蔑我们党和周总理的。”

一九七二年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开始，毛泽东同志要周恩来同志在会上讲讲这个问题，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问题列入了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的议程。参加了这次会议的陈云同志，在六月十三日发言中说：“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共产党员要负责任，需要对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的态度，讲清楚。这件事完全记得是国

民党的阴谋。伍豪二百四十几人的脱党声明，是在周恩来同志已经到达中央苏区之后”。同一天，陈云同志还写了书面发言，说：“我现再书面说明，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六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同志在会上专门报告了这个问题，再次说明这是敌人的造谣诬陷。

对于周恩来同志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就伪造启事所做的报告，毛泽东同志和政治局曾提出将录音和根据录音整理的记录稿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存档，但是会后却被搁置下来未办。而且王洪文于七月间还叫人从上海档案馆寻找“伍豪的材料”。上海档案馆“查到了一份伍豪等人的启事”，于七月十七日报王洪文。王洪文批道：“此件先存敬标同志处，再等一个时期处理，可能中央有指示。”一九七二年冬，上海有人证明一九三二年二月为驳斥国民党反动派伪造的“伍豪等启事”而设法刊登党所代写的“伍豪启事”的情况，启事内容说“报载事实不符，谣传不足凭信”。这一材料被张春桥、徐景贤扣压，不报中央。这些都说明江青一伙的陷害之心不死。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周恩来同志病重，在入手术室前他要来了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报告的记录，用已经颤抖的手亲笔在上面签了名，并注明了报告日期。这说明了你对这件事的关切。

周恩来同志一生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英勇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党性纯洁，立场坚定，不能容忍敌人

的诬蔑对他的玷污，不能容忍这种诬蔑给我们党带来不良影响。为了保护党的荣誉和捍卫自己的政治生命，他为澄清所谓“伍豪等启事”作了多次努力。经过他的努力、毛泽东同志的说明和陈云同志等的证明，事情已经完全清楚，江青等人企图利用伪造启事的阴谋早已破产。但是，由于一九六七年五月提出这个问题以来，始终没有一个党的正式文件澄清此事，至今还有许多同志不了解此事的前因后果。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国国民党反动派的伪造启事曾经在一部分人当中传播，所造成的不良影响至今尚未清除，因此，现在根据历史事实写出这份材料，向全党同志如实地介绍国民党反动派伪造《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以及我党反击国民党反动派造谣诬蔑的经过，仍属必要。这不仅符合周恩来同志的遗愿，也符合全党同志的愿望。

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党史研究室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聂荣臻回忆录

——红军时期

编者按：《聂荣臻回忆录》红军时期部分已经完稿，我们征得聂荣臻同志的同意，在此发表。

第一章 在中央苏区

一、到中央苏区去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中旬，上海白色恐怖日趋严重，各苏区又迫切需要干部，组织决定我继恩来、伯承、剑英同志之后，迅速撤离上海，先转移到中央苏区去。到中央苏区，只不过是路过，目的是要到湘鄂赣苏区去，我是被分配到湘鄂赣苏区工作的。因为一个人去那里不容易，听说湘鄂赣有代表在中央苏区开会，我到了中央苏区就可以随他们一起去目的地了。瑞华同志和孩子自然留在上海。

组织上的决定是正确的。自从顾顺章叛变之后，上海形势已经大变，很多地下组织已经被敌人破坏了。象顾顺章这样曾在我中央特科搞了很久的人叛变，对我党保存在

上海的核心力量来说，已构成很现实的威胁；而我又是和顾顺章打过长期交道的人，自然是及时撤离为好。何况苏区正在大发展，正缺人手去开展工作，我又是学军事的，苏区正是中国革命直接用武之地。因此，一经组织上决定，我即匆匆地告别了留在上海坚持斗争的同志，告别了瑞华和正呀呀学语的女儿，踏上了去中央苏区的征途，相期于全国革命胜利之后再相见。

我是和陈寿昌同志从上海结伴起程的。陈寿昌是个大革命时期就入党的好同志，他当时是中央特科专门负责安排交通的，后来一九三四年在湘鄂赣苏区任省委书记时，在作战中英勇牺牲了。我们先乘船到汕头，再奔潮州乘小汽船，沿韩江北上，在大埔起旱，大体是从大埔经虎岗、永定、上杭县境，先到长汀，再转瑞金。这是一九二八年建立起来的一条非常秘密的交通路线，一九三〇年归中央特科交通局直接领导。中央许多负责同志也都是经过这条交通线，被护送到中央苏区去的。中央苏区从上海、香港购买药品、无线电器材，也都是经过这条路线。我们和秘密交通站接上头以后，一切行动都听向导的，不该问的，什么都不能问，你问他，他也不会告诉你。我们自己也尽可能不开口讲话，因为我们不会讲广东话和福建话，口音不对会引起别人怀疑。靠近城镇地区，你只是远远地跟在向导后边走就是了。他说白天走就白天走，他说晚上走就晚上走，这样走了四、五天（每天只走三、四十里）。因为

都是在白区，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又经常要赶到可靠的投宿地点，有时不得不赶路，有时又不得不停下来等待时机。直到过了永定，知道已经到了苏区的边沿，才轻松一点，可以比较放心地赶路了。路上，我们都是穿长袍，装成老百姓的样子。每个人都准备了一套对付敌人盘查的说词。幸好许多难关都被我们闯过去了。

整个旅途对我说来倒并不生疏，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我大体上就是从这条路上撤走的，现在不过是往回走罢了。这一带真是好地方，和上海亭子间相比，实在是换了天地，沁人肺腑。可惜这样好的地方，年年都有穷人被苛捐杂税逼得背井离乡，卖“猪仔”远走南洋。现在只有把希望寄托在苏区。

我进入中央苏区的第一个城市是永定，接待我们的县委书记是个女同志。她很热情，安排得很周到。因为永定离赤白交界线并不远，显得有些衰败残破。以后到了长汀，这是毛主席和朱德同志一九二九年三月率红四军入闽建立的中央苏区第一个县级政权。一路之上，只有到了长汀，我才见到熟人。当时福建省委设在长汀，欧阳钦同志在那里担任省委书记。他是我留法勤工俭学时的老同志，又一起在武汉军委和上海军委并肩战斗过，见到他我高兴极了。在长汀，正赶上过新年，他告诉我的第一条好消息是：本月十四号，国民党西北军的第二十六路军，有一万七千多人，在我党特别支部和共产党员赵博生以及董振堂等同志

的领导下，在宁都起义，参加了红军。

当天，福建省委就给我准备了一匹马。我骑着马，用了五个多小时的时间走了六十来里路——有一段还把路走错了，赶到了瑞金。从长汀到瑞金，是大革命失败以来我最高兴的一天。我清楚地意识到已经进入了横跨闽赣两省，纵横数百里的中央苏区，这完全是我们党领导的工农大众和红军打下来的自己的天下了。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晚上约九时许，我就到了瑞金。

当晚在瑞金总部，我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同志，大家都分外高兴。剑英同志责怪我太大胆，说在长汀到瑞金的路上，并不都是巩固区，一人单骑黑夜赶路，还有一定危险哩。

我向恩来等同志汇报了自从他们离开上海以后上海斗争形势的新变化，有谁牺牲了，有谁叛变了，有谁又落荒了，更多的是汇报了留在上海继续斗争的同志们的工作情况。

朱德同志以他特有的浑厚、老成、平易、谦虚的风度，向我讲了自从南昌暴动失败分手以后，他如何带着失败了但不肯低头的队伍，辗转到了湘南又进到井冈山和毛泽东同志会师的情形。

我向毛泽东同志讲了自己初到苏区的感受。我说，在白区工作是在敌人屠刀下坚持斗争，处处显得被动，有时真感到只有招架之功而乏还手之力，到了苏区，才是到了

自己的天下，可以大摇大摆地行走了。毛泽东同志诙谐地用手比划说：“还是象我们这样，拿起枪杆子建立自己的政权，干得痛快啊！”

我到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已胜利结束，中国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刚开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已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分别正式成立。再加上十二月发生的宁都暴动，红军一下子增加了一万七千多人。这时中央苏区的形势，真是一片兴旺景象。在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时，我在上海就和伯承同志议论过，象第二次反“围剿”那样，红军横扫敌军七百里，这在战争史上都是很少有的。第三次反“围剿”胜利更大，引起了国民党军队内部的震动和分化，因此才有宁都暴动。特别是我们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形成了和国民党全国性政权对峙的局面。可以说，这时的中央苏区正处在威严赫赫的大发展时期。

到瑞金不几天，组织上又不叫我到湘鄂赣苏区去了，确定留在中央苏区工作。

我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代表军委到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去帮助工作。这个军团是由宁都起义的部队新组编成的，当时肖劲光同志已经到五军团任政委，刘伯坚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左权同志任十五军的政治委员。我们和赵博生同志等互相配合，作团结安定这个新起义部队的工作。我每天找些上层军官谈话，说明形势，讲清政策，晓以大

义，使他们提高认识，安下心来当红军。这个部队在日后的作战中一直表现很好，是中央苏区红军主力之一。

我由五军团回来，一九三二年一月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是王稼祥同志。他与任弼时同志都是一九三一年四月到中央苏区的。我到总政不久，即受领任务，参加二月初打赣州，到前线帮助部队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开始在瑞金开会研究打不打赣州时，我参加了这个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赣州是敌人必守的坚城，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于我不利，反对打这一仗。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毛泽东同志历来都是主张尽可能打野战、打运动战的。毛泽东同志认为，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朱德同志也是不赞成打赣州的。中央局和中央军委的一些同志却坚决主张打赣州。最后表决时，因为受中央一月九日发布的《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这条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总想在江西多打下几个大城市，赞成打的占了多数。我因为刚进苏区，对情况不清楚，会上没有发言。苏区中央局的多数同志站在错误的一边，还是决定打。既然决定打，我作为总政治部副主任，当然是极力动员大家打好。

赣州是粤赣交通要道，是赣南经济政治军事中心，素有“铜赣州铁上杭”之说。敌人当然是不会轻易放弃这座城市的。而且赣州三面环水，地形对敌人防守有利。但是我们打得很英勇，边打边挖坑道。打赣州的前敌总指挥是彭

德怀同志。指挥所离火线很近。我一直跟着三军团司令部行动。当时，我看了看赣州地形，四面都比较开阔，水陆交通比较方便，而我们则屯兵于坚城之下，为兵家所忌。我建议我们要多掌握一点预备队，少了不行。当时三军团后边有五军团的十五军和十四军作预备队，随后林彪任军长、罗荣桓同志任政委的第四军也赶到了赣州以西以南的南康、新城、扬眉地区。我军利用坑道用黑色炸药炸城，虽然两次爆炸都炸塌了一段城墙，特别是第二次在东门炸开了一个二十余丈的缺口，但因为敌人预有准备，把缺口用火封死，我军仍未能攻入城内。敌人罗卓英带了三个师由吉安等地分进合击，驰援赣州。罗敌两个团利用我们侦察警戒不严密的弱点，偷渡赣江成功，钻进了赣州城。敌人大部队一出击，我红一师大部分插到西门河川与城墙之间挖坑道的部队，被敌人截断了，一师师长侯中英被俘。幸亏五军团十五军手持大刀及时冲上前去打退了敌人，三军团在南门与东门的攻城部队才转危为安。这次战斗，从二月四日开始围城到三月七日被迫撤围，共打了一个月零三天，在战略指导思想 and 战术上，都给了我们一次很大的教训。

二、到一军团工作，参加打漳州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二日，赣州战役刚结束，中央决定调我到一军团工作。从此以后，我就一直以一军团为家，

在一军团任政治委员七年之久，开始了我长期的野战军旅生活。在中央苏区，我们带领一军团，时而江西，时而福建，时而广东，真是马不停蹄。以后长征北上抗日，走遍了半个中国，打遍了半个中国，那更可以说是戎马倥偬了。

本来，中央苏区早就有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的建制，是由第一方面军的首长兼一军团的首长，也就是由朱德同志兼一军团军团长，毛泽东同志兼一军团政委。到了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央在瑞金召开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决定撤销一方面军总部。毛泽东同志原一方面军政委和前委书记的职务实际上也撤销了。朱德同志的兼一军团军团长，毛泽东同志的兼一军团政委，也随着一方面军总部的撤销而撤销了。到了一九三二年三月，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重新成立一军团。三月十二日军委命令，提升四军军长林彪为第一军团军团长，我任第一军团政委。三月十五日又任命陈奇涵同志为军团参谋长，罗荣桓同志为军团政治部主任。当时一军团下辖第四军和原属五军团的十五军。四军军长为王良同志，政治委员为罗瑞卿同志，十五军军长为黄中岳同志，政治委员为左权同志。两个军下面各有三个师，全军团总人数为九千四百九十八人。原属一军团的第三军则拨归了五军团。三月中旬在南康县唐江镇的一个祠堂里开了全军团团以上干部会议，宣布了一军团领导的新任命。毛泽东同志亲自参加了这个会议，并讲了话，鼓舞大家执行新编制，迎接新任务。

为了确定新任务，中央局内部发生了激烈的意见分歧。三月中旬，苏区中央局在赣州东北的江口开会，毛泽东同志批评了攻打赣州的错误，极力主张红军的主力应向赣东北以及闽北、浙江、苏南、皖南等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和空虚的地区发展。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同志则仍坚持争取一省数省胜利的方针。据此，军委十八日命令中央红军主力兵分中西两路，沿赣江而下，赤化赣江两岸和夺取两岸城市。一军团和五军团受领了中路的任务。走到半路，毛泽东同志向我和林彪阐明了他的主张，我们觉得还是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正确，建议中央军委将我们的行动方向改向闽西。三月十七、十八两天中央局开会，批准一、五军团改称东路军，向闽西发展。毛泽东同志在长汀向一军团团以上干部作了东征动员，大意是：我们的新任务，是经闽西向闽南方向发展。他指出：闽南逼近厦门，当前日寇的势力已到达厦门，我进军闽南，对日寇侵略阴谋是一个打击。我军以实际行动贯彻我党抗日主张，无论对国内、国外，都将产生极大的政治影响。同时应该看到我们中央苏区沿赣江向北没有多少发展余地，国民党“剿共”的大本营就设在南昌。如今向西发展，有赣江梗阻，大部队往返不方便。向南发展则必然会和广东部队的主力顶牛。只有向东发展最有利。向东则一来有闽西老根据地作依托，二来闽南尚有广阔的发展余地，是一个最好的发展方向。因此决定趁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以后敌人暂时无力组织新的进

攻的空隙，乘红军大胜利的余威，由他亲自带领东路军，打到外线去，打到闽南去，发展苏区，扩大我军的政治影响，并获得物资补给。

与东路军向闽南进军的同时，彭德怀同志也带领三军团作为西路军向湘赣边去了。

在中央苏区那个时期，一次战役下来，只能短期整训，不能蹲在苏区腹地吃老米。得主动出击，开辟新地区，打土豪筹款，解决吃饭问题和扩充红军。广大红军指战员懂得这个道理，很愿意到新地区打仗。

在福建，我们作战的对象主要是国民党张贞的四十九师，其他都是地方保安部队。东征动员以后，毛泽东同志一面命一军团开赴长汀以北的新桥迷惑敌人，一面电周恩来同志（当时任中央局书记），提出东路军必须直下漳（州）、泉（州）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开展局面，若单纯在龙岩附近筹款，仍是保守局面，下面的文章很不好做。同时漳州地形难守易攻，于我有利。顾虑的是粤敌从大埔出龙岩，威胁我后路，所以希望在赣南信丰的五军团尽快东调龙岩，否则一军团兵力单薄，后方空虚。周恩来同志同意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于是我们一军团从新桥、馆前一线掉头往南，急向白砂、龙岩一线开进。毛泽东同志则到上杭、旧县，向谭震林、张鼎丞等同志布置配合东征龙岩、漳州的任務。四月二日一军团离开长汀地区，经河田、涂坊等地，四月七日到达白砂。当天毛泽东同志也由上杭赶

到白砂。四月八日一军团全部(含军团部、四军、十五军)到达龙岩西部约五十里地的大池。四月九日部队一面在大池休息，一面侦察敌情地形，得知守龙岩的是张贞四十九师的两个团和少量地方民团，战斗力并不强。毛泽东同志与我们军团几个领导人研究后决定，直接向龙岩攻击前进。四月十日拂晓，十五军为先头，四军跟进，乘敌不备，向龙岩发起进攻，十五军先消灭了小池的少量敌人，即向龙岩外围的要点考塘前进。敌一个团及一个补充营凭借既设阵地和炮楼负隅顽抗，我十五军行动受阻。红四军随即沿两侧坚决进攻，遂将考塘之敌包围全歼，随即于当天占领龙岩。龙岩之战，歼灭张贞一个多团，给了张贞以迎头痛击。龙岩一仗为漳州战役的胜利打响了第一炮。

四月十一日，在龙岩由毛泽东同志主持，一军团召开了师长、师政委以上干部会议，总结龙岩战斗的经验和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毛泽东同志总结龙岩战斗胜利的原因是，在白砂休息了一天，集结了兵力，直取龙岩；在大池隐蔽宿营，不去有敌人守备的小池，达到击敌不备的目的。教训是我十五军四十五师解决小池前哨之敌行动还不够迅速，致使龙岩有一部分敌人来得及逃跑，未能全歼。与会者都同意这个分析。对下一步行动，会上大家的共同意见是，张贞的四十九师共有九个团，在龙岩仅被我军消灭不到两个团。张贞与闽南地主、资产阶级关系极深，当地交通与通信联络均较方便，不会轻易撤退，一定会在闽南某

地集中兵力与我决战。于是我们确定的部署是，由罗炳辉同志率领的十二军在闽粤边的上杭、武平地区警戒粤敌，保障我军的后路和右侧翼。一军团则索性在龙岩休息，让敌集中，待五军团赶到，东路军主力会合以后再向集中之敌进攻，五军团于四月十四日赶到了龙岩。即以十三军驻守龙岩，负责保障龙岩到漳州的战勤供应运输线。第三军由军长徐彦刚同志率领，与一军团一起参加进攻作战。这个行动计划报告了军委并得到批准。后得知张贞的部队全部退守漳州。我军即由龙岩出发，经和溪、龙山一线，于十五日赶到漳州西北约二十多公里的马山。十六日我东路军总部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于马山组织了敌情地形侦察，确定了我军进攻部署。当时张贞防守漳州的兵力为四十九师一四五、一四六两个旅加上地方靖卫团、保安队等共八、九千人，两个旅的主力部署在漳州西北天宝到南靖一线，一部敌人控制在漳州市内，其主阵地在大尖山、十二岭到天宝以北。这里地势险要，山岭起伏，北扼天宝大山，南靠宽阔的龙江，要进攻漳州，必先突破这一线阵地。据此，我军确定以四军主攻敌人的天宝阵地，以十五军助攻宝林到南靖一线的敌人，以三军为预备队。十七日四军越过龙江支流东溪，到达大尖山北的南坪、内洞一线进攻出发阵地，三军也进到这一地域。我军本拟十七日即行进攻，但十七、十八日连降大雨，河水陡涨，视界迷蒙，而且道路地形都不熟悉，所以推迟到十九日拂晓同时发起攻击。我

担任主攻部队红四军的先头十一师在第十师的配合下，向杨梅岭、十二岭、风霜岭的敌阵地发起猛烈进攻。十一师师长为刘海云，政委为刘亚楼，下辖三个团。三十三团四月十七日作为师的先头部队由政委刘忠和副团长陈冬生率领，克服河水暴涨的困难，抢先渡过东溪，掩护全师展开，并受命担任从正面配合十师的部队攻占大尖山东侧的敌人阵地，尔后直插漳州城郊的天宝。三十一团则由团长吴皋群和政委宋成泉率领，绕到敌后攻歼大尖山守敌。当时规定整个师一定要等绕到敌后的三十一团先打响后才能发起攻击，以利全歼敌人。三十二团则由政委杨成武率领，随三十三团后跟进，扩张战果。整个战斗几乎都是按我们预定的作战计划实现的。我们与在城郊大尖山到天宝一线据险顽抗的敌人一个旅，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天宝阵地被我攻占后，敌人的防线即全面崩溃，这个旅大部份当了俘虏，被我们消灭得干干净净。敌人从漳州城开来一部增援，在天宝东南遭我军迎头痛击，又被打回了回去。十五军在助攻方向的进展也很顺利。他们在南靖至宝林一线，由左权同志率领四十四师（师长王洪章，政委刘英）打前锋，佯攻宝林桥，强渡芟水，配合主攻部队把沿途各点的敌人歼灭或击溃了。张贞吓得赶紧将城中弹药库焚毁，率残部弃城分头向漳浦、泉州、厦门方向逃窜。四月二十日我军遂占领漳州城。随后又相继占领离厦门不远的石码（龙海）和漳州以北的长泰，以南的漳浦、云霄、平和。在石码，我们晚

间站岗的哨兵就可以看到帝国主义军舰上射出的探照灯光了。

漳州战役，我军共歼敌约四个团，张贞的主力基本被歼，俘敌一千六百多人。张贞残部大部分逃到了闽粤交界的海滨城市诏安，长期未能恢复战斗力。

漳州战役之所以能获得胜利，首先是我军行动神速，大部队在丘陵地运动，两天赶路一百五十多里，使敌人来不及组织充分的防御；其次是战役决心正确，部署周密，尤其是选择了恰当的主攻方向；第三是我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善战，在龙岩战斗胜利的鼓舞下，士气更加高昂。漳州战役我军也有弱点，以一万五、六千人对敌八、九千人，并不占绝对优势，兵力不够分配，所以只能在漳州西北一线正面进攻，没有能派出一支部队迂回漳州以南，断敌退路，致使残敌四千多人（大多数是靖卫团）得以漏网。

四月二十一日，在漳州由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了师长、师政委以上干部会议，讨论下一步工作，决定的主要内容有：第一，十五军在南靖到天宝一线，三军、四军在漳州附近，进行下列工作：收集战利品；搜查反革命分子，重点是搜查反动党政军机关、旅馆和地主豪绅住宅；向群众宣传，分发谷物给群众，扩大红军政治影响；向地主豪绅筹款。第二，严格执行入城纪律，不许拿非公用品，不许打破东西，维持革命秩序。第三，军事上准备随时打击来闽的广东敌人。

四月二十二日下午，三军、四军和总部连以上干部在漳州城内听毛泽东同志作报告。他总结了前一阶段作战的结果，布置了下阶段的任务。除了形势部分而外，他讲的大体上就是师以上干部会议确定的内容。毛泽东同志很有风趣地说：“有人说我们红军只会关上门打狗，怀疑我们在白区能不能打仗，可是你们看，我们在白区不是打得蛮好嘛！”

在漳州开会的同时，十五军在天宝、南靖也开了同样内容的会议。两处会议由我和林彪分头参加。

这次部队进入漳州城，对部队的入城纪律、政策观念，是个很好的考验。当时的漳州，是福建的第二大城市，华侨很多。红军部队在漳州纪律好坏，执行政策怎样，影响所及，决不只限于漳州范围。

部队当时的入城纪律是良好的。二十日上午八点开始入城。有的部队入城时，还将全团司号员集合在队伍前面鸣号作先导，步伐整齐地开入市区。毛泽东同志身穿制服，头戴草帽，骑着一匹黄马，也随队入城。城外的部队无许可证的一律不得入城。街上除宣传队、调查敌产的工作人员和有特殊标志的巡逻队外，很少见到军人。

部队在漳州执行的政策，前面说了，都是由毛泽东同志主持开会拟定的。毛泽东同志一九三〇年亲自指挥部队打开过吉安，规定过一些政策。这次规定得更完善了，强调红军进入漳州后，商店照常营业。对敌产我们没收，仍

打土豪，可是对一般工商业，我们只是通过商会向他们筹款。

当时陈嘉庚先生在漳州开有一座商店，派了他的款，他开始不交。我们只是派人进入他的商店，取走相当于所派款项的胶鞋、罐头等给部队吃用，仍令其继续营业。后来全国解放见到陈嘉庚先生，他说起这件事，还是比较满意的。他认为红军当年在漳州是讲“信用”的。

打开漳州以后，部队很快分散，四军在漳州、石码、长泰等地，三军在漳浦，十五军在天宝、南靖等地发动群众打土豪，扩兵，筹粮、筹款。可是在漳浦，有的部队在林彪纵容下，对政策的执行一度搞得很混乱，甚至把一些不交款的老财弄到街上去拷打。为了制止这些违反政策、脱离群众的作法，我和林彪之间，发生了我们共事史上的第一次争吵。

我在黄埔军校就认识林彪。北伐到武汉，林彪由黄埔毕业分配到独立团实习，就是经过我的手分配的。这次我和林彪一起被派到一军团工作，在我当时看来，林彪还年轻，世故也比较少一些，虽然气盛，但只要做好工作，还是可以团结共事的。我对他所持的态度是：尽量支持他的工作，遇到非原则问题，即使有不同的看法，也不多争论。但是遇到原则问题就不能让步。

在漳州前线发生的分歧，的确是原则分歧，是我们红军这个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执行什么样政策的问题。

这将直接影响到当时民心的向背，关系到新开辟的苏区能否巩固和发展。我对林彪说：对一些不肯出钱的老财，给他们一定的惩戒是必要的，但我反对把他们弄到大街上去拷打。这种搞法不光不会得到一般市民的同情，甚至也得不到工人、农民的同情。其结果只会是：铺子关门了，人也逃走了，筹款筹不到，政治影响反而会搞得很坏。林彪当时反问我：我们究竟要不要钱？没有钱就不能打仗。我回答他，我们既要钱，又要政治。我们是红军，如果政治影响搞坏了，即使你搞到再多的钱，你甚至把漳州所有的老财的财产都没收了，都毫无意义。经过争论，林彪有所收敛。部队经过教育，也杜绝了只顾弄钱不讲政策的倾向。

部队在漳州，也有无意中违犯纪律的，那都好纠正。比如语言不通引起的隔阂，那时的福建比现在闭塞，历史上称为“百越”，隔个州县讲另一样语言。我们部队初去，有些闽西人也不太懂闽南话，引起过一些误会。再就是漳州一带，侨眷很多，比较有钱，穿得也比较阔气。红军战士大多来自农村，见着穿毛料绸缎拿文明棍戴眼镜的，有时误认为他们都是土豪，把他们捉了起来。毛泽东同志发现后，指示部队赶紧清查，把误捉的都释放了。通过这件事，使部队得到了一次很深的教训，即办事情要注意调查研究。我军作为工作队，在漳州地区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动员群众参加红军以及部队整训等工作都取得了很大

的成绩。一个多月中，我军共筹款一百多万元，还有大量布匹、粮食、食盐等。这些钱和物资，绝大多数送到当时中央局和军委总部所在地长汀和瑞金，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央苏区和红军在财政上、物资上都很紧缺的困难。群众参军的共九百多人，还有一批知识分子，象担任过四野作战处长现在总参谋部工作的苏静同志，象先后任过一军团和新四军的组织部长后来牺牲在上饶集中营的李子芳同志，都是在这时候参军的。部队也充实了，五月份我东路军曾作了一次兵力统计，共有一万六千多人，内一军团九千六百多人，五军团(缺一个师)六千六百多人。我军在当地还组织了游击队四百五十多人，日后成为新四军的一部分。在漳州、石码觉悟高的工人中成立了三千多人的秘密工会和地下党组织。向贫苦群众发放了谷子四万多石，还有其他物资，使当地群众的革命热情高涨起来。

五月二十七日，我们接到总参谋部通报，陈济棠正在广州召开军事会议，有勾结广西军阀共同入侵赣南或闽南之说，又得悉十九路军正开赴福建途中。五月二十九日接军委指示，东路军的下一步任务是开赴赣南，与入侵赣南苏区的粤敌作战。接命令后，我东路军于六月初分别离开漳州、龙岩地区，回师赣南。

部队在漳州打了胜仗情绪很高。一军团、五军团的军需服装都解决了。大家还轮流看了一次无声电影。红军看电影，这在全国红军中，还是首次。

一军团的部队，在漳州照了一张有数千人参加的大照片，这是很珍贵的历史资料。

在漳州缴获了两架国民党的飞机。红军缴获飞机，这也是首次。我和林彪还在飞机前面照了一张照片。这两架都是小型侦察机，一架缴获时就不能开，一架能开，由一位朝鲜同志把它开回了瑞金。

由于这是我带领部队首次攻入一座城市，经验教训都比较深刻，所以以后直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每逢攻打一座城市，我都引用进漳州的事例，提醒部队应如何遵守入城纪律和执行城市政策。

打赣州，没有打下来，吃了个大苦头；打漳州，打下来了，吃了一个甜头。两者相距一个多月。两相比较，究其原因，无它：赣州，是敌人的强点，又有国民党大部队增援，再加上我们侦察警戒疏忽，所以吃了亏，毛泽东同志一开始就不主张打；漳州，是敌人的薄弱点，毛泽东同志就赞成我们打，亲自指挥我们打，取得了胜利。所以，选择敌人的弱点打，应该是我们处于劣势的部队绝对要遵守的一个军事原则。此外，即使漳州打下来了，也不能引申说凡城市都可以打。普遍地攻打城市，在当时条件下显然是错误的。“争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夺取中心城市”等口号显然更是战略性的错误。

这是我跟随毛泽东同志东征领会的战略思想。

毛泽东同志在战术指挥上也有很多特点。第一，他很

注意调查研究，对敌情、地形以至民情风俗都是亲自找人或到现场作调查。这次打漳州，认为漳州“易攻难守”，就是他调查得来的结果。他在调查的基础上，又善于把握全局，捕捉战机，迅速定下决心。他还很注意分析、研究、判断，摸敌人的规律，寻找敌人的弱点，迅速行动。第二，他制造假情况，给敌人一些虚伪的“示形”，以便调动敌人或麻痹敌人，出敌不意。比如这次作战，用毛泽东同志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做了许多“乱敌探耳目”的动作。这次打龙岩是“不顾坎市，直取龙岩”，而且是在“大池宿营，不去小池”，所以达到了击敌不备的目的。第三，他很注意集中优势兵力。这次决定打漳州，是他建议把五军团从江西调来，才形成作战拳头的。第四，他很注意总结经验教训。在龙岩、在漳州，他都亲自给干部作总结。第五，他也很讲民主，大的军事行动，都尽可能事先征询我们的意见后再作决定。

毛泽东同志在开辟闽南新区所制定的方针，更帮助我学到了很多宝贵的策略。其策略思想的基础是从实际情况出发，不因占领漳州冲昏头脑，不因占领漳州而背上包袱。占领漳州以后，本来局面很大，可是他估计我们力量有限，不可能长期占领。所以他确定在新区的工作方针是“公开宣传，秘密组织”。只是在原先有游击武装基础的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即“以龙溪为中心，向南靖、云霄、平和、漳浦等五县扩大游击战争。创造小红军、建立小苏区”。在漳

州，“只散发谷物而不建立政权，不分土地”。

漳州战役，是我第一次在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下，带兵打仗和做群众工作。他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和政策思想，以及他的领导才能，都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使我由衷地钦佩。

三、水口战役和乐安、宜黄战役

打漳州以后，一军团参加了有名的水口战役。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曾提到这次战役，有多方面的经验教训可供汲取，也是红军史上著名的恶仗。

打这次战役的历史背景是：正当我东路军漳州战役取得胜利的同时，由彭德怀同志率领的西路军在湘粤赣边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五月中旬，蒋介石调集六个师的兵力，在何应钦指挥下，对我三军团实施围攻。三军团被迫撤出上犹、崇义根据地。粤敌以两个师侵占赣南西部大片地区，另以一个师侵占信丰，向于都窥进，我赣南苏区受到粤敌巨大威胁。

为了打击粤敌，我东路军奉命回师赣南，然后再西向南雄。六月二日、三日，在毛泽东同志率领下，我一、五军团分别由龙岩地区出发向西。六月份，闽、赣两省天气已经非常炎热，长途行军很疲劳，再加上各种疾病的困扰，部队非战斗减员很多，但大家情绪很高，听说是为了保卫

赣南苏区，互相鼓励，迅速向赣南开进。

开进途中，要路过一些地主的土围子。打这些土围子是件麻烦事。他们一般以几十或几百人的兵力凭险据守，筑有比较坚固的工事，我们兵力多了用不上，兵力少了不容易打下来。六月十三日，一军团到达闽赣边的大禾，就遇到这样一座土围子。这个土围子我先去侦察过，遭冷枪袭击，一发子弹打来，擦耳而过。本来我已决定放弃侦察，绕道通过。王良同志不知道，又去侦察，结果被冷枪击中，折了我们一员好将。王良同志是个很好的同志，四川人，一九二七年参加秋收起义，一贯作战勇敢，待人热情诚恳，对他的牺牲，我们大家都感到非常痛惜。王良同志牺牲后，只得由周昆接任四军军长，这是开进途中的一个波折。

六月下旬我们到达赣南天心等地。东路军的番号取消了，受方面军直接指挥。因为此时我军又已恢复一方面军建制，朱德同志兼方面军总司令，王稼祥同志兼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同志随军行动，南雄水口战役就是由他们几位指挥的。我们在赣南接到方面军命令，命令指出粤敌共十二个团，分别窃据赣南的赣州、南康、大余、上犹、杨眉寺、信丰等地，另外在广东南雄及其附近有六个团，统归第一军军长余汉谋指挥。在赣州北有蒋介石的五个师，在湘南有何键的两个师。我们一、五军团和独立三师的任务是，由信丰南部直取南雄，如南雄得手，我军就可威胁

韶关甚至广州。估计各路粤敌必将回援南雄，我一、三、五军团、十二军及独立第三、第六师分别协同配合，相机在运动中于南雄附近给余汉谋以最大的打击。无疑，这个命令对敌情的判断和下达的决心都是正确的。

接命令后，我一、五军团不顾天气炎热长途行军的极度疲劳，即急行军经信丰南部渡过桃江，六月底七月初先后到达广东乌迳地区。

先是我三军团在池江与粤敌四个团遭遇，经过激战，敌退守大余。方面军判断退守大余的这股敌人可能要退南雄，命令一、五军团开向梅关、中站一线，准备与三军团配合，将大余出来的敌人包围在中站附近而歼灭之。七月初我们一军团击溃梅关守敌一个团，控制了梅关要隘，首先完成了南面的部署。后来三军团围攻大余，大余的敌人凭险固守不动。但三军团却误报大余守敌已经向仁化逃跑，方面军当即命令五军团迅速直插南雄以南，防止南雄的敌人向南逃跑。当方面军知道大余的敌人没有动，而粤敌第四师却离开信丰到达九渡水，正向南雄撤退，又命令五军团迅速返回湖口待命。

七月七日粤敌第四师到达乌迳。这时陈济棠命令他的独立第三、第五师到达南雄增援，并以一部向我中站方向出击，当天到达新迳附近。方面军命令林彪和我统一指挥一、三军团和十二军准备歼灭南雄出犯之敌，命令五军团和独立第三、第六师负责歼灭第四师。

八日凌晨，五军团在向乌迳开进中发现敌第四师由浈水南岸向南雄逃窜，即改变行军方向，向水口堵击。当天下午在水口以东的弱过村，隔河与敌打响。五军团以十三军在正面攻击，以三军由左翼渡河绕到敌后，很快击溃敌人两个团，敌当晚退守水口圩及附近高地。我五军团误报水口之敌已经向南雄逃跑，致使方面军改变了原先一度决定的由我一军团和十二军增援水口的计划，而没有赶往水口。九日，余汉谋一面命第四师固守待援，一面命独立第三师和独二旅紧急由南雄驰援水口。九日中午南雄援敌与第四师会合，即以优势兵力向我猛扑，我五军团错把九个团的敌人当成三个团打，双方激烈拼杀，我军伤亡很大，五军团处于困境，好在陈毅同志领导的江西独立第三、第六师及时赶到，才稳住战局。

七月九日下午，我们接到方面军命令，要一军团与十二军紧急开向水口增援五军团。十日拂晓我军到达水口战场，即会合五军团和独立第三、第六师向敌人勇猛冲杀，双方激战在水口周围，浈水河畔。我军打得很英勇，许多同志手持大刀与敌人肉搏，一时战场杀声震天，使敌人受到重创。但终因三军团未能赶到，敌我兵力基本相当，经几个小时战斗，只将敌人击溃，敌逃回南雄。粤敌经过这次教训，全部退出赣南苏区，以后很长时间未敢轻举妄动，使我赣南苏区得以安定了一段时间，这对于我们尔后的北线作战是很有利的。

三军团赶到水口时，我见到了彭德怀同志。他告诉我，一、三军团分兵以后，他们在湘粤赣边扩军四十个营，我们可以放手打，兵员不成问题。

水口战役是著名的恶仗。双方伤亡之大，战场景象之惨烈，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罕见。“尸横遍野”，对于这次战斗来说，并不是过甚其词。有的部队白天打仗，夜间还要在该地露营，许多同志疲劳过甚，倒头便睡，第二天拂晓才发现是和尸体露宿在一起了。有的同志夜间口渴，摸到河沟去喝水，有一股血腥味，第二天拂晓一看，河沟里的水泛着红色。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同志在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对水口战役作了总结。他说，水口圩这一仗“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当时兵力摆得并不少，也是想集中起来歼灭敌人，但是由于部队一再误报敌情，领导决心一再变更，自己乱了步骤，兵力并没有真正集中起来。以致打成了同敌人拼消耗的战斗。这次总共击溃陈济棠二十个团，“本来一般算作胜仗，而且还算作大胜仗的。”却同时“在某种意义上简直还可以说它是败仗。因为没有缴获或缴获不超过消耗”，“我们历来就不欢迎这种胜仗”。

水口战役以后，一军团在南雄以东的粤赣边一面休整，一面打土豪筹款，待命行动，以后奉命北上。我们自七月下旬即逐步北移，经崇仙、安西、古陂、信丰、长洛等地，再渡过于都河，于八月上旬到达兴国南郊。

八月初，方面军在兴国附近的竹坝召开军事会议。接着中央局召开了兴国会议。这两个会议决定，一是红军主力北上消灭乐安、宜黄、永丰之敌，二是对红军进行整编。在这次整编中，将五军团的第三军正式编回一军团，仍由徐彦刚同志任军长，朱瑞同志任政委。

整编刚结束，八月八日中央军委重新任命毛泽东同志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同时下达了一、三、五军团发起乐安、宜黄战役的命令。

乐安、宜黄守敌为孙连仲的第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共六个团。这股敌人离中央苏区最近，又比较弱，因而先消灭二十七师进行乐安、宜黄战役的决心是完全正确的。

接到命令后，我们与兄弟部队随即北上。因为是在中央苏区行军，群众条件好，军委又命令我们各军团行军开进要严守秘密，封锁消息，所以八月十五日当我军到达招携、东韶一线时，敌人尚未发现我军行动。

八月十五日接到朱德总司令、毛泽东总政委签发的红一方面军攻击乐安的训令（此时周恩来、王稼祥同志也在方面军随军指挥）。训令指出，乐安守敌为孙连仲二十七师第八十旅的两个团，城周围筑有工事，由林彪任攻城总指挥，我为政委，统一指挥攻城作战行动；五军团在城南作预备队，三军团在东北部警戒宜黄、崇仁之敌。八月十六日解放乐安的战斗打响，开始由三军攻城，未能成功。十七日我们即决定改由四军为主强攻乐安城。战斗凌晨打

响，当时乐安城被我军四面包围，攻城部队搭上云梯，前仆后继，勇猛冲击，我四军十一师三十一团很快突入城中，打开城门，别的部队由此涌进，到中午就结束战斗。二十七师第八十旅（两个团另一个营）共三千余人，从旅长、团长直到勤杂人员全部被歼，无一脱逃。攻乐安当天，敌人飞机前来袭扰，被我们击落一架。当时在中央苏区击落敌机是件新鲜事，同志们都很高兴。这一仗打得真痛快。

八月二十日，三军团进攻宜黄之敌二十七师的另两个旅。八月十八日我们接到方面军命令，要一军团配合三军团攻宜黄。接命令后一军团除留第十师在乐安打扫战场，其余部队即向宜黄急进。十九日全军团到达宜黄西北的官仓、前至、凤岗圩一线。同一天，方面军再次命一军团在宜黄西北地区，一面佯攻宜黄城北门，吸引部分敌兵力，一面在北部警戒崇仁、抚州之敌的增援，另向龙骨渡方向派出游击。我们把佯攻北门的任务交给了三军。二十日拂晓，宜黄战斗打响。当天下雨，宜黄城周围地形开阔，城外工事较多，三军团攻击一天未能奏效。遂改为夜攻。当夜天转晴，月光如昼，三军从西北门攻进城内，三军团也同时攻进西南和东南门。守敌大部被歼，一部分出东北门向龙骨渡逃跑。我三军奉命追击，二十二日在龙骨渡又将逃敌千余人截获，大部俘虏。这样，高树勋的这个师除高本人带少数人逃走以外，其余全部被歼。

由于我军连克乐安、宜黄，抚州、崇仁、南城、南丰

的敌人受极大震动，吓得南丰毛炳文师急向南城靠拢。我红十二军于二十三日乘胜占领南丰。

一周内接连打了两个大胜仗，连克三城，俘敌五千多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物资，我军广大指战员莫不感到欢欣鼓舞。

乐安、宜黄战役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首先是找靠近我苏区比较突出的弱敌打，决心下得正确；第二是乐安、宜黄当时虽已筑有部分工事，但不巩固，有利于我攻城；第三是我军行动迅速隐蔽，出敌不意，使敌人来不及逃跑和增援。当然最基本的是我红军指战员的勇敢善战。

四、到建宁、黎川、泰宁开辟新苏区， 鏖战浒湾

乐安、宜黄战役以后，我军想乘胜攻取南城，一、三、五军团遂到达南城外围。当时南城守敌有三个师的兵力，而且工事也很坚固。毛泽东同志经过冷静考虑，毅然改变预定计划，命令我们主动撤退，到新占的地区做群众工作。九月上旬敌人派六个师的兵力重新侵占了乐安、宜黄、南丰，因为不明我军虚实，没有敢再前进。我们也就在中央苏区北部，一面派出小部队游击，寻找战机，一面发动群众，进行休整，搞调查研究，为未来作战作准备。

十月中旬，我们接到命令，敌人正在向中央苏区周围

集结兵力，在北面、西面已经集结了二十个师，着手部署第四次“围剿”。我军则决定利用各路敌人还没有准备就绪的时机，到东面敌人比较薄弱的建宁、黎川、泰宁、邵武等地区，去打击敌人，开辟新的苏区，以打破敌人的“围剿”计划。

命令规定，我们一军团为中央纵队，任务是消灭建宁、里心的敌人；红二十二军为右纵队，消灭泰宁、邵武的敌人；三军团为左纵队消灭黎川的敌人。接到命令后，一军团很快集中到广昌西南的头陂，分两路向建宁开进。林彪率领第四军经尖峰、客坊向建宁，我率领第三军和军团部经水南、里心向建宁。当时建(宁)黎(川)泰(宁)地区守敌是刘和鼎的五十六师和周至群的新编第四旅。建宁、里心的敌人是新编第四旅，还有一些地方民团，当然不是我们的对手。周至群知道我们大军东进，十月七日就弃城逃跑。我们消灭了一部分民团，比较顺利地占领了里心、建宁。随后不久，三军团和二十二军也相继占领了黎川、泰宁。我们就在建宁、里心、客坊、安远这些地方建设新苏区，打土豪，筹集资财，都获得了相当成绩。实践证明，东出建宁、黎川、泰宁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我军以较小的代价取得了较大的胜利，虽然消灭的敌人不多，但开辟了一块大面积的新苏区。

我刚到建宁不久，方面军领导机关也来到建宁，因为他们是随一军团跟进的。我看到方面军领导同志里面没有

毛泽东同志。有位同志告诉我，毛泽东同志在前不久开的中央苏区政治局宁都会议上受了批评，并于十月十二日免去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被排挤出了红军领导岗位。以后又陆续知道，批评毛泽东同志的主要理由是，说他反对打赣州是反对中央“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总方针；乐安、宜黄战役后放弃打南城，是又重犯了分兵筹款的错误；说他提倡诱敌深入、找弱敌打等正确主张是所谓“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危险”。我听了深感不平和忧虑。我在中央苏区一年十个月的实践，亲身体会到毛泽东同志在指挥上是正确的和有才能的，他在一军团广大指战员中有崇高的威信，撤销他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将不可避免地会对今后的作战行动带来消极后果。

毛泽东同志被免职以后，即由周恩来同志接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在“建黎泰”新苏区做群众工作，不断受到敌人小股部队袭扰，我们也进行了回击，一般战斗规模都不大，只有十月底那一次仗打得大一点。十月底，敌人以三个师的兵力向黎川进攻，我三军团主动撤出黎川。十一月一日，敌人第八师的两个团由南丰向黎川进犯，当天黄昏，跟我们一军团的第四军和三军团的一部在沧浪附近遭遇。经过激战，敌人被我们击溃，退守筑有堡垒的石沟圩据点。第二天我军再次进攻石沟圩，未能攻克，到傍晚双方各自撤退。十一月三日我们与三军团一起向黎川开进。敌人看到我们

两个主力军团出动，不敢较量，又主动放弃黎川。于是我们与三军团一起重占黎川。以后我们就在黎川附近游击和筹款。这一带比较富，筹款成绩比建宁那里更好一些。

十一月中旬，方面军命令我们继续北上，到资溪、金溪等地区打击敌人，发展新苏区。十一月十七日，一军团的第三军出敌不意攻占资溪，击溃守敌第五师的一个团。十九日三军又乘胜攻占赣东北重镇金溪。引起敌人极大的恐慌，陈诚分别命令南城的二十四师和抚州的二十七师（在乐安、宜黄被歼后重建的）向金溪合击。在南城东北的礼西赵附近，我们一、三军团配合，消灭了许克祥二十四师运动中的一个团。以后没有能再捕捉到有利战机，敌人也没有大举进攻。我们一军团就在金溪附近征集资财。十二月中旬一、三军团曾经向东到福建进攻邵武，企图消灭十九路军在邵武及其附近的十个团。我们一行动，敌人就集中到邵武城里，坚守不出。彭德怀同志认为我军进攻兵多城坚的邵武是不利的，建议放弃攻邵武。方面军领导同志同意了彭德怀同志的建议。我军就又回到黎川附近筹款，打土豪。

我们这次打下了资溪、金溪，没有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向东北发展，以沟通赣东北苏区与我们的联系，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失策。

一九三二年底，我们接到命令重新北上攻打黄狮渡和金溪。一九三三年元旦，红一方面军全军在黎川城举行北

上誓师大会。经过誓师，士气振奋。

一月五日、六日三军团和五军团在黄狮渡首战告捷，消灭守敌第五师的第十三旅大部，俘虏一千多人，旅长周士达被活捉。这时徐彦刚同志已经担任一军团参谋长。他在率领一军团一部分配合三军团作战中，冒充敌人军官搭上电话线与敌人通了电话，得知抚州、浒湾敌人向我金溪、黄狮渡进攻的部署。一月七日方面军给一军团下达了歼灭浒湾之敌的命令。命令指出，敌人在浒湾及其附近有孙连仲的一个师，吴奇伟和周至柔的各两个师共十四个团。其企图是兵分两路，一路攻占金溪，一路攻占琅玕、左坊、黄狮渡。我军决定以三十一师为右翼队，在金溪以西公路北侧吸引牵制和阻击可能由琅玕、白沿方向来犯的敌人；以一军团、二十二军组成中央队，作为歼灭浒湾出犯之敌的主力。由三军团、五军团和一军团的三军消灭向黄狮渡进犯之敌。浒湾战斗一月八日上午九点半打响。一军团四军由金溪沿公路向西进攻，在金溪通浒湾的公路中间点枫山埠附近与孙连仲、吴奇伟各一个旅共六个团的敌人遭遇，遂在公路两侧展开激战。此时我们令三十一师加入一军团作战，二十二军作预备队。敌人抢先占领了公路北侧制高点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又有飞机大炮助战，猛烈地向我投弹扫射和轰炸，战斗非常激烈。我们在远处看到，在一片地域不大的战场上，硝烟弥漫，听到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中夹杂着双方厮杀的呐喊声。我军虽然勇猛冲杀，但态势对我

很不利，我十一师师长陈光同志，十师师长李锡凡同志都先后负伤，别的指战员伤亡也比较多，部队一度有招架不住之势。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军团几个主要领导人都急忙赶到前沿阵地直接指挥战斗，振奋了士气，稳住了阵势。我军随之不断发动猛烈的攻击，敌人死伤比我军更惨重，至中午逐渐向西溃退。下午一点多，吴奇伟为了挽救败局，由浒湾增兵两个团，在浒湾附近的唐岗铺会合溃退之敌重新反扑。至下午三点，我们命二十二军投入战斗，猛攻敌人，激战一小时以后敌人再也支撑不住了，开始全线溃退。溃退的敌人经过浒湾，不敢停留，直接向抚州逃窜，可见敌人惨败的狼狈情景。当晚我们军团部即进占浒湾。二十二军追击逃敌一直到抚州城边，途中又歼敌一部。与此同时，徐彦刚同志率领三军配合三军团击溃了向琅琊、左坊进攻的周至柔六个团的敌人，歼灭一部，余敌也向抚州逃跑。到一月九日凌晨，浒湾战斗全部结束。

浒湾战斗，我军共歼敌两千多人，大部分打死，俘虏一部，缴获武器弹药较多，使孙连仲新组建的二十七师遭到歼灭性打击。我军伤亡也不小，最令人痛惜的是，宁都起义的领导人五军团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赵博生同志，为配合黄狮渡和浒湾战斗，率部队阻击南城出犯之敌，在战斗中英勇牺牲。我们党为了纪念这位好同志，一九三三年一月由毛泽东同志下令，将宁都县改为博生县。

黄狮渡和浒湾两次战斗的胜利，吓得由南城出犯企图

配合周至柔夹击我军的李云杰师，和由南丰出犯，企图进窥我黎川的毛炳文师，赶紧缩了回去。经过这两战的胜利，给了北线敌人以一次较大的打击，我军士气也更加高涨，为日后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造成了有利条件。

浒湾战斗之后，我一军团继续留在浒湾至金溪一带活动，一面待命，一面征集资财，后送伤员、俘虏和战利品，一面北向东乡、余江等地游击侦察。当时周恩来同志建议，我主力红军北上贵溪等地，打通与赣东北红十军的联系，然后待抚州等北线敌人出动增援或进攻我军时，在抚河到信江之间广大地区于运动中消灭敌人。这本来是一个比较好的主张，我们军团领导人是支持的。但遭到中央局别的几位同志的极力反对，理由是我军远离苏区（赣东北也是苏区）作战于我不利，另外又怕我军主力北上后，敌人大举向中央苏区进攻，无法抵御。这种看法是片面的，敌人作战的主要目标始终是针对着我军主力的，这早就为当时的战争实践所证明。在中央局的一再催促下，我军终于在一月底，将红十军接应过信江以后，离开浒湾、金溪地区，经黎川、团村、西城桥等地，在杨林渡渡过盱江，于二月上旬到达南丰前线。

五、反第四次“围剿”

一九三二年冬天，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为“剿共”总司令，陆续调集了五十万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准备对中央

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

敌人的主要部署是，以蔡廷锴为左路总指挥，指挥十九路军的六个师又一个旅，向我闽西苏区进攻；以余汉谋为右路总指挥，指挥在粤北、赣南的粤军六个多师由南部向中央苏区进攻；以蒋的嫡系陈诚为总指挥，指挥十二个师为中路军，再加上散布在我苏区周围各点的十三个师配合。这样，中路军便成为进攻中央苏区的主要突击力量，左右两路军策应中路军行动。蒋介石的企图是想套用一九三二年秋他进攻我鄂豫皖苏区的经验，以中路军组成左中右三路纵队的强大突击兵团，向我黎川、泰宁、建宁、广昌各点分进合击，将我主力红军截断在广昌到建宁一线以北决战而消灭之，并乘机侵占我新开辟的“建黎泰”苏区，尔后再伺机进犯我中央苏区。

第四次反“围剿”是由周恩来和朱德同志指挥的。他们仍然沿用毛泽东同志诱敌深入、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所以取得了这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

敌人在第三次“围剿”失败以后，将它的部队进行了整编。在战场上出现了分为甲乙丙种的所谓“整编师”，每师两个旅，每旅两个团，另外还有一个团，一个师共五个团。各师人数略有不同，比未整编前的师充实多了。那时候轻机关枪刚到中国，参加“围剿”的国民党的整编师就装备了轻机关枪。

第四次反“围剿”开始之前，我们也在进行整编，目的

在减少指挥层次，充实基层战斗力。一九三三年一月，一军团遵照军委东沙会议的决定，在黎川三都进行整编，决定撤销第三军和第四军番号，军团直辖第七、九、十、十一共四个师。并奉军委命令，将第三军军长徐彦刚调任一军团参谋长，将第四军政委罗瑞卿调到军团任保卫局长。可是，整编还未完成，第四次反“围剿”就开始了。直到浒湾战斗结束，才将三军、四军两个军部完全撤销。

“围剿”一开始，敌人主力由西北向东南，齐头并进，分进合击。到一九三三年二月初，敌中路以十个师的兵力，分三个纵队向南丰、广昌前进。二月十二日，我军主动进攻南丰。敌人为了救援南丰，寻找我军决战，竟敢以其第一纵队的五十二、五十九两个师，取道永丰、乐安向宜黄南部前进。由于敌人是由西北向东南行军，它的整个右侧翼就容易暴露在我军面前，于是我军迅速从南丰撤退，隐蔽地集中了四、五万优势兵力于黄陂以西地区，然后从两翼北上包抄。于二月二十七、二十八日在宜黄南面的黄陂一线山区，将敌人这两个师歼灭了。这就是有名的黄陂山地大兵团伏击战。随后三月二十一日在东陂、草台岗附近，又歼灭了它第十一师的大部和九师的一部。这就是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一个总的轮廓。

以上两次主要战斗，都是一军团和三军团、五军团等主力结合地方部队和赤卫队并肩打的。

黄陂之战，是中央苏区反“围剿”中一次规模最大的大

兵团伏击歼灭战。参加这次作战的有一、三、五军团和二十二、二十一军。具体部署是这样的：当时敌人五十二和五十九师二十六日从乐安出犯，分别取道向黄陂、东陂前进。同时，驻宜黄之敌第十一师也有向神岗、党口前进的模样。方面军判断敌人的企图是要南下建宁、广昌，寻求我主力决战。但是敌人一路之上，前后左右，都遭到我各独立师、独立团、赤卫队的袭击，不知红军主力究竟在哪里。殊不知我军主力早已于二十三、二十四两日由南丰附近，隐蔽地转移于东陂、河口之线集中完毕。军委决心歼灭由乐安出犯的这股敌人。当时军委决定，兵分左翼队和右翼队，秘密地向北包抄敌人。右翼为五军团和二十二军，他们从横石、侯坊，沿着东陂一线，进至黄陂，向西迎击敌人，并负责掩护我军的右侧背。左翼为一、三两军团和二十一军，由一军团统一指挥。二十五日左翼队分别进抵金竹、郎源一线，二十六日沿金竹、王都、竹坪之线，采取平行路线，隐蔽接敌，准备以伏击、侧击、兜击等手段，逐次由左向右的顺序，迅速消灭敌五十二和五十九师。

这几天适逢连日阴雨，山野昏暗，浓雾侵没山头，傍晚更甚，夜间漆黑，道路泞滑得很。我们带着队伍，为了取得采取平行路线前进的军事效果，有时根本走不上路，只能披荆斩棘，向着黄陂圩、蛟湖、登仙桥——预定的作战地域前进。二十七日拂晓以前，徐彦刚参谋长和罗瑞卿保卫局长，带着七师、九师和一个炮兵连在右，我和林彪

带着十师、十一师在左，分别到了伏击阵地。三军团在一军团的右翼，与我们平行开进。部署展开不久，我和林彪就到了蛟湖以北十一师的指挥阵地，他们的左邻为十师，右邻为九师。十师隐伏在面对着通登仙桥大路南之东北山上，十一师则在坳下集结待命。我们到达十一师时天还未明。听完师长刘海云和政委刘亚楼压低声音所作的报告以后，我们审思了一会儿，即表示了同意。我说：“对！你们加强西北面是对的。我们是先把敌人放进来，然后再关起门来打。因此，北面的三十三团要特别注意隐蔽，不要暴露过早，敌人来时，要大胆地放他们往前走，东南面还有三军团，放过去是跑不掉的。打响以后，三十二团从右翼调头往北打，动作要猛一点，求得一下截住敌人。三十一团要机动，必要时以一部分兵力控制有利阵地，防止敌人向西夺路逃跑。”林彪还专门检查他们侦察员派出去了没有。从十一师回到军团指挥所，天刚麻麻亮。军团指挥所和十一师指挥所设在同一条山沟里，相距并不远。从军团指挥所，我们也能直接观察到敌人来的必经之路。不过天亮的时候，有浓雾，在伏击阵地上，往外只能看到一个个山头，象一座座孤岛，时隐时现。直到上午九点多钟，远远地听到一些人喊马嘶的声音。侦察员来报告说，敌人已经朝着我们阵地前面过来了。日出雾散，果然看见敌人一队队过来了，隔不远还有坐轿子的，是他们的军官。敌五十二师共两个旅，每旅两个团。我们看清楚敌人的时候，

前面已经过去一个旅，这个旅后来在大龙坪东边被三军团消灭了。过了一个团又一个团，一共过了四个团。敌人大摇大摆地，毫无戒备，显得很了不起。我说，我们沉住气，再沉住气，敌人这样大的部队进苏区来，不可能没有辎重部队。果然，最后来了辎重部队。还有一个团在后面掩护，没有进入伏击圈。这样直到敌人师部和四个团加辎重部队确实已进入口袋，我们才发出总攻信号。顿时象天崩地裂似地爆发了震动山岳的枪炮声，把敌人的师部和四个团加辎重部队，压到了蛟湖北面我军的伏击阵地。这时，敌五十二师师长李明以一个团冲锋，一个团掩护的办法向我阵地猛冲，企图突围逃跑。打到后来，敌人东奔西突，想夺路逃跑，果不出所料，他们是企图从西北而突围。我赶到了十一师三十二团的指挥阵地，刘亚楼也到这个团的指挥阵地。凭肉眼就能看出，向西北突围的敌人，持短枪的不少，似乎是敌人的指挥机关和他们认为得力的掩护部队。而且它越攻越接近三十二团驻守谷口的山头。我一边用望远镜观察，一边对该团政委杨成武说：“这是紧要关头！”杨成武很激动，扬起驳壳枪，边跑边喊：“同志们跟我来，冲呀！聂政委刚才讲了，这是紧要关头，冲呀！”他带领部队迅速将这股敌人压到了谷底，与友军一起展开了捉俘虏竞赛。这时，我手头只有一个特务连，就带着他们也冲了下去。徐彦刚同志在阵地上看到我，连连向我大声喊着，你不能来，你不能来，意思是要我注意安全。当时这

激动人心的战斗场面，我顾不得这些，带着那个特务连冲了下去。只见敌人的军官到处东奔西窜，嗷嗷乱叫，一个个束手被擒，那真是痛快啊！那时蒋介石实施连坐法。敌人后卫一个团在登仙桥附近眼看着主力已被歼，它仍然不退，被刘海云同志带着他那个师把这个团歼灭了。

从发起总攻不过三个小时，三军团消灭了敌人一个旅，我们消灭了敌人的师部和一个旅加辎重部队，这样，就将五十二师消灭了。五十二师师长李明，战斗一开始就被我打伤后活捉。这位李明其人，我知道他原是林虎的部下。他很骄狂无知，这次进入苏区，竟不知道行军要加强侧翼警戒。当他的部队进入大龙坪地域时，侧翼全无警戒，真是自投死路，骄兵必败。在我们消灭五十二师的同时，我五军团在北线对五十九师发动了进攻。五十九师大部企图向乐安溃退，少数散布在大路两面山上激烈抵抗。不过由于五十二师已遭歼灭，五十九师就孤立了。它一度寄希望于由宜黄经河口出击的敌第十一师的增援，但远水不解近渴，且有高耸绵亘的摩罗嶂大山阻隔其间，我军右翼队又有强大的阻击部队，野战司令部还掌握着二十二军作预备队。二十八日拂晓，我军又发动了一次总攻。随着整个围歼战的发展，各个部队战术上的直接配合越来越密切，许多阵地都是几个不同建制的部队主动配合，共同夺取下来的。如二十一军的部队配合我第十一师三十二团解决登仙桥西端高地附近的敌人，三军团七军的部队配合一军团七

师的部队歼灭由蛟湖大道突围的敌人等等。至二十八日十一时许，敌五十九师除两个团的残部逃走外，其余全部被歼在摩罗嶂东麓山谷中。于是，我军分头在摩罗嶂一带搜山抓俘虏。这一带山上山下到处都是敌人的溃兵，有些溃兵自动把武器架起来，请红军派人去收缴。战斗到最后，敌人有些成建制的部队也被败阵下来的溃兵冲散了，乱成一团，失去了战斗力，都当了俘虏。最后清查俘虏时，没有发现敌人的第五十九师师长。我们知道，五十九师师长叫陈时骥，是个麻子。于是发动部队继续搜查。后来军团部电台班上山砍树回来架天线的同志告诉我，他们抓到了一个俘虏，是个当官的。我问脸上有没有麻子，说是有，就这样把他从俘虏中清查出来了。至于武器弹药，山山谷谷丢得到处都是。许多新式自动武器和望远镜还未开箱就被我们缴来了。附近几个县，派了很多农民前来帮助红军打扫战场，搬运战利品，搬了一个星期才搬完。

此役我军共歼敌两个师，光俘虏就有一万多人。可惜，当时我们不太重视争取俘虏参加我军的工作，除军官以外，不久就将俘虏兵全部释放了。

黄陂大兵团山地伏击战不久，三月二十一日，又打了一个大仗，即著名的草台岗战斗。因为到了三月份，敌人仍在继续寻找我军主力决战，但是他仍然无法获知我主力所在。虽然敌人这次改变了战术，不是采取当初的分进合击队形，而是组成两个纵队，向我苏区纵深用交叉掩护的

办法徐徐前进，但是我们主力仍然可以转到它前进方向的侧翼，用各个击破的战法，看准它薄弱的一路，予以歼灭。

草台岗战斗就是这样打的。到三月二十日，敌人打先锋的吴奇伟的二纵队，已前进到甘竹、罗坊、朱坊、新丰之线，企图是要夺取广昌。而由其第五军军长罗卓英指挥的一纵队，则居后，滞留在东陂、五里排、草台岗这一线，也有向东前进的模样。罗卓英指挥的有李延年的第九师和肖乾的第十一师，以及从黄陂逃出的五十九师两个团的残部。在一纵队的后边，还有原属于第三纵队的七十九师两个团，滞留在宜黄至河口之线待命。这样，从敌军整个态势来看，它由宜黄到广昌的甘竹，形成了一个由西北转向东南的，虽有纵深配备，但长径达三日行程以上的长蛇阵。对此，当时军委决定仍然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不打头，不打尾，而是将我主力转到它的侧面，打它的腰部。即选择驻草台岗一线的罗卓英部来打。为了进一步造成敌人的错觉，在草台岗战斗的头一天，专门派了我十一军，在吴奇伟纵队的前面，在广昌的洽村，迎头向敌人佯攻。给敌人一个“示形”，使它以为我们的主力在那个方向，吸引敌人向东南方向继续前进。造成我向其腰部出击的有利形势。

我们出击的队伍分为左翼队和右翼队。左翼队由林彪和我率领，下属一军团、二十一、二十二军和独立第五

师。右翼队是三军团和五军团。遵照总司令部命令，我们一律于三月二十一日拂晓前分别到达指定的攻击位置。我们左翼队是由西北向东南攻击，任务是“采取迅雷手段，干脆消灭草台岗、徐庄附近敌人之一师，然后再突击东陂、五里排之敌”。右翼队的三军团和五军团则是由西南向东北攻击草台岗，五军团并有钳制东陂之敌和防止新丰敌回援的任务。

我回忆三月二十一日一军团进攻草台岗的大致经过是这样的：午夜，我和林彪就提早到了十师驻地，督促十师按命令规定的时间出发。拂晓前，十师即已向敌人占领的黄柏岭前进。黄柏岭是紧临草台岗南面的制高点，高约五、六百公尺。不攻下黄柏岭即无法攻下草台岗。在十师之后跟进的是十一师。但是七师和九师却迟到了，到了八时半，尚未见他们到来，使我们十分焦急。这可怎么办呢？如果让先到的单独投入战斗，等于让敌人各个击破。但是到了九时左右，我们已听到三军团方向枪声甚密，于是我们只得赶紧以号音命令十师迅速向黄柏岭攻击前进。十一师则在十师之右迅速展开，协助攻击黄柏岭之敌并断其退路。这一天上午十时许，九师先赶到，十一时许，七师方赶到。我责问他们为何迟到，才知道他们经过的玉华山一段路，树木都被群众砍倒了，横在路上不能行走。这本是苏区群众防敌的措施。由于我们事先没有侦察清楚，才造成延误攻击时间的后果。十二时许，火力最猛。十师、十一师屡

次冲锋肉搏，向黄柏岭发起猛攻。敌人十一师居高临下，凭火力进行顽抗。我十师二十八团政委沈联雄同志阵亡。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敌人的飞机来助威，到处扔炸弹。当时我和林彪还有七师师长彭雄同志和一个管理科长在前沿阵地指挥位置，林彪正在写作战命令，一个炸弹下来，气浪把他吹到了山坡下，管理科长负了伤，我和彭雄也被吹倒在地。我们起来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指挥战斗。十三时许，我们令徐彦刚参谋长率九师用中央突破的战法猛攻敌人，策应左右邻之攻击。战约两小时，我九师将当面之敌完全冲垮。最后由七、九两师会攻黄柏岭的残敌。因系仰攻，我军伤亡较大，然终将黄柏岭上敌之十一师和五十九师残敌解决，只逃掉很少一部分。然后九师立即向东陂追击，协同二十一军、二十二军肃清其他各据点的敌人，并打击前来增援的敌人第九师的部队。一直战斗到这一天的黄昏之后，东陂残敌于二十一时乘暗夜逃走。

草台岗这次战斗，消灭了蒋介石的嫡系、陈诚靠它起家、素称没有打过败仗的国民党第十一师，只逃走了不过一个团的兵力。该师师长肖乾和他的参谋长，还有三十二旅旅长均被我击伤。击毙了三个团长。三十一旅旅长黄维坐着担架逃出了苏区。我们缴获很多。捉住俘虏时，他们每人身上带着一条绳索。我们很奇怪，一再追问，才知道这原来都是他们出发前上级发给的，说是准备捆绑红军回去领赏的。这次作战还消灭了敌第九师的一部分。

战后，军团部开会。刘伯承参谋长参加，对一军团作了很高的评价，说：“一军团在决战方面作用很大”，这显然是过誉。林彪着重从战术上作了总结。我补充了两点意见，一是要发扬英勇牺牲以争取全局胜利的决战精神，二是对某几个师这次作战暴露的缺点分别作了批评。

在四次反“围剿”结束以后，蒋介石在给他的中路军总指挥陈诚的手谕中，不得不承认：“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草台岗战斗，我们一军团共打死敌人两千多，俘虏一千七百多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经过黄陂和草台岗两次战斗，我军武器装备得到较好的改善，连队装备了不少轻机关枪。部队派了许多的优秀共产党员去学习掌握机关枪的使用技术，日后很多成了优等射手。

六、第五次反“围剿”之前

第四次反“围剿”结束，到九月下旬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在这半年的时间里，我中央红军大部分的仗没有打好。我们一军团除了八月底的乌江战斗以外，别的仗也都打得不好。其中有许多值得汲取的教训，尤其是执行“左”倾冒险主义者提倡的所谓“两个拳头打人”的战术，给我们造成了损失。但是，当时“左”倾冒险主义者没有接受这些教训，以致一直延续到以后的第五次反“围剿”。

提出“两个拳头打人”的战术有个过程。第四次反“围

剿”被打破以后，陈诚中路军的十二个师，除了被歼的十一、五十九师的残部，在黄陂、西源附近地区整补以外，其余十个师分别在南丰、南城、宜黄、乐安、崇仁、新干、永丰等地，全线转入防御。我军则想乘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的有利时机，向西北方向发展，主动寻歼敌人，结果三仗都没有打好。

首先是强攻乐安。三月二十一日，我们刚打完草台岗战斗，二十二日即奉命进攻乐安。本来，草台岗战斗我们打得很艰苦，理应有个短期的休整、总结时间才好。但当时接到命令，部队立即出发。我们离开草台岗以后，苏区政府发动当地群众，掩埋尸体，收集战利品等，整整搞了一个星期，仍有许多武器弹药没有收集起来，可见我们走的匆忙程度。大家对于急行军，一来是打了胜仗，士气很高，二来红军是最守纪律的部队，所以二话没说，就立即向乐安开进，并于二十四日到达乐安前线。因为我主力红军一、三、五军团和红十二、二十一、二十二军都参加这次作战行动，所以很快便将乐安四面包围起来。当时乐安守敌为四十三师的一个旅。他们从去年九月重占乐安以后，就在乐安城外构筑了大量坚固的堡垒工事，城墙也作了加固，城防工事和火力也都有较大的增强。以一军团为主，二十五、二十六日两天对乐安展开强攻，都被敌人堡垒的机枪火力所压制，我军虽然打得很英勇，但始终没有能突破堡垒线。二十七、二十八日两天改为夜袭，也

没有成功。方面军即命令停止攻城，派小部队监视，红军主力撤围乐安。敌人以一个旅的兵力，凭借工事和火力坚守一个小县城，我主力红军屡攻不克。这件事确实是发人深思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我军没有炮兵，光靠步枪、机枪、手榴弹是难以摧毁敌人的堡垒工事的。这使红军广大指战员进一步体会到，在武器装备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运动战、野战歼敌应该是我们的主要作战手段。为此，周恩来同志在四月份的《红色战场汇刊》上发表文章，论述了这个问题，是代表了大家的心情的。

三月底，我红十六军攻占新干。于是方面军命令我们以一部分兵力佯攻永丰，主力则开到永丰以西以北地区，待敌人来增援新干或永丰时在野战中消灭之。接命令后，我们即向水东、鹿岗、谭城桥、戴坊、供坊一带开进待机。但敌人慑于不久前的惨败，未敢轻举妄动。坚守崇仁、公陂（今公溪）、吉水各点之敌都不动。一直到六月上旬，我军都未能获得战机，就在当地进行游击、打土豪、筹款等工作。中间一军团打了一次公陂，也因敌人坚守不出而未获战果。就这样，我军佯攻永丰以求打敌增援的作战意图也未能实现。

在此期间，五月十二日临时中央（一九三三年初由上海迁到中央苏区）下令，将中央军委与红军总司令部分开。虽然军委主席仍为朱德同志，但加了项英、博古同志为军委委员，并规定朱德同志在前线时由项英同志代理军委主

席。实际上在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就由他们在瑞金发号施令、指挥作战了。六月初，军委下令对一方面军部队和领导机关进行了一次大的整编。当时一军团驻在滕田一带，一军团的同志们都称它为“滕田编队”。这次编队，一军团将原属的七、九、十、十一师加上罗炳辉同志的红二十二军改编为第一、第二两个大师，每师三个团。一师师长罗炳辉同志、政委蔡树藩同志；二师师长徐彦刚同志，政委胡阿林同志。原属一军团的十五军编回五军团。命令上原来还规定以新成立的瑞金模范师编为一军团的第三师，在瑞金附近训练后归建，实际上后来这个师没有编入一军团。这次整编是必要的。经过整编，全军团共八千五百多人，以后很快又补了新兵二千余人。使每个师达到五千多人，每个团有一千七百多人，部队比较充实了，有利于作战。

部队整编刚完，六月五日接方面军命令，得知原守宜黄的李默庵第十师六月四日离宜黄开赴崇仁，接防宜黄的是敌人独立三十二旅，其先头二千多人已经由抚州到达宜黄，还有两个团正在向宜黄开进。命令规定我们一军团为主攻，五军团助攻，三军团为总预备队，进攻和消灭独立三十二旅。并由一军团统一指挥三个军团的作战行动。接到命令后，我们就率领部队连夜由乐安北面的沙港、马鞍坪一线出发，冒雨在崇山峻岭中沿羊肠小道急行军，九个小时走了七十多里山路，赶到宜黄以北附近地区。当时我

们决心以一师围攻宜黄，以二师北上在遭遇中消灭独立三十二旅后续两个团。结果二师在宜黄北不远的赤井亭与敌人遭遇，将敌击溃。敌一部逃入宜黄城中，一部退龙骨渡。我军击毙敌一百多人、俘人枪二百余。我们只伤亡二十人，算是打了一个小胜仗。六月七、八、九日三天，我军团一、二两师攻打宜黄城。这次由于我军行动迅速，乘敌人换防混乱之机，攻占了大部分宜黄城外围堡垒，但大部队进攻行动受城外宽阔的宜黄河河水阻隔，涉水渡河的小部队偷袭行动，又被敌发现受机枪火力压制而失败。十日，方面军命令撤围宜黄。再袭宜黄的战斗又未能成功。

六月十三日，方面军接苏区中央局转发的中央关于今后作战计划的指示，因为电文很长，所以我们一般都称之为“长电”。这份“长电”，实际上是当时在上海的共产国际军事总顾问的意见。“长电”判断蒋介石与闽、粤敌人有矛盾，蒋介石在中央苏区北部取守势，我们攻击不容易，而且战果很少，所以要求将一方面军主力分成两个部分作战。从这时起，即开始有所谓“两个拳头打人”的说法。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有一段话，说：“军事平均主义者到一九三三年，有所谓‘两个拳头打人’的说法，把红军主力分割为二，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同时求胜。那时的结果是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而且没有当时可能取得的最大胜利。”这段话就是指这个阶段的作战说的。

当时“长电”规定：将一方面军一部分组成东方军，先到闽西打十九路军，然后北上打抚河以东敌人，最后再会攻抚州。另一部分留在永丰、崇仁、宜黄、乐安地区进行牵制性作战，待东方军有进展后再北上会攻抚州。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相对弱小的红军，与强敌作战必须集中兵力。广大红军指挥员，特别是高级指挥员，对此早已深有体会。所以接到“长电”以后，周恩来、朱德和我们各军团在前线的领导同志都反对这个计划。但当时在瑞金的临时中央、中央局和军委的一些领导同志，根本不接受前线同志们的意见，三令五申，必须执行“长电”。

于是三军团即于六月下旬急忙开赴闽西，由彭德怀同志兼任东方军总指挥。七、八、九三个月东方军虽然在福建将乐、沙县、顺昌等地打了一些胜仗，但自己搞得很疲劳，伤亡和疾病减员也很大。彭德怀同志在他的自述里，多次提到中央苏区的两个兄弟主力军团——一、三军团，分开作战，就要打败仗；集中作战，就经常打胜仗。这是他从战争实践中得来的深切体会，是完全正确的。三军团东调以后，一军团和五军团则仍留在原地，改称中央军，由一军团统一指挥。六月中旬到九月下旬，我们就活动在乐安、永丰、吉水一线两侧地区，除八月底的乌江战斗，基本没有打什么仗，只进行了一些小规模游击战，再就是打土豪征集资财。这样，主力红军用两个拳头打人，一

个拳头被置于无用武之地，一个拳头则打得过于疲劳，还起不到真正痛击敌人的作用。更主要的是，使蒋介石获得了喘息时间。他一面从容地在庐山与他的高级将领和外国顾问们策划第五次“围剿”的方针和计划，一面命令他的部队在苏区周围休养生息，补充物资，加固工事，准备新的进攻。开脚一步就走错，这是我们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八月底，我们一军团进行了乌江战斗，取得了消灭敌人一个师的重大胜利。

乌江战斗是八月三十一日打的。战前，一军团主力在茶口以东地区活动。一师侦察获悉，敌李思愬的第八十师，已于八月二十九日进至吉水县的乌江修筑碉堡。在这一线，吉水附近驻有敌人的第九十三师，枫坪驻有敌人的第二十七师的八十旅，永丰有敌第十师和八师所属的部队。敌人的根本企图是要在我中央苏区北线从赣江到抚河筑成一道钢铁封锁线。而乌江的第八十师，是其中新添的一个环节。我们研究了这一带的地形，决定利用这一带地形有利于我隐蔽部队的特点，以奇袭的手段，消灭乌江这股敌人，并打击援敌。于是我们率领一、二两师，于八月三十日秘密进至茶口、大桥附近。命令一师（不含一团）于三十一日三时出发，经八江、桑园绕至乌江西北，切断乌江至吉水的交通，并钳制枫坪的敌人，战斗发起后由西向东攻击。二师及一师的一团，则由二师师长徐彦刚和政委胡阿林率

领，经桑园从正面向乌江之敌展开攻击。我则和林彪带着军团指挥机关，紧跟二师前进。当天部队展开之后，适逢大雨如注，雷电交加，各个部队正好利用这个天气出敌不意地袭击敌人。接敌之后，五团与占领马鞍山的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六团配合向敌冲锋，占领了马鞍山。一团、四团则占领了小孤山，向乌江展开猛烈的侧击。这时一师的部队也从西北方向兜击过来，对乌江形成四面包围。至十九时许，敌人除一小部逃窜外，其余全部缴械投降。敌第八十师被我消灭了。

乌江战斗共进行了约近四个小时，全歼敌人近四千人，其中被打死的一千多人，俘虏的二千多人，俘虏中有二三八旅旅长何文鼎和团营级军官多名，并缴获许多弹药和军需用品。可惜，敌师长李思愬被他乘黑夜带少数人突围，逃跑到了八都。乌江战斗，是我军自黄陂、草台岗两大胜仗以后取得的又一次较大的胜利。这次胜利证明，只要我们善于捕捉战机，集中兵力，出敌不意，攻其不备，消灭敌人一个师或一个旅仍然是有可能的。但如若要想将战斗的胜利发展成战役的胜利，当时则是不可能的。因为执行了“两个拳头打人”的方针，所以个别的胜利不能扭转当时全局上的被动局面，没有能阻止住敌人逐步完成吉水、永丰到乐安、宜黄的堡垒封锁线。

七、参加第五次反“围剿”

一九三三年秋天开始，蒋介石集结了一百万兵力，以五十万专门对着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

“围剿”一开始，敌人的战术变了，即在中央苏区四外修筑碉堡。这是一个战略性的变化。它不长驱直入，而是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一边前进，一边筑碉堡，平均每天只挪动两、三里，但步步朝着我中心区和主力所在地进逼。它要求军事行动紧密配合政治需要，就是蒋介石所说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配合“步步为营”战术，政治上推行清乡、保甲制、连坐法、政治怀柔等反动政策，再加上经济封锁。其总的目的，用北路军司令陈诚的话来说，就是要从军事、政治、经济各个方面“抽干塘里的水，捉塘里的鱼”，消灭红军，消灭苏区。

面对着这种形势，当时如果我们党的领导仍然象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一样，不犯机会主义错误，是可以有办法克敌制胜的。但是党内情况不是这样。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已经发展到居统治的地位，使我们对敌人的这种战略性变化，不能采取正确有效的对策，陷入了先是冒险进攻后是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错误，导致了中央苏区的丢失，红军不得不作战略转移。

一九三三年初，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博古、洛甫等同志先后到达瑞金。第三国际派来的

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也于一九三三年九月跟进中央苏区。中央和这些同志的到来，使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得以进一步贯彻。而一九三四年一月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又使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发展到顶点。他们对形势作了极端错误的估计，说什么中国已经存在“直接革命形势”，第五次反“围剿”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在对敌斗争中，采取了完全错误的指导方针。这些都直接造成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博古、李德等实行的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方针。这个方针是这么来的：九月二十八日，敌人占领黎川。“左”倾冒险主义者不采取过去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方针，却命令红军北上就敌，企图恢复黎川，保住“国门”。这时，我们的三军团在黎川东北的洵口，与敌人吴奇伟的第六师十八旅三个团打了一个遭遇战。我们先敌开火，先敌展开，占领阵地，冲跨敌人以后，又紧接着追击，把敌人高级军官到前方视察坐的小汽车都缴到了。这一仗共消灭敌人两个多团，俘虏一个旅长。仗是打得不错的。这本来是出敌不意，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在当时敌人兵力超过我们多少倍，强敌压境的总形势下，是带有一定的偶然性的。可是，“左”倾冒险主义者却不这样看，硬是夸大它有普遍意义，并引以为据，主张普遍陈兵苏区边缘，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作战方针。到了十月上旬至十一月中旬，“左”倾冒险主义者甚至命令

红军主力，进攻白区有敌人重兵扼守的硝石、资溪桥、浒湾等据点，结果都遭到了失败。失败了也不从主观指导思想上找原因，却把失败归罪于方面军领导同志干预了他们的正确决心和各个军团执行他们的指示不坚决。为此，还在十一月二十日以军委名义下达了一封致师以上首长的信，批评我们。

这时，一军团已奉命于十月初由永丰地区赶到南丰附近，牵制敌人东进，以保障三军团和五军团在东面作战。以后中央军委想恢复黎川，我们又赶到黎川附近配合三军团作战，一直到十一月中旬，辗转在敌人堡垒与重兵之间寻求作战。但是敌人不轻易离开其堡垒地带，我们又缠住敌人死拼死打。仗一般的都打得不好，反而疲惫和消耗了自己的兵力。

十一月中旬，我一、九军团又奉命在棠阴附近突破敌人封锁线，北上袭击敌人。在十一月十七日至十九日之间，我们打了云盖山、大雄关战斗，战斗打得十分艰苦。先是吴奇伟发现我军突进到封锁线以北，就企图用五个师的兵力，从东从南两个方面合围歼击我军。我军紧急退到云盖山、大雄关地区，与敌人三个师展开激战。我们用九军团十四师从神岗正面吸引敌人，以一、二两师从两面包抄，但当我二师先锋第五团抵达党口附近山岭时，发现敌人已先我占领大雄关东南木鱼嵎附近的险要制高点。在我们攻击这个制高点时，受到敌人的飞机猛烈轰炸和地面交

又火力的射击。二师政委胡阿林牺牲。胡阿林同志原是上海的一个工人，为加强红军中的工人骨干，由党培养起来作政委，在部队中威信很高，这次英勇牺牲了。四团团长肖桃明也在这次战斗中牺牲。此外，我一、二两师师长都负伤。最后，我们撤退，敌人也撤退了。

这次战斗前，我正在发疟疾，没有突过封锁线。部队由封锁线外回来时，我要程子华同志率十四师掩护部队撤回。以后，我们经过天演山、神岗、党口，到达汤坊。在天演山，看到敌人飞机顺着山谷低飞扫射，从上面看象一溜汽车似的。在汤坊，我们指挥了大雄关战斗。

从大雄关向西南转移时，在军峰山附近，要通过敌毛炳文第八师的堡垒地带，我们遭到毛炳文部队的射击，搞得军团部都很危险。那一天，刚越过敌人的堡垒线，敌人就冲到军团部跟前来了，不仅军团部受到直接威胁，殿后的二师也有被敌人切断在隘路口内出不来的危险。我看到敌人上来了，真是急了。我说：“凡是有战斗力的，不管是炊事员、饲养员，都上阵！”有的炊事员说：“毛炳文是我们的手下败将，不怕他，上！”我们一面组织就地抵抗，一面往后传：“四团赶紧上来！”直到四团上来，才化险为夷！

十一月下旬，发生了一起震撼蒋家王朝的大事，就是蔡廷锴的十九路军，联合了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了“福建事变”。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从其“围剿”红军的北路军中，抽调一部分兵力前去镇压福建人民政府。这是转变苏区反

“围剿”形势的关键。当时党中央倒是从政治上把握住了这一关键，同十九路军秘密签订了停战协定。

可奇怪的是，“左”倾冒险主义者只知道从政治上把握这一关键，而根本不了解，只有从政治上军事上同时利用福建事变，才能帮助我们粉碎第五次“围剿”。

据我当时知道的，福建人民政府曾经派吴明（即陈公培）为代表先到苏区谈判。吴明原也是参加过法国勤工俭学的，并且是黄埔二期毕业生，他在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第三党，是李济深派他来的。人们都说，我们和他谈判的人把他骂了一顿，打发他走了。

当时有上述这样一种说法也不奇怪。因为，在“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之下，在我们的人中间，有时还不是一般人，确是流行着一种空谈式的教条主义的说教。说什么第三势力可以迷惑一部分人，因此，比蒋介石还要坏。还有人说，蒋介石是大军阀，福建人民政府是小军阀，我们去给小军阀当挡箭牌干什么！

当福建人民政府第二次派代表徐名鸿到瑞金谈判时，中央考虑到为了推动十九路军反蒋抗日，倒是和他们订立了反蒋抗日同盟，签订了停战协定。

但是，当时“左”倾冒险主义者，仍然不知道如何从军事上利用福建事变去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

十二月初，当蒋介石抽调北线“围剿”的部队去镇压福建人民政府时，他的第三、第九两个师由蒋鼎文率领从南

丰以南向闽西开进，而我们一军团当时刚打完大雄关战斗，就在附近休整。我们正处在敌人的侧面。敌人移动时，我们看得很清楚，一路一路地移，正好打。大家都说，这个时候不打什么时候打，再不打机会就没有了。可是上面就是不叫打，说打是等于帮助了小军阀。他们硬是把敌人放过去了。以后，又把红军主力拆开，把三军团放在福建，把一军团放在中央苏区北线，说是“两个拳头张开打敌人”。他们也不采纳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断然将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从根本上摆脱蒋介石制造的封锁囚笼，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迫使敌人回援其基本地区，借以粉碎其向中央苏区的进攻。

在福建事变期间，我们一军团被西调至中央苏区北线的永丰地区作战，企图在那里突破敌人的堡垒封锁线。在战术上，李德强调要以堡垒对堡垒，实行“短促突击”。为此，军委于十一月下旬专门下达了命令，要部队用这种战术作战。这个战术，就是敌人修碉堡，我们也修碉堡，待敌人进至距我碉堡二三百公尺，我们即用短促突击去消灭敌人。采用这种战术，我军消耗很大，又打不出什么结果。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开始在永丰南面打的丁毛山战斗，就是和宋子文的两个美械装备的税警团及唐云山的第九十三师打。面对着他们修筑的堡垒线，我们也修筑堡垒与之对抗，打了一个多星期，结果，完全是得不偿失的消耗战。敌人又有飞机，又有大炮。国民党军队从德国买了

几门普伏式山炮、野炮，还有几门一〇二口径的重迫击炮，数量并不多，但调动很灵活，侦察到我主力到了哪里，他们就把它调来了。我们部队打得很英勇，但伤亡很大。当时一军团同敌人对阵的主要是红一师，师长为李聚奎同志，政委为谭政同志。二师则负责向永丰、江口警戒。此外还有警卫师和独立十三团参加，统一归我和林彪指挥。一师由东北面向南进攻敌人的碉堡群。有的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我当时也到了阵地上。只见阵地上硝烟弥漫。三团共有九个连队，却阵亡了十三名连级干部。当时就有人听到三团一个当排长的瑞金老表发牢骚说：“不知捣啥鬼呵！我们一夜不困觉做了一个堡垒，人家一炮就打翻了；而人家的堡垒，我们只有用牙齿去咬！我们没有重火器，天天同人家比堡垒，搞什么鬼呵！”后来遵义会议作总结时，把这次战斗归入“拼命主义”战斗之列。

我至今印象还很深，在丁毛山地区，我们的斗争很艰苦，军务工作也很繁忙，可是军团却没有一个好参谋长。军团原先有一个好参谋长徐彦刚同志。徐彦刚和黄公略同志一起工作过，黄公略很赏识他，说他“作参谋工作当指挥员都行，文武全才”。后来二师缺师长，军委就又命令他到二师任师长。徐彦刚同志这个当过军长的人毫不计较，欣然赴任，真正做到能上能下，党性过人。他在二师当师长也很出色。第五次反“围剿”刚开始，他被调到了湘鄂赣任司令员。以后我们长征走了，徐彦刚同志就在湘鄂赣牺牲了。

到了年底，军委派左权同志来当军团参谋长，以补徐彦刚的遗缺。我们想对新任参谋长有所表示，趁过年准备了一顿淡薄的年饭，而这顿年饭也被国民党的飞机炸掉了，没有吃成。

由于我们对福建事变坐失良机，蒋介石将福建事变镇压下去以后，转过头来又重新开始对我们中央苏区进攻。即由中央军从东西北三面向我中心区作向心推进，粤军则从南面防堵。

这时“左”倾冒险主义者仍然不肯实行积极防御方针，而是由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一变而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处处设防，大力推行以碉堡对碉堡和“短促突击”。他们将红军的几个主力军团调来调去，我们一军团则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底被东调到了建宁以北地区。这时各军团从战斗部队到直属机关、分队，都被分配担任修筑堡垒任务，企图依托堡垒，实行“短促突击”。他们甚至将五军团以连排为单位分散去守堡垒。由于他们采取这种战法，从一九三四年一月下旬到三月底，红军所进行的一系列战役、战斗，其结果，不是打成顶牛，就是中途撤退。一军团这时期打了凤翔峰、三岬嶂、乾昌桥等战斗。凤翔峰消灭敌樊嵩甫七十九师一个营。三岬嶂是我牵制部队坚决抗击和击溃数倍敌人的典型战斗，受到军团表扬。

三岬嶂，在黎川西南。从二月二十五日开始，一军团和友邻部队在保卫建宁的过程中，在这一带同敌人几个师

展开了三天激战。敌人派出九十四师全力猛扑我军团侧翼的制高点三岬嶂。负责守三岬嶂的是我一师红一团。红一团团长为杨得志，政委为符竹庭。在主阵地上踞守的为一团二营，营长为陈正湘。这个营打垮了敌人九十四师多次多路进攻。敌人飞机大炮轰炸之声震动得整个山谷轰鸣，我二营打得只剩一百多人，但阵地岿然未动。最后一团协同我突击部队将敌人进攻的一师部队全线击溃，保障了我军团侧翼的安全。为了表扬这次战斗，我写了一篇《把第一团顽强抗战的精神继续发扬起来》的社论，发表在第三十一期《红星报》上。

个别战斗的胜利，挽救不了整个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被动局面。为了从战术上另找出路，二月十四日，我们军团由我和林彪署名，曾经向军委提了一项“关于用运动战消灭敌人的建议”，陈述了一军团当时在建宁西北的守备阵地，纵横有数十里，防线太宽，兵力薄弱，弹药缺乏，工事不坚固；处处设防，处处薄弱，突破之后，工事往往反被敌人利用。建议今后不要处处修工事，应力求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如若修工事，也只是在预定的战线上，有重点地修。这项建议，在我们今天看起来，自然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但是，即使这种有局限的建议，军委也没有接受。军委复电，只承认我们在原则上是对的，同时告诫我们要坚决服从军委命令，找种种理由，根本不承认自己在战术指导上有错误，更不会承认是战略方针错误。

三月中旬，一、三军团在南丰的三溪、三坑作战时，由于敌人的堡垒工事已构筑坚固，失去了击敌于立足未稳的时机。三军团向驻马寨进攻，碰了一个大钉子，伤亡两千多人。我们是从西南面向南丰进攻，因为地形不利，部队还没有展开，就接到彭德怀同志要我们支援的电报。当时一、三军团相距三十里，已是傍晚，天下着雨，路又窄又滑，很不好走。我们顾不得这些，就紧急率司令部摸黑向三军团靠拢，部队随后跟进，前往驰援。我们赶到离三军团原先的阵地约十里地时，已经是黑夜，看到阵地上到处都是手电筒的亮光，我们判断敌人已经占领了三军团原先的阵地，命令部队停止前进，没有误入敌人群中。果然，不久就看到三军团的电台和部队三三两两地撤下来了，我们就在那里收容掩护他们后撤。三月二十五日在泰宁以北的新桥之战，也由于敌人钻进了五军团以前修的碉堡工事，我们啃不动，没有打好。

四月中旬，敌人集中了十一个师的兵力沿甘竹河分左右两路进攻广昌。“左”倾冒险主义者荒谬地提出要“把广昌变成马德里！”要“象保卫马德里那样保卫广昌！”“保卫广昌的政治命令，是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一日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博古、军委主席朱德、代总政治部主任顾作霖联合署名下达的。命令中强调的仍是李德那一套：“我支点之守备队，是我战斗序列之支柱，他们应毫不动摇地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以使用有纪律之火力的射击及

勇猛的反突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完全是单纯的阵地战。李德一度亲自到前方指挥，博古也亲临前方为他撑腰，但仍然固守他们消极防御的那一套。他们调集了红军主力一、三、九军团的九个师同敌人决战，从四月十日到四月二十八日，打了十八天，部队遭受极大损失。最后广昌还是失守了。

一军团在保卫广昌时打的一些战斗，如甘竹战斗等，伤亡消耗都比较大。从甘竹到广昌，不过二十多里，敌人越接近苏区腹地，越是谨慎小心，每天只前进半里到一里，每进一步，边修公路边筑碉堡。我们在“死守广昌”、“寸土必争”的错误口号下，打了十八天所谓“守备战”。这就是说，我们在敌人飞机大炮轮番轰炸下，仍死守阵地，进行“短促突击”，等敌人刚从工事里出来，推进到离我们的工事几十或上百公尺时，我们就象猛虎一样扑上去打击敌人。可是等敌人一缩回碉堡，我们又得暴露在敌人飞机大炮的火网下战斗。最典型的是六月五日一、三军团在宁都西面打的古龙岗战斗。我们本来是想集中主力，伏击薛岳纵队四个师的一部分，但是由于执行的是“短促突击”战术，不诱敌深入，敌人离开其碉堡线才五里地，我们的部队就出击了，暴露了红军的主力，使敌人立即退回碉堡据点。结果是本来可以取得大胜利的战斗，仅仅以消灭了敌人一个营而告结束。我们自己的伤亡也不少。

七月，敌人开始了新的进攻。这时，“左”倾冒险主义

者又命令红军实行“六路分兵”，“全面抵御”。使红军在一系列防御中继续受到损失。一军团转战福建建宁、泰宁一带。又打了不少消耗战。只有九月初的温坊战斗打得比较好。

温坊现名文坊，在长汀东南。这次战斗，包括九月一日和九月三日连续打的两次战斗，是违背“短促突击”的原则，采取运动战的战术打的。我军参加战斗的主要是一军团，独立二十四师，九军团也参加了战斗，统一都归一军团指挥。战斗经过是这样的：八月底，我军即已侦知敌李延年集结了第三、第九、第八十三、第三十六等四个师于朋口、莒溪、壁州、洋坊尾一线，有向汀州前进模样。这时我独立二十四师师长周建屏、政委杨英已率领该师在敌人前进方向之朱鬃岭、桥下、肖坊一线构筑工事，一面吸引敌人，一面等待着一军团到来。三十一日，一军团急行军赶到该地。第二天一时许，敌人李玉堂第三师第八旅两个团，由其构筑的封锁线出动，至正午时分，已进抵十多里以外的温坊。他们一面构筑工事，一面向我二师占领之制高点松毛岭阵地派出侦察警戒。其实我军团指挥位置也设在松毛岭上。敌人并未发觉。这时，我们已命令二十四师派出两个营先隐蔽地迂回到洋坊尾、马古头之间截断敌人后路去了。因为我们看到这确是消灭敌人的极好机会。我们早就认为，敌人的进攻，并非在所有的地方每次只前进二三里，而是看情况决定的。我主力迫近他们跟前，他

们的确是每次只前进二三里，构筑碉堡。但当敌人发现我主力远离时，他们也是跃进或急进较远的，我们并非完全没有打运动战的机会。所以这次我们急令二十四师师长周建屏率领该师主力负责攻击温坊东北敌人的右侧翼，我们率一军团由西向东突击敌人。我们把九军团放在曹坊，牵制在那一带活动的团匪，防止敌人增援。这次作战是夜间战斗，部队动作静肃、秘密、沉着。从一日下午九时战至二日拂晓以前，敌人大部分已被消灭，只有少数残敌尚固守杨背附近堡垒和温坊南面的八角楼。于是我五团六团配合独立二十四师消灭固守杨背的敌人，四团负责消灭温坊村内的敌人。因为既是夜战又是近战，我消耗伤亡都不大。如，四团消灭温坊村内两营敌人的战斗，由于敌人架设的电话线事先都被我侦察员剪断，更增加了我们将敌人各个击破的有利条件。一营是攻击温坊的主力营，他们在整个战斗过程中，只消耗子弹四百发，轻重机枪完全未用，主要靠刺刀、手榴弹解决战斗，自己只负伤三人。战斗结束，仅一军团即俘敌一千六百多人。敌第八旅两个团被消灭了。

三日早晨，敌第三师和第九师由朋口集结三个团又向我进犯，其先头部队为第九师的一个团，八时许由洋坊尾向温坊前进。我们决心消灭这个先头团。命令一师负责截断其先头团的归路，由二师从八前亭，二十四师从马古头两个方向向敌突击。二师四团一营连续冲锋六次，占领八

个山头和三座半截子碉堡，三营连续冲锋占领敌人六个阵地，成为坚决英勇的连续冲锋的模范。其他部队也都很英勇。二团团长李苗保头一天因堵截敌人退路不力被撤职，第二天追击敌人时，奋勇当先，英勇牺牲了。

整个温坊战斗，共歼敌四千多人。打死打伤两千多人，俘虏两千四百多人。

这次战斗结束之后，敌人第八旅旅长许永相只身逃回，被蒋介石枪毙。第三师师长李玉堂由中将降为上校。

但是，个别战斗的胜利，补救不了整个战略指导方针的错误。何况五次反“围剿”所取得的个别战斗的胜利，不能象四次反“围剿”一样，很快发展成为一个战役的胜利。因为“左”倾冒险主义者，经常将一、三军团分开，各堵一面作战，以致使前面提到的三军团打的洵口、团村战斗，和这次一军团打的温坊战斗，都不能发展为更大的胜利。

在此期间，我的心情是很苦闷的。在一军团，林彪执行“短促突击”特别积极。上边四月份提出“保卫广昌”，五月份又提出“保卫建宁”，七月中旬提出“保卫长汀”，九月底提出“保卫兴国”。我们军团今天在这里突一突，明天又在那里突一突，把自己的力量都突光了。我认为这样打在战役上不能解决问题，在战术上也不能解决问题，只是徒然消耗弹药和兵力而已。这些话，我只有和左权同志讲。林彪那时忽然在六月十七日发表了《论短促突击》的文章，正受到重视，我是不放心对林彪讲这些话的。

对林彪发表这篇文章，我开始感到突然，仔细想想，也不奇怪。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之前，大约在一九三三年七月上旬，李德到一军团来过一次，在干部会上大讲一通阵地战。干部们都听不懂。林彪说：“你们不懂，这种打法我也不懂，但不懂就学嘛！”突然发表《论短促突击》这篇文章，自然不仅是谈战术，实际上是他这时的一个政治上的表态。

到了十月，中央苏区日益缩小，红军日益陷于被动，“左”倾冒险主义者采取的单纯防御的方针遭到彻底破产。他们总不愿意让红军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实行机动作战，而提出“以碉堡对碉堡”，死守苏区每块“国土”，“寸土必争”，“拒敌于国门之外”。结果，“国土”还是丢了。红军被迫不能不作战略转移——走长征这条路了。

总之，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是偶然的，而是战略错误，路线错误。是王明“左”倾分子在中央排挤了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领导的必然结果，是否定了一至四次反“围剿”致胜的积极防御方针，执行单纯防御方针的必然结果。以碉堡对碉堡，实行“短促突击”，光在内线顶牛、拼消耗，不集中兵力，所谓两个拳头打敌人，六路分兵；既不敢诱敌深入，寻机歼敌，又不接受毛泽东同志将红军突入到闽浙赣外线去调动敌人回援的建议，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苏区的丧失，铸成了这次历史性的错误。但是只要革命的火种不灭，中国革命仍然是会胜利

的。

八、政治思想工作

回忆录写到这里，我想插入一段关于在中央苏区政治思想工作的综合回忆。遵照革命领导者们这方面的一些至理名言，谈谈我自己的一些亲身体会。因为我当时不过是军团一级的政治思想工作的贯彻执行者。之所以插在这里讲，也是因为红军中的政治思想工作，与国民革命军中的政治思想工作相比，又有许多新的特点，内容有很大的发展。而且在中央苏区，又是我学习和积累做红军政治思想工作经验打基础的时期。在总政治部时间很短，可不去说它。在一军团任政治委员时，按照政治委员的职责，我除了作为指挥员之一，参与军事指挥之外，日常主要任务，是领导和参与做好军团的政治思想工作。

“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奋斗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这是斯大林关于政治工作的名言。我在中央苏区工作实践中，也有深切体会。

试问我们的每一个红色战士，为什么要当红军，他们都会回答你是为了“打土豪，分田地”。再进一步地问他，他会回答你：“为了苏维埃新中国！”“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更进一步问，他会回答你：“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每个农民参军，都经历了一个对革命目的由不认识到认识的过程，由初步具有这种认识，随后就变成每个革命战士终生

为之奋斗的政治目标、政治理想和斗争信念。战斗力就是从这里生长出来的。

教育战士“打土豪，分田地”，战士们一听就懂。可是，为了使这些战士懂得什么叫苏维埃——这个直接音译过来的外来语，我们各级政工人员，可是费了很大的劲哩。费劲确实是费劲，可是战士们一旦懂得它的基本含意，就会对它产生强烈的感情。许多战士在临危授命时，是一面喊着“为了苏维埃新中国”，一面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至于共产主义，战士们都觉得比较好懂。他们早就希望将来有一个没有人剥削人，没有人压迫人的社会，他们把一切至善至美的理想都寄托在她身上。虽然觉得这个社会很遥远，但又觉得她很亲近。她每天都指导和鼓舞我们前进。所以很多烈士临终以前，都闪着圣洁的泪光说：“为革命而死，死而无憾。只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我看不到了！希望同志们……”

所以，有的人归结说：我们红军打仗，打的就是政治。如果说话的人，他不是轻视军事，不是轻视战术、技术训练，不是轻视后勤保障，而是用这种强调语气，说明政治工作在红军中的重要地位，我认为这是从某种根本意义上讲的，是正确的。那时敌强我弱，我们的装备和火力都远不如敌人，在人数上，敌也数十倍于我。我们之所以能打胜仗，除了靠正确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避实以就虚之外，主要靠压倒敌人的士气。士气从哪里来？靠指战员的

阶级觉悟，靠广大指战员知道为何而战。这就要靠政治思想工作，靠平时经常的基本的和时事性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战场上强有力的宣传鼓动工作。

我的第二个深切体会是，的确如毛泽东同志说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也是直接关系到一个红军军团的生死存亡，士气兴衰的大事情。我进入苏区时，正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正确路线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反复较量的时期，它经常直接反映到红军政治工作上来。我们这个军团究竟拥护什么，反对什么，必须立即表态，不容回避。

我对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一些政策主张是经过反复比较鉴别，才认为它是正确的。毛泽东同志能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一套切实可行又能克敌致胜的政策主张，和王明等人从国外贩来的，或从书本上抄来的大而空的政策主张，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我不是说毛泽东同志是“圣人”，一点也不会出错。但是他那时很注意调查研究，倾听各种不同的意见，总结实践得来的经验教训，出了错改正得也比较及时。不象他晚年那样。比如对苏区的肃反政策，我们的党一度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是我党我军历史上的一大悲剧。我们在上海时就有所发觉。对此，毛泽东同志也是发觉得比较早，提出反对搞逼、供、信比较早的主要领导人。

我到达苏区时，肃反的高潮已经过去了。但当时王明

“左”倾路线又在苏区得势，对肃反扩大化的错误，纠正得不可能很彻底。我进苏区到达长汀时，还看到了对“破获”的“社会民主党”正法的布告。那时在江西叫肃 AB 团，在福建是肃“社会民主党”。其实，AB 团是有的，但只是敌人打进我们内部的个别人，哪里会有那么多？很多是冤案，是自己在哪里吓唬自己，自己在哪里疑神疑鬼，自己把自己搞垮，冤枉了很多干部。我看到有的战士也被说成是“社会民主党”。我很奇怪，一个农民才当几天红军，他知道什么叫社会民主党呀？！

我到一军团以后，肃反工作直接归我这个政治委员领导。不久，罗瑞卿又从四军调来军团任保卫局长。我们之间意见比较一致，使一军团的保卫工作没有发生过大的差错。我记得我们在一军团，干部有了错误就批评一顿，没有随便扣上“敌人”的帽子，没有杀过一个干部。

我至今还记得有这样一件事。那是第四次反“围剿”的时候，一次缴到了一些西药。有的西药上没有标签。从外形和气味上看，很象奎宁。那时，部队发疟疾的很多，急需奎宁，军团卫生部就把它当作奎宁发下去了。军团部是近水楼台，机要科黄科长和警卫连指导员正发疟疾，就先服用了。立即产生过度兴奋、烧心、恶心等强烈反映。后来查清楚是误把吗啡当作奎宁服用了。

可是开始并不知道。只看见军团机要科长等竟然象疯狂了似地在山上跑上跑下，乱抓自己的心窝。这是中毒的

表现。这不是敌人在搞破坏是什么呢？于是赶紧追查。先追查到军团部的游胜华医生，他是瑞金中华红色医务学校毕业的，是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土”医生，本人是党员，家庭是贫农，难道是他搞破坏？似乎不会。往上追，药是军团卫生部分发下来的。当时在军团卫生部当药剂科长的是戴济民同志，外号戴胡子。是红军打吉安时，他在吉安城内开私人诊所，红军动员他出来参军的。是否他是 AB 团？再往上追，军团卫生部的医务主任是姜齐贤同志，他在被红军俘虏以前是国民党的中校医官。可疑！当时他们本人都很紧张，旁人也替他们捏把汗。

我亲自参与调查处理这件事，发现确实是误用了药，并非蓄意搞破坏。罗瑞卿同志和我也配合得很好，一场风波算是平息了。我给卫生部规定了一条，今后凡是缴到没有标签的药，先找有药剂经验的人辨别判断，然后给狗吃作试验，证明没有毒性才允许给人服。我还告诉这些被怀疑的人接受教训，不要多心，安心工作。一起人命关天的错案才算避免。使许多人懂得正确的保卫工作，保护好人跟打击坏人同样重要，是一点也不可疏忽大意的。

第三点体会是，做政治思想工作，一定要依靠党团支部，发动全体干部、党团员都来参加，而且，干部和党团员一定要以身作则带领群众，才能发挥政治思想工作的威力，才能把本军官兵的政治思想工作、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以及争取敌军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好，完成打仗，发动群

众，打土豪、筹粮筹款三大任务。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就讲过：“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在连队，那时党团员至少占全连总人数百分之二十，干部多数是党团员。依靠干部和党团员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很重要。有人讲，共产党打仗打的是干部，打的是党团员。我认为这种用强调语气说的话，说得也对。事实上，从在中央苏区开始，我们每打一仗下来，党团员伤亡数，常常占伤亡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甚至百分之五十。我们的干部和党团员绝大多数真正做到了“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到了关键危急时刻，敢于扬臂一呼：“同志们，跟我来”！干部和党团员以身作则，这是政治思想工作起作用的关键。

第四条体会是，必须从政治上到物质生活上关心群众；越是在困难时刻，越要注意关心群众的疾苦。这本身就是政治思想工作。第四次反“围剿”和第五次反“围剿”有个明显的比较。第四次反“围剿”时，红军每人由地方供给一斤六两粮食，供给部发六分钱菜金，到月底还能分“伙食尾子”，生活很有保障。打仗即使伤亡大一点，但缴获多，补充快，政治思想工作是比较好做的。到了第五次反“围剿”，没有打出一个名堂，部队伤亡消耗大，得不到补充，生活越来越艰苦，政治思想工作是比较难做的。到了以后长征，根据地没有了，作战没有根据地作依托，条件更艰苦，政治思想工作更难做。所以，在艰苦条件下，除了从政治上

关心以外，关心群众疾苦更显得重要。在第五次反“围剿”时，由于敌人封锁，部队经常吃不到盐。江西不出盐，还要越过敌人封锁到广东去运盐。有的地方花一块白洋只能买到几两甚至几钱盐。没有盐吃就只好“官兵同淡”了。随着战斗频繁，生活艰苦，部队病号越来越多。有些病号实际上是什么病都没有，纯粹是营养差造成的，如夜盲症，在部队越来越多。有些疟疾久治不愈，也和营养不良有关。为了减少病号，我曾经找医务部门的同志商量，看能想点什么办法。他们的回答是：最好是吃鱼肝油。在那种情况下，哪里去找鱼肝油？！别说鱼肝油，就是猪肝、羊肝也难弄到呀！后来想到了一些土办法，象打鱼摸蟹，掘笋罗雀等等，来解决部队的营养问题。这样做，总比束手无策强。自己动手，想些土办法，减少病员；少一个病号连队就多一个战斗力。

第五个比较深切的体会是，提高部队的文化教养，发动革命竞赛，培养与发扬部队革命英雄主义的荣誉感，也是政治思想工作重要内容之一。毛泽东同志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红军在中央苏区经常挤时间上政治课或识字课。歌天天唱，有晚会必有舞蹈。列宁室有机会就开展文化娱乐活动。一驻下整训，单杠木马等军事体育活动就展开了。一九三三年中央军委规定八月一日为建军节。这一年的建军节，第一方面军先召开运动会，授予了红五团“模范的红五团”奖旗一面。之后，一军团在滕田

召开了本军团的运动会。红军的运动会和一般日常所说的运动会不同，它是紧紧地结合作战，培养那种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压倒敌人的革命英雄主义。所以在会上，军委给新整编的各师团授了军旗，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颁发的二级和三级红星勋章发给了一军团一批团职以上领导同志。军团授了上题“牺牲决胜”的奖旗一面给红一团，上题“英勇冲锋”奖旗一面给红四团。并进行了文化的、体育的、卫生的、通讯的各种战术技术的竞赛。最后演剧发奖。从这一年往后，几乎每年都在“八一”举行一次运动会，作为全年文体卫生工作的总检阅，以推动这些工作在平时健康发展。比如演戏，红一方面军一九三三年春节就开始了，到秋天“八一”建军节在滕田运动会形成高潮。第二年“八一”在长汀南山坝开运动会又继续演出。当时红军知识分子很少，只有一些小型剧社、宣传队，都是一些小知识分子在那里搞，他们自己或发动一些干部编些短小精干的话剧，为部队演出。那时剧本也不象现在这样细，是粗线条的，所以演的人可以充分发挥。几位搞保卫工作的同志，象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等对搞文艺工作很积极。特别是胡底同志，他爱好文艺，很有创作才能，可惜长征时被张国焘杀掉了。当时演出的戏记得有《庐山之雪》、《杀上庐山》等等。

第六个比较深切的体会是，一切政治工作必须为着前线的胜利。一九三四年二月，军委召开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贯彻“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这一方针。军委

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贺昌，他们在讲话中，一致强调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而政治工作又必须明确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这一总目的。只有明确这个目的，才会注意在平时政治工作中为战时打基础，并加强战时政治工作，加强战场宣传鼓动工作，发挥战时政治工作的顽强性不间断性。政治干部才会注意学战术，学会做各种战斗情况下的政治工作。才能克服政治工作中的文牍主义、闭门造车、形式主义等等。

第七个比较深切的体会是，各级政治机关、政治干部必须经常注意发现好的干部苗子，推荐选拔干部、培养干部。在中央苏区，红军都办有各种在当时环境下堪称“正规”的学校，比如红军大学和各种训练班，甚至有团政委训练班，各个部队还办有自己的教导队，训练最基层的干部。学校培养再结合在工作岗位上培养（学校培养很重要，经常性的培养主要靠在工作岗位上培养），使我们培养了大批能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干部，一茬接一茬，源源不断。使我们在各种残酷的战斗环境中，无论伤亡多么大，我们的干部队伍，始终是后继有人。其中涌现的很多德才兼备、能文能武的优秀干部，也都是当年从一些革命热情很高但稚气十足的红小鬼中选拔出来的，或者是从虽然有些书生气但对待革命事业很忠诚又很有抱负的知识青年中磨练出来的。历来的经验证明：凡是哪个部队干部出得多，不用说，这个部队的领导一定是很有远见的领导，部队一定是

很有朝气的部队，政治工作必定很活跃，部队一定有战斗力。

第二章 长 征

九、突破敌人一、二、三道封锁线

一九三四年十月，历史上著名的长征开始了。

长征之前，一军团在福建打了温坊，奉命回到瑞金待命。我和林彪提前一天赶到瑞金。周恩来同志找我们单独谈话，说明中央决定红军要作战略转移，要我们秘密做好准备，但目前又不能向下透露，也没有说明转移方向。转移之前，要一军团先到兴国抗击和迟滞周浑元纵队的进攻，以便掩护各路红军到预定地域集结。当时保密纪律很严，所以我们也没有多问。听说毛泽东同志这时候也从外地回到瑞金了，我提议去看看他，就和林彪一起去了。毛泽东同志见到我们很高兴，说：“你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呀！”我说：“我们回来了，接受新任务来了。”毛泽东同志故意反问：“什么任务？”我回答说：“要转移。”当时称长征不叫长征，叫转移。因为并非预定了要走二万五千里，只是要先转移到湘西去，和二、六军团会师，以后再作计议。

当时，先遣队已提早出发了。七月份，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同志领导的红七军，和随后在赣东北会合的方

志敏同志领导的红十军，成立了抗日先遣队，早已首途北上。八月份，六军团从湘赣苏区出发，由任弼时和王震、肖克等同志率领，到湘西一带找二军团去了。

毛泽东同志听我们说到转移，就说：“你们知道了？”我说：“我们接受任务了。”

我们这次去见毛泽东同志，本想打听一下转移去哪个方向。可是他就谈到这里，不往下谈了，却提议一同去看看瞿秋白同志办的一个图书馆。

毛泽东同志那时是很守纪律的。同时，那个时候他也在避嫌疑。因为一军团长期是由他直接领导和指挥的部队，他要防止教条宗派主义者怀疑他在暗中搞什么宗派活动。因此，没有达到我们想探问转移方向的目的。毛泽东同志这样注意守纪律，李德仍不断散布谣言，污蔑攻击毛泽东同志搞宗派活动，一直到一九七六年他写的名为《中国纪事》的回忆录里面，仍然充满了这类无耻谰言。我所经历的事实，是对这类谰言的最好的回答。

辞别毛泽东同志以后，第二天我们就同部队一起离开瑞金，九月中旬末到达兴国以北的高兴圩，与原在那里的五军团一起阻击周浑元纵队三个师的进攻。敌人在这次进攻中火力特别猛烈，飞机、火炮轮番轰击，我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阻击，直到九月底他们才占领了高兴圩。以后敌人停止进攻，进行筑堡。十月上旬我们与五军团换防，奉命到兴国东南的社富、岭背、宽田、梓山一线集中，十月

十二日以前我全军团到达了预定的集中地域。

长征之前，洛甫同志在《红色中华》第二百三十九期上，发表了《一切为了苏维埃》的文章，提出了准备反攻的任务，这是我们进行公开动员公开准备总的根据。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一日由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署名，发布中央军委长征行动的命令。在此前后，总政治部由李富春代主任署名（因王稼祥同志四次反“围剿”后负伤了），也先后发布了几个政治动员令。我们根据这些命令，逐步将动员工作、准备工作具体化。出发前，军委又拨给我们两个补训团，一军团总兵力达一万九千八百多人。

一军团的部队，是十月十六日以后，先后离开瑞金以西的宽田、岭背等地，告别了苏区群众，跨过于都河走向了长征之途。过于都河，正当夕阳西下，我象许多红军指战员一样，心情非常激动，不断地回头，凝望中央苏区的山山水水，告别在河边送别的战友和乡亲们。这是我战斗了两年十个月的地方，亲眼看到中央苏区人民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他们向红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儿女，红军战士大多来自江西和福建，苏区人民给了红军最大限度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想到这些，我不胜留恋。主力红军离开了，苏区人民和留下来的同志，一定会遭受敌人残酷的镇压和蹂躏，我又为他们的前途担忧。依依惜别，使我放慢了脚步。“紧跟上！紧跟上！”由前面传来的这些低声呼唤，又使我迅速地走上新的征程。

行军时，三军团在右翼，其后有八军团；一军团在左翼，后面有九军团；从两翼掩护着中央纵队（第二纵队）和军委纵队（第一纵队）——当时为了保密，统称为红星纵队，作甬道式的开进。第一纵队由叶剑英任司令员，第二纵队由罗迈（即李维汉同志）任司令员，邓发任政委。五军团担任殿后。

开始出发时，红星纵队真象大搬家的样子，把印刷票子和宣传品的机器，以及印就的宣传品、纸张和兵工机器等等“坛坛罐罐”都带上了。这就形成了一个很庞大很累赘的队伍。以后进入五岭山区小道，拥挤不堪，就更走不动了。有时每天才走十几里或二、三十里。

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时，一军团由二师担任前卫。这时，粤敌的第一师主力在安西，第二师在信丰，第四师在赣州、南康，独二旅在安远。我们突围第一仗首先在江西安远和信丰间的版石圩一线碉堡群间打响。十月二十一日，我一师一团袭占新田，二师六团袭占金鸡，旗开得胜。这一线守敌是国民党广东部队的一个旅。敌人发觉我们突围的红军大部队以后，边打边撤。十月二十二日我军进攻版石圩，守敌是第一师的第三团和教导团，敌凭堡垒进行了顽抗，经两个半小时激战，才将敌人击溃。敌人向安西逃跑，我们在追击途中，又与敌激战数小时，共歼敌约一个团，除打死打伤的以外，俘敌三百多人，缴获了部分军用物资。粤敌第一师经这一打击，退到安西，三军团从右

翼占领了古陂，随后也追歼逃敌到安西。敌退守安西后不敢再出。我一、三军团派出一部兵力，监视信丰、安远、安西这三点的敌人，掩护后续部队从这三点间安全通过以后，我们才先后撤出战斗。敌人吹嘘的第一道“钢铁封锁线”，就这样被我们冲垮了。

夜以继日，我们赶到了第二道封锁线。第二道封锁线设在湖南桂东、汝城至广东城口一线山上。碉堡和碉堡之间，沟壕相通，火力相连。这一线的守军保安队居多，有的还没有见过正式红军，有的也没有想到红军来得这样快。国民党正规军则深处内线。我二师六团在团长朱水秋、代政委王必成同志率领下以奔袭、奇袭方式夺取了城口。

城口临河，河边有一道木桥，公路从上边通过。敌人在桥上设有岗哨。负责主攻的六团一营，非要从木桥上经过不可。十一月二日晚，一营到达距桥头数百公尺处，敌人就发觉了。敌喝令一营停止前进，一营佯称是“自己人”，一面上前夺哨兵的枪，一面派部队涉河包抄。这时，二营也迂回过去了。歼灭了城口这股敌人，生俘了一百多人。军团部移驻城口。与此同时，三军团因湘敌六十二师先我占领汝城，所以对汝城采取派一部监视，其余部队绕道通过的办法突了过去。第二道封锁线就这样又被我们突破了。

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设在粤汉铁路沿湘粤边湖南境内良田到宜章之间。这时韶关这一线的铁路虽然还没有全线修通，但是有些地方火车短距离是通车的，公路上汽车往

来也频繁，对敌人调兵非常方便。敌人几年以前就利用修铁路的水泥和器材，在这一线山上修了不少碉堡。而且这时敌人已判明我们在突围，国民党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有的已经从江西、福建追上来了。粤敌利用他们有铁路公路之便，正赶往我们前面堵击。

在这样危急的情势下，我和林彪之间，为了部署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发生了长征路上的第一次争吵。我平时总认为林彪不是不能打仗之人。有时他也能打。他善于组织大部队伏击和突然袭击。可是由于他政治上存在很大弱点——个人主义严重，对党不是很忠诚，有时就使他在军事指挥上产生了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这次在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时就表现得很明显。当时一军团受领的任务本来是要派一支部队控制粤汉铁路东北约十多公里的制高点——九峰山，防备广东军阀先期占领粤汉线上的乐昌以后，向我发动袭击和堵截，以掩护中央纵队从九峰山以北到五指峰之间安全通过。因为我们早就知道广东军阀的部队正在开赴乐昌。可是林彪不执行军委命令，不占领九峰山，一直拣平原走，企图一下子冲过乐昌。他持的理由是敌人还没有到达乐昌。我说，那可不行！我也估计可能敌人还没有到达乐昌。可是我们离乐昌还有一段路程。我们的两只脚怎么能跟敌人的车轮比呢？就算敌人现在还没有到乐昌，等我们用两只脚走到乐昌，也可能和敌人在乐昌碰上了。因为敌人是乘车。同时，我们也不能只管自己在

平原上跑过乐昌就算完，还有中央军委纵队在后面，我们担任的是掩护任务。如果我们不占领九峰山，敌人把后面的部队截断怎么办？我认为这是个原则问题，作为政治委员，对军委命令的执行，是负有责任的。因此，我坚决主张按军委命令行事。当时我们争吵得很激烈。左权参谋长为了缓和这场争吵，他建议派陈光带一个连到乐昌去侦察一下。我说，侦察也可以，不侦察也可以，你去侦察时，敌人可能还没有到，等你侦察回来，敌人可能就到了。担任如此重大的掩护任务，我们可不能干这些没有把握的事。我说，我同意派人去侦察，但部队继续前进，一定要遵照军委的命令行事，一定要派部队控制九峰山。以后陈光侦察回来说，在乐昌大道上已经看到敌人，正在向北开进。林彪这才不再坚持了。

幸亏我们没有图侥幸。十一月六日下午三点，军团部到了麻坑圩。林彪亲自利用敌人的电话线，装作敌人的口气，和乐昌道上赖田民团团长通了一次电话。该民团团长告诉他，红军到了何处，他不知道，乐昌前日到了粤军邓龙光部的三个团，一团今日开往九峰去了。这时，他才着了急，赶紧派二师四团，昼夜直奔九峰山。抢先占领阵地，随后派出得力部队，攻击九峰山南侧的茶岭，监视了九峰圩的敌人，保证了左翼的安全。再加上三军团在右翼先后占领了宜章、良田等县城，这就更增加了有利条件，从南北两个方向掩护中央军委等后续部队，从九峰以北安全地

通过了第三道封锁线。

十、奔袭道州，强渡湘江，突破 敌人第四道封锁线

越过九峰山时，行军非常艰苦，我们冒雨行进在九峰山崎岖的羊肠小道上。这里没有村庄，看不到一户人家，部队没有饭吃，饥饿、寒冷和疲劳考验着每一个红军战士。但当我们得知，三军团、中央和军委纵队及其他兄弟部队已经通过了第三道封锁线，走到前面去了，于是大家互相鼓励，不顾一切地往前赶。我的脚就在过九峰山时磨破了，但仍坚持随队行动。

部队进到湖南、广西边境，还没有渡过潇水，蒋介石的嫡系薛岳、周浑元的几个师就尾追上来了。湖南军阀何键的部队，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的部队也乘机从两边夹击过来。这时蒋介石已任命何键为进剿军总司令，十一月十四日何键下令以十五个师分五路追击和堵击我们。第一路刘建绪四个师由郴县直插黄沙河、全州，第二路薛岳四个师由茶陵、衡阳插零陵，这两路主要是堵击我军去湘西；第三路周浑元四个师，第四路李云杰两个师向我追击；第五路李韞珩一个师在我军南部跟进，配合粤桂军围堵我军。广西军阀五个师已经先期占领了全州、灌阳、兴安等地。军委一方面向我们通报了上述严重的敌情，一方面仍要我们加速西进。

在我们前面，横着两条大江，一条是潇水，一条是湘江，都是由南往北流入洞庭湖的大水系。

过了第三道封锁线，一军团仍然先走左翼，沿临武、兰山方向前进。以后又变为右翼，向天堂圩、道县方向前进。

敌人的第一着恶毒计划是先合击我于天堂圩与道县之间的潇水之滨。

在当时的形势之下，从右翼部队来说，若想掩护中央纵队渡过潇水，必须先敌抢占道县。

道县旧名道州，紧临潇水西岸，是这一带第一大县城，也是这一带第一大渡口。

十一月二十日，一军团二师受领了长途奔袭占领道县，并阻止零陵之敌向道县前进的任务。

二师师长陈光和政委刘亚楼决定，将抢占道县的任务交给四团。由四团主攻，五团迂回配合。四团团长耿飏，政委杨成武，他们率领部队，以日行一百多里的速度，长途奔袭，于十一月二十二日拂晓，泅渡潇水，急袭道县，消灭了守敌，并向零陵方向派出了警戒部队。六团在道县以南的葫芦岩、莲花塘、九井渡架起浮桥，掩护中央军委后续部队渡过了潇水。这样，使敌人第一个计划不能得逞，并为我进一步渡湘江造成有利态势。

紧接着，敌人的第二步计划是消灭我于湘江之滨。这是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最严密的部分。

敌人麇集二十个师，为了紧缩包围圈，湖南军阀何键将他的指挥部从长沙迁至衡阳，将其所属的刘建绪的四个师调至桂北全州。第二路薛岳的四个师进驻黄沙河。广西白崇禧也将指挥所移到桂林，将他的五个师和民团配置在全州、界首、灌阳等地。重点在保境“灭共”。而蒋介石的嫡系周浑元的四个师和李云杰的两个师，则从我们红军的背后，象拉网似的压过来。

我们面前是一道又宽又深的湘江，湘江对岸还有一条与它平行的桂黄公路，敌人在湘江与桂黄公路之间连绵不断的丘陵间，修了一百四十多座碉堡。

本来，当十一月十六日我五团攻占临武，敌人弃守兰山，我军继续向江华、永明方向开进时，白崇禧一度命他的部队退守龙虎关和恭城，用意是既防止红军也防止蒋介石军队进广西。这时白崇禧部已经撤走，湘敌刘建绪部还没有赶到全州，灌江、湘江一线空虚得很。如果我们能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没有那么多坛坛罐罐的拖累，是完全可以先敌到达湘江，抢先渡过湘江的。但我们丧失了这个宝贵的时机，直到十一月二十五日军委才发布命令，我军兵分两路渡江，这时的湘江就很难渡了。

中央军委将渡河点选在界首和凤凰咀之间。命令一军团从右翼，三军团从左翼，以及八、九军团等，从两翼掩护中央和军委纵队渡湘江。

当一军团率领二师从道县出发，经文市向湘江前进时，

一师尚滞留在后面配合五军团对付周浑元。因为周浑元一直紧追在后边不放，其先头部队已抵达道县，一师在五军团未到达之前，必须保住潇水西岸。同时，如果不给紧追之敌一个歼灭性的打击，我们也不能放心前进。

二师派四团作前卫。四团受领的任务是：提早出发，先去抢占全军左翼的界首，待夺取以后，移交给随后赶到的三军团六师。然后向右翼归还在全州方向的二师建制。这个任务四团按期完成了。与此同时，二师另两个团，也于二十七日由石塘抵达大坪，涉水渡过湘江。并派遣五团相机先敌占领全州。但当天全州已被湖南军阀刘建绪的部队先期占领，五团这一任务未能实现。

夺取全州未成，一军团只能将第一道阻击线选在全州西南、湘江西岸，距全州十六公里的鲁板桥、脚山铺一线的小山岭上。从全州，有一条公路，就是桂黄公路，正穿过脚山铺。这一线山岭走向与桂黄公路相交，正好成十字形。脚山铺，在这个十字中心，是个二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庄。在公路的两侧，夹峙着两列二公里多长的小山岭，各有数个小山头。以东边的黄帝岭和西边的怀中抱子岭最高，标高有三百多公尺，其余二百多公尺。山岭上长满小松树。山岭前面有一个开阔地。这个地区是一个比较好的阻击阵地。

军团召集干部看了地形，决定先将二师重点部署在桂黄公路两侧，加紧构筑工事，待一师赶到，再将一师部署

在公路西侧。

白崇禧看到我军直奔湘江，就又把他的九个师开回灌阳和兴安两点。从十一月二十七日起，三军团在左翼灌阳、新圩和桂军打了几天几夜。由于一、三军团同时在两翼强占要点，我军已控制了界首至屏山渡之间六十里地的湘江两岸，在此区域，甚至有四处浅滩可以涉渡。中央军委纵队也已于二十七日到达灌阳北的文市、桂岩一带。如果当时仍决定抢渡，由桂岩到最近的湘江渡点，只有一百六十多里地，采取轻装急行军，一天即可到达，仍有可能以损失较小的代价渡过湘江。但是“左”倾教条主义领导却没有利用这一大好时机。他们仍然让人们抬着从中央苏区带来的坛坛罐罐，按常规行军，每天只走四五十里，足足走了四天，才到达湘江边。使前线战士为了掩护任务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十一月二十九日，刘建绪得悉我中央纵队要渡湘江。而白崇禧又将全州以南至界首段他所部署的正规桂军都撤掉了，只剩下民团；识破了白崇禧的目的是想要让红军入湘，他就急了。即以其四个师的兵力，从全州倾巢出动，向我二师脚山铺阵地进攻。攻到第二天拂晓，即十一月三十日凌晨，我一师师长李聚奎，代政委赖传珠才率部队刚刚赶到，部队非常疲劳，队伍一停下，有些战士站在那里就睡着了。但军情紧急，立即紧急动员，仓促调整部署，进入阵地。

三十日，全军团展开阻击。一师是二、三团阻击，一团作预备队。二师是四、五团阻击，六团作预备队。敌人前锋为十六、十九师两个师的兵力。拂晓时的第一次冲锋，很快被我军打垮。在尖锋岭和美女梳头岭丢下了几十具尸体。敌人不甘心失败，又组织第二次冲锋。后来随着冲锋次数的增多，投入的兵力越来越多，在十多架飞机的掩护下，攻击也越来越猛。阵地上硝烟弥漫。我们利用有利地形杀伤敌人，阵地前敌人的尸体越积越多。战至下午，敌人以优势兵力，猛烈的炮火，突破了一师米花山防线，威胁我美女梳头岭等阵地。最后，一师只剩下一个怀中抱子岭。入夜，敌人又利用夜幕迂回进攻。我一师为了避免被包围，退往西南方向水头、夏壁田一带。

敌人占领米花山和美女梳头岭以后，对我二师前沿阵地尖锋岭威胁也很大。敌人从三面向我尖锋岭进攻，五团在上面只派有两个连，尖锋岭失守。五团政委易荡平负重伤。这时，敌人端着刺刀上来了，荡平同志要求他的警卫员打他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手直打颤，岂能忍心对自己的首长和同志下手。荡平同志夺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他决不当俘虏的誓言。五团阵地失守，二师主力只得退守黄帝岭。敌人紧跟着向黄帝岭进攻，于是在黄帝岭展开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拼杀战，黄帝岭终于守住了。入夜，在一师撤出之后，二师孤军突出，为了避免被敌包围，也主动撤退至珠兰铺、白沙，与一师占领的夏壁田、水头，构成

第二道阻击线。

第一天战斗过去了，夜间也无法入眠。我们最担心的是中央军委和后续部队的安全。这几天，中央军委要求我们全天都和他們保持无线电联系，来往的电报，几乎都是十万火急，个别的是万万火急。十一月三十日晚上，我们军团领导人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在脚山铺附近给军委发了一份电报：

朱主席：

我军向城步前进，则必须经大埠头，此去大埠头，经白沙铺或经咸水圩。由脚山到白沙铺只二十里，沿途为宽广起伏之树林，敌能展开大的兵力，颇易接近我们，我火力难发扬，正面又太宽，如敌人明日以优势猛进，我军在目前训练装备状况下，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军委须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一、二师明天继续抗敌。

十二月一日一时半，朱德主席给全军下达了紧急的作战命令。命令指出：“一军团全部在原地域有消灭全州之敌由朱塘铺沿公路向西南前进部队的任务。无论如何，要将汽车路向西之前进诸道路，保持在我们手中。”紧接着，在三时三十分又以中央局、军委、总政的联合名义，下达了一定要保证执行军委上述命令的指令给一、三军团：

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

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迟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我一、三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员，分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一号一时半作战命令全部实现，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部队，开辟西进的通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

去。

中 央 局
军 委
总 政

十一月三十日晚上，到十二月一日清晨，无论是红色指挥员、政工人员、参谋人员以及各类战勤人员，和连队的党团积极分子，都是一个最紧张的通宵达旦的不眠之夜啊！为了党中央的安全，为了红军的生存，都是熬红了眼在为第二天作战斗准备。生死存亡在此一战啊！

十二月一日，是战斗最激烈的一天。凌晨，敌人在敌机狂轰滥炸之下，更加嚣张地向我进犯。而军委命令我们在本日十二时前，要保证决不让敌人突破白沙河，使总部

和全野战军能顺利地渡过湘江封锁线。敌众我寡，但在“一切为了苏维埃新中国”的口号下，我们的士气惊天地而泣鬼神。于是在二十多里地的战场上，炮声隆隆，杀声震天。在茂密的松林间，展开了生死存亡的拼杀战。

开始，敌人猛攻三团阵地，三团连续打了几次反冲锋。敌转而猛攻我一、二师的结合部，终于被敌突进四五里地，并迂回到三团背后，包围了三团两个营。一个营当天奋勇地突出了重围，和一、二团会合。一个营突错了方向，反而突入敌群，被分割成许多小股，在班、排长和党的支委、小组长带领下，两天以后多数人归回了自己的部队。敌人从我结合部突破以后，二师也有被包围的危险。因为二师部署靠外，他们当机立断，命令守白沙的团队将敌人坚决顶住，这个团打得非常顽强，他们硬是凭着刺刀，将来势汹汹的敌人顶住了，其他两个团才撤出向西边大山靠拢。

接近正午时分，得知中央纵队已经渡过湘江并已越过桂黄公路，我们才放了心，令一师和二师交替掩护，边打边撤。一师经木皮口、鸛子江口，二师经庙山、梅子岭、大湾，分别从两个山隘口退入通资源的大山区。

这一天，一军团军团部也遭受极大危险。敌人的迂回部队打到了我们军团部指挥所门口，这是很少有的事。当时指挥所在一个山坡上，我们正在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敌人已经端着刺刀上来了。我起初没有发觉，警卫员邱文熙同志很机警，他先看到了，回来告诉我。我说，恐怕是

我们的部队上来了，你没有看错吧？他说没有看错。我到前面一看，果然是敌人。左权同志还在那里吃饭。我说，敌人上来了，赶紧走。于是我一面组织部队赶紧撤收电台，向一个山隘口转移，命一部分同志准备就地抗击敌人，一面命令警卫排长刘辉山同志赶紧去山坡下通知刘亚楼他那个政治部，让他们向预定方向紧急转移。刘辉山往下走的时候，敌人正向我们方向射击，一抬脚，一颗子弹奇怪地把他的脚板心打穿了。由于我们这次及时地采取了适当措施，摆脱了敌人，避免了损失。进北京以后，刘辉山曾当过中央警卫团团长。在我们撤退的时候，敌人的飞机活动很疯狂，撒下很多传单，说什么如果不投降就要葬身湘江。国民党政工人员编写的这些狂妄浅薄的宣传品，连他们自己的士兵都称之为卖狗皮膏药，更吓唬不倒英雄的红军，没有人去理它！可是敌人的飞机几乎是擦着树梢投弹扫射，很多人被吸去了注意力，不注意往前走了。我说，快走！敌人的飞机下不来，要注意的是地面的敌人。快走！

在我们一军团与敌人血战的同时，三军团在兴安、灌阳一带，与广西敌人进行了激战。五军团则在文市附近与周浑元等追敌进行激战。他们也都打得顽强而艰苦，损失很大。

这次过湘江，我们不仅要掩护中央机关，而且要掩护几个新成立的部队。那时候，教条宗派集团，不注意主力兵团的充实建设，却成立了一些缺乏基础的新部队。我们

主力兵团又缺乏兵员补充，是打掉一个少一个，而新成立的部队战斗力不强，我们既要完成主要任务，有时还要掩护他们。

准备撤往西边大山时，有一个山隘口叫梅子冲，通过这里，就可以到油榨坪，是我们预定的撤退路线。大家都往这个口子挤，这个口子很窄，部队多了势必谁也过不去。所以一定要安排开。我命令聂鹤亭同志带一支部队在通向油榨坪方向右边的一条路上抗击敌人，从右翼掩护大部队撤退。布置好后，急忙向梅子冲赶，当我到达这个口子的时候，罗炳辉和蔡树藩带着九军团过来了。我对他们说，你们部队比较少，可以走左侧的另外一个口子，不过稍微绕点路，但也不远。这个隘口今天一定让我们军团通过，我们也好掩护你们。我亲自在这个口子上调排各个部队的行进道路。一、九军团通过以后，我在口子上等后面渡江的兄弟部队，见到八军团的一位负责同志。他一见我就说：“糟糕，我们的部队都被敌人打散切断了！”我说：“此刻，过来多少是多少，先安置宿营。”因为这时已经天黑了。第二天，我们才知道彭绍辉、肖华同志带的那个少共国际师还没有过来。于是又派了一个部队，重渡湘江，把少共国际师接了过来。虽然如此，由于敌人来得快，我们行动太慢，所以仍然有一部分部队没能渡过湘江，象五军团的三十四师和三军团的一个团，还有八军团被打散的部队都被敌人切断了，损失很大，其中有些同志后来转到湘南打游

击去了。

突破第四道封锁线这一仗，是离开中央苏区打得最激烈也是受损失最大的一仗。这时，红军由江西出发时的八万六千多人，经过一路上的各种减员，过了湘江已不足四万人。博古同志感到责任重大，可是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在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瞎比划。我说，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不是瞎闹着玩的！越在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我们在油榨坪没有敢休息，因为敌人在后面紧追。我们过了油榨坪，摆脱了敌人，到了一个大树林里，才得到休息。几天几夜的紧张激烈的战斗，这时候才感到又饥又饿，疲劳极了。我把身上带的干粮拿出来吃，也分了一些给林彪吃，觉得真是香极了。艰苦的岁月就是这样，紧张的战斗会使你忘记饥饿和疲劳，一旦休息，能睡上一小觉，或吃上一点干粮，就会觉得是一种极大的享受。

这次过湘江，进一步暴露了教条宗派集团在政治上和军事指挥上的逃跑主义错误，促使人们从根本上考虑党的路线问题，领导问题。

十一、黎平会议和渡乌江

渡过湘江以后，一军团减员不少。以一师三团为例，从中央苏区出发时，是两千七八百人，过江后，只有一千四五百人了。当然这个减员数字不光是渡湘江受的损失，

包括前几次过封锁线的伤亡和非战斗减员都在内。

可是我们终究没有被敌人消灭在湘桂边境与湘江之畔，我们又整队前进了。

离根据地越远，困难越多；就越想到有根据地的好处，和离开根据地作战的难处。突破第一、二道封锁线时打仗下来了伤员，还可以交给送红军出征的担架或用沿村转送等办法，送回苏区安置。可是越走越远，这种可能没有了。又不能都抬着走，只能就地安置，这是唯一的办法。许多轻伤员都是不愿意寄养的，都愿意随队养伤。

部队也不能伤亡一个少一个，总要千方百计地动员群众参加红军。从道理上说，哪里有穷人，哪里就有兵源。不过，那时红军行动飘忽，新区群众对红军又不十分了解，做好扩红工作确实不容易就是了。所以经常是减员多，补充少。这就是难题。

还有一个大难题是如何巩固提高部队的士气，关键是如何向指战员讲明红军的前途，部队向哪里去。干部战士不断地提出这个问题，开始说是转移，可是越走越远，仅“转移”两字就不可能圆满地回答指战员心中积下的疑问了，特别是跨过粤汉路后，就不得不逐步明白地告诉是为了去和二、六军团汇合。

求解放的理想和艰苦奋斗的意志帮助我们克服了千难万险。虽然我们知道在前面等待着我们的仍然是千难万险。

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以后，一军团到了广西资源县一个叫油榨坪的地方，已经是傍晚了，我们站在山顶上朝广西、贵州交界的地方一看，嗨！一层山接着一层山，象大海里的波涛，无穷无尽，直到天边。我这个出生在四川，又在江西、福建打过几年山地战的人，都没有见过这么多山！我们作为先头部队，没有在油榨坪停留，就继续向大瑶山前进了。

开始，我们在广西境内走，李宗仁、白崇禧的部队胁迫老百姓对我们实行坚壁清野，当地民团和我们打开了麻雀战。他们在这个山头上朝你放几枪，你追了去，他们又转移到另一个山头上朝你放几枪。他们还派坏人在我们住的村庄偷偷地纵火，诡称是红军放的火，用来蛊惑群众。被我们捉住揭露了。在大瑶山地区的行军是很艰苦的，没有粮食吃，还要对付民团的麻雀战。广西的敌人在后面追击，胁迫我们出境，天上还有蒋介石的飞机不断来侦察，发现了就扫射轰炸。好在密林多，我们又规定了许多防止敌人飞机发现的措施，才没有遭受大的损失。

随后，进入湖南边境。十二月十一日，一军团二师五团打开通道县城，我们只在通道待了一天，继续西进。当时目的还是要向湖南西北部前进，企图与二、六军团会合。可是敌人调集了十几万大军在湘西正等着我们，敌刘建绪、薛岳、周浑元、李云杰的十六个师开赴城步、绥宁、洪江、黔阳、靖县等地筑堡堵击。为此，毛泽东同志竭力说服错

误路线的领导人，放弃和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以免投入敌人的罗网。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西入贵州创造新根据地的方针，但仍未能说服李德等人。十二月十四日军委仍电令贺龙、任弼时，肖克、王震同志由湖南常德一带向湘西北发展新苏区，以接应中央红军。

离开通道城时，一军团走右翼，经雀鹰坡、新厂，三军团走左翼，经团头、播阳，入贵州境内。贵州当年是有名的穷省，真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没有三分银的人自然是指一般老百姓。穷苦的老百姓，人们都称呼为“干人”。封建剥削，十分惊人。贫富两极分化，除封建盘剥之外，又和吸鸦片烟，种鸦片烟、贩卖鸦片烟、抽鸦片烟税等联系在一起。鸦片烟，不仅富人吸，不少穷人也吸。富人靠鸦片烟发财，穷人抽鸦片烟抽到倾家荡产，甚至卖老婆。军队也抽鸦片。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部队，几乎都是双枪兵，一杆步枪再加一杆鸦片枪，战斗力较差，比较好打。十二月十四日，一军团二师六团进占贵州黎平。黎平当时有王家烈守敌一个团，我军进攻，他们即放弃黎平，散在城外各地。随后，我们一军团以一个师的兵力驻守黎平，一面驱逐城外的黔敌，一面保障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开会。黎平会议是一次重要的会议，经过毛泽东同志的努力说服，许多同志改变了观点，同意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十二月十八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预定遵义为新根据地的中心。这是

一个十分重要的决议，是我们战略转变的开始。其中最主要的是指出，去湘西已不可能也不适宜，决定向遵义进发。这样，一下子就把十几万敌军甩在了湘西，我们争取了主动。十二月十八日，军委为了充实战斗部队，紧缩机关，还下令撤销八军团，并入五军团，军委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由刘伯承同志任司令，陈云同志任政治委员，叶剑英同志为副司令员。

我在黎平没有住，随先头部队前进了。十八日，在前进途中接到军委发来的电报，说中央有新的战略方针决定，要我们电台随时准备收听。不多久，就接到了政治局决议，传达到师一级干部。决议提到改变战略方向的根据是：一、使中央红军能取得与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的密切协同；二、求得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发展新苏区和红军，因此新根据地应该在川黔边地区，最初应该以遵义为中心，在不利条件下转移到遵义西北地区，但不应该去云南和黔西南；三、向遵义前进时，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们前进的敌人，但对蒋介石的部队和湖南、广西的敌人应力求避免大的战斗，以保存我们的力量；四、在我们内部，坚决反对对自己力量估计不足悲观失望和正在增长着的游击主义危险；五、责成军委、总政治部制定保障本决议实施的具体计划。第二天我们就收到军委关于贯彻黎平政治局会议决议的决议，其中第四条提出，二、六军团应该在湖南常德地区积极活动，以调动湘敌北援，然后再向永顺西进，以

牵制在铜仁地区的薛岳纵队；第五条提出四方面军应该在川北重新发动进攻，以便中央红军继续向西北前进时，能牵制四川全部敌军。随后由李富春代主任签署的湘江政治部关于执行决议的训令，也发来了。根据这个训令，各级政工人员向部队做了大量的解释工作，说明了政治局决议的重要性，得到了广大指战员的积极拥护，大家提高了信心。

黎平会议后，我军即改向遵义进发。但欲取遵义，必须先跨越天险乌江，一军团受命先渡乌江。二师由军委直接指挥，一师由我和林彪率领，分别在江界和回龙场两地同时强渡乌江，中央纵队则在二师后跟进。一九三五年一月二日，二师和一师在预定地点渡江成功。渡江战斗比较激烈的是在二师方向。

二师在江界渡乌江先取得了成功。十二月三十日二师由陈光同志带领四团走前卫，飞速抢占了乌江南岸的江界河渡口。占领时，敌人已经把南岸的一些茅屋放火烧光了。敌人撤到了北岸，正抢修工事。

四团团长沙飞虎同志、政委杨成武同志，亲自化装冒雪到江边侦察。他俩看到的乌江真是险峻。乌江南岸要下十里壁陡的石山，才能到达江边。北岸又要上十里地的陡山，才能走上通遵义的大道。乌江正是在墨乌色的峡壁间流过。乌江江面倒不算宽，只有二百五十公尺左右，可是流速却每秒达一公尺八。整个乌江象一江沸腾的乌青色的

奔流，无论投下一片什么东西，转眼就冲得无影无踪了。难怪群众称它为乌龙江了。为了搞清对岸敌人的兵力火力配系，四团对敌人进行了火力侦察，逗引敌人不断朝南岸射击。驻守北岸的敌人是军阀侯之担的一个旅。耿飏和杨成武同志根据敌人发出的火力，观察敌人的工事，分析敌人的兵力部署，再参照老百姓的介绍，哪里是敌人的排哨、连哨，哪里是敌人的团预备队，哪里是旅预备队，都作出了判断。

第二天，先在渡口组织佯渡，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同时在上游五百公尺处，又组织了以三连连长毛振华为首的八位善于游泳的勇士试渡。结果，由于准备架桥的粗绳索被敌人的炮弹打断没有拉过去，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只得又游了回来。

晚上组织了十八位勇士乘竹筏偷渡，只有以毛连长为首的五名勇士所乘的第一筏渡河成功，第二、三两筏都渡到中流被水卷回来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第一筏渡河成功，以为它被激流卷走了。偷渡基本未成。

二日天刚拂晓，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同志赶到了四团。他告诉四团，后面追踪的薛岳纵队，已经离这里不远了，督促四团迅速完成渡江任务。否则，有背水作战的危险。他带来了一个工兵连，协助完成此次紧急渡江任务。

二日上午九时，四团紧急动员，绑扎了六十多个竹筏，以三个竹筏为先头，组织强渡，成功了。他们与第二次偷

渡过去在对岸峭壁下隐伏了一天的毛连长等五勇士互相配合，把敌人河岸阵地上的守军打垮了。一营的部队赶紧过江。这时敌人的预备队也开到了。敌人居高临下，我们是仰攻，地形十分不利，一营被迫退守江边。幸亏军团炮兵连连长、神炮手赵章成同志连打三发炮弹，把向我滩头阵地猛冲的敌人压制住了，一营乘势反击，才将敌人全线击溃。

桥架起来了，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安全过了乌江。

与此同时，一师在龙溪回龙坝渡口组织强渡；稍晚半天，也成功了。一师一团任前卫，一月二日上午，指战员不顾风雨交加，赶到了大乌江渡口。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同志亲自到渡口指挥。前卫营为一营，营长是孙继先同志。前卫营一踏进河滩，守在对岸敌人的一个团就向我前卫营开火。杨得志同志立即组织火力压制敌人。几发炮弹就将敌人一座用破庙改成的据点轰飞到半空中去了。此处江面只有一百来米宽，可是两岸也是悬崖陡壁。没有渡河工具，别说木船没有，就是木桨都被敌人早搜走了。他们扎制竹排，组织了八名泅水的勇士乘暗夜偷渡，因为风急浪高，竹排被冲到下游，很多同志都落水了，没有成功。随后再接再厉组织了十几名勇士，选择下游水势较缓的地方强渡，成功了。第二天上午十一时，一团胜利地渡过乌江。浮桥也搭成功了。我随一师，渡过乌江，就向湄潭进发。湄潭城外是开阔地，没有敌军防守，我们就顺利地占

领了湄潭。后继部队也陆续安全地渡过了乌江。

十二、打开遵义，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渡湘江之后，我的脚化脓了，住在一家壮族老百姓家里，由前面提到的那个外号叫戴胡子的医生给我开了刀。这样，我行军就得坐担架。坐担架行军，对频繁作战的军团来说，不免增加累赘。于是，我有时就跟着中央军委纵队行动。

坐担架给了我思考问题的机会。显然，自从一九三一年一月，我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王明跃居中央最高领导的地位（当时名义上的总书记仍是向忠发）之后，王明路线越来越占上风。王明这个人，大革命时期在武汉我就认识他。他那时给共产国际派来的米夫当翻译。此人爱夸夸其谈，傲慢得很，教条气十足，我那时就讨厌他。但从路线上认识他，也经历了一个过程。从白区到中央苏区，越是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就越是感到王明等人推行的这条路线是错误的。逐步形成了我的坚定认识：只要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得势，革命就大发展；反过来，如果王明路线占上风，革命就受挫折，红军和苏区老百姓就遭殃。事实都是摆在那里的。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以前，红军几乎是连战皆捷，苏区得到大发展。到第四次反“围剿”，运用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仍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可是，第五次反“围剿”就不行了。第五次反“围剿”固然敌情发生

了很大变化，但是，从对敌斗争来说，根本问题还是个领导问题，路线问题。一九三三年初，临时党中央从上海迁到了中央苏区，军事顾问李德一九三三年九月也进了苏区，一切指导思想，战略方针都变得一反常态，变得特别“左”，特别不切实际。尤其是一九三四年六届五中全会以后，王明“左”倾路线在中央苏区占据统治地位，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已经几乎没有发言权。“左”倾冒险主义者甚至胡说：“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就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他们胡搞八搞，使红军蒙受巨大损失。渡过湘江，中央红军只剩下三万多人。这都使我深为焦虑不安。我躺在担架上冥思苦想，为什么不能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黎平会议虽然开始转变了我军战略方向，不再往敌人布置好的口袋里钻了，但领导问题不解决，我军就难以彻底地由被动变为主动。这不只是我个人思考的问题，也是当时广大红军指战员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提到中国革命的议事日程了！后来知道，由于从湘南起，毛泽东同志对李德以及博古同志的错误做法不断有所斗争，党内意见分歧，所以黎平政治局会议已经决定在适当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那时，王稼祥同志（总政治部主任）因为在中央苏区四次反“围剿”后，被飞机炸伤，也坐担架，我们就经常在一起交换意见。认为：事实证明，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

须改组领导。王稼祥同志提出，应该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我说我完全赞成，我也有这个想法。而这个问题，势必要在一次高级会议上才能解决。

一九三五年一月初，我军渡过乌江，接着打开遵义，为召开这样一次会议创造了条件。打遵义，二师六团是攻城部队。渡过乌江以后，六团团团长朱水秋、代理政委王集成同志就接受了攻取遵义的战斗任务。他们把一切攻坚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这时，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赶到了他们部队。他当时对干部讲：“现在，我们的日子是比较艰难的。既要求仗打得好，又要伤亡少，还要节省子弹。这就需要多用点智慧罗！”后来随着情况的发展，这次攻打遵义的战斗，实际上变成一次智取遵义的战斗。

一月六日，六团离遵义还有半日行程。侦察员来报告说：离遵义三十里地，有敌人的一个外围据点。刘伯承同志指示六团：要先歼灭这股敌人，而且要保证不准有一个漏网；否则就会影响打遵义。于是当日下午三点，六团一营就以迅雷般的动作，冒雨对这个据点展开了奇袭，全歼了这股敌人，果然做到了无一漏网。并立即对俘虏兵做好了争取工作。由一营营长曾宝堂带着团侦察排，全部换成俘虏的衣服，化装成敌军，由俘虏兵带路，全团跟在他们之后，向遵义前进。当时六团作了两手准备。争取诈开城门；如诈不开城门，就强攻上去。结果敌人真以为是从外围据点败退回来的自己人。一月七日凌晨我们二师进了遵

义城，取得了智取遵义的胜利。

打开遵义以后，我随军团部紧跟二师进了遵义城。遵义是黔北的首府，是贵州第二大名城。这里是黔北各种土产的集散地，是汉苗黎各族商旅云集之所。市面十分繁华，既有新城，又有老城，一条河流从中间穿过，是红军长征以来所经过的第一座繁华的中等城市。

我和刘伯承总参谋长步入这座城市时，看到二师的部队已经在准备宿营了。这可不行，军委命令我们，乘胜追击由北门逃跑的黔敌三个团，直到占领娄山关、桐梓，就是说任务还很重！六团昨天是比较疲劳了，四团这个主力团还未怎么使用哩。于是我们与二师领导商定，使用四团为先头追击部队。

当刘伯承参谋长给四团明确任务，要他们立即出发去占领娄山关和桐梓时，他们虽然满口答应，却可以看出面有难色。这也不难理解，他们刚到遵义城，屁股还没有坐热又要出发了，政治思想工作的确难做哩。

我对四团政委说：“杨成武同志，你是政委，要向同志们说清楚：任务紧急，不能在遵义停留。早饭也不能在这里吃，到路上去吃干粮，完成任务后，再争取时间好好休息。”

杨成武和该团团长耿飏都一致保证坚决完成任务，立即吹集合号，把部队集合好就出发了。

四团朝着去四川的孔道、兵家必争之地的娄山关前

进。一九三五年一月十日，四团快进到娄山关时，他们偷听敌人的电话，知道了敌人在娄山关一带的部署，就派了一支部队，从板桥镇绕小路插到了娄山关的侧后，攻占了娄山关。紧接着又打开桐梓县城。一军团的部队集结在桐梓一带休整。少共国际师即第十五师，这时撤销番号并入了一军团。这之后，四团又向前伸，先占领了牛栏关，十四日在新站与敌人遭遇，击溃敌人两个团，乘胜追击，十六日又占领了松坎。

中央军委纵队九日进入遵义城。由刘伯承同志兼任遵义警备司令。我和林彪奉军委指示，从十四日开始，将部队的日常工作，交给参谋长左权和主任朱瑞，专心致志地去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了。由于我军突然转向遵义，一下把十几万追剿军甩在了乌江以东和以南。何键虽仍为追剿军总司令，但他率领二十个团到常德地区与二、六军团作战去了。四川刘湘的部队摆在长江南部一线，搞不清虚实，不敢轻进。蒋介石虽然命令粤桂军队赶快北上遵义，但贵州不是他们的地盘，显然不积极，仍滞留在黔南榕江等地。黔敌不经打，一触即溃。只有蒋介石的嫡系薛岳、周浑元纵队比较积极，但被阻隔在乌江以南，也难以很快采取行动。这为我们召开遵义会议提供了可贵的时机。

会议召开之前，经过了紧张的酝酿。毛泽东同志亲自在中央领导集团中做了一些思想工作。先是王稼祥通了。

前面说了，我和王稼祥一路走，一路扯。他和我的意见是一致的，那时坚决主张请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他说，他参加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两次都取得了那样大的胜利，完全是毛泽东同志采取诱敌深入、隐蔽部队、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指挥的结果。他赞成毛泽东同志出来统帅部队。对博古、李德，王稼祥同志十分不满。用他自己当时的话来说：“到时候要开会，把他们‘轰’下来！”周恩来同志是个好参谋长，他那个时候行军时往往坐在担架上睡觉，一到宿营地，不管白天晚上赶快处理电报。他从长期的实践中，已经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见解是正确的，也赞成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周恩来、王稼祥同志他们两个人的态度对开好遵义会议起了关键的作用。

听说要开会解决路线问题，教条宗派主义者也想争取主动，积极向人们作工作。会前和会议中，凯丰——即何克全，当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书记——三番两次找我谈话，一谈就是半天，要我在会上支持博古。我坚决不同意。我后来听说，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

会议还是开得很紧张的。除了个别同志处理作战指挥方面的事，临时告假以外，一律到会。那时，我的脚还没有好，每天坐担架去。

会议的名称就叫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共开了三天，

出席会议的除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朱德、刘少奇、陈云、博古、邓发、凯丰同志以外，还有刘伯承、李富春、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小平同志，我和林彪也出席了会议。李德列席了会议，伍修权同志给他当翻译。会议由博古同志主持——他既是会议的主持人，同时在路线方面，又处于被审查的地位。博古在会上作了主报告——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他一再强调客观原因，强调不可能粉碎这次“围剿”。副报告是周恩来同志作的，因为他是军委主要负责人。

在会上，多数人集中批判了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以后又发展到右倾保守主义，以及在长征中消极避战只顾夺路去湘西的错误军事路线，集中批判了王明路线在中央苏区的代理人博古的错误，这方面遵义会议的决议已经讲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是批判他们的主要发言人，王稼祥同志紧接着发言支持毛泽东同志。所以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说，遵义会议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会上大多数人拥护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只有博古、凯丰出来反对。博古同志后来作了检讨，但没有彻底地承认错误。凯丰甚至很狂妄地对毛泽东同志讲：“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并且对会议表示保留意见。李德是列席的，遵义会议文件中的华夫同志，就指的是他。他没有正式坐位，坐在屋里靠门口的地方，经常一言不发，只是一个劲地抽烟，情绪十分低落，对会上大家对他的批

评，他一概不承认自己有错误，态度十分顽固。我在会上一提起李德的瞎指挥就十分生气。他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他都横加干涉。我记得在会上，林彪没有发什么言。

对于今后行动方向，伯承同志和我在会上建议，我们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因为四川条件比贵州要好得多。从我到贵州看到的情况，人烟稀少，少数民族又多，我们原来在贵州又毫无工作基础，要想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实在是太困难了。而到四川，一来有四方面军的川北根据地可以接应我们，二来四川是西南首富，人烟稠密，只要我们能站稳脚跟，就可以大有作为，三来四川对外交通不便，当地军阀又长期有排外思想，蒋介石想往四川大量调兵不容易。会议接受了我们的建议，而且写上了决议。只是后来由于川军的顽强堵击，张国焘又不按中央指示，擅自放弃了川北根据地，使敌人可以集中全力来对付我军渡江，这个设想才未能成为现实。

会议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在常委分工上，由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先后决定由洛甫同志代替博古负总责，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组织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同志组成的军事领导小组，负责指挥军队。

关于遵义会议的传达，由于经常处在军情紧急状态，

我们只能先用电报或个别告诉等形式向团以上干部打招呼，正式传达是在二渡赤水回来，第二次攻克遵义后，在遵义由中央召集团以上干部开会传达的。会上，张闻天、周恩来同志都讲了话。一些过去受过王明路线打击的干部，一提起过去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和它给革命带来的损失时，就气得又捶桌子又打板凳。我给连以上干部传达，是在仁怀县一个叫什么场的镇子里，在一家地主的场院里传达的。传达的那天正下着小雨，谭政同志还帮我撑着伞。干部都很集中精力听，传达几小时无人走散避雨的。大家都拥护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最伟大意义的一次会议，它不仅纠正了党的错误的军事路线，为日后从政治上彻底清算王明路线打下基础，而且从组织上改变了党的错误领导，从此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发展的道路。自然，由于军情紧迫，时间短促，以及条件尚未完全成熟，在遵义会议上还只能首先解决军事路线问题，但这却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万分危急的中国革命已经从此得救了。

十三、四渡赤水和遵义会议后的余波

遵义会议过程中，一军团按军委的指示，派我军前锋二师四团占领桐梓、松坎，以后全军团就集结在这一地区。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确定向四川进军。当时选定的渡江地点是在重庆上游宜宾到泸州一线。一月十八日会议刚开完，我们就离开遵义，一军团由集结地向西，三军团经仁怀向北，五、九军团和中央纵队随后跟进，共同向赤水城进发。

因为我的脚伤没有好，军委要林彪先回部队。李德表示，要到部队去体验实际生活。林彪与李德先后去了一军团。我坐担架，仍随中央纵队行军。开始一路上比较顺利。一军团首先攻占习水、土城等地，于一月二十五日到达赤水城郊，准备攻城。但那时敌人闻讯我军北上，早已在川、黔、滇三省边界大修碉堡，集中兵力到川黔边境布防，封锁长江。赤水城本来就比较坚固，这时川敌又派大量部队增援，一军团到了赤水城外复兴场、旺隆场等地与敌人一个师又两个旅对峙，相持不下。中央纵队与三、五军团于一月二十六日到达土城，第二天四川军阀的先头部队，装备精良的“模范师”郭勋祺部和潘佐的三个团，共六个团赶到了土城。一月二十七日，军委主席朱德命令我三军团、五军团及干部团全部，“于明日拂晓包围迂回该敌而歼灭之。”一月二十八日和敌人在土城东北的丰村坝、青岗坡一带打了一场恶仗。由于我们指挥存在缺点等等原因，这一仗没有打好，部队受挫。

一开始打得还是不错的。三军团、五军团和干部团先投入战斗。敌模范师被我击溃一部，干部团攻击很猛，硬

是攻到了郭勋棋师部附近。敌人已经感到弹药匮乏了，突然三个旅增援上来了，由于得到了子弹手榴弹的补充，才把我干部团压了下去，反而转守为攻。一军团二师被指定为预备队，是后来参加这一战斗的。到我们一军团上去时，敌人已占领了有利地形。我二师的部队曾经陷在一个葫芦谷形的隘口中，来回冲杀，部队无法展开，伤亡较大，五团政委赵云龙牺牲，部队处境十分危险。我们与郭勋棋师激战了一整天，虽然给了他以重大杀伤，但未能消灭敌人，自己却受损失不小。

态势于我很不利，于是军委下令退出战斗，西渡赤水河（即一渡赤水）向古蔺开进。土城战斗以后，我的脚伤基本好了，就不再坐担架，又回到了一军团。

我军一渡赤水以后，原拟经古蔺、叙永、兴文向长宁集中，然后在宜宾附近渡江，但我军非常疲劳，又在山间小道行军，速度很慢。敌人则依靠其有利的交通条件，先后调集了十个旅赶到宜宾南部长宁一线集中，于是我军又改道到威信（扎西）、镇雄一带滇黔边休整。二月中旬，我们发现川敌十多个旅正由北向南压来，云南敌人四个旅正向镇雄、扎西急进。于是军委决定我军掉头向东，二渡赤水，去打击在遵义、贵阳一带的王家烈部队和薛岳、周浑元纵队。二月十九、二十日，我军在太平渡到二郎滩之间渡过赤水河。

部队在赤水河来回穿插，避实击虚，灵活地调动敌人。

为了增加部队的机动，甚至把一些累赘的火炮和辎重也都沉到赤水河里去了。红军主力先是两渡赤水。这时黔军有六个团，布置在娄山关一线，他们凭险据守，企图掩护遵义，以待薛岳的部队北援。我军决定先打击消灭黔军。经过激烈交战，一军团的部队二月二十四日再次夺占桐梓城，守敌退向娄山关。二月二十六日，三军团的部队二次占领娄山关。

敌人溃败以后，纷纷夺路南逃。一、三军团并肩向遵义方向展开了追歼战。我们一军团在黑神庙偷听敌人电话，得知遵义只有敌军约一个营，其他是娄山关溃退下去的部队，敌师长命令他们在遵义城外各处整顿，不准入城。于是我们命令一师和二师：“如三军团的部队在你们前面追击时，你们则随其后跟追，如三军团停止未追时，你们应超过他们迅速追击。”二月二十七日，一、三军团再取遵义城。这次三军团比我们先占遵义。为了配合三军团作战，我骑马先赶到了遵义城里三军团指挥部，还没有坐下来，就听说三军团前卫部队在向遵义以南追击溃敌时，碰到薛岳纵队吴奇伟率领的两个师增援上来了，并且已经在遵义城南丘陵地接火，战斗很激烈。彭德怀同志真可以说是马不停蹄，立即向前线出发。我也赶紧通知一军团部队进遵义城后不要停留，立即向城南去配合三军团作战。

经过我们一军团和三军团等友邻部队的奋勇战斗，在遵义以南先后打垮了由贵阳北上增援遵义的中央军——吴奇伟率领的五十九师(师长韩汉英)和九十三师(师长唐云

山)，并乘胜猛追，在懒板凳、刀靶水等地打了几个漂亮的追歼战。

在懒板凳附近，我们召集会议，命令部队追歼敌人。我说：“现在我们部队没有吃饭，敌人也没有吃饭，我们疲劳，难道敌人不是比我们更疲劳吗？我们一定要乘胜追击，把敌人赶到乌江去喝水。”

敌人这两个师，在江西就和我们作过战，知道红军的厉害。比如敌人的五十九师，就是四次反“围剿”被我们在黄陂几乎全歼过的，不知道敌人怎样东拼西凑，又把把这个师的番号恢复了。他们一听说红军来了，闻风丧胆，和我们一接火，逃得比兔子还快。

有一天黄昏，敌人刚逃到一个村子，停下来做饭。敌人前脚到，二师四团后脚就追进了村。四团有个部队进了敌人的伙房，敌人还不知道是红军。四团有个战士看见伙房里有一盆热气腾腾的鸡，抄起来就想吃。敌人的伙夫还斥责说：这是给师长做的！不准吃。敌人根本想不到红军来得这样快。

一师二团的追击动作也很迅猛，他们追击王家烈的双枪兵。当敌人刚停住脚，宿了营，摊开铺吞云吐雾时，团长龙振文和政委邓华带着二团的部队追到了，缴了敌人的枪，敌人还以为是自己人在开玩笑。

我们追敌人一直追到鸭溪以南乌江大渡口。由于敌人砍断了浮桥，才幸免于全军覆灭。

这次战役，红军歼敌九十三师大部、五十九师一部还有王家烈的一些部队，俘敌近三千人，内有团长一名，还打伤敌旅长、团长三名。这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三月初，周浑元纵队在仁怀(即茅台)鲁班场一线，有向我遵义进攻的企图。我军决定趁薛岳纵队刚吃败仗尚在乌江以南的机会，向西北打击周浑元纵队。三月四日军委决定组成前敌司令部，由朱德任司令，毛泽东任政委，指挥这次作战行动。本来想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但周敌却在鲁班场附近筑堡固守不动，我们一军团到鲁班场打了一下，没有攻克。这时薛岳纵队重整旗鼓，又北渡乌江向我后面袭来。于是我军三月十日放弃遵义，军委机关与野战军会合以后，于十六日攻占茅台。在茅台休息的时候，为了欣赏一下举世闻名的茅台酒，我和罗瑞卿两个，叫警卫员去买些来尝尝，酒刚买回来，敌机就来轰炸，于是我们就又赶紧转移。随后为摆脱追敌，我军即在茅台附近向西三渡赤水，再次向古蔺方向开进。周、薛两敌在后紧追。在此紧迫之时，不意毛泽东同志指挥我们突然掉头向东，三月二十一日于二郎滩、大平渡一线四渡赤水。当我军西进古蔺时，敌人以为红军还是要北上，赶紧改变部署，没有想到红军四渡赤水，掉头南下，把北线敌人甩得远远的。我军在遵义到茅台之间直插乌江边。

一九三五年三月底，一军团一师三团，带着军团的工兵连，作为先遣队，掩护我军南渡乌江。三月三十一日，三团抵

达刀靶水南的乌江边。当晚，先头营在暴风雨中乘竹筏渡过了江，从小道绕到了敌人江防营——薛岳部九十一师的一个营的侧后，击溃了这个营。工兵连架起了浮桥，红军渡过了乌江。

敌人万万没有想到，我军竟长驱直入，前锋直逼贵阳城下，吓得贵阳守军将四门紧闭，而我军却从贵阳城郊先东向贵定，以后又折回来于四月九日在贵阳到龙里之间一个很小的口子由东北向西南通过了贵阳。当时蒋介石就在贵阳。他历来是冒冒失失的，这次因为我军行动神速，他摸不清我们意图，还以为我们要打贵阳，所以未敢轻举妄动。

这个阶段，我们都是声东击西，大踏步地机动作战，不断地调动敌人。这样打法，部队自然要多走一点路，疲劳一点。可是敌人却对我们捉摸不透，便于我们隐蔽企图，使我军由被动变为主动。以后陈毅同志对我说过，毛主席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我也深感毛泽东同志在军事指挥艺术上运用之妙，他确实才思过人，值得我们很好学习。

四月九日，通过贵阳城郊的那天，一军团在口子两边掩护全军通过，我在后面督队，队伍拉得很长，差不多都过去了，我在路上见到蔡畅大姐。她那时和贺子珍等几位女同志在一起。我对蔡大姐说：快些走！现在我们的左边有龙云的五个团，驻在龙里附近，右边驻贵阳的是蒋介石的大部队，蒋介石本人也在贵阳。这中间只有约三十里宽

的一个口子。我们要赶紧插过去，否则两边一夹，我们就暴露了。她一听说，一半是开玩笑一半是真情地说，我走不动呀！一边说，一边一瘸一拐地加紧赶路。这些女同志真是令人可钦可敬！从贵阳往西，一师二团抢先渡过了北盘江。军团主力渡江之后，二师连下盘县、兴仁、罗平三县。这一带敌人兵力空虚，都是些地方保安队等小部队，所以我们开进比较顺利，几乎是日下一城，给养也得到补充。记得到了云南曲靖，这一带倒是很大一个平坝子。部队在这里住了两天，仍无法在这里建立根据地，而追敌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却尾我进入云南，云南敌人也调集大量兵力向我合围，当时估计各路敌人有七十个团之众。于是中央、军委四月二十九日发布命令，我军速渡金沙江，甩掉敌人，去川西与四方面军会合。接命令后，我们一面向昆明虚张声势，一面向金沙江前进。前进时，二师四团这次用了三个连队，全部化装成国民党的“中央军”，由他们作先导。象演戏似的，用的是连环计，不费一粒子弹，一连赚开了禄劝、武定、元谋三座县城。掩护我军抢渡金沙江，北上四川。

这一程，又是我们一军团走左翼，三军团为右翼。伯承同志带着军委纵队、五军团和干部团作为中央纵队，直插金沙江边。到了金沙江边，我们被指定在元谋、龙街渡江，军委纵队在绞车渡渡江，三军团在洪门渡江。我们在元谋、龙街一艘船也找不到，江面水流太急，又无法架

桥。桥架起一半就被水冲走了，再架又没有器材，敌机又不断来侦察袭扰。可是中央军委纵队的干部团在绞车渡夺到了一艘送敌人侦察人员过江的船，占领了渡口南北两岸。朱德总司令五月五日打电报叫我们赶到绞车渡去渡江。电报说：“军委纵队在本日已渡江完毕，三军团七号上午可毕，五军团在绞西以南任掩护，定于八号下午渡江，敌人八号晚有到绞西的可能。我一军团务必不顾疲劳，于七号兼程赶到绞车渡，八号黄昏前渡江完毕，否则有被隔断的危险。”那时真是军情紧急啊，电报还没有翻完，但大概意思已经知道：到那边去渡河。我们立即决定，沿着一条经白马口山谷间的沿江小道向绞车渡前进。这一夜走的简直不是路，路在一条急流之上，上面尽是一些似乎是冰川时代翻滚下来的大石头，石头又很滑。我们一夜过了四十八次急流，净在石头上跳来跳去。摔倒的人很多。一夜赶了一百二十里地，疲劳极了。当赶到绞车渡时，干部团已经渡到对岸，消灭了对岸的敌人。就靠那条船，将其他部队都渡过去了。我们由前卫几乎变成了后卫，只有五军团还在江南岸掩护我们。毛泽东同志正在渡口那边一个崖洞里守候着我们。我们从这里渡过了金沙江，见到了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说，你们过来了，我就放心了。过了金沙江，我们就真正把长征以来一直尾追我们的蒋介石军队甩掉了，隔了有一个多礼拜的行程，这无疑是长征中的一个巨大的胜利。

一九三五年五月上旬，三军团包围了四川会理县城，这时中央红军还有约四万人，在会理附近休整了几天。

四渡赤水以后到会理期间，在中央红军领导层中，泛起一股小小的风潮，算是遵义会议后一股小小的余波。遵义会议以后，教条宗派主义者并不服气，暗中还有不少活动。忽然流传说毛泽东同志指挥也不行了，要求撤换领导。林彪就是起来带头创议的一个。

本来，我们在遵义会议以后打了不少胜仗，部队机动多了。但也不可能每仗必胜，军事上哪有尽如人意的事情。为了隐蔽自己的企图和调动敌人，更重要的是为了甩掉敌人，更不可能不多跑一点路。有时敌变我变，事后看起来很可能是跑了一点冤枉路，这也难免。但林彪一直埋怨说我们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还说：“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象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我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们好比落在了敌人的口袋里，如果不声东击西，高度机动，如何出得来?!”。在会理休整时，林彪忽然跳出来，给彭德怀同志打电话，他煽动彭德怀同志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他打电话时，我在旁边，左权、罗瑞卿、朱瑞同志也在旁边。他的要求被彭德怀同志回绝了。我严肃地批评林彪说：“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

到！”我警告他说：“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指令给部队不执行。”林彪不肯听我的话。他又写了一封信给中央三人小组，说是要求朱毛下台，主要的自然是要毛泽东同志下台。他还要求我在信上签个名，被我严词拒绝了。我对他说：“革命到了这样紧急关头，你不要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参加了遵义会议，你现在又来反对遵义会议。你这个态度是不对的。先不讲别的，仅就这一点，你也是违犯纪律的，况且你跟毛主席最久。过去在中央苏区，在毛主席领导下，敌人几次‘围剿’都粉碎了，打了很多胜仗。你过去保存了一个小本子又一个小本子，总是一说就把本上的统计数字翻出来，说你缴的枪最多了。现在，你应该相信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能挽救危局。现在，你要我在你写的信上签字，我不仅不签，我还反对你签字上送。我今天没有把你说服了，你可以上送，但你自己负责。”最后，他单独签字上送了。

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二日，毛泽东同志在会理城郊外一个名叫铁厂的地方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了政治局委员以外，彭德怀、杨尚昆同志还有我和林彪参加了这个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对林彪的反党活动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对林彪所谓“走了弓背”的谬论，进行了驳斥。他对林彪说：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

十四、过彝族区，强渡大渡河

会理会议后，红军继续北上。一军团一师一团五月十七日攻占德昌，俘敌二百多人。以后我们与五军团一起向西昌进发，到西昌城边，侦察得知，西昌城高三丈，而且很坚固，城内有刘文辉部守敌四个团和一部份彝族士兵。军委接受了我们的建议，绕道通过西昌，二十日进抵泸沽。

这时候，中央军委指定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和我，他任司令，我任政委，带领一军团第一师的第一团、一个工兵排和无线电台，再加上肖华同志的一个工作队，组成中央红军先遣队，进行战略侦察，为红军北上开路。接命令后，我和伯承同志就率先遣队继续向冕宁以北安顺场方向前进。

与此同时，左权、刘亚楼同志则带领第二师的第五团，经越西占领了大树堡渡口。一方面掩护我军右侧翼，一方面在那里佯渡，借以转移敌人对安顺场方向的注意力。

先遣队的任务，通俗点说，就是逢敌开路，遇河搭桥，特别是前面将要通过彝族区，一定要将彝民的工作做好，保证中央红军安全顺利通过。

中央军委派伯承同志来，能和伯承同志共同完成这项任务，我很高兴。他不仅是个老军人，而且是个老四川；尤其在军事上富有阅历，遇事能深谋远虑，作风上又细致

入微；他很注意调查研究，凡事请示报告，从不妄作主张。他过去曾经到过川西一带，对当地地理风俗人情比较熟。当时那个地方的彝族是奴隶制社会，分为“白骨头”、“黑骨头”，我都是听他讲的。我虽然也是四川人，但年少出川，对川西北情况几乎可以说是毫无所知。受领任务以后，先遣队于五月二十一日占领了冕宁。这是一座县城，守敌已经逃跑。监狱里关了不少彝族首领。原来这是国民党统治少数民族的一种手段，彝族人民如果不听他们的话，就杀这些头头，平时就当作人质。我们放了他们，还请这些头头们喝了酒，气氛就缓和得多了。有的彝族头头懂得点汉语，我们问他，也告诉了我们一些情况。有的还表示愿意给我们带路。但国民党对少数民族的残酷统治，使他们对汉人充满了敌对情绪，民族隔阂很深，对红军是个什么样的队伍，执行的是什么政策，全不了解，所以并没有真心对待我们，仍然使先遣队碰到了许多困难，只是由于我们坚持了党的民族政策，处理得当，才比较顺利地完成了通过彝族区的任务。五月二十二日，先遣队开始进入大凉山彝族区。其边沿就是冕宁以北五十多里的袁居海子边。知道通过彝族区在当时民族隔阂很深的情况下是不容易的，语言不通，风俗习惯不一样，地形道路根本不清楚，所以我们很慎重。由工作队派了丁伯霖同志专门去打听了情况，知道这里彝族有好几个部落。我们刚进彝族区，就有两个比较大的部落，一个叫咕鸡家，一个叫罗洪族。这两个部落当

时正在“打冤家”。我们一到，就听到几声土炮响，一打听，原来就是他们两家在那里打。听说红军来了，咕鸡家想要红军帮他“打冤家”，所以对我们表示友好。而罗洪族则跟我们敌对，想袭击我们，我们打了几发信号弹，把他们吓跑了。我们当然无意于去支持这一方打另一方。可是，当时为了通过彝族区，我们决定利用这个矛盾。于是丁伯霖同志便把咕鸡家的首领小叶丹请了来，由伯承同志出面，与他边喝酒边谈判，谈了很久。伯承同志很有办法，双方谈得很投机。对方提出要求结拜金兰之盟，还拿了一个公鸡来，在湖边宰了，伯承就和小叶丹喝了雄鸡血酒，从而打开了一条通过彝族区的道路。当时我也在场，听不懂他们说些什么，只知道意思是说：哪个不忠实，就和这个公鸡一样。最后达成了协议，咕鸡家愿意护送我们过彝族区。但此时已经中午过后，我听说彝族区有一百多里路，得一天时间才能通过。于是我和伯承同志商量，虽然与咕鸡家已达成协议，但还有别的部落，糊里糊涂地往里乱闯，太危险。伯承同意我的意见，最后决定不走，不仅不走，走到前面的队伍还命令他们跟我们一起，象当年司马懿似的，来一个“倒退三十里”，又回到了一个叫大桥的地方。这是彝族和汉族交界两族杂居的小集镇，就在那里宿营。第二天，由咕鸡家派人护送我们向彝族区进发，我们进到彝族区，有别的部落的彝民在山上站在路两边，伸手向我们要钱，都喊：要钱，拿钱来！这些彝民个子高大，样子

挺怕人。我们早有准备，部队编队整齐，从容通过，没有理他们，也就过去了。由于有小叶丹的护送，我们比较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区，当天天黑到达擦罗，这里离安顺场就不远了。我们通过不久，我们带的那个工兵连还有一些后卫队人员，因为带着一些笨重的工兵器材，行军时掉了队，在后面一个山凹子里被千余彝民截住，彝民将他们所带的器物全部掠去，连身上穿的衣服也被剥得光光的。幸亏我们规定不准开枪，彝民也只是卤获衣物，并未加害红军。这些战士气得直掉眼泪，没有还手，就光着身子跑来了。于是我们对部队再次进行了党的民族政策教育。我们走在半路上，还遇到过国民党冕宁县的县长，带着他一家人，被剥得光光的。见了我们，跪下来，要我们救救他们，说都是汉人，宁肯死在这里，也不愿受侮辱啊。那时，大家对国民党都很恨，就没有管他。以后，把丁伯霖同志留下，与咕鸡家首领继续保持联系，因此我后续大部队通过的时候，咕鸡家仍对我们友好，给予了种种方便，护送我们过了彝族区。这多亏了伯承同志，要不是他在，这种局面我还真是很难对付哩。建国以后，小叶丹作为当年红军的客人，还到北京来过一次，肖华同志还热情地招待过他。

与我们通过彝族区的同时，恰好左权、刘亚楼同志带领五团，经过冕山以后，把越西县城打开了，关在国民党县衙门里的几百个作为人质的彝民，也被我们释放了，这也有助于我们顺利地通过彝族区。

求得顺利通过彝族区的目的，在于早日出敌不意地占领安顺场渡口，使红军能从安顺场渡过河去。五月二十四日我们到达安顺场。

夺取安顺场的任务，当然由我们先遣队来承担，具体任务又落在了一团团长杨得志和政委黎林同志的身上。一团指定一营为前卫营，营长为孙继先。渡河的那天晚上——二十四日晚上，我和伯承同志为了检查渡河部队的准备情况，冒雨到了前卫营。天很黑，路不好走，我用一个刚缴获不久的法国造手电筒给伯承同志照路，因为他眼睛视力当时就已经比较差。那时驻守安顺场的两个连的敌人，根本想不到我们会来得这么快，以为还有几天路程呢，很麻痹。我们来个突然袭击，很快就把它肃清了。河水轰轰隆隆的巨大咆哮声，掩没了激战的枪声，对岸的敌人并没有发觉。

我和伯承同志进到安顺场边一间老百姓挖煤住的棚子里，把一营营长孙继先找来。伯承同志仔细地询问了渡河的准备情况，然后进一步给他明确了任务，指示了注意事项。我对孙继先同志说：“前几天看到敌人飞机扔下来的传单，说我们毛主席要成为石达开了。但是我们不是石达开，也不可能成为石达开。因为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结合在一起，有坚强的政治工作，有超乎寻常的勇敢精神与吃苦精神，这是石达开所没有的，我们一定要渡过河去，我们也一定能渡过河去。渡

过去，我们的行动就自由了。”我要他回去，动员部队，把渡河的一切准备工作做好。

这时，一营已经夺到了敌人的一条小船。这条小船是敌人营长太太乘坐过来为她母亲拜寿的。其他的船早被敌人划到对岸去了。就是这条船还是一条坏船，我们不得不加以修理。

大渡河宽约百米，深约三十米，流速每秒一米八至两米，很远就可以听到激流的咆哮声。这是长征以来，我们渡过的水流最湍急的河流，比乌江、金沙江水还要急，两个人在河边讲话，如果不用大声音，对方会听不到。

我和伯承同志继续前伸到渡口附近，看到一营的同志们为争当突击队争持不休。有一个十六七岁的通讯员，争得最积极。我和杨得志同志都说：“由你们营长最后下命令定吧。叫谁去就谁去。”这个通讯员终于得到了批准，高高兴兴地参加突击队去了。

当时决定第二天——五月二十五日拂晓强渡。拂晓时，我和伯承同志就站在河岸的一个坡地上，旁边就是架着重机枪的阵地。我们直接观察了这个惊心动魄的历史场面。战斗发起后，由有名的迫击炮手赵章成同志和一团机炮连的三个特等射手，用两门迫击炮和数挺机关枪进行掩护。我们的十七勇士乘着唯一的那条小船，在惊涛骇浪中，冲到了河的对岸，打垮了敌人的防御，占领了滩头阵地。我和伯承同志的心头都充满了激动，为我们英勇无畏的红军

感到骄傲！

随后，他们掩护后续部队一船一船地渡过河去。可是船太小，每船只能渡四十多人，直到二十五日晚上一团还有两个连没有渡过去。风急浪高，浮桥又架不成，没有办法，只有一船一船地渡。

第二天一师的二、三两团也来到渡口，当天夜间，总算把三个团都渡过了河。在一团渡河还没有完，二、三团还没有开始渡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来到了渡口，林彪也来了。毛泽东同志找我们开了个小会。当他得知渡河的困难情况，就立即决定我军要迅速夺取泸定桥，否则大部队一时难以过河，而敌人李韞珩的五十三师已经渡过金沙江，正向我们赶来，红军仍然面临着巨大危险。毛泽东同志当时确定的部署是：一师和陈赓、宋任穷同志领导的干部团到大渡河对岸，仍由伯承和我率领，从东岸北上赶向泸定桥；由林彪带二师、一军团军团部和五军团，在大渡河西岸赶向泸定桥。安顺场到泸定桥三百四十里行程，要求我们两天半赶到。毛泽东同志特别向我们指出，这是一个战略性措施，只有夺取泸定桥，我军大部队才能过大渡河，避免石达开的命运，才能到川西去与四方面军会合。毛泽东同志的意思我知道，万一会合不了，由伯承和我带着一师和干部团到川西创造个局面。罗瑞卿和肖华同志也跟我们一起走。干部团有干部，只要有群众，搞革命根据地就好办。受领任务以后，我和伯承同志就随着一师的部队，

登上彼岸。干部团随后也从这里过了河。

防守河对岸的敌人，只是被我们驱逐走了，并没有走很远，我们不知道。我和伯承同志带着部队过河以后没有走多远就天黑了，找到一处村庄宿了营。第二天天亮起来一看，才发现敌人和我们住在一个村庄上了。我们在山坡的这一边，他们在山坡的那一边，噼里啪啦打了一仗。又经历了一场惊险！

队伍沿着大渡河的东岸继续北上，目的是要从东岸去策应西岸准备攻占泸定桥的部队。伯承同志说他要先走，他要带一部分部队先去占领一处隘口，那里敌人大约有一个营固守。我就随着本队走，我们边走边审问俘虏。从刚俘虏的敌人口里，才知道，跟在我们后边的，是敌人刘文辉的一个营，山后另外还有一个旅。都是敌人布置的河防部队，就在我们行进右侧的山地上。我赶紧去将这个情况告诉伯承同志。我对他说，你不能那样走。如不先夺取右侧这几个高地，我们就过不去，如若敌人居高临下，来一个反扑，就有把我们压到大渡河里去的危险。当时，我们手下只有黄永胜那个三团，其他队伍还没有赶到。于是我们就带着三团背水仰攻，一鼓作气占领了右侧那几个山头，把敌人那个旅击溃了。敌人向化林坪方向逃去。这样才保障了我们的安全，又保证了正行进在河对岸的二师四团不受敌人隔河的射击。

二师四团的任务是作为先头部队沿着大渡河的西岸北

上，去夺取泸定桥。我们两支英雄部队，互相支援，夹大渡河北上，当时的情景真是动人。他们在对岸边行军边不断地对我们又是喊又是比划手势，意思是告诉那里有敌人，要我们注意。我们这边也是一样。虽然由于河水的咆哮，大家什么也听不见，但战友的关怀却鼓舞着每个红军战士，都加紧了脚步，向泸定桥急进。我看到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更坚信我们决不会做第二个石达开。同时，这次打泸定桥，好在采取了夹河而上的办法，因为大渡河并不宽，越往泸定桥前进就越窄，只有百米左右，两岸的敌人都可以隔河射击，封锁我们前进的道路。当年在一军团任参谋，现在在空军任副司令的何廷一同志，就是在西岸被东岸敌人火力打伤的。我们夹河而上，就可以消灭和驱赶两岸的敌人，保障对岸同志的安全。

四团团长沙时是王开湘，政委仍是杨成武。他们以急行军的最大速度，二十七日晨从安顺场出发，还要一边走，一边消灭路途上碰到的敌人，真是行走如飞。他们在路上接二连三地打了几次胜仗，俘虏了敌人的营长、连长等数百人，日夜兼程，冒着大雨，黑夜点起火把，第二天用的是“一天二百四十里”的速度，于二十九日早晨六时，抵达泸定桥西岸。面对着他们的是一江汹涌咆哮的江水。而泸定桥有很多地方被拆得只剩下几根光溜溜的铁索，悬挂在令人头晕目眩的激流之上。他们组织了二十二人的英雄突击队。当天下午四时，在对岸敌人的火力封锁下，一

边在铁索上铺门板，一边匍匐射击前进。是这样奇绝惊险地夺取泸定桥的。这时候我一师二团、三团的几个连队，也从东岸赶到泸定城郊，对四团夺取泸定桥起了策应作用。然后四团冒着敌人放的熊熊大火，攻占了泸定城。守敌二十八团向天全溃退，我军俘虏人枪百余，补充了一批弹药。

我和伯承同志带着三团冒雨从大渡河东岸赶到泸定城时，已是后半夜两点钟。那时，我本来已经病了，正在发烧。可是为了查看泸定桥被敌人破坏的情况，看是否大部队还能从上面通过，我和伯承同志要杨成武带着我们去看看泸定桥。杨成武同志提着马灯，带着我们在铺了门板的桥上走了一遭。在我们又回到桥中间的时候，由于伯承同志心中无限激动，情不自禁地在桥上跺了三脚，一边说：“泸定桥呀，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因为他过去在那里打过仗，知道泸定桥的险要，夺取这座桥的不易，感想自然更深。我也激动地说：“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随后，五军团和林彪带的一军团的本队，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带的中央红军大部队，从泸定桥上渡河。我们一渡过大渡河，就把追击我们的国民党中央军，全甩掉了。

渡河胜利以后，一军团《战士报》连续发表捷报和评论。先是表扬了《冲部永远是模范——渡河前的胜利》。冲部是当年五团的代号，表扬他们占领了越西县城，为掩护

我们从西边占领渡河口创造了条件。然后是《向牲部全体指战员致敬礼》，牲部是一团的代号，表扬他们在安顺场强渡取得成功。最后特别表扬勇部飞夺泸定桥，一天行军二百四十里。勇部是当年四团的代号。这些都反映了从机关到连队战士那股高兴劲。

特别是朱德总司令发来几份电令，一再称这次胜利是战略的胜利，十分鼓舞人心。单从战役的指挥来说，我认为我们的确走了几步关键性的险棋。我们都走胜了。单就一军团范围来说，这次胜利，是几个部队自觉地互相在战术上密切配合、执行统一战役计划取得的结果。如果没有五团远离主力去吸引敌人对安顺场的注意力，一团在安顺场能否夺到那条小船渡河成功，还是一个疑问，固然夺到那条小船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如果不是一师渡河，与二师四团夹河而上，飞夺泸定桥是否能够那样及时得手，也很难预料，固然四团动作神速勇猛确有独到之处。如果我们当时夺不到泸定桥，我军又是一个怎样的处境？那就很难设想。总之，当时棋势虽险，我们终于取得成功。确实来之不易，但也决非偶然。我们和国民党的斗争，常常是棋高一着，出敌意外。这是因为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有敌人根本不能和我们相比的政治素质和以劣胜优的机动灵活的战术素养，特别是我军指战员那种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中国革命的伟大的牺牲精神，所以有时能绝处逢生，再开得胜之旗，重结必胜之果。

一九七九年十月，有的同志要求我为大渡河纪念馆题词，有感于当年红军过大渡河的英雄气概和我们取得这一战役胜利的主要过程，我写下了这么几句：“安顺急抢渡，大渡勇夺桥，两军夹江上，泸定决分晓”。这说不上是诗，只不过反映了强渡大渡河的实际情况罢了。

十五、翻越夹金山与四方面军会师

我全军过大渡河后，开始想回过头来，南向清溪、富林，以扼阻中央军渡河北上，所以我们一军团又在化林坪等地击溃退守第二线的四川军阀河防部队。以后军委得知清溪有川军守敌四个旅，为了避免与敌纠缠，尽快与四方面军靠拢，又命令我们继续北上去占领天全、芦山。于是我们爬了二郎山附近一个叫甘竹的高山。这是我们长征中最艰难的行军之一。

二郎山主峰的海拔标高是三千四百三十七公尺。我们自然不会走主峰，但是我们走的这座山峰也够高的，当时说是五十里。山上没有人烟，尽是原始森林。林中是纠缠不清的粗壮的葛藤和横七竖八的被雷击倒的枯树干，地下则是老厚的腐枝败叶和苔藓。在这样大的原始森林里，即使晴天也是暗无天日，何况那天正下小雨，阴暗得几乎什么也看不见。脚下泥泞，可以说根本无路可走，有的地方要砍倒树开路。步兵运动很困难，别说重机枪和辎重部队了。尤其是下山的时候，山非常陡，大家是用裹腿结成绳

索，攀扶着哧溜下山的。对牲口则是先把它身上的驮子卸下来，滚下山去，然后再把牲口连拉带推地推滑下去。这一天损失的牲口不少。只不过是一日的行军，搞得人困马乏，精疲力竭。

这一天倒没打仗。可是四外仍然军情紧急。四川军阀以雅安为据点，前来向我堵击，想在雅安以西击溃我军。六月六日我们接到军委命令，要我们以破釜沉舟的决心迅速夺取天全、芦山。于是我们军团就向北急进，赶在川敌援军的前面。六月八日四团袭占天全，一团击溃川军的一个团占领芦山。

一到天全、芦山，就象到了天堂一样。虽然只不过是原西康省两座小县城，平坝子也不多，可是没有大山了，能见到各种蔬菜和从四川运来的各种物资。我们在天全县政府里休息了一天，部队吃得饱饱的，搞了一天卫生工作，突击治疗病号，补充了一些给养。主要是利用这个时间动员大家做好翻越夹金山的准备工作。在天全、芦山我们接到中央和军委发布的指示，要我军迅速北上，去与四方面军会合。这是战略总任务，而全局的关键是要翻越夹金山去夺取懋功。中央军委把这个光荣任务交给了我们一军团。一军团则由陈光率四团带电台先走，限他们十二日赶到懋功。刘亚楼率五团在四团后跟进。我们率军团部和一师还有三军团彭雪枫的那个师，在五团之后跟进。

离开天全、芦山，四团占领宝兴，我们就到了宝兴。

这时地势越走越高，峡谷越来越多，过铁索桥又多了。我的一匹骡子在过桥时把蹄子陷进铁索中去了，左弄右弄弄不出来。为了不耽误部队过桥，只好忍痛地把它推到桥下去了。长征中有一头骡子是多么宝贵呀，失去一头骡子又是多大的损失呀！何况那时我开过刀脚又化脓了。

到了宝兴，就可以远远看到晶莹耀眼、高耸入云的大雪山了。我虽然是四川人，但生长在秀媚的川东，看壮丽惊心的大雪山，平生还是第一次。从江西、福建来的一些红小鬼，更是觉得大开眼界。

六月十三日，我们进到大碛碛，已经进到了夹金山的脚下。这时陈光同志发来电报，他们十二日中午已经翻过夹金山，到了达维，与四方面军的先头团第八十团会合，并得知四方面军的二十五师已经在八日占领了懋功。接到电报真是高兴极了，给我们翻越夹金山增添了力量。在大碛碛住了一夜，第二天，天刚亮就开始上山。象我们这些病号，为了不致中途落伍，更是提早上路，未等天亮就动身了。

这时，左权同志也病了。我和左权同志都是带病过夹金山的。那天一大早，他们用担架抬着我。一上坡，我想起左权同志行走更困难，就赶紧下来。我说：“我可以拄一根棍慢慢地走，左权参谋长还在后边，你们去抬抬他，帮一帮他吧！”

夹金山，是我们长征路上过的第一座雪山，地图上的

海拔高度主峰是四千五百公尺左右，但是从大碛碛往上走并没有这样高，因为我们到大碛碛时，海拔高度已经很高了。困难的是山上空气稀薄，天气变幻无常。上午爬山，天气正常，人们开始还并不觉得什么。已经经过反复动员，人们的精神准备都很充足。山坡是原始森林，一片片，一丛丛，铺散在茫茫浩瀚的“六月雪”中，这些奇特的景色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住了。再加上鼓动工作，把人们的劲头鼓得很足。但一过中午，天气骤变，先是大雾，随后是毛毛细雨，转眼又成了霏霏白雪，随风狂舞，把我们红军战士一个个都变成了雪人。尤其是到了傍晚，天气奇冷。战士们衣着不多，临时打开背包，把能穿的都穿在身上，或者干脆把被子、毯子披在身上。我上到山上感到气也喘不上来。山顶空气稀薄，不能讲话，只能闷着头走，不管多累，也不敢停下来休息，一坐下来就可能永远起不来了。我们警卫班的同志，身体都是比较健壮的，也有的走着走着不知怎么地，倒下来就完了。在山上我们牺牲了一些同志。就整个来说，我们全靠万众一心，群策群力，互相帮助，发扬了阶级友爱精神，胜利地越过了夹金山。我也和大家一起，因为想到我们盼望已久的四方面军的战友就在山脚下，自己也说不清当时是哪里来的那一股体力，硬坚持着越过了雪山。我一打听，左权同志也过来了。林彪这一天反倒掉了队，没有能过夹金山；过去他几乎是从来不掉队的。

六月十四日晚上，我们到了达维，我开始见到四方面军的同志了，那个高兴劲，简直无法形容。真是他们高兴我们也高兴。

这次来迎接一方面军的不光是三十军的八十师，还有九军的二十五师，统一由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同志带队。当时李先念同志驻在懋功。我和几个同志在二十五师师部住了一夜，他们搞了好多吃的东西来款待我们。第二天我们到了懋功，见到了李先念同志，他又热情地招待了一番。李先念同志看到我没有骡子，就送给我一匹骡子。这匹骡子我一直骑到陕北。

随后，六月十八日，中央来到了懋功。六月二十二日，中央和四方面军的领导到两河口开会，也会合了。

十六、过草地，与张国焘的斗争

两河口会议是张国焘野心暴露的起点。这时，经过万里之行的中央红军，军衣破破褴褛，五光十色，在张国焘的眼里，还不如“他的”队伍有战斗力。本来不管哪个方面军，都是中国工农红军，都是党的部队，谁有战斗力都是好事，可是张国焘他动了野心。我们当时看到四方面军的队伍人员比较充足，除五万多部队外，还从川北带来一些帮助他们运东西的男男女女，总共约有八万人。张国焘把这些都看成是他闹独立的资本。另外，在两个方面军会合以后，一方面军中也确有人从一种不正确的动机出发，歪曲

地把一方面军的情况和遵义会议的情况，偷偷地告诉了张国焘，也使张国焘起了歹心，认为中央红军不团结，他有机可乘。对张国焘这个人，过去我是了解的。他狡猾阴险，个人野心很大。所以，我对他是有警惕的。

两个方面军会合之后，本应有一个统一的行动计划。早在两军会师以前，六月十六日、十八日，中央、军委曾两次致电张国焘，告知党中央关于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意见，即：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应以嘉陵江与岷江上游中间地区为目标，争取建立根据地。如不成，则应北出平武，到陕、甘南部地区去创造根据地，切不可向川西发展。因为以懋功为中心的地区，纵横千余里，均为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峨眉山，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出川西地区，均为下策。并指出实施这个计划的关键，当前是要将茂县、北川、威州控制在我们手中，要他不来懋功，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准备去理番（现名理县也叫杂谷脑）与他会合，共商大计。但张国焘就是不听，放弃川北根据地率领四方面军大部队向川西懋功一线转移。开始，中央派了李富春、林伯渠等三位同志，作为中央代表到张国焘那里，就今后行动问题跟他商谈，双方都表示了态，当时就没有谈拢。

六月二十六日，中央在两河口正式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在甘肃南部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以争取中国西

北各省以致全中国的胜利。”这个决定无疑是正确的。在会上张国焘却坚持异议，态度傲慢，主张到川康边境去创建根据地。会议虽然作了决定，但张国焘根本就不愿执行，他以后的行动证明了这一点。这次会议，也暴露了张国焘要搞分裂，想夺权的野心。

在两河口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有这么一件事，引起我警惕。张国焘忽然请我和彭德怀同志两人去吃饭。席上，开始他东拉西扯，说我们“很疲劳”，称赞我们“干劲很大”。最后说，他决定拨两个团给我们补充部队，而实际上不过是相当于两个营的兵力，一千人左右。我们从张国焘住处出来，我问彭德怀同志，他为什么请我们两人吃饭？彭德怀同志说，拨兵给你，你还不要？我说，我也要。往下我再没有说下去，因为我那时脑子里正在打转转。

我们又翻越了几座比夹金山还要高得多的大雪山，由于部队有了经验，都学会了腾起一点身子，放平两只脚，轻轻地从雪上走过，陷到雪里去的很少，没有象过夹金山牺牲那样多人。两河口会议以后，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以消灭胡宗南的主力。当时得知在松潘附近有胡宗南的共十六个团。为了打松潘，我军编成左、中、右三路军：左路军由一、三、五、九军团组成，由林聂彭杨统一指挥；中路军由徐向前同志指挥；右路军由陈昌浩同志指挥；分头向北，继续前进。

因为这一带人烟稀少，又是少数民族地区，部队严重

缺粮，我们几乎天天为粮食发愁。这种情况，完全证实了中央一开始的正确判断。到了黑水、芦花一带，部队要四处筹粮运粮。这一带有很多大喇嘛寺。刷经寺是最大的。寺里大喇嘛都很阔气，连许多家具都是从上海运来的，藏粮很多，但是不能随便取用。部队到处筹粮，有些藏民又误信敌人宣传，把粮食埋藏起来了，人也跑光了。部队有时不得不起用了藏民的粮食，只得留下几块光洋，写个条子，表示歉意。

当时为了掌握政策，团以上都有筹粮委员会，统一筹粮，统一分配。对于收割藏民地里的青稞，总政治部有个严格规定：一、各部队只有在用其他办法不能得到粮食的时候，才许派人到藏民田中去收割已经成熟的麦子。二、收割麦子时，首先收割土司头人等的，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去收割普通藏民的麦子。三、收割普通藏民的麦子，必须将所收数量，为什么收割麦子的原因等，照总政所发的条子，用毛笔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藏民回来可以拿这木牌向红军部队领回麦钱，这实在是不得已的办法，因为红军要生存呀！

在饥饿中，能吃到一点正经粮食就不错了。蔬菜简直谈不上，能吃到一点豌豆苗那就美极了。我还记得有这么一件事，警卫员弄来一些从一面破鼓上剪下来的牛皮煮着吃，还开玩笑说，颇有点象海参的味道哩！

那时我们一军团是前卫，四方面军的三十军临时归我

们指挥。前面，毛儿盖驻有胡宗南的一个营，七月十六日，我三十军和二师四团将那个营击溃了，占领了毛儿盖。敌人临逃离毛儿盖时，还放火烧了房子。部队到了毛儿盖，缺粮情况才比较缓和了。因为毛儿盖周围，是个农牧区，土地肥沃，青稞比较多，蚕豆长得很高，藏民养的牛羊也不少。当然，对当时那么多部队来说，仍然是只能救一时之急。

中央曾利用在毛儿盖休息的时机，于八月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讨论了当时面临的形势与任务，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要求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兄弟团结，重申了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既定方针，反对南下逃跑及各种右倾、动摇。特别指出，由于一、四方面军的会合，我们的战斗力比以前更大了更集中了。西北各省是中国反动统治及帝国主义势力最薄弱的地区，一、四方面军在西北部的活动，将给中国革命和红军发展以及创造西北根据地造成有利条件。会上，中央和张国焘斗争很激烈。张国焘企图挑拨一、四方面军之间和一方面军内部各兄弟部队的团结，中央对他的许多谬论都一一给予了驳斥。

另外，还召开了一个沙吾会议。那时四方面军的十一师，政委是陈锡联同志，驻在沙吾，会是在十一师司令部开的。张国焘要补选中央委员，改组中央。毛泽东同志和他斗了一、二十天。我们那时随部队到另一个地方执行任务

去了，没有参加。恩来同志也没有能参加，因为他肝病犯了，曾经把“戴胡子”医生调去护理他。听说毛泽东同志对张国焘说：“你这是开的督军团会议。”意思是向中央要权。

毛儿盖会议鉴于胡宗南兵力已经在松潘附近集中，毛儿盖附近全是藏民，对我们不了解，特别是粮食困难问题虽有缓和，仍未解决，因而决定放弃松潘战役计划，不打松潘，只作为钳制方向。全军改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即北上甘肃南部，在夏河至洮河流域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为此，决定一、四方面军分别向毛儿盖和卓克基两地逐渐集中，组织左右路军。右路军由徐向前和陈昌浩同志指挥，由一方面军的一军团、三军团（这时一度改称一军和三军），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及军委纵队一部和新成立的红军大学组成。左路军由朱总司令指挥，实际上是由当时已升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指挥，由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一方面军的五军团、九军团及军委纵队的一部组成。先分两路北上，右路军以班佑为目标，左路以阿坝为目标，然后在巴西会合。

右路军组成后，有一天，我和林彪在右路军总指挥部开过会留下来吃晚饭，吃了很多胡豆。右路军的政治委员是陈昌浩，他是代表张国焘的。吃完了晚饭还没有天黑，陈昌浩说：“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荣臻同志你留下来，我们还要谈一谈。”留下后，他问我，你对遵义会议态度怎样？你对会理会议态度怎样？我说，遵义会议我已经有了态度，

会理会议我也早已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看来，他们认为，林彪已经不成问题了，要做我的工作，要动员我出来反对毛泽东同志。谈话时徐向前同志也在场，但他在一边，在地图上划标号，正在计划作战方面的事，没有作声。就是陈昌浩一个人在那里高谈阔论。谈到晚上十点钟了，我说，昌浩同志，我要回去了，明天还要行军。他才说，好吧，你走吧。我就带了两个警卫员，牵着一匹骡子，离开了。骡子我也不敢骑，让一个警卫员牵着走在前面，我走中间，一个警卫员殿后。我过去在不作战时，从来没有将手枪顶上子弹的，这次我将手枪子弹上了膛，也叫警卫员将枪里顶上子弹。老实说，我怕陈昌浩整我，也怕遇上藏在藏民中的坏分子打我的冷枪。前不久，我红二师参谋长李棠萼就是走在路上被冷枪击中牺牲的。我走了半夜多，才摸回一军团军团部。

八月中旬，我们向北走，张国焘向西走。我们向巴西、阿西前进，张国焘就向阿坝前进。到了阿坝，张国焘老说阿坝如何如何好，强调种种理由，就是不向巴西方向来，企图以既成事实，诱使右路军也向西进。真是奇谈怪论！阿坝再好，也只有那么大一块地方。我对同志们说，我们光在毛儿盖附近，前后就耽搁了一个多月，再不能在草地拖了。还是照毛泽东同志讲的，出甘肃，不然我们就要完了。我告诫林彪说，你要注意，张国焘要把我们“吃”掉。因为我当时已经获悉张国焘还有一个方案，要把我调到三十一

军去当政治委员，把林彪调到另一个军去任军长。总之要把我们调离原部队，只不过是命令还没有发出。当时林彪已经有他自己的“立场”。他说，你这是宗派主义。我说，怎么是宗派主义呢？对这个问题，我们要警惕。张国焘和中央的思想一贯不一致。我们应该想一想。我说这是路线问题。林彪反驳我说，既然是路线问题，你说他路线不对吗？那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哪？我们才几个人哪？这时，我一方面军的确只剩下两万多人。我驳斥他说，蒋介石的人更多哩，难道能说蒋介石的路线更正确？这时左权、朱瑞同志都在场，他俩都未表态。左权同志当时不表态有他的苦衷，他知道当时王明等人怀疑他是托派。这完全是冤枉，所以他说话十分谨慎。朱瑞同志是在长征途中接替李卓然同志任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在争论时，他既没有支持我，也没有公然支持林彪。这次争论，我和林彪都动了气，拍桌子把一个盘子也打翻了。

右路军八月二十一日开始出发向草地前进，一军团由二师四团作先导，走前卫。随后出发的是右路军司令部和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同志及红星纵队的一部、红军大学等。然后是四军和三十军，最后是正在病中六天没有进饮食的周恩来同志带着三军团殿后。

离开毛儿盖北行四十里就进入草地。草地可以说根本没有路。当时由二科的侦察科长苏静同志，带了一个指南针，找到了一位藏族老太太当向导，在前边为部队开路。

·那位老太太有病，我们派人抬着她走。红军过草地，苏静同志在前边开路是有功的。我们走了二十里地就到了腊子塘，路不好走，晚上把树枝架成棚子宿营。第二天走了五十里到达分水岭，在附近森林中宿营。第三天走了七十里到了后河，能寻见单株树的，在树下宿营。第四天离色既坝四十里宿营。这一夜没有下雨，附近也无森林，选择了一些干燥的高地，勉强对付了一夜。第五天才走到班佑。这只是小草地。整个草地的景象，真是“天苍苍，野茫茫”，千里沼泽“复不见人，鸟飞不下，兽铤亡群”，这就是草地。我们的红军战士，就是在这样的荒原上，燃篝火，食青稞、野菜，互相激励，相扶而行。天气是风一阵、雨一阵。身上是干一阵、湿一阵。肚里是饥一顿、饱一顿。走起来是深一脚，浅一脚，软沓沓，水渍渍。多少人挺过来了，不少人倒下去了。

我到班佑的前一天，给后面的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李富春同志打了一个电报，把我们沿路经过的情形和后续部队要注意的事项，特别是把我们的经验教训，告诉了他们，并请他们转报周恩来同志。其中有一段是：“一军团此次因衣服太缺和一部分同志身体过弱，以致连日来牺牲者约百余人。经过我们目睹者均负责掩埋，在后面未掩埋的一定还有，你们出动时，请派一部携带工具前行，沿途负责掩埋。”十天以后，得到周恩来同志一份电报，他说：“据三军团收容及沿途掩埋烈士尸体统计，一军团掉队落伍

与牺牲的在四百以上……”嘱咐我们要“特别注意改善给养，恢复体力”。战争的确是残酷的，我们的许多同志在作战中那么英勇没有牺牲，却在缺粮少药，饥饿、寒冷、疾病、高原缺氧的艰苦旅程中痛苦地倒下了。

因为张国焘拒不受命，使红军耽误了行程，而国民党军队却争取了时间，逐渐从南从北从东围过来了。这时尾追我军的川军已占据懋功，蒋介石的嫡系周浑元纵队已集结在雅安，胡宗南的四个师已在松潘、漳腊、包座一线布防，在巴西附近的高山筑起了碉堡群。进到包座的是国民党原福建派系张贞指挥过的第四十九师，这是我们一军团在中央苏区的宿敌，这次被我右路军第三十军消灭了它两个整团，右路军才进入巴西。

尽管中央在巴西一带等着阿坝附近的左路军按原定计划前来会合，张国焘不仅不来，反而凶相毕露，打电报命令陈昌浩带领右路军，包括原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全部南下，背弃中央北上的决定，居心险恶。这份电报发到班佑寨右路军司令部，被当时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同志看到了，他连夜骑马紧急赶到巴西报告了毛泽东同志。当时我们一军团已进到了俄界，巴西只有三军团少数部队。我们在俄界对于上述情况一点也不知道。只收到了三军团发来的一份电报，要我们停止前进，以后派武廷同志送来信件，我们才知道张国焘闹分裂和中央的危险处境。当时中央在巴西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半夜立即从巴西出发脱离危险

境地。同时命令原一方面军三军团及军委纵队、红军大学在阿西集合，根据我党这年发表的“八一宣言”的精神，继续北上。先到俄界，会合一军团，临时组织为北上先遣支队，继续向甘南地区前进。同时电令左路军等随先遣队后北上，张国焘没有执行。

九月十二日，张国焘贼心不死，又给一、三军团领导人发来电报，诱令我们南下，我们根本没有理他。

十七、出腊子口，在吴旗镇打骑兵结束长征

北上先遣队出草地后，中央政治局于九月十二日在俄界召开紧急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讨论了北上抗日的任务和到达甘南后的方针，特别强调要团结好部队，创造条件再迎接左路军北上。

然后部队冒着雨雪交加的严寒，沿着白龙江源头的栈道，进入甘南境内。

打天险腊子口是进入甘南的关键性的一仗。腊子口是通往岷县的一个奇峻的隘口。这一仗是我们报告毛泽东同志，他亲自决定打的。并以毛泽东、我和林彪联合署名，在九月十六日发了一个电报告诉彭德怀同志。电报开头就说：“顷据二师报告，腊子口之敌约一营据守未退，该处是隘路，非消灭该敌不能前进。”随后，我们一军团的几个领导干部，即根据毛泽东同志下达的决心，冒雨赶到二师去，把师长陈光和四团干部叫在一起，一边看地形，一边研究

打腊子口的部署。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则驻在朵里寺等待我们的消息。

十六日这一天，四团还没有到达腊子口，在路上就打了两仗。打的都是鲁大昌十四师派来堵击我们的部队，它的两个营都被我们打垮了，消灭了它一部分。

下午四时，四团先头营开始在腊子口接敌。我们在腊子口外，边看边惊叹腊子口诚乃一处天险。要北上，非走此山口不可，别处无路可走。没有想到在甘南这黄绿相间的漫漫土山中，居然有此险峻地形。口子很窄，只有三十来米宽，仿佛这原本是一座大山，被一把巨斧劈开了似的。两边都是悬崖峭壁，中间有一条七、八十米宽的河流，称为腊子沟，水深流急。河上架有一座木桥，桥头筑有碉堡，这是进入腊子口的唯一通道。敌人在这里布置了两个营的兵力。山坡上还修了不少碉堡，仅在右岸半山峭壁的碉堡中，就有一连兵扼守。山口往里，直到岷县，有纵深配置。敌十四师师长鲁大昌的四个团都驻守在这一线。四团当时决定，由杨成武政委指挥，用一个连从正面进攻，夺取木桥，猛攻隘口。另派两个连，由团长王开湘率领，沿右岸的峭壁迂回到敌人侧后奇袭敌人，达到全歼敌人占领隘口的目的。我们批准了他们的作战方案。

入夜开始攻击。负责攻击木桥的连队几次猛攻都没有奏效。敌人死守桥头堡。从右岸石壁上敌人倾泻下来的手榴弹，在桥头堡五十公尺内，构成了一片火网；爆炸过的

甚至没有爆炸的手榴弹柄，在地上铺了满满一层。我攻桥的部队始终接近不了桥头。于是该连在火线上召集党员会议，决定再接再厉，分两路夺取木桥。与此同时，负责从右岸峭壁间迂回敌人的两个连队，经过指挥员精心组织，在上游不远处，用马匹将他们驮过了河，然后由一名自报奋勇、会攀藤附葛的苗族战士带领，一批一批地，一层一层地用裹腿带牵引着，攀上敌人右岸峭壁的后坡。许多同志勇敢跳下岩层，象从天而降似的急袭了敌人，打得敌人丢盔卸甲。这时我攻击桥头的那个连队又开始了他们的第六次攻击。两下夹攻，敌人狼狈逃窜。到九月十七日早晨，四团终于占领了天险腊子口。并在当天穷追九十里，占领了大草滩（即现在的三草滩）。缴获粮食数十万斤，盐二千斤。尤其是回、汉族群众对我们红军的热情欢迎，这对当时刚出草地不久的部队，真是无价之宝。

腊子口一战，北上的通道打开了。如果腊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无论军事上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现在好了，腊子口一打开，全盘棋都走活了。

腊子口一打开，我先锋侦察警戒部队一直前伸到甘南重镇——岷县。我们过了腊子口，当夜又翻了一座山。山虽不太高，但正下着雨，天黑路滑，真是难走，一不小心，就掉到山涧里去了。过这座山牺牲了好几位同志。为了赶路，我骑在先念同志送给我的那匹骡子上，任它走罢。还

好，顺利地到了山脚下。一过山就是大草滩，我们在这里住了一夜。这地方回民烙的大烧饼，有脸盆那么大，北方人叫锅盔。我们买了不少。因为饥饿，吃着真香，于是又叫老乡烙了一些。后面毛泽东同志他们来了，吃了也赞不绝口。九月十九日，我和林彪随二师部队进驻哈达铺。在这里我们得到了一份国民党的山西日报，其中载有一条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的消息。我说，赶紧派骑兵通讯员把这份报纸给毛泽东同志送去，陕北还有一个苏区哩！这真是天大的喜讯！

九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同志召集第一、三军团和中央军委纵队的团以上干部，在哈达铺一座关帝庙里开会，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他说：“我们要北上，张国焘要南下，张国焘说我们是机会主义，究竟哪个是机会主义？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现在我们北上抗日先遣队人数是少一点，但是目标也就小一点，不张扬。大家用不着悲观，我们现在比一九二九年初红四军下井冈山时的人数还多哩！我们现在改称陕甘支队，由彭德怀同志任司令员，我兼政委。”支队之下，编为三个纵队，林彪任支队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我任第一纵队政委，下属一、二、四、五、十三大队，也就是五个团。二纵队司令员是彭雪枫，政委是李富春。三纵队即中央军委纵队，由叶剑英同志任司令，邓发同志任政委。

全支队由七千多人编成。最后毛泽东同志动员大家振奋精神，继续北上抗日，并告诉大家，从现地到刘志丹同志创建的陕北苏区只不过七八百里了。

部队继续向陇东高原前进。蒋介石急调胡宗南和西北军、东北军主力在西兰公路和平凉至宁夏的公路上布置封锁线。九月底，我四大队先占领陇西，紧接着我一大队急袭通渭城，占领了这万余人口的城市，消灭鲁大昌部和保安团三百多人。部队在这里休整恢复体力，然后向陕北前进。

在前进的路上，我们的部队几次和敌人的骑兵遭遇。我们在草地上打过骑兵，但有的部队仍不知所措，如何打骑兵提到了教育日程。我们的部队历来是和两条腿的敌人作战，现在要和六条腿的敌人作战。它倏忽而来，倏忽而去，刀光闪闪，声势夺人，如何打法，确是一个新课题。林彪当时对这个战术抓得很紧，部队都学会了打骑兵歌。越过六盘山之后，十月七日，在青石嘴打了一仗，打的是东北军何柱国的骑兵。六盘山驻有何柱国的一个骑兵军，驻青石嘴的是它的第七师第十三团两个连。当时，他们在村里休息，我和林彪、左权在山上拿着望远镜看得清清楚楚，他们把马鞍子卸在地下在那里休息，根本不知道我们已经来到他们跟前。随后，毛泽东同志也上了我们站的这个山头。他叫把各个大队的领导干部都召集来，决定要消灭这股敌人。他亲自命令一大队和五大队从两侧迂回兜

击，四大队从正面突击。三个大队像猛虎扑食似地扑下山去，把敌人解决了，缴获了一百多匹马。大家对打骑兵有信心了。我们用缴获的马匹装备了我们纵队的侦察连，我们也开始有自己的骑兵部队了。第一任骑兵侦察连连长是梁兴初，副连长就是日后驰骋在晋察冀根据地的骑兵团长刘云彪同志。

第二天，四大队走前卫。走到白羊城附近，天刚蒙蒙亮。驻庆阳敌人邓宝珊的两个地方小团队，迎面来了。敌人一点也没有想到红军来得这样快。四大队临时组织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干净利落地把先头那个部队消灭了。我和朱瑞主任到达四大队时，战场已经打扫完毕，俘虏都集合起来准备上送了。

十月十八日部队到达吴旗镇附近，十月十九日我们正式进了吴旗镇。这时，宁夏二马和毛炳文的骑兵又跟上来了，紧追在我们的后边不放。行军掉队的战士吃他们的亏不少。我们到达吴旗镇时，已经是下午了。一纵队还在抗击骑兵的气势汹汹的攻击。毛泽东同志认为，让敌人的骑兵一直跟进陕北，对我们很不利，总是被动。他给我们交代，要想办法打它一下，要我到前面去看看情况再下决心。当天下午我们跑到前边阵地上看了看，看究竟打得赢打不赢。我心想，把敌人带到陕北去也确实不好呀！傍晚回来，我向毛泽东同志作了汇报。我说，我们应该出击。敌人骑兵也就是几千人。别看他在马上气势汹汹，真正打起来，

他就不行了。他一定要下马和我们作战，还要招呼马匹，战斗力就会下降。毛泽东同志同意第二天早晨出击。十月二十一日，二纵队在左翼，一纵队在正面，向正在迂回吴旗镇西北部的敌三十五师骑兵团的两千多骑兵出击，果然，我们出击不久，敌人就垮了。这次作战，我们不幸牺牲了第二大队队长李士华同志。随后，我们在杨城子以西，在齐桥、李新庄间，分别阻击敌三十二师和三十六师的两个骑兵团，又将敌人击溃。敌人骑兵这次垮了以后，一段时间再没有敢来侵犯。我们将先后俘获的敌人的马术教官、兽医以及会钉马掌修马鞍具的工人都补充了我们的骑兵队伍，我们的骑兵连就更充实了。

我们初进吴旗镇，看到在一间窑洞的门口挂着苏维埃政府的牌子。我们到了陕北根据地了！从此我一方面军正式结束了长征。长征以来，我们做梦也想找一个落脚点，现在总算有一个落脚点了。开始把伤兵安置在后方，长征以来一直使我们苦恼的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我们在吴旗镇休息了几天。知道徐海东同志领导的红二十五军也到达陕北了，还派了人来和我们联络，真是令人高兴。十一月六日，在甘泉南边的象鼻子湾，我们中央红军和徐海东同志领导的二十五军、刘志丹同志领导的二十七军胜利会师了。

十一月七日是俄国十月革命节，我们在甘泉县驻地套塘口开运动大会，全面检查了部队的军事、政治、文化和体

育训练素质。这是我们从中央苏区就有的传统作法，那时多是选在“五一”或“八一”开，长征以来没有机会开，所以这次开得很热闹，把开展革命竞赛的风气，带到了陕北高原。在这次运动会以前，奉中央军委命令恢复一军团建制。仍由林彪任军团长，我任政委，左权任参谋长，朱瑞任政治部主任。这个新恢复的一军团，实际上是一、三军团的合并，为了继承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会师的光荣传统，保留和沿用了一军团的番号。新恢复的一军团，下属二师和四师，第一团和第十三团，过一个月以后又恢复了一师的建制。所以这次运动会结束时，我站在一个八仙桌上，面对全军团的部队讲了一次话，对比赛作了讲评，并强调要互相学习，特别要注意向四师和十三团的同志们学习，他们过去是三军团和红七军的，他们有许多好作风，原一军团的同志要好好学习。

两天以后，中央在象鼻子湾召开全军干部会议。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等同志，先后到达会场。毛泽东同志对长征作了总结。他首先对大家说，“同志们，辛苦了！”引起会场上一片热烈的掌声。接着，他说：我们从瑞金算起，总共走了三百六十七天。我们走过了闽、赣、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十一个省，经过了五岭山脉、湘江、乌江、大渡河以及雪山草地等万水千山，攻下许多城镇，最多的走了两万五千里。这是一次真正的前所未有的长征。敌人总想消灭我们，我们并没有被消灭，

现在，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它将载入史册。我们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是八万人，现在只剩下一万人了，留下的是革命的精华，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了。今后，我们红军将要与陕北人民团结在一起，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任务！

长征，在人类历史上确实是前所未有的，是极其伟大的。它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早已成为不朽的英雄史诗。它不仅是我党我军的光荣和骄傲，也是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的光荣和骄傲，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长征的胜利说明了一个真理：农民起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近代的革命运动没有共产党的领导，都是不能成功的。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军队才形成一支战无不胜的铁流；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之所以取得最后胜利，各路红军始终未被敌人所扑灭，就集中地说明了这一点。

十八、打直罗镇，献奠基礼

一九三五年的十一月，陕北高原早已是雪花飘飘了。由徐海东同志率领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与刘志丹同志领导的红二十七军合编为十五军团。一军团和十五军团合称为第一方面军。此外，尚有陕北地方主力部队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八军。同时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也宣布成立，

由毛泽东同志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同志任副主席，统一指挥红军作战。红军在陕北的阵容大振。这时候蒋介石胁迫东北军组织了五个师，向陕北苏区进攻，企图合围我军于葫芦河与洛河之间的地区而消灭之。敌南路六十七军王以哲的一一七师，沿洛川、郿县(今富县)大道北上。敌西路由五十七军董英斌率领一〇九、一〇六、一〇八、一一一等四个师，从甘肃庆阳、合水沿葫芦河向郿县方向前进。其先头两个师，一〇九师和一〇六师，十一月初占领了太白镇以后又占领了黑水寺，有向直罗镇方向前进的模样。这两个师就成为毛泽东同志选中歼灭的目标。歼灭地点就预先选定在直罗镇。

这是一个严寒的冬天，而一军团当时尚缺两千多套棉衣补给不上，部队在陕北透骨钻心的寒风中致病送医院的先后达千余人次。部队靠士气旺盛御寒，寄希望于打一个胜仗解决棉衣等军需、给养问题。

毛泽东同志亲自指挥红十五军团和一军团打了这一漂亮的歼灭战。十一月五日，毛泽东同志就要我和林彪到象鼻子湾军委总部开会，确定了打直罗镇战役的总的决心，开始研究制定战役计划。战役发起的前两天，毛泽东同志即组织十五军团和一军团团以上的干部在张村驿会合，到直罗镇西南面的小山头上看地形，研究具体部署。直罗镇是一个不到百户人家的小镇子，三面环山，镇子的北面有一条小河流过，镇子的东头有座古老的破寨子。大家认为把

敌人放进直罗镇歼灭，地形对我十分有利。

二十日下午，在我们小部队节节抗击下，敌人进了直罗镇。先开进直罗镇的是敌人的一〇九师的三个团和一一一师的一个团，后面的一〇六师开到黑水寺附近，就不太敢向前进了。于是一〇九师就成为我们先歼灭的对象。

规定接敌的那一天晚上，我们一军团走错了路，毛泽东同志比我们还先到。我们带着部队到达时，他说：“唉呀，我等你们好久了，你们怎么现在才到。”于是，赶紧按预先区分的任务，开进接敌。

整个的部署是按毛泽东同志“要的是歼灭战”的指导思想部署的。十五军团基本上是由南向北，一军团是由北向南，当天夜间从四面八方包围了直罗镇。

一军团的二师和四师都参加了这次战斗。当时进到直罗镇的敌人部署是，在河北面是一〇九师的两个团和师直属队，另两个团在河南。我军的大体部署是这样的：十三团配合十五军团从药埠头以北地区，由南向北拦头突击敌人，四师一个团直插黑水寺，一方面堵住敌人的退路，一方面钳制黑水寺的敌人。二师第一团及四师另两个团由北向南直接攻击直罗镇的敌军。

毛泽东同志的指挥所设在北山坡吴家台北端高地几个破窑洞附近，直接观察战场情况，指挥战斗。彭德怀司令、徐海东军团长则指挥十五军团和十三团；我和林彪跟随一军团主力，直接指挥作战。十一月二十一日拂晓前五时半，

我们已部署完毕，拂晓发起战斗。冲锋号一响，山鸣谷应，千军万马，直冲敌人营垒。冲杀拼刺之声震天。打到上午十一时左右，二师已攻入直罗镇，十五军团也将敌人设在南面山上的阵地攻破。敌人在天上虽然有六架飞机耀武扬威，但是地面的指挥体系已被打乱。不过敌人还想垂死挣扎。打到中午，忽然上来一股敌人，约摸有一团人的样子，直向一军团指挥部所在的山头上冲来，企图向西突围出去。敌人向我们越逼越近。这个阵地，原来我们是命令二师陈光带一个团来占领的。可是他们还没有到达，敌人就上来了，我们只得带着直属部队，面对面地阻击敌人。我们当时身边只有一个警卫排，将警卫连派去保卫毛泽东同志去了。我们命令这个警卫排就地死守。左权参谋长叫通讯员赶紧把侦察连、工兵连调上来。还命令直属队所有的人都拿起枪进入阵地，保证不叫敌人冲出去。可是直属部队没有充足的子弹，每人才只有四发，而且警卫排又没有长枪，只有用驳壳枪射击敌人。战斗打得十分艰苦。我的一个老警卫员叫孙起锋，差不多是从江西瑞金参军以后就跟着我的，这次就在离我不远的阵地上在冲锋时中弹牺牲了。直到后来，还是警卫连上来了，我才带着这个连将冲上来的敌人压下山去。为了表彰孙起锋同志的英勇，我后来将他牺牲时背的一只带血的图囊一直保存着，直到进北京，交给了军事博物馆。直罗镇上的战斗，打到这一天中午，敌人河北一〇九师的两个团和其师直属队被我全部歼灭，无

一漏网。镇子东头那座破土围子等地的敌人，二十三日突围，也被我十五军团在追击途中将其消灭。

在这次战斗中，四团代政委黄甦同志英勇牺牲了。他是省港罢工的纠察队长，参加过广州起义和左右江起义，任过八军团政委，是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军委本已决定：或者将他调到一个新单位去任政委，或者到中央去工作。他本人也知道马上就要离任。可是他坚决要求等打完这一仗再去就任新职。他是一位很好的同志，这次不幸中弹，为革命过早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解决直罗镇之敌以后，我们回头北进，想消灭黑水寺的一〇六师。一〇六师得知直罗镇一〇九师被歼，立即逃跑。林彪有事，毛泽东同志命我带一军团追击。当时雪大路滑，我一直跟着前面的部队，追到了太白镇，消灭了敌人一个团。一〇六师师长沈克过去跟我们有些关系，毛泽东同志要我在前线释放几个俘虏军官，并捎话，只要东北军同意反蒋抗日，与红军停战，我们俘虏的人枪，日后可以如数归还。在太白附近，通过一〇六师我地下党员在中间传话，与沈克谈判几次，沈克吞吞吐吐，始终不予明确答复。毛泽东同志认为再谈无益。我们一军团就奉命撤回。这次战役，俘虏的敌人真不少。后来我们对这些俘虏进行教育后，将他们都放回去了。这对于日后争取东北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好的作用。

整个直罗镇歼灭战的结果是：敌一〇九师被歼灭，师

长牛元峰被击毙，还捉住敌人一个名叫高福源的团长。我军共俘虏敌人五千三百多名，打死打伤敌一千多人，缴获长短枪三千五百多支、轻机枪一百七十六挺、迫击炮八门、无线电台两架、子弹二十二万多发，大大地改善了红军的装备。

受此惨重打击，敌一〇六师的残部和董英斌的另外两个师不得不退回甘肃合水县。敌东路的一一七师也不得不退出郿县。

直罗镇战役结束以后，十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同志在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上，对直罗镇战役胜利的经验 and 意义作了详细的总结。大家很受鼓舞。以后毛泽东同志在评价这次战斗时又说：“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我们荣幸地参加了这个奠基礼。

打完直罗镇以后，林彪情绪高一些了，话也略多一些了。但是他对中央的路线终归是不满意的。他平时又是一个不爱讲话的人，和他共事，推心置腹地交换一些意见，有时感到困难。往好处想他，这个人似乎很深沉，往坏处想他，又觉得他很阴沉甚至有些鹰鹫。我们初到陕北，看到陕北一些荒凉衰败景象，一般稍有头脑的同志，都能理解这是统治阶级多年残酷统治压迫剥削的结果，同时也是

多年战争来回拉锯造成的必然景象。只要路线纠正了，加强建设，根据地是可以逐渐恢复过来的。可是林彪见了很悲观。他不止一次地流露，要带一些部队去陕南打游击。十二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召开瓦窑堡会议以前，曾征求军团领导干部对战略问题的意见。林彪在信中就正式向中央提出，要到陕南去打游击，说这比在陕北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更重要，而且要求把红军主要干部调出，由他带领到陕南打游击。这封信当即受到毛泽东同志的批评，认为他同中央有分歧，要他改变主意，但他仍不死心。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他还在一封电报中和中央软磨，说“我还在期待中央批准我打游击战争”。我劝他说：我们只有这样一点部队，只保存这么一点骨干，你能带多少去呢？你带多了我们这里能维持下去吗？我们这个根据地能不能巩固呢？我说：你不要看到目前这几个破窑洞，它终归是个根据地，是我们的落脚点。我们不是经过两万五千里才找到了这几个破窑洞吗！你去陕南，搞不好，连破窑洞也找不到。你别以为陕南四方面军曾经从那里经过，打过游击战，条件会好，我看综合各方面条件来看，不见得一定会强过陕北。对我的劝说，他根本听不进去，以后态度一直比较消沉。

第三章 在 陕 北

十九、东 征

直罗镇战斗以后，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被我们粉碎了。顿时间，阎锡山的队伍不敢来了，张学良的队伍也不敢来了。相反地，张学良和东北军的许多部队有些动摇，我们俘虏的那些团长以下的军官和士兵放回去以后，首先在宣传上起了很大的作用，至少使广大的流亡关内的东北军，知道红军是个什么样的队伍，这个队伍执行的是什么样的政策，知道红军是主张抗日的，是压根儿不愿打内战的，对东北军的处境是很同情的。我们在东北军中的党组织，在它的上、下层各类人员中都做了很多工作。西北军也一样，和我们早就有关系。当然最根本的，是红军有战斗力，足以粉碎任何进攻。他们知道了这一点，所以不敢来了。同时，这时候陕北党组织的错误路线由于中央的到来，毛泽东同志向他们做了艰苦的工作，已得到初步纠正。刘志丹同志等已从冤狱中释放出来了。陕北根据地呈现了稳定的局面。

陕北根据地面积不算小，可是的确太“穷”。人口有限，出产不丰。即使陕北群众都踊跃交公粮，能养活得起这么多部队吗？再说，我们也不能都蹲在陕北吃老米，得向外

发展，波浪式地向外发展呀，要抗日，要革命，队伍总得有个前进阵地和供给粮草的后方呀！那个时候的陕北，向北没有地方去，是沙漠地带。向西也是沙漠的边边，是回族聚居区，没有多少人口，而且蒋介石嫡系部队正纷纷向这个地区集中。向南也没有地方好去，西安是国民党在西北的大本营。只有向东——一切找阎锡山要去！如果在山西有了立脚点，再向东进打日本就好办了。向东就是河北省。河北阜平一带有过暴动，总不至于没有留下一点工作基础吧，何况平津一带又不断掀起学生抗日爱国高潮，我们向东去是可以互相策应、互相配合的。

一九三六年一月三十一日，军委在延长开会研究战略方针，我和林彪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关于战略方针问题，在党内领导层中早就有所争论。争论的焦点归结起来讲，就是如何处理好巩固与发展的关系。有人讲，目前我们刚到陕北，刚立住脚，是巩固一段时间再往前发展呢，还是马上去发展呢？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在发展中也可以巩固。至于向什么方向发展，瓦窑堡会议之前，许多同志提出过不同的建议。有的主张往西，向宁夏发展；有的主张往北，向内蒙发展，以便背靠苏联；也有的要先往南，打击东北军、西北军的力量，以求巩固陕北苏区。前面说了，林彪的意见是要到陕南去打游击。瓦窑堡政治局会议十二月二十三日通过了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了“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的方针，红军作战的主要目标应该是

汉奸卖国贼的军队，并注意要大力扩大红军。一方面军要把军事行动放在“打通抗日路线”、“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项任务之上。具体步骤是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与北边的绥远等省去。这个决议发布后，多数同志同意战略方向向东，但有的同志仍怕红军主力东进后，陕北根据地可能丧失。有的同志则提出了所谓张学良抗日不反蒋，阎锡山反蒋不抗日，我们的主要敌人是蒋介石，因此我们仍应南下，或者东进只作佯攻，目的是吸引阎锡山在陕北的四个旅回援山西，在运动中消灭它。李德则在所谓“对战略的意见书”中，诬蔑毛泽东同志东进是想要挑起苏日战争。因此，毛泽东同志在延长会议上反复说明阎锡山与日寇正勾勾搭搭，东征讨阎无论政治上军事上都对我们有利，我们执行的是“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希望通过东征能建立一块根据地，与陕北苏区连接，在山西“筹款”、“扩红”以解决陕北根据地“太穷”的问题。经毛泽东同志说明，大家原则上都同意东征，但仍然担心黄河天险，渡过去后有没有回不来的可能。于是毛泽东同志又作了补充，就是一定要保证黄河各渡口在我手中，使我们进退有据。参加会议的同志最后同意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执行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向东求发展，当然也不是很容易的。阎锡山是山西的土皇帝，他从清朝末年在山西当都督到民国当省主席和绥靖主任，统治山西几十年，他有他的社会基础。阎锡山当时有部队八万人，有自己的

兵工厂。他一听说红军到了陕北，就沿黄河东岸十多个县，构筑了高碉暗堡，在山西普遍推行闾甲制度。这都会给我们红军东渡造成很大困难。

当然，既然决定东征，我们也是作了充分准备的。

一九三六年一月中旬，一军团先遣军在陕北延长县临镇一带休整待命，并不断地开展练兵。移防到那里，练兵练到那里。从政治思想，到战术技术，直到组织编制，都在进行整顿。

一月二十八日，一军团在临镇举行东征誓师大会。这时的一军团，已恢复了三个师的建制。即二师（师长刘亚楼，政委肖华）、四师（师长彭雪枫，政委张爱萍），此外又恢复了一师的建制。一师由陈赓同志任师长，杨成武同志任政委。战斗力显然又加强了。

整个东征军命名为抗日先锋军，由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亲自指挥，野战司令员彭德怀同志协助。开始，兵分两路。彭德怀率一军团为左路军。徐海东的第十五军团和刘志丹的第二十八军为右路军。两路军都厉兵秣马，准备打过黄河去。

厉兵秣马，自然是指的起码的准备工作，包括渡河演习等等。更重要的是政策思想准备。中央这时，从毛泽东同志来说，已进一步肯定，过去中央苏区后期的许多政策是王明“左”倾路线的产物。我们这次进入山西，再不能象在中央苏区后期那样搞法了。这次东征，中央根据十二月

二十五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所制订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对俘虏、商人、富农、小地主的政策，都有些新的精神，新的规定。比中央苏区后期宽多了。创建根据地，政策是关键。我们自己从中央苏区出来以后，也深深地体会到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在这方面过去经验教训都不少。如果在创建一块根据地时犯了错误，把打击面搞宽了，为敌人所利用，我们被迫退了出来，以后重新进入再图恢复，往往比创建时还要困难。所以这次东征之前，我们在政策教育上抓得很紧，毛泽东同志也督促得紧。在临渡河之前，二月十日，他还专门给我和林彪发来电报。指示：“政治上解释新策略，着重于对俘虏，对商人，对富农，对小地主。”并询问部队对这方面“具体政策了解如何，即告”。我们在这些政策教育方面，当然更不敢马虎。

一九三六年二月，毛泽东同志在延长县古峪村——一方面军司令部即抗日先锋队司令部所在地，召集团以上干部进一步作动员，讲东征形势与任务。明确了东征的任务有三条：一是到外线打击卖国贼阎锡山，并调动他在陕北的四个旅的兵力，借以粉碎敌人对陕甘边区新的“围剿”；二是配合北平“一·二九”学生抗日爱国运动和全国反内战高潮；三是壮大自己的力量，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

先锋队司令部对渡河工作做了充分的准备。在此之前，

林彪曾经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意图到黄河西岸各地进行侦察，开始想由冰上渡河，因为这一年天气回暖较早，黄河提前化冰，遂决定改由船渡。渡河工作，接受了长征的经验，组织得很严密。一军团的两个渡河点都选在绥德以东，沟口附近。强调渡河要有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时间。

统一的时间，在当时做到也是不容易的。因为当时指挥员所用的都是作战缴获来的破旧表，快慢不一。那时又不象现在可以通过广播校对时针。所以部队经常为遵守时间是否准时发生争执。有时上级批评下级迟到，下级不服，说照我的表我们还算提早到达哩！为了防止扯皮，规定了一项制度：每天定时向上级司令部机关对表。当时，部队中还流行这样一句俏皮话，说谁的“官”大谁的表准。这次渡河，毛泽东同志和我开了一次玩笑。十九日他向部队发了一个电报：“渡河时间不可参差，一律二十号二十时开始，以聂荣臻之表为准。”我的一只旧表居然成了这次渡河的标准表了。

渡河前夕，一军团隐蔽集结在黄河西岸沟口附近，秘密而紧张地做好了渡河前的准备工作。所有集结和开进地域都封锁消息，部队行动一律在夜晚进行，对大的居民点，都是绕道通过。二十日晚二十时，准时地展开了敌前偷渡。

二师五团是这次渡黄河左翼的先遣队。先遣队先将小

船由通向黄河的小川里悄悄地滑出来，滑到了水深处，然后人乘上去直奔黄河中流。当夜，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只见人影绰绰，大家都压低嗓音说话，显得很肃静。只听见黄河咆哮和河里冰块撞击木船的声音。木船渐渐划向对岸，划着划着，突然对岸发出了一阵猛烈的枪声。战斗打响了，偷渡变成强渡，木船也加快了速度，很快靠岸了。我们冲上去，手榴弹加拼刺刀，敌人的河防被突破了。

渡河成功后，我们立即发布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命令”，通电全国。

渡河部队于二十一日拂晓占领三交镇，全歼敌人一个营。二十二日一军团的部队已全部渡过了河并乘胜占领了留誉镇。开始我们奉命在留誉镇地区开辟作战根据地。到二十六日，阎锡山组织一部分兵力向留誉到石楼一线我军占领地区进行反击，企图防堵我东进和把我赶回河西去。我们一军团主动东进迎敌，在关上村截住了敌独立第二旅。这个旅共两个团，我们先截断了旅部、第三团与已进关上村的第四团的联系，然后当天下午，我带四师、一师由北向东南包抄，林彪带二师由南向北包抄。敌人的旅部和第三团被击溃，向汾阳逃跑。第四团被包围在关上村，我们黄昏发起攻击，经过大半夜的激战，在雪后朦胧的夜色中，全歼了这个团的敌人。俘虏官兵四百余人，缴步枪二百多支，山炮三门，打了东渡以后第一个胜仗。后来听说，敌独二旅旅长回去后被阎锡山撤了职。与此同时，十五军团

也打退了阎敌向石楼地区的进攻。这样我们就在河东初步站稳了脚根。三月上旬，我军越过吕梁山，进至兑久峪一带，逼近了同蒲线。阎锡山调集了十四个旅的兵力，分别由中阳、汾阳、介休、隰县地区编成四个纵队，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向我发起第一次反击。在兑久峪地区，敌人集结了两个纵队，一共来了三个师和一个炮兵旅，共十四个团，我们毙伤敌约两个团，将进攻之敌击溃。当时要一下消灭这么多的敌人是做不到的，毛泽东同志决定撤退。

随后，毛泽东同志召集团以上干部在大麦郊开会，决定十五军团前伸至文水、交城县境，向太原方向佯攻。三月中旬，前锋一度进占离太原只有二十五公里的晋祠，以此掩护我一军团南下，进入汾河地区开展工作。三月下旬，又兵分三路。十五军团为左路军，北伸至苛岚、岚县。二十八军和三十军为中路军，活动在石楼、中阳、午城等地，刘志丹同志就是四月份在中阳三交镇作战中牺牲的。一军团和十五军团的八十一师为右路军，趁敌人注意力集中在我渡河地域的时机，直插敌兵力空虚的汾河流域。一军团在二十余天时间内，突破了敌汾河一带的堡垒线。沿着同蒲路两侧，先后围困了霍县、赵城、洪洞、浮山，敌人不敢出来，我们也没有打这些城市，就在附近筹款，打土豪，发动群众参加红军。四月初，二师攻克了襄陵镇和侯马镇，攻占襄陵时我们还活捉了阎锡山的一名县长。一师占领了史村、汾城。

在霍县城外，有一处大军阀的宅第，十分阔绰，我们军团部住在那里。敌人飞机来轰炸，我们刚一离开那所房子，那所房子就被敌机炸掉了。真险！

汾河流域是有名的富庶地区。在这一带，我们红军才真正见到北方封建大地主是个什么样子。在陕北，一谈起地主来，往往说他家有多少孔石窑，多少垧地，多少群羊。在山西汾河流域，我们看到地主除土地、羊群以外，往往宅第连云，几乎占半拉村子，有的地主家有多少套大车，养着几十匹一色骡马，连一匹杂色的也没有，十分阔绰。商业资本也很发达，可是封建性很大，开钱庄当铺的不少，高利贷剥削穷人十分猖獗。许多破产农民只好赤身露体下煤窑挖煤。我们在这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没收汉奸财产，筹了不少款子。山西老财都会把金银财宝埋在地下窖起来。部队在这里也学会了敲打地面听声响判断窖藏所在地的方法，还收缴了不少鸦片烟土，没收了一些当铺的不义之财，充实了抗日军费。我们在这一带经过宣传发动，群众报名参加红军的很踊跃，光四师就扩红一千三百多人，全军团共扩红约五千多人。

红军由陕北进入山西，算是进入了一个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这一带离北平、天津比较近，从平津沪流入的抗日救亡报刊杂志不少，红军收集了很多。我们从中进一步看到，中国民气很盛，中华民族不可侮，中国的抗日高潮是一定会到来的。

我们本来还想进一步向太行山长治一带前进。北方的学生运动是很活跃的，想配合一下，向北发展，开拓一块根据地。可是这时候，蒋介石的部队，配合阎锡山，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过来了。

四月中旬，蒋介石派了十个师，分两路进入山西，一路五个师自潼关北上，另一路五个师沿正太路西进。阎锡山也派了五个师、两个旅由晋中向南共编成七路纵队，向我军压过来。黄河以西陕西境内的东北军、西北军部队，在蒋介石驱使下也企图沿河北上，卡住黄河渡口。企图消灭我于隰县、石楼地区。

我们奉毛泽东同志命令，决定撤回陕北。撤退以前，在蒲县附近抓住给国民党当先遣队的关麟征的骑兵，趁他们正在睡觉之时，我们一个袭击，就消灭了它一个骑兵连，给了他一点教训，他就往后退了。随后，我一师向稷山、新绛经吉县后撤，四月十五日顺便把吉县打开了，俘敌保卫团稽查队等三百余人，又抓住了敌人一个县长，缴获了不少鸦片烟。与关麟征作战，我军也受过一些损失，苏家坪战斗，我二师参谋长钟学高阵亡。

五月三日和四日，一军团在清水关、铁罗关两渡口西渡黄河，毛泽东同志带着一部电台，坚持在河东指挥全军渡河到最后。恩来同志特地从瓦窑堡赶来迎接远道归来的红军。战绩是令人鼓舞的。抗日先锋军在东征七十五天的成绩统计是：共歼敌一万七千余人，筹款四十万元，扩充

新兵七千人左右。更重要的是，阎锡山把伸入陕北绥德、米脂的四个旅调回山西，减轻了对陕北根据地的压力。最主要的收获还是政治上的收获，中国工农红军把抗日的大旗插到了黄河以东，推动了华北以至全国的抗日高潮，为以后八路军从山西继续北上抗日造成有利条件。总结起来，教训也有：在东渡之后，战线拖得太长，部队撒得太宽，没有突出重点。否则战绩还会更大一些。

我至今还记得东征时唱的一首歌：“密云遮星光，万山乱纵横，黄河上渡过了抗日英雄们……”即使我如今到了垂暮之年，每当哼这首歌时，仍使我豪情激荡，不能抑止。

二十、西征和红军三大主力会师

一军团返回陕北以后，驻在延川县城西的文安驿一带休整。

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四日，一方面军在大相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东征，动员西征。

我和林彪带着一军团团以上干部，徐海东和程子华同志带着十五军团团以上干部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毛泽东同志作了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中央书记洛甫和彭德怀司令员都讲了话。博古同志也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东征时肯定了成绩，指出了缺点。

会议指出，我们一军团的主要缺点是本位主义倾向。这一缺点，主要应该由我负责。因为我是政治委员，这个

“舵”没有掌好，应该受批评。而且，我知道这对全军也有很大的教育意义。所以，我也主动作了自我批评。

随后不久，中央颁发新的任命：林彪调到红军大学当校长，任命左权同志任一军团代理军团长，我仍任政委。

我们欢送了林彪。分别前，我们互相征求了意见。本来，我对林彪在大相寺会议上所抱的不吭气的态度是有意见的。一军团犯的本位主义还起因于他。东征时，十五军团在北线打仗伤亡比较大，再加上他们是在山区活动，筹款、扩兵都不多。那时，毛泽东同志打电报来，要我们拨点兵给十五军团。林彪气呼呼地把电报一摔，说：有鸟的几个兵！我拿过电报来，找到下边一些同志了解了一些情况。下边的同志也都反映有困难。一军团有的连队也不充实，有的连应有的班的建制都编不全。我当时也想不拔或少拨一点，也有本位主义思想。后来我们打了个电报给毛泽东同志，请求免拨。所以在在大相寺会议上，我作了自我批评。而林彪却一声不吭，一点自我批评精神都没有。但是我又觉得事情反正已经过去了，特别在他临走之前，我们应该多看到他在一军团工作上的建树和成绩，就没有向他提出来。可是他对于我们过去发生的一些争论，仍耿耿于怀。他归结说：“我们在一起搞了好几年，现在要分手了。过去我们之所以发生分歧，你是从组织上来考虑的，我是从政治上考虑的。”我回答他说：“你这个说法不对。你把政治上和组织上绝对对立起来，完全不对头。我们之间

争论的许多问题，都是政治问题。你现在要走了，现在又扯这些问题，扯几天也扯不清。还是等以后有机会再慢慢扯吧。今天我们主要是欢送你。”

关于西征问题，毛泽东同志早在四月二十八日西渡黄河之前就给我们一军团、十五军团领导人来电报，说明在山西继续作战已不利，神木、府谷、三边地区敌兵力空虚，可以作为新的进军方向。东征回师以后，政治局开会决定，我军主力向西，到黄河以南陕甘大道以北地区西征作战。毛泽东同志在动员时着重说明西征的三大任务是：扩大新苏区，扩大红军，打击马鸿逵、马鸿宾的封建势力。以此来促成我陕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我们与东北军、西北军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五月十八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同志又在大相寺联名发布了西征战役计划。

西征开始，我们一军团为左路军。执行西征第一战役的目的，是夺取陇东的曲子镇、环县，扩大苏区，配合右路军十五军团钳击三边和宁夏一线敌人。我们首先遇到的是驻在曲子镇和庆阳一带的马鸿宾的一个师，和马鸿逵第一〇五骑兵旅的骑兵。一〇五骑兵旅旅长冶成章，外号叫野骡子。六月一日，我们攻击曲子镇，适逢他带着一部分骑兵到环县去，在曲子镇宿营。他性情暴躁，打仗慍悍，欺压群众十分野蛮。人们传说他是：“一对骡子，一对马，一对老婆，一对娃。”我们一到，二师师长杨得志和政委肖华就急令先头团二团团长沙兴初带着部队将曲子镇包围

了。然后由二团主攻五团助攻，攻坚战就开始了。曲子镇是座土城，方圆不过二华里，野骡子守得十分顽强，我们一度攻进了城堡，被野骡子和他的警卫部队打出来了。那时二师东征扩充了一些新战士，没有打过仗，新提升的一些干部也没有打巷战的经验。只知拼命往城里攻，刚打开一个缺口就几乎全团都向里冲。可是从上午攻到中午，仍未解决战斗。我和左权同志到阵地一看，看出攻击的方法不对头。我告诉他们赶紧把突破口坚决守住，同时把其他部队撤下来，在城墙隐蔽地点进行整顿，不要一下子都涌进城。只要将兵力火力组织好，派一个连打进城去就行了。进城的连队，也不必过于集中，几个排互相掩护，交替前进。进去人太多，反而展不开，招至无谓的伤亡。经过改进战术，打到下午四时半，二团一个连攻进去了，其他部队随后跟进，野骡子退守西北角的大碉堡。担任助攻的五团也由团长曾国华、政委陈雄带领，攻入西北城角。二、五团互相配合，边打边开展战场喊话，敌人放下了武器，捉住了野骡子。在打的过程中，有人产生了动摇，说打不下来就算了，部队可以绕道前进。我说不行。这一仗不消灭它，我们的威风就会大减。敌人会说，你们连野骡子都收拾不了，还前来干什么呀，反过来会欺负我们。结果曲子镇还是打下来了。第二天，我们就向庆阳方向前进。庆阳的敌人是马鸿宾的一个师，共两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我们是打还是不打？有的人又不主张打。我到达的时候，左权

同志正和部队的干部研究。有好多人说要打，也有好多人说不打。我说一定要打，不打，就等于向敌人示弱。这一仗打胜了，敌人就会闻风丧胆，我们在这一带就有了行动自由。最后还是决定打庆阳。六月三日，我们在曲子镇以南的阜城附近与马鸿宾来驰援曲子镇的六个营的敌人遭遇，被我们主力击溃，俘虏敌人一千一百多名，内有营副、连长多名。但营长以上的一个没有，因为二马的部队有个特点，营长以上的大多是他的亲戚，这些家伙怕死，听说红军来了，都留在庆阳，不敢随军行动。我军在击溃了马鸿宾的两个步兵团以后，就继续向庆阳前进，结果马鸿宾的那个骑兵团突围逃跑了。经过这两仗，我们的军威大振，向西向北挺进，如入无人之境。一军团先后占领了木钵、环县、洪德等城镇。

六月下旬，西征进入第二战役，一军团受领的任务是进入陇东的靖远、海源县境。部队继续西进，一路是很苦的。这一带十分荒凉。炎夏行军，到处一片黄土，有时走几十里地，头上赤阳曝晒，脚下热沙灼烤，想找几棵树休息都很难。晚上行军本来比较舒适，可是这地方昼夜温差很大。到了夜间气候太冷，部队有时不得不拣牛粪燃篝火防寒。尤其是好些地方都是苦水区，给部队造成很大困难。有些地方要到十几里以外去驮水吃，有些地方地势太高，根本没有水源，要靠冬天窖下的雪水和雨季的积水维持生活。很多地方看着河水很清，但不能吃，是苦的。吃苦水，

连牲口也要拉稀。吃窖水也很不清洁，有时发现其中有人畜粪便没有清除，但没有办法啊，只能吃那个水。

部队前进到宁夏的固原、海原一带，我们有意识地不过早接近西兰公路，就地整训，筹粮筹款，做群众工作，不过早地惊动敌人。

这时期，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已经提到重要工作日程。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同志几次下达政治工作指示，讲得很明确：“开展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是我们西征中的战斗任务之一，是和我们消灭敌人战斗任务一样重要。”所以一军团无论是做群众工作、白军工作、回民工作，都是贯彻抗日统一战线精神。对于没有民愤的小地主，一般商人，和东征时一样，执行比较宽大的政策。为了防止滥打土豪，规定除单独行动的连队外，一般连队均无打土豪之权，一律由政治机关协同地方政权统一办理。要防止错没收，如果没有调查清楚，宁可少没收一家。也可将没收改为募捐抗日经费的方式。在回民工作中，明确提出反对大汉族主义，承认回民的民族自决权，凡是红军协助组织起来的回民革命政权，承认它是区乡县的自治政府。对尊重回民风俗习惯，又作了更严格的规定。工作做得比过去更细了，团结的基础更扩大了。

这个时期最突出的是对白军的统一战线工作。野战军政治部要求我们做到，“使每个指战员深刻的认识：要争取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不仅仅是依靠红军打天下，而且要争

取白军到我们这边来。”在这方面，一军团各级政治机关做了大量的工作。马鸿宾本来是我们西征的主要作战对象，我们在第一个战役中就把他的主力消灭了。但是我们仍然是一面作战，一面争取他们。曲子镇的战斗，不只是打的军事仗，也打了政治仗。曲子镇战斗之所以能取得胜利，一方面是改进了战术，另一方面也是在战场上开展政治攻势取得的成果。我们攻进去以后，敌人退守西北一隅顽抗，我们进行战场喊话，晓以民族大义，要他们不要把枪口对着红军，和我们一致抗日，残敌终于全部放下武器。这次战斗不仅捉住了敌第一〇五旅旅长，该旅姓杨的副旅长也成了我们的俘虏，不过他混在伤俘一起被我们释放了。其实，他若不这样，我们也会释放他的。旅长这次腿部负伤，我们派医生给他治疗；他的小老婆藏在浅水井中，被我们打水的伙夫发现，捞上来以后，她两手满是戴的金戒指，也无人摘她的。最后将他们一起放走了。第一次战役的俘虏兵，除自愿参加红军的以外，都经过抗日统一战线的教育，当兵的发三、五元，当官的发十元，都放走了。还给马鸿宾和其他几个旅长写了争取信，托他们带回去。对其他马家骑兵也都极力争取。那时，邓宝珊的新一军驻榆中、定西、静宁、靖远一带，我们也很注意争取。我们曾数次派遣俘虏和与邓部有关系的军官，给邓部带信去。信是署政治部的名义，重要的对象则由我署名。在曲子镇俘虏了一名在邓部工作过的参谋，我们送到野战军司令部

去了，后被派去与邓接洽。

西北军是我们进行抗日统一战线的重点之一，当时的口号是“杨虎城不打红军，红军不打杨虎城”。不过，这次西征没有遇到杨虎城的部队。对东北军则是我们工作重点的重点，以政治争取为主。在六盘山附近，我们和东北军何柱国的骑兵第一师和骑兵第六师接过火，消灭过他们的几个骑兵连。不过打是为了争取，我们几次把缴获的人员和缴获的马匹都给他们送回去了。我们对骑兵第六师进行的工作是很成功的。多次对他们进行战场喊话，半夜到他们营地附近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等救亡歌曲，甚至发展到战场联欢，与他们暗中签订停战协定。这都推动了日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

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我们确实下了功夫。在北京卫戍区当过副司令的李钟奇同志，就是西征时起义过来的。他当时任东北军骑兵连长，起义过来后在一军团骑兵团当参谋长。我们还俘虏过东北军的一个骑兵团长，经过教育，当时就放了回去，但这件事被胡宗南知道了，逼着张学良把这个骑兵团长枪毙了。

七月底，一军团集结在陇东的预旺堡。这一带饮水烧柴都很困难，所谓集结，其实都离得很远。军团部在预旺堡，二师集结在预旺堡及其以西地区，一师在预旺堡以南九十里之梨花咀，四师则在预旺堡东南八十里之毛居井。八月一日，各师动员整训，准备迎接将要到来的更加艰巨

的任务。二日召开团以上干部会，总结西征以来完成任务的情况和经验教训，布置开展革命大竞赛，预定在纪念“九一八”时全军团大检阅。

预旺堡整训期间，在我记忆中还有两件可记的插曲。

第一件是，美国记者斯诺和医生马海德，在黄华同志陪同下，到了预旺堡。斯诺在采访时，给一军团照了好些照片。又有不少人请马海德同志看病。部队头一次见到美国友人，大家是很热情的。

第二件是，我的妻子张瑞华同志辗转前来看我了。她来时，我还在前线，左权同志派人把我叫回预旺堡。张瑞华经组织安排，用了几个月的时间，由上海经天津、陕西澄城、西安辗转到达当时的中央所在地保安。一到保安，组织上就安排她到预旺堡一军团军团部来看望我。在这极其艰苦的岁月里，我们阔别了五年之久。听她讲述别后的情况，我才知道我们离开上海后，坚持上海地下工作的同志，经历了更加残酷的斗争，许多同志被捕，受尽酷刑，有的坐牢，有的英勇牺牲。使我对战斗在白区的战友充满了怀念和崇敬之情。当时因军情紧迫，战斗频繁，张瑞华在预旺堡住了两天就回保安去了。

七月份，中央与四方面军又取得了联系，知道他们与二方面军一起正在经巴西等地向岷县方向北上。但中间张国焘又一再动摇，开始想经临夏在兰州以西渡过黄河，然后去新疆，以取得苏联援助，以后经中央一再劝说，和其

他同志的斗争、帮助，他才确定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师。

八月底，我们一军团和十五军团由预旺堡、同心城、黑城镇地区出发南下，以策应二、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一军团由我带领一师直插静宁、隆德地区。那时一师师长是陈赓同志，政委是杨勇同志。我们经过几天急行军，向西兰公路逼近。九月十八日，我第一团占领静宁县的界石铺。十月一日，友邻独立支队第七团的骑兵出敌不意攻克了会宁城，随后我一、二两个师配合十五军团七十三师又在城外击溃了前来增援的敌军两个团。五日，四方面军的三十一军占领通渭城。这就为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城会师创造了条件。十月八日，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到达界石铺。九日，朱德同志率领总司令部到达会宁。十日，一、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就在会宁举行了热烈的联欢会，大家都很高兴。二方面军也于十九日由贺龙、任弼时同志率领相继到达。一军团一师一团的部队参加了在会宁文庙前举行的庆祝大会，会上宣读了中央发来的贺电。欢呼声响遍会宁城。

会师时，我们看到四方面军的同志们都穿着单衣，在张国焘闹分裂后他们的艰苦历程是可想而知的。这时，我们早已为四方面军的同志每人操办了一件棉衣。当时一下子要搞到那么多棉衣，确实是件很困难的事情，除了向当地老乡购买棉花棉布以外，没有其他办法。只好劝说一些商人，让他们把运往新疆的棉花和一些皮毛留下，我们打

了收条，让他们向红军后勤部门去领取款项。

我没有见到张国焘，因为我们当时另有任务，把一师师长陈赓留下就出发了。陈赓过去在鄂豫皖当过师长，他和四方面军许多干部都比较熟，留下他来欢迎是最合适的人选。

这次张国焘率四方面军北上，朱德、伯承同志和二方面军的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同志是做了大量工作的。据我所知，中央和二方面军以前没有建立密码联系，中央为了引导二方面军到陕北来，曾用明码电报告诉二方面军，中央在陕北。这也为会师创造了条件。任弼时同志见到我们时，找我们问及头年张国焘和中央红军分手的情况，他问得很详细。但未表态，态度十分冷静。

会师后，我见到许多原先在一方面军工作过的同志。当时止不住热泪盈眶，悲喜交集。从他们口里，我才知道四方面军自从在草地和我们分手后，就在草地懋功等地转来转去，打天全、芦山也没有打下来。四方面军加上原先一方面军留下的五、九军团，由八万多人拖得只剩下四万人。这次北上，分左右两翼，而右翼二万多人又已在甘肃靖远渡过黄河向西去了。这就是后来所说的“西路军”。这次到达陕北的只有两个军。

我还从他们口中打听到原先在一军团当过师长的李聚奎同志，正在四方面军四军当参谋长。他的驻地离我们还颇有一段路程。我写了一封信，把党中央有关决定也一并附在其中，请了一位回民，骑了头毛驴给他送去，想不到

居然送到了，李聚奎同志还写来了回信。

二十一、山城堡战斗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不将西路军计算在内，总共只有三万人，可是力量集中了。

蒋介石不顾我党一再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急忙调了他的第一军、三军、三十七军和东北军的六十七军、骑兵军等五个军，分成四路，追击正在向海原、打拉池地区转移的红军主力。

很显然，敌人是想趁红军长途行军，刚到陕北，立足未稳，严冬已届，十分疲劳困顿之时，一举将我消灭。

当时，根据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我们的作战方针是：逐次转移，诱敌深入，尔后在预定的有利地区集中优势兵力，给敌人主力胡宗南第一军的四个师以歼灭性打击，对敌毛炳文的第三十七军和王均的第三军，相机予以打击；对东北军王以哲部则由于他们当时已有不愿继续打内战的倾向，并秘密地与我军建立了某些联系，故而采取了积极向其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

当我们转移到打拉池、海原地区稍事休整，向海原以北转移时，海原之敌马鸿逵的第三十五师和东北军的一个骑兵师曾向我侧后攻击。我一军团的一师和十五军团的七十三师曾予以坚决反击，在何家堡消灭了敌军两个团，俘虏了千余人，其余逃回海原。

当我军逐次转移到环县，隐蔽在山城堡附近时，敌人判断我军已向盐池方向撤退。胡宗南的第一军竟敢孤军深入，急速向惠安堡、盐池方向前进。其主力两个师直插盐池，十一月十九日侵占惠安堡，它的七十八师经预旺堡、古城，二十日侵占了山城堡。敌人企图从两翼合围我军于盐池以南地区。与此同时，东北军六十七军亦由预旺堡地区东进策应。

这真是打歼灭战的好机会。山城堡一带的地形对我们十分有利。我们隐蔽在山城堡南北地区，敌人没有发现。我们即在部队中反复动员，无论如何要打好这一仗。这一仗对于稳定和开展三大红军主力会合后的陕北战局有重大意义。而且不打也不行，如果不打，敌人一直跟上来，就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困难，我们是跟在二、四方面军后面负责掩护他们的。

当时的部署是：只要敌人一进山城堡，我们一军团由南面向山城堡进攻，徐海东同志率领十五军团从西面向山城堡西北方向进攻，以截断敌人退路，肖克同志率四方面军的三十一军从北面向山城堡进攻。在战场上，规定由一军团统一指挥。彭德怀同志是野战军司令员，总的都归他统率。

十一月十八日，下发了由三个方面军的领导人联合署名的《决战动员令》。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原文如下：

一、二、四方面军各兵团军事政治首长钧鉴：

从明日起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各首长务须以最坚决的决心，最负责的忠实与最吃苦耐劳的意志去执行。而且要谆谆告诉下级首长转告于全体战斗员，每人都照着你们的决心、忠忱与意志，服从命令，英勇作战，克服任何的困难，并准备连续的战斗，因为当前的这一个战争，关系于苏维埃，关系于中国，都是非常之大的，而敌人的弱点我们的优点又都是很多的。我们一定要不怕疲劳，要勇敢冲锋，多捉俘虏，多缴枪炮，粉碎这一进攻，开展新的局面，以作三个方面军会合于西北苏区的第一个赠献给胜利的全苏区的人民的礼物。

红军胜利万岁！

苏维埃胜利万岁！

抗日民族战争万岁！

毛泽东 张国焘 彭德怀 任弼时

朱 德 周恩来 贺 龙

整个作战详细过程，我在《结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仗——山城堡战斗》一文中已经都讲过了。我在这部回忆录中，再补充一点指挥上的情况和战斗花絮。

当时对究竟打不打这个仗，直到部队展开以后，还是处于“有争议”状态。不主张打的理由是我们的部队很疲劳

了，敌人侵占山城堡后，又抢修了一些野战工事，不打好。我说，现在我们部队都已经展开了，怎么还考虑打不打呢？好打也要打，不好打也要打。至于说到敌人抢修了一些野战工事，这是部队野战时驻下后的常规，没有听说一个部队驻在一个地方不构筑工事而能安心睡觉的；这种野战工事，都比较简单。我把这个意见向左权同志说清楚了，先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方开始打。后来，在几个部队接敌的过程中，又发生了锣齐鼓不齐的事。有的是因为当时通讯联络不好，产生了误会。有的说来说去还是个领导决心问题。尤其是当左权同志告诉我说，杨得志已经带着二师插下去了，而有的部队尚未按规定到达指定位置，我更急了。我将此情况报告了野战司令员彭德怀同志。我说，我们的部队不但展开了，而且已经打响了。如果决心再动摇，即使本来是胜仗也会打成败仗的。我的意见得到他很大的支持。最后合围了敌人。

部队打得很英勇。十一月二十一日白天，敌人飞机来侦察，因为我们隐蔽得好，没被发现。战斗从当天黄昏打起，一直打到第二天上午结束。先截断了敌人西逃的退路，然后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向敌人展开猛烈攻击。战斗开始，五团政委陈雄同志亲自带领一排人，一下子就冲入敌人阵地。他们用手榴弹将敌人的临时堡垒一个一个地炸毁，一连占领十个堡垒，随后又把敌人几处主要阵地都拿下来了，敌人就溃败下去了。部队一追就和敌人混战在一起了。

这时天已经很黑，伸手不见五指，也分不清敌我，枪也不能打，手榴弹也不能投，上去就摸帽子，摸着是国民党戴的那种帽子就拿手榴弹砸头。夜晚打乱了敌人的部署，白天的仗就比较好打了。经过一夜多的激烈战斗，将敌七十八师二三二旅及二三四旅的两个团全部歼灭。与此同时，胡宗南派向盐池方向进攻的另外几个师，也被我二十八军击溃。我们缴获了很多弹药，解决了部队的急需。

不幸的是，五团政委陈雄同志在这次战斗中英勇牺牲了。

山城堡战斗后，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央又发下一个很有历史意义的通令：

全体红军将士、全苏区人民钧鉴：

甲、蒋介石此次大举向苏区进攻，不但不许红军抗日，反要消灭红军，消灭苏区，屠杀人民，命令胡宗南各军向盐池、定边、环县猛攻，并要向陕北苏区前进。

乙、我一、二、四方面军会合之后，士气大振，坚决执行中华苏维埃军委之路线，消灭进攻之敌人，扩大苏区，实行抗日救国，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定(边)、盐(池)南边之山城堡打了第一个胜仗，消灭胡宗南之一个旅。

丙、这个胜利是粉碎蒋介石全部进攻的开始，我全体红军战士要更加团结起来，吃苦耐劳，

执行命令，勇敢作战。我全苏区人民要帮助红军输送粮食，转运伤兵，搬运胜利品。白军来时，用坚壁清野对付之。为保卫抗日根据地而战，为扩大抗日根据地而战，为消灭全部进攻之敌而战。

红军万岁！

苏维埃万岁！

抗日救国之民族革命战争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

中华革命军事委员会

这一仗一打，把陕北的局势稳定下来了。由于红军的这一胜利，使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从此更坚定了与红军携手抗日的信心，但是我们当时还没有估计到这次战役后不久，西安事变就发生了。

我们接到西安事变通报的那天晚上，我和左权同志挤在一条炕上睡觉。老百姓把炕烧得太热，半夜里把炕上堆的谷子和我们的褥子烤糊了，也把我们烫醒了。这时正好总部来电话，说是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抓起来了。部队听到这个消息，都没有再睡觉。那个高兴劲啊！这个人出这个主意，那个人出那个主意。有的主张把蒋介石杀了。有多少个意见啊！我和他们半开玩笑地说：这个问题，我们不好处理，由中央去处理吧！那个时候，中央还驻在保安，后来张学良让出延安，中央才搬到延安。

西安事变后，形势发展很快。张学良要求我们红军向他靠拢，我们一军团就向西安前进，随彭德怀司令员的前线司令部，驻在云阳镇、三原一线。任弼时同志当时是政治委员。那时候东北军对我们几乎可以说没有敌对情绪了，不断有东北军的比较高级的军官到我们军团部来，我们中央的代表也驻进了西安。我本人也一度化装进了西安城去镶牙。当时西安城内谣传很多，政治气候一日三变。为了安全起见，我镶牙未成，就返回防地。我们已经在准备要抗日了。

抗日战争到来之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一军团一度从西安附近，转移到宁县、正宁、旬邑、共和镇一带整训，这对于日后一一五师的编成和开赴抗日前线作战，起了良好作用。

这时，以善于作参谋工作闻名的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同志，被军委调到野战军总部工作去了。随后军委指定由陈光同志代理军团长，孙毅同志为参谋长。

山城堡一战，标志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基本结束。在我们党的推动下，国内各派政治力量进入谈判协商团结抗日的新阶段。

从此往后，中国革命由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向抗日战争时期转变。红一军团编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军团的番号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争史上一个光辉闪闪的历史名称。回想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一军团与红军其

他兄弟部队一起为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有光荣的革命历史和传统；许多同志英勇地牺牲了，革命志士的热血从江西一直洒到延安前线，染红了中国的半壁河山，也培养锻炼了大批革命干部。他们以后成为抗日战争打到鸭绿江边和解放战争埋葬蒋家王朝的骨干，有的成为建国建军的栋梁之材。

长征途中的哈达铺改编，一军团曾经被编为陕甘支队一纵队，三军团编为二纵队。到达陕北，重新恢复一军团，把一军团、三军团原有部队合编为一军团，这里面除了彭德怀同志领导的平江起义主力编为第四师以外，由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领导的左、右江起义组建起来的红七军编为一军团的十三团。黄公略同志领导的原红三军编为一军团第一团。由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两支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后组建起来的老一军团底子，编为一军团的一师和二师。这几支英雄部队汇聚在一起，把各地起义和艰苦转战的光荣传统带到一军团，所以一军团的战斗力比较强，在历次战斗中，经常成为主力部队之一。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一军团牺牲了大批好同志。我所知道的光军、师、团职干部就有黄公略、王良、徐彦刚、胡阿林、刘海云、黄甦、吴泉群、肖桃明、沈联雄、易荡平、赵云龙、李英华、陈雄、李棠萼、钟学亮、李士华等同志，营以下干部战士则有成千上万人。他们为中国革命在祖国的大地上洒尽了最后一滴血，永远值得中国人

民和我们这些幸存者怀念和学习。尤其令人怀念的是长期参与我一军团领导工作的左权同志，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了。

一军团确实是一支光荣的部队，虽然也出了象林彪、黄永胜、吴法宪等这些败类，但丝毫也无损于她的光辉！这就是我在回忆一军团这一段战斗历史时的一个总的概念。

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

李 维 汉

八七会议以后，瞿秋白同志是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我是临时中央政治局的三个常委之一。现就记忆所及，并重温有关文献，把瞿秋白同志和我们推行“左”倾盲动主义的问题作一些回忆和研究。

八七会议后的政治形势和党中央所做的主要工作

八七会议以后，紧接着在八月九日召开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苏兆征、瞿秋白、我、罗亦农、王荷波、张太雷、毛泽东、蔡和森、彭公达、任弼时、顾顺章及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等人。会议由瞿秋白同志任主席。议程共有十一项，其中主要讨论决定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关于常委问题。会议对常委人选进行了比较充分

的讨论，多数通过国际代表提出的名单，以秋白、兆征和我三人组成常委会。至于分工，会议决定由秋白兼管农委、宣传部并任党报总编辑；我兼管组织部、秘书厅；兆征兼管工委；恩来负责军事部，因他已率领南昌起义军去广东，由秘书王一飞代理部务；杨之华负责妇女部；顾顺章负责交通局；出版局暂由郑超麟负责。

二是关于北方、南方工作问题和湖南问题。关于北方工作问题，会议决定将蔡和森、王荷波二同志派往北方，组织北方局，蔡和森、王荷波、刘伯庄、彭述之和共青团的一名代表参加，王荷波为书记，蔡和森为秘书，管理顺直（今河北省）、山西、满洲、内蒙和山东等省党的工作。对于这个问题，八月十一日《中央给山东省委山西满洲临委的信》中也写道：北方局“以和森、荷波、述之、昆弟、伯庄为委员，以荷波为书记，管理顺直、山东、满洲、山西及内蒙各党部”。会议特别指出，北方局负有报告八七会议决议案并以会议精神整理所属各省党组织的任务。关于南方工作问题，会议决定派张太雷同志去广东任省委书记。接着，八月十一日，《中央给广东广西省委及闽南临时委员会的信》中说：“临时政治局请派恩来、太雷、彭湃、陈权、代英、黄平、国焘为中央之南方局，以国焘为书记，并在南方局之下组织一军事委员会，以恩来为主任，管理广东、广西、闽南及南洋一带特支。恩来等未到以前，由太雷、杨殷、黄平组织临时的南方局。临时南方局之职权在于准

备并指导上述区域内之暴动及一切政治军事事宜，此外并须报告此次中央紧急会议之决议案，且根据之整顿该三省党部组织之责。至于前敌委员会与临时南方局相遇之后，前敌委员会即可取消。”关于湖南问题，会议决定改组湖南省委，吸收与群众接近的人加入，加强湖南党的领导；由毛泽东、彭公达与湖南省委商选新省委名单报告中央，新省委由九人组成，其中至少要有工农分子三人，工农运动的负责同志三人，彭公达为新省委书记。会议批评湖南省委不应在湖南组织一师与南昌起义部队共同取粤，而应使湖南形成一广大基础，将革命力量扩大到全省。在批评中，毛泽东同志指出，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现在适值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毛泽东在这以前不久曾起草并经中央常委通过的一个计划，即主张在湘南农民起义中形成一个师的武装，占据五六个县，形成一个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他认为即使武装起义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该上山去。毛泽东同志自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以后，就明确指出农民武装在处境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即应上山，“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当时只有他提出了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国情具体结合的远见卓识。

三是关于政权问题。会议决定在乡村中一切政权归农民协会——农会政权；在城市中一切权力归革命委员会。

革命委员会在暴动前是指挥暴动的机关，由我党指派同志及少数真正国民党左派分子组织之；暴动成功后，即是临时革命政府的性质。

八七会议后，党中央领导机关仍在武汉，九月底至十月上旬陆续迁往上海。当时将中央机关迁往上海，主要是因为上海的革命力量比武汉强，同时也比较容易隐蔽。

当时，国内政治局势是非常紧张的，白色恐怖十分严重。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支持下，已经建立了反共反人民的新军阀统治。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许多人为人民大革命所吓倒，也附和了蒋介石的反动。我们党和其他革命力量遭到了极大的摧残，许多共产党员、革命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惨遭杀害，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革命已经由高潮暂时转入了低潮。在这种形势下，我记得党中央由武汉迁往上海前后主要做了以下几件工作：

第一，通过各种秘密渠道迅速向全党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八七会议以后，临时中央政治局于八月十二日和十九日先后发出了《中央通告》第一号、第二号，阐明了党中央召开八七会议的重大意义，并要求各级党组织迅速将会议精神传达到全党。为了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等各项革命运动中也能贯彻八七会议精神，中共中央于八月份还陆续发表了《今后学生运动方针议决案》、《最近妇女运动的决议案》等各种文件。与此同时，中央还通过党的组织系统下

达会议精神，并派了一些同志到各地去进行指导。八七会议后，湖北省委很快传达了会议精神，并制定了秋收暴动计划。在湖南方面，改组了湖南省委，迅速传达和贯彻了八七会议精神。湖南的秋收暴动是毛泽东、彭公达回去布置的。毛泽东同志到湖南后，曾多次将会议精神向他所到地区的党员干部作了传达。在广东，张太雷同志向本省的党员、干部和到达广东的“八一”起义部队领导人周恩来同志等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在北方，王荷波、蔡和森同志也把八七会议精神迅速传达了下去。八七会议精神下达后，大大鼓舞了广大党员的革命斗志，使全党精神为之振奋。

第二，按照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和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任务的决定，各地党组织先后发动了湖南、湖北、江西、广东、江苏、河南、河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的武装暴动。在湖南，有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在湖北，有蒲圻、咸宁、公安、石首、松滋、沙市、通城、通山、崇阳、孝感、麻城、黄安等地的起义。中央在武汉时，瞿秋白、罗亦农和我在亦农家开过会，共同布置了湖北的秋收起义。在江西，有修水、德安、星子、鄱阳、弋阳、横峰、万安等地的起义。在广东，有海丰、陆丰、琼崖等地的起义。在江苏，有宜兴、无锡、江阴、崇明等地的起义。在河南，有光山、四方山等地的起义。在河北，有玉田等地的起义。在陕西，有清涧等地的起义。这些起义大半是

我们党领导的，也有许多是零星的自发斗争。这是我们党在这段时间最重大的任务和最主要的工作。这些起义虽然大部分都失败了或遭到了挫折，但是它都英勇地回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屠杀和围攻，而且也有一部分起义取得了胜利。特别是井冈山斗争取得的胜利，对创立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起了先锋、模范作用，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

第三，在各地举行武装起义的同时，党积极开展了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下，工人阶级处于毫无政治权利、毫无经济保障的地位，原来曾经拥有三百多万会员的各地工会均被封闭，工人领袖和积极分子大部分遭到杀害和监禁。面对这种情况，当时的工人运动，主要的工作是开展经济斗争，建立秘密工会，进行工农革命夺取政权之宣传。

在新军阀的统治下，学生的境遇日益痛苦，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不但毫无民主权利，而且大批失学、失业，致使许多人流落街头，徬徨无依。因此，就学生运动而言，当时主要是组织秘密学联，发展左派学生青年团体的组织，领导学生群众参加政治上、思想上和争取学生本身应得利益的各种斗争。

至于广大妇女，她们在旧社会的地位本来就比男子更为低下，这时又遭受国民党新军阀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更是痛苦不堪。为了积极开展妇女运动，当时主要

是恢复各级妇女部组织，给妇女干部传授秘密工作知识，并要她们积极向女工、农妇做工作。

经过我党的工作或在我党影响下，当时有些地方爆发了一些零星的斗争。拿工人运动来说，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六日，郑州市的纱厂和铁工厂的工人结队进行了游行请愿。同日，汉口邮务工人罢工。十月四日，上海英美烟草公司第一、二厂工人八千余人罢工。十月十四日，广州工人万余人举行大示威，反对反动政府委派工贼组织的“工会改组委员会”。这些事实说明，当时工人阶级的斗争虽然已经由进攻的性质转变为防御的性质，并且大多数都是自发的、分散的经济斗争，但他们的斗争却是持续不断的，并有少数斗争取得了胜利。

第四，根据八七会议关于要“造成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自上至下一切党部都应如此”^①的决定，中央在全党散乱之际和遭受严重的白色恐怖的情况下，进行了极其艰苦而又重要的组织工作，开始恢复、整顿或重建党的组织，建立了党的秘密组织系统和工作机关，组织了全国的秘密交通网，出版了党的秘密机关报。党中央除在八七会议后立即成立了北方局和南方局外，九月下旬迁往上海后，因中央与长江各省隔绝，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又设立了长江局。长江局所辖范围是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四川、

^① 《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一九二七年八月），见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五册，第146页。

安徽、陕西七省。“长江局不是中央在上列七省的通讯机关而是代行中央职权，指挥上列七省的革命运动与党务，上列七省的党务须纯全受长江局的指挥，但长江局须随时将所处理之工作与决定报告中央，受中央的指导”^①。十月二日，长江局召开第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我、罗亦农、王一飞、任旭四人。会议决定罗亦农为长江局书记兼所辖各省军事特派员，易礼容为秘书长，蔡振德为秘书。会议还讨论了湘、鄂、皖、豫、赣各省的工作。各局建立以后，先后派人巡视各地，实际指导各地工作，在党的内部工作中注意培养党的干部和从党员群众中提拔负责人，领导党员和群众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极其艰苦而英勇的斗争。

第五，对湘、鄂、赣、粤四省的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做了许多善后工作。南昌起义军南征失败后，十月十二日《中央致广东省委函——关于叶贺军队失败后广东的工作及善后问题》中谈到：“关于从前线溃散之同志，南局应即在香港厦门汕头等处设一招待处招待他们，……招待的详细办法由昌颐兄面商，大要是可以留在广东的工作同志，或可以就近归家之同志须尽量留在广东或暂时回家，不能留者则令其回沪。现尚在前敌负重要工作的同志，无必要留在前敌时须一律设法回沪。”当时，我在中央常委中分管组织部和秘书厅。南昌起义军失败后，许多人辗转到上海

^① 《中央对于长江局的任务决议案》（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

是由组织部负责接待的。贺龙同志也转移到了上海。他名声很大，是个“危险人物”。我们在上海租了一幢两层楼的公馆，让他一个人住在楼上，下面安排一对夫妇带着小孩作二房东。当时我代表中央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认为南昌起义有两个错误：一是用国民党的旗帜；二是未没收土地。在谈到湘西问题时，他说湘西是有希望的，主要的是要俟农民起来。事后，我把与他谈话的情况向中央常委会作了汇报。秋白同志听了汇报后说：是否要他去干一千呢？我说：我以为可以。去俄回湘由他自己决定。先叫他们到湘西去试一试，有办法时再派得力同志去。会后，我又去找他谈了话。在谈话中，他表示不愿去莫斯科，要回湘西。我说，你怎么能回湘西呢？武汉和长江你很难过去。他说，只要过了武汉，走水上、陆路到湘西，我什么问题也没有，以前凡是打我的旗帜的，就不会遭到强盗抢劫。他还说，我很保险，你不要管，我只要出了武汉就行。后来中央同意他回去。我就派人掩护他出了武汉，回到桑植。结果，他回去又干起来了。在南昌起义军南征失败后辗转到上海的，还有周恩来、李立三、叶挺、谭平山、张国焘、郭亮、夏曦以及党外的朱剑凡（周南校长）等许多人。对于这些人，党中央都进行了妥善的安排，有的分配工作，有的送去莫斯科学习，周恩来回到临时中央政治局工作。

在这一时期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决定，我认为也应该

提出来，这就是抛弃了左派国民党的旗帜，打出了苏维埃的旗帜。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九日，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这个决议案根据当时“几月的经验（包括南昌军队中的暴动与两湖广东革命的农民暴动的爆发）指示出中央以前复兴左派国民党的估计不能实现。”因为，一方面，“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已经很快的把国民党变成政治的尸首”，并“由其腐烂的尸体中产生出赤裸裸的军阀专政”。另一方面，“以前国民党在群众中的革命威信，已因资产阶级军阀之到处利用国民党的旗帜实行流血屠杀，恐怖与压迫而消灭了”。在群众眼里，国民党的旗帜已经成了“资产阶级地主及反革命的象征，白色恐怖的象征，空前未有的压迫与屠杀的象征。”因此，中央认为：“八月决议案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一条必须取消。”后来，十一月召开的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则重申：“本次会议完全赞同中央九月间关于取消组织左派国民党之计划及提出苏维埃口号之决议。”^①

现在看来，当时打出苏维埃的旗帜（只是“苏维埃”一词是音译过来的，不易为中国老百姓了解）是正确的。事实上，在十一月扩大会议以前，海陆丰已经打起了苏维埃

^①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2月版，第125页。

的旗帜。毛泽东同志在秋收起义时也没有用左派国民党的名义，而是旗帜鲜明地以共产党的名义号召群众，他并致信党中央提议放弃国民党左派的旗帜。至于南昌起义部队，在开始时虽曾利用国民党左派的旗帜，但到汕头失守以后也决定取消左派国民党的旗帜。

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在八七会议以后，我们党在很短的时间内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而加强起来的革命急性病，使党内的“左”倾情绪很快地发展起来。这种“左”倾情绪在八七会议上就已露头。八七会议反对右倾错误时的“左”倾成分，主要见之于由罗米那兹起草的《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中。应该肯定，《告党员书》的方向是正确的。它的目的是批判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并且基本上达到了目的，但其中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上确实存在有“左”倾论调。首先，关于民族资产阶级问题，《告党员书》说：国民政府“它从革命的政权机关变成了资产阶级之反动的执行机关”^①（着重点是我加的，下同），这里所讲的“资产阶级”是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告党员书》明白地说：“民族资产阶级这种政策上的变节，以蒋介石在上海的屠杀而著名。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他如今和买办阶级、封建阶

^①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2月版，第84页。

级的大地主相象，将要成为外国资本对于中国统治之支柱。正因为这种情形，更使无产阶级的斗争——力争自己真正的阶级要求的斗争，变成民族解放革命所必须的条件。”^①这里是把民族资产阶级视为同买办阶级“相象”。《告党员书》还说：“中国无产阶级要履行自己解放中国民族的使命，只有随着力争自己的阶级要求的斗争的发展，就是反对外国资本及中国资产阶级斗争的开展，而日益实现这个使命。”^②并说：“谁要民众解放革命得到胜利，谁要中国完全脱离外国的压迫，他便应当促进、扩大并激励工人反对资产阶级，农民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他便应当赞助社会斗争，使之进于全体平民革命之新方式。”^③这里笼统地强调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且只是工人阶级一己利益的斗争。这样，在《告党员书》中就混淆了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的界限，不知道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主张对民族资产阶级只讲斗争，不讲争取和联合，这显然是错误的。其次，关于对待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问题，《告党员书》说：“社会之中既然发生了两大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小资产阶级便无论如何不能有自己的策略；他或者和资产阶级同道，或者和无产阶级同道，无产阶级应当明了小资产阶级之动摇是不可免的；正因为

①②《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2月版，第89页。

③ 同上，第90页。

如此，所以他自己应当有坚决的政策，去以革命的方法解决目前的问题。”^①这个分析，基本上是对的，问题是用什么样的革命方法，《告党员书》的回答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斗争愈坚决愈剧烈，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愈深入，则小资产阶级愈能转向左倾，愈能站到革命的战线上来”^②。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这里讲的“工人阶级斗争”，如前所述，是指他们“力争自己的阶级要求的斗争”，这种斗争“愈坚决愈剧烈”，势必不仅会对民族资产阶级过左，而且会过火到侵犯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农民对地主的斗争，也存在这个问题，这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出现过。其次，这里没有区分农民对地主，工人对民族资本家两种斗争的不同，更重要的是没有把城市小资产阶级当作必须极力争取和联合的对象、同盟者，没有认识到要克服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一方面要照顾他们的利益，并进行适当的教育，另一方面要领导他们在对敌斗争中取得胜利。与此相反，他们却把“一般手工业者、商人、学生、店员及城市贫民”^③统统当作小资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又不是联合第一，不讲照顾他们的利益，而是用绝对的无条件的阶级斗争，即所谓“革命方法”来强使小资产阶级跟着自己走，这种做法就会把小资产阶级大部分驱到豪绅一边。如

①②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2月版，第90—91页。

③ 同上，第90页。

此等等。由于《告党员书》中存在着一些“左”的错误理论和偏激情绪，不够实事求是，它又“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①

事实表明，在八七会议以后，这种“左”倾情绪继续滋长，致使在中央领导机关和一些地方党的工作中，都包含有盲动主义的因素。例如，河南省委在一九二七年九月四日写给中央的信说，冯玉祥反动以后，党的工作无形中停顿，党的组织非常薄弱，好多个县市缺书记，军事工作更是缺人。同时，“在农民中，没有我们的基础。”“工人对政治态度，非常冷淡”^②。但中共中央在九月二十四日却指示河南省委说：“河南现时客观的情形，一面反动统治不能稳定，一面工农革命情绪又很高，尤其是农民武装暴动，差不多继续不断普遍于全省。正是我们党从各方面领导工农穷苦民众实现这个总目标的好机会。”^③在这前后，中央领导机关和某些地方党的组织还提出要煽动起“红色恐怖”^④，“大杀豪绅地主”^⑤等口号。当时上海正在搞赤色恐怖，中央迁上海后，我同秋白去看上海新任书记邓中夏同志。他汇报这事，我们三个人都反对在城市搞赤色恐怖，市委随即制止（当时中央对城市恐怖政策还是反对的）。

①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09页。

② 《河南省委报告》（节要）（一九二七年九月四日）。

③ 《中央致河南省委函》（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④ 《江苏省委给宜兴的信》（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日）。

⑤ 《中央给陕西省委信》（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六日）。

党内“左”倾情绪的不断发展，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党中央的扩大会议，就导致以秋白为首的党中央犯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

十一月扩大会议的召开和我对 几个决议案的看法

八七会议以后，经过党在各方面的工作和斗争，到一九二七年十月，形势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中央召集紧急会议的通告》中这样说：“现在湘鄂粤赣四省的秋收暴动均已告一段落”，全国局势“已有大的变化”。但是，“在这些运动中我们的党充分的暴露了他的弱点，同时也得了不少的教训，这些弱点和教训均须有一番正确的整理”，“本党今后的政策和组织须有一个新的决定”。因此，秋白同志和我们几个常委研究后，“特决定十一月十二日在沪召集紧急会议，凡中央政治局委员及中央指定出席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均须列席；被指定之重要省委或中央分局亦须派代表出席。”接着，在《中央关于召开紧急会议的更正》中，则将召开会议的日期由十一月十二日改为十一月八日，并要求“到会的人务于七号以前赶到上海”。

随后，十一月一日，中共中央常委会开会。出席会议的有瞿秋白、苏兆征和我。会议除讨论了政治通告问题、两广问题和北方问题外，主要讨论了中央紧急会议的准备

问题。关于当前的革命潮流是高涨还是低落的问题，秋白同志说，中国革命潮流仍是高涨的。当时我也说，中国革命潮流高涨的形势，此时已比八七紧急会议时还要明显。农民的暴动简直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农民暴动已显然走到土地革命的阶段。目前中国革命，客观条件上可以综合各地的暴动发展成一个总的暴动。关于党的状况，我说，从前党有组织基础的是上海、湖南、广东三处，经过大压迫之后，湖南、广东党的组织几乎没有了。上海比较好些，还存在一点，但也不大好。其他地方更可以想见，甚至南昌等处党的群众都没有了。因此，我又说，当时党的力量实无力来适应客观条件的需要，不能负起如此重大的责任。会上我还提出这次紧急会议对于组织问题要下一决心，坚决地改造党，撤换一般知识分子的领导，提拔工农分子等。对于这个问题，秋白也说：党的组织是一非常严重的问题，一定要坚决地提拔工人分子，党不但灵魂要换，而且躯壳都要换过。凡旧的同志稍微不好的即请他自己去找职业。现在看来，秋白和我的这些意见，特别是我自己的意见，都是错误的，其中也都有国际代表的影响。这次会议，为在十一月扩大会议上形成“左”倾盲动主义作了准备。

一切准备就绪，中共中央于十一月九日在上海召开了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历时两天。这次会议召开的时间，正是九月两湖农民暴动遭受挫折以及叶贺军队失败之后。

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按当时中央的说法，就是“不但要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前途，指出我党今后斗争的策略，并且要指出根本上重造我们的党，强健我们的党，彻底肃清机会主义，严厉的整顿政治纪律。”^①

出席这次会议的人，除中央常委外，还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指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重要省委（山东、直隶、河南、江苏、广东、湖南、湖北）或中央分局的代表。在十月十九日《中央召集紧急会议的通告》中通知参加会议的人有：任弼时、彭湃、顾顺章、罗亦农、向忠发、王荷波、毛泽东、张太雷、李立三、张国焘、邓中夏。当时，毛泽东同志正在井冈山领导革命斗争，可能这个通告他没有接到，就是接到了他也走不开，因此他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张国焘随叶贺部队南征至汕头失败后，当时已从香港到达上海。张在《我的回忆》一书中说，他没有参加这次会议^②。王荷波同志在八七会议后被中央派去任北方局书记，十月十八日已在北京被捕，因此他没有参加会议。中央于十月二十三日致南方局并转广东省委的信中说：“太雷已到此（按：指上海）”，“省委即由太雷代表出席不必另派人来，彭湃既已派往闽南即可不出席，并请你们通知恩来务于七日以前赶到上海以便出席”^③。因此，张太雷参加了

① 《中央通告第十六号——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内容与意义》（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②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第340页。

③ 《中央致南方局并转广东省委信》（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会议，彭湃没有参加会议。蔡和森在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致中央的信》中，曾谈到他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到天津前“去沪月余”^①，在《关于顺直问题的口头报告》中又说他“动身来参加十一月扩大会之前一日接到中央纠正盲动主义的信”^②，由此看来，他是参加了会议的。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湖北省常委向湖北省扩大会的报告》中说：当时“任旭已赴中央扩大会”^③，可见任旭参加了会议。这样，参加会议的有瞿秋白、苏兆征、我、任弼时、顾顺章、罗亦农、向忠发、周恩来、张太雷、李立三、邓中夏、蔡和森、任旭等人。此外，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也出席了会议。

这次会议是由瞿秋白同志主持的。会议的议程我记不太清楚了。十月十九日《中央召集紧急会议的通告》称，会议的议事日程为：一、政治报告和讨论；二、党的组织问题；三、召集第六次代表大会问题。会上通过了以下几项决议：

（一）《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

按十一月一日中央常委会上的决定，这个《决议案》是罗米那兹起草的。

首先，关于革命性质问题，《决议案》认为：“中国革

①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120页。

② 同上，第153页。

③ 《湖北纠纷问题专号》，见《中央政治通讯》第二十期，第28页。

命是马克思所称为‘不间断的革命’。——(一)在革命性质上，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实行推翻封建军阀的民权革命，所以中国革命进展的过程中决不能有民权革命自告一段落的局势(所谓二次革命的理论)；这一革命必然是急转直下从解决民权革命的责任进于社会主义的革命。”^①《决议案》还认为：“中国革命虽然简直还没有开始其民权主义任务的解决，但是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遽的进展；中国革命的进程，必然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②

秋白在《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一文中也说：“国民党是背叛革命，并未完成国民革命，而且还是取消国民革命已得的胜利，帮助着统治势力的复辟。‘第一次’革命并没有完成而是中断，根本上无所谓‘第二次’的革命。”^③他又说：“中国革命虽然现在已经是革国民党的命，已经是工农的革命，然而他的任务仍旧首先便是国民革命——土地革命。……这一革命的性质，由他的主要领导者来说，如今更显然是工人阶级(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由他的社会内容来说，却还首先是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④他

①②《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2月版，第137页。

③ 同上，第117页。

④ 同上，第118页。

还说：“中国革命中民权主义的任务，要在工农反对豪绅资产阶级的革命的阶级斗争之中，方能实现。可是，即使为着彻底实现土地革命，工人阶级就不能不领导着农民根本推翻中国的资产阶级，——因为中国资产阶级基本上与剥削农民的豪绅地主相联结相混和。中国革命要推翻豪绅地主阶级，便不能不同时推翻资产阶级。……中国革命要彻底推翻旧社会关系（半封建制度的资本主义前期的社会关系），也就不能不超越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的范围。所以中国当前的革命，显然是由解决民权主义任务急转直下到社会主义的革命。”^①最后，他指出：“总之，中国革命，不论是在速度上或是在性质上，都是无间断性的革命，要说中国革命已经是纯粹社会主义的革命，固然不对，要说中国革命仅仅是民权主义的革命，仿佛革命之后，只开辟些‘民治气象’得着纯粹资本主义的，更是不对。”^②

所有这些，都是对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的否定与批判。陈独秀把中国新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当成西方旧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认为无产阶级只有等待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发展后再来干社会主义革命，并且认为当时蒋介石的法西斯专政即资产阶级的专政。《决议案》

①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2月版，第119页。

② 同上，第120页。

和秋白的论文在这里说得很清楚：国民党是背叛革命，国民革命并未完成，而是中断。夺取政权的革命只有一次，根本上无所谓陈独秀等人所说的“二次革命”。因为中国的资产阶级不但“没有能力实行推翻封建军阀的民权革命”，而且“基本上与剥削农民的豪绅地主相联结相混和”。因此，这个时候的革命“已经是要革国民党的命”，“已经是工农的革命”，然而它的任务仍旧首先便是继续完成国民革命——土地革命。这一革命的性质，从其“主要领导者来说”，显然是工人阶级（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而从“他的社会内容来说，却还首先是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基本上不能在民权主义的阶段上再成一个段落，象法国大革命似的”^①；这个革命“除非不胜利，要胜利便是工人阶级领导农民武装暴动获得政权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②，因而它是“马克思主义所称为由民权主义生长而成社会主义的最明显的实行。”^③——这些就是《决议案》和秋白论文中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的“无间断革命论”的中心思想。在当时，这实在是极为新鲜的思想，也可以说是光辉思想或光辉思想的萌芽。这些思想已经为后来的革命实践所证明。

但是，在《决议案》和秋白的论文中也包含了一个重要的错误观点，即：“即使为着彻底实现土地革命，工人阶级就不能不领导着农民根本推翻中国的资产阶级”^④。这个

①②③④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2月版，第119页。

错误观点，混同了中等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不认识中等资产阶级有两面性；不认识蒋介石只是在他制造“三二〇”中山舰事件以前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而在这个事件之后已转到大资产阶级的立场。过去很长时间内都认为，蒋介石一直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的叛变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这种认识从五大宣言起即见之于党的正式文件，几乎贯通于整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不是某些个人的责任。这个观点是共产国际、斯大林的观点。然而这个错误观点，却是“左”倾错误的一个主要的根源。

由于这个错误观点，至少主要是由于这个错误观点，便引出了模糊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一定界限的错误论调，即前面引述过的所谓“因为中国资产阶级基本上与剥削农民的豪绅地主相联结相混和。中国革命要推翻豪绅地主阶级，便不能不同时推翻资产阶级。”“中国革命要彻底推翻旧社会关系（半封建制度的资本主义前期的社会关系），也就不能不超越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的范围，所以中国当前的革命，显然是由解决民权主义任务急转直下到社会主义的革命。”中国当时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遽的进展”。这样，就明显地“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定界限”^①，不懂得无产阶

^①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24页。

级在领导人民大众夺取了政权之后，还需要经过一个在政治上、经济上实行新民主主义纲领的过渡时期。

但是，《决议案》和秋白的这种错误观点，同李立三、王明等“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开始即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①，在提法上不相同。前者的提法是：革命既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本，革命的性质就超越民主主义的范围。这种混淆在历史上一直延续到瓦窑堡会议以前。后者除了这种混淆外，还加上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开始”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冒险性更为突出，再加上又主要靠红军打大城市，正是“主观地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②。

其次，关于对革命形势的估计问题。《决议案》从“左”的观点论述了“中国社会的总危机与农业危机”、“工商业的危机”、“帝国主义侵略之急进”、“民族资产阶级与国民党”统治内部的冲突之不能稳定，然后说道：“所有这一些情形，都使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这一观察，并不带着‘革命在最短期间必定完全胜利’的幻想。中国的客观情形是如此；直接革命的形势之时期，并非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事，而是好几年的事。”^③

①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12页。

② 同上，第924页。

③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2月版，第127页。

《决议案》还认为：“在革命速度上，中国革命的进展虽然受着历次的挫折，但是他始终继续不断的发展，因为统治者阶级之间自身的冲突矛盾非常剧烈，他们的统治不能稳定，民众革命斗争，尤其是农民暴动自发的到处爆发，而有汇合起来成为工农民众的暴动推翻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统治之趋势。”^①

广州暴动失败之后，秋白在《中国革命低落吗？》一文中还断言：“中国革命无疑的是在高涨。”^②其理由是：“第一，广州暴动之后，国民党的豪绅资产阶级统治更加分崩离析，军阀的混战更加要扩大。”^③“第二，广州暴动之后，不断的军阀战争，正在广东湖南河南山东福建等等省份大大的发展起来，这是许多杂色军队的小军阀的战争，亦就是桂系与蒋派间接的战争。”“农民暴动的事实，差不多每天的报纸上都可以看见”。“许多乡村之中农民群众自己开始寻找共产党。”^④“第三，广州暴动之后，开始兵士的参加革命。”^⑤因此，秋白说：“固然，白色恐怖摧残我们的力量，但是伟大的艰苦的斗争之中，共产党的力量和群众的基础是在生长起来。”^⑥

①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2月版，第127页。

② 同上，第146页。

③ 同上，第144页。

④⑤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2月版，第145—146页。

显而易见，《决议案》和秋白论文中的上述观点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提出革命必然要高涨，革命高潮必然要到来，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大革命失败后，在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下，所有民主革命的任务都没有解决，而且当时明显的事实是反动派不能稳定自己的统治；另一方面，这里指出的“高涨”是“无间断的高涨”，“不断高涨”，这种关于中国革命形势一直高涨的说法，否认了当时总的说来中国革命形势是低潮，否认了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也是违反辩证法的。

大家知道，标志直接革命形势的三个根本条件是：统治阶级不能继续统治下去；下层群众不能继续生活下去，并具有对统治阶级进行生死斗争的决心；中间阶级日益动摇、脱离统治阶级，倾向下层革命群众。这些条件当时在全国根本不存在。实际上，秋白等人是把全国已处于革命低潮中的一些此起彼伏的农村暴动，夸大成为“直接革命形势”，这显然是错误的。

如果上面这个错误还是带理论性质的话，那么，《决议案》关于“民众革命斗争，尤其是农民暴动自发的到处爆发，而有汇合起来成为工农民众的暴动推翻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统治之趋势”的论断，就明显地是直接影响政治实践的严重错误。至于秋白写在广州暴动失败之后的论文，他所列举的第一、第二、第三条理由，即使全部是事实，也得不出“中国革命无疑的是在高涨”，更得不出这是“直接革命的

形势”的结论。

我认为如实地估计当时的革命形势，情况可能是这样：

第一、虽经大革命失败（蒋、汪叛变）和严重白色恐怖，又经历八一起义军南征的失败，但革命斗争并没有熄灭，仍旧在继续，这主要表现在一些地方的农民暴动。

第二、农民暴动有失败，有胜利，失败多，胜利少，但斗争仍在继续，并未消失。各地农民起来暴动，特别是胜利的暴动，以及几处农民游击战争的坚持，证明八七会议关于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实行土地革命总方针的正确。

第三、当时的农民暴动，并不都是“自发的”，其中大都是党组织领导的。这证明当时党的组织在一些地方仍有战斗力，响应了八七会议的号召。

第四、当时的革命形势就全国来说还不是高潮，而是低潮；但在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星星之火（农民暴动），它有一定的可能（这里必须有正确的指导这个主观条件）逐渐发展成为燎原之火，即逐渐发展成为高潮。因此，盲目乐观是错误的，悲观失望也是错误的。

再次，关于“现时的总策略”问题，《决议案》根据它对中国革命形势所作的“左”倾错误估计，提出了当时党的盲动主义策略总方针，即：“（一）努力使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得有最高限度的组织的性质；（二）努力使互相隔离零星散乱的农民暴动，形成尽可能的大范围内的农民总暴动；

(三)努力保证工人阶级的爆发与农民暴动互相赞助互相联络。”^①(“总策略”(一)使用了“自发的”这个形容词,实际上当时群众的革命斗争在多数场合是党组织在那里推动和领导的,其中有的还带有强迫命令的性质。)

《决议案》指出:如果农民暴动,“事实上不能估量到较大范围内的胜利,那么,党应当使这种暴动采取游击式的战争(不去占领县城或巨大的地域,长久的时期,不去费力建立大规模的军队等等,而以人数虽少却是团结巩固的暴动军,经常不断的袭击政府的军队或地主的武装)。”^②这是提出了当时中国同志中间除了毛泽东等同志外,一般还没有认识清楚的关于游击战争的观念。这在当时是非常宝贵的。紧接着又指出:“这种游击战争,随后很容易发展而生巨大的农民暴动,进一步而达到在较大的范围内夺取政权。”^③对游击战争的发展前途来说,这也是对的,但在当时只能在小范围内进行。同时,就当时形势来说,这个“很容易发展而生巨大的农民暴动”和上面“总策略”(二)中的“尽可能的大范围内的农民总暴动”相结合,很难不产生盲动主义。

严重的盲动主义倾向是“总策略”的(三)。《决议案》指出:“城市工人暴动的发动是非常之重要;轻视城市工人,仅

①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2月版,第129页。

②③同上,第129页。

仅当做一种响应农民的力量,是很错误的,党的责任是努力领导工人日常斗争,发展广大群众的革命高涨,组织暴动,领导他们到武装暴动,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革命的胜利在巨大暴动内得以巩固而发展的先决条件。”^①秋白也说:“城市之中这种工人的斗争不能胜利,乡村中农民的斗争始终不能超出游击战争的限度而得到巩固的胜利,乃因为单是农民暴动而没有暴动的城市做他的中心和指导者,便不能团结集中而形成伟大的胜利的革命权力。”^②大家知道,秋白在《武装暴动的问题》一文中,曾引用了列宁对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前准备暴动的指示:“暴动要能够胜利,必须不依据于军事投机,并不只依据于党,而要依据于先进的阶级。此其一。暴动要依据于民众的革命高潮。此其二。暴动要依据于日益生长的革命达到历史上的转变关头,就是革命敌人的动摇一天天的增加,而且薄弱的骑墙的不坚决的革命友军也一天天的更加动摇。此其三。解决暴动问题的这三个条件,便是马克思主义与白朗吉主义不同的地方。”^③秋白说:“列宁这几句,是革命发展到决定胜负的斗争时期,所应当特别注意的。”^④可是,他在“城市工人暴动的问

①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2月版,第133页。

② 《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2月版,第119页。

③④《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2月版,第143页。

题”中，却没有严格遵守列宁的指示，而是依据他的“中国革命无疑的是在高涨”的错误估计。

由此可见，“总策略”的核心便是武装暴动，是农村暴动和城市暴动的汇合，是以工人暴动为“中心”和“指导者”的城乡武装暴动。这种暴动的推行者并不认识在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性，而是强求城市工人暴动，搞的是城市中心论，而对农民暴动的估计，也是盲目乐观，以为很容易发展成为巨大的农民暴动，甚至农民总暴动。

此外，《决议案》还规定了一系列“左”的政策。例如关于阶级政策，《决议案》写道：“工农武装暴动的策略，尤其应当注意的是：对于豪绅工贼及一切反革命派，应当采取毫无顾惜的消灭政策；……对于上层小资产阶级——店东商人等等，切不可存着犹豫动摇的心理，如惧怕扰乱他们的安宁秩序，因而不去发展革命的群众的独裁制，甚至阻止群众的剧烈的革命行动。”^①这些“左”的政策，在某些农村暴动中，例如在湘南成为“杀尽土豪劣绅”以及烧毁他们房屋的所谓“烧杀政策”；甚至引进了城市。这种错误政策曾使革命遭受到不应有的损失。

（二）《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

依十一月一日常务委员会决定，这个《议决案》是秋白起草的，共十个部分，即：“（1）组织任务之重要”，“（2）党

^①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2月版，第131页。

的组织之大弱点”，“（3）党的改造之重任”，“（4）党的基本组织与民主主义化”，“（5）工会的组织问题”，“（6）农民的组织问题”，“（7）党与青年团的关系”，“（8）党与反动团体”，“（9）党的组织与纪律”，“（10）发展党员的数量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党的改造”问题，其政策的核心就是要“将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之干部。”^①

《议决案》指出：党组织上的主要缺点，“有很大的政治意义的——就是本党领导干部并非工人，甚至于非贫农，而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②《议决案》分析这种情况的形成是在“中国无产阶级没有自觉的成为一个阶级的时候”，“工农阶级运动初具雏形的时期”^③。在这一过去的时期中，“站在民族解放运动的最主要的、最激进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渗入了我们的党。这种成份形成中国共产党的最初干部。”^④而工人贫农群众加入共产党，“这已经是比较迟的一时期里的现象，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作用，竟留在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手中，当时这一部分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仅仅受着最初一时期革命高潮的冲动，并未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锻炼，并不知道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并且是站在工人贫民的阶级

① 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五册，第270页。

②③④同上，第269页。

斗争之外的，他们不但没有能改造(成)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反而将自己在政治上不坚定、不彻底、不坚决的态度，不善于组织的习性，以及其他种种非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所特有的习性、习气、成见、幻想，……带到中国共产党里来。这种组织成份，就是武汉反动以前本党政策机会主义孟塞维克主义的策源地”^①。

《议决案》的以上这些论述对不对呢？据我所知，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和地方领导机关的负责干部大多数确实是知识分子出身，他们中间的确有许多人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或多或少或大或小还带着一些小资产阶级的尾巴，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党内产生右倾机会主义的阶级根源之一。有不少人，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紧急关头消极了，逃跑了，甚至叛变了。只就这个范围来说，《议决案》的上述评论或多或少可以说是合乎实际的。

但是，这些评论有很大的片面性，对当时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采取了近乎“一刀切”的否定态度。很显然，《议决案》忽视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工人阶级政党不可能直接从工人阶级中产生，只能由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作先导。这就是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在中央和地方组织中占主要地位的客观

^① 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五册，第269页。

原因。事实上，在党的第一代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干部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参加过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他们同工农相结合，初步得到了实际锻炼，并在不同程度上学习过马列主义的初步知识，因而在第一次大革命中起了骨干作用。一般地说，他们的工作是积极的，斗争是英勇的。否认了他们的这个骨干作用，就很难理解我们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对大革命所起的领导作用，也很难理解大革命的惊人的迅速发展。大革命失败以后，他们中间的许多人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有些同志牺牲了宝贵的生命，有些还在继续奋斗。由于增长了丰富的经验和斗争成败两方面的考验，在当时更成为党的宝贵财产的一部分。中国革命经验证明（外国的革命经验也同样证明），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在民族斗争中往往起着先锋作用，而其中真实信仰共产主义的部分，即本文称之为革命的知识分子的部分，则能在实际斗争中逐步同工人农民相结合，形成整个革命中的基础力量和领导力量。中国革命胜利的主要条件就是革命知识分子与广大工农分子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密切结合，没有这种结合不可能有胜利。可是，《议决案》的上述论述却忽视了这种革命知识分子的作用。当然，他们当时还只有几年党龄，在理论上、政治上都还很幼稚，还带有这样那样的弱点，以至跟着陈独秀主义走过。但是，由于对党和革命的忠诚，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已经牺牲的和正在继续斗争的这样一批知识分子出身的优秀干部，是决不可以否定，

决不可以采取虚无主义态度，而相反是应该予以表扬和鼓励的。这是头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议决案》还把八七会议后的某些错误和失败也归罪于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议决案》写道：“最近许多正确的彻底革命的党的决议案和方针，如土地问题，农民暴动的策略问题，劳动问题，国民党问题（八七紧急会议及其后中央临时政治局的决议），往往在各地并不执行，谬解而成机会主义的实际行动，这是因为实行这些决议的分子，仍旧是那些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代表的旧干部。”^①这也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的正确立场上实事求是地来对待他们，而是从盲动主义的观点来指责他们。我认为临时中央政治局领导上从八七会议开始就有“左”倾盲动倾向，逐渐发展到十一月扩大会议而形成盲动主义错误。这是当时的主要倾向，在党内有它的思想基础。盲动主义政策到头来是行不通的，要碰得头破血流的。在地方上直接领导暴动的干部，当然首先要受到这种惩罚，也就是知识分子干部首先要受到这种惩罚。但责任应当主要在中央，不能简单归罪于许多在地方上担任领导工作的知识分子干部，更不能指责他们为“机会主义代表的旧干部。”

第三个问题，《议决案》说：“因此而得的结论，自然便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组织任务是——将工农分子的新

^① 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五册，第270页。

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之干部。……使党的指导干部之中无产阶级及贫民的成份占最大多数。支部书记、区委、县委、市委、省委的成份，各级党部的巡视指导员的成份，尤其是农民中党的工作(人)员的成份，必须大多数是工人同志或贫农同志。工会机关的干部，则须全部换成工人。这一改造工作，当然不是一下子可以做成功，但是必须愈快愈好，应当开始建立各级党部的巡视指导制度，去切实(实行)这一改造工作。”^①这实际上就是要对大革命失败后留下来的革命知识分子干部实行大换班。

应当承认，培养和提拔工农干部(在城市斗争中是工人干部，在农村斗争中是农民干部)，在当时，是党的建设上一项根本的带紧迫性的任务；同时也应当肯定，这项任务应该是也只能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审慎地进行，并且决不能由此而得出用他们去取代一切革命知识分子干部的结论。但是，《议决案》却简单地采取大换班的办法，而且要求实行得愈快愈好，这又是“一刀切”。这个问题，周恩来同志曾经作过如下的评论。他说：“关于领导机关工人化的问题，在‘八七’会议后，就把与机会主义作斗争看成了简单的人事撤换，这种形式主义影响到后来关于领导机关的工人化，把工人干部当作偶像，对知识分子干部不分别看待。那时李立三同志当广东省委书记，曾说：知识分子的作用完了，

^① 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考考资料》第五册，第270页。

今后只有依靠工农干部。所以到广州起义失败后，教导团有几百学生退到海陆丰，就没有把他们当作干部来使用，而把他们编到第四师去当兵，后来绝大多数在作战中牺牲了。”^①

在组织上，采取以工农分子新干部替换知识分子旧干部，这种大换班的办法是要不得的。即使是下面搞错了，也不能这么做。这是因为，八七会议的总方针之一是秋收起义，而起义就是武装暴动，就是要夺取武装，打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可是当时党内干部中几乎没有人有这种经验。不但没有经验，而且很少有真枪实弹（只有少数几处暴动先有部分正规武装为骨干），只有用梭镖、土枪、刀棍去夺取敌人（多半是民团、小部敌军、警察所）的武器。这首先要有很大的勇气，还要有几分冒险性。但是由于武器劣，经验缺，往往是失败多，胜利少。一切工农武装起义的成功和游击根据地的建立，都是经过反复多次的斗争和失败，才达到胜利的。天才（比别人聪明一些）的领导者毛泽东同志（他本人也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也是在秋收起义部队与优势敌人多次战斗受挫折以后，才说服干部，率部上井冈山，争取与袁文才、王佐合作的。如果一遇挫折和失败就进行大换班，那就不但不可能取得胜利，而且只能由于新提拔的干部的更加缺乏经验而加速失败。无论知识分子

^① 《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80—181页。

出身的干部，或工农出身的干部，都得在战争中学习，而且主要是从败仗中学习，经常不断地总结斗争经验。大换班的性质是组织上的盲动主义，是对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争既缺乏知识，又不了解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的产物。

以上，就是对于组织问题议决案的核心问题——干部政策的几点看法。

由此可见，十一月扩大会议在政治上是盲动主义的，在组织上是为政治上的盲动主义服务的。十一月扩大会议后，在十一月的《中央工作计划》中，就明显地把“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和政治上的盲动主义紧密结合起来，前者为后者服务。《中央工作计划》一开头就指出：“目前党在组织上的主要任务为严格的执行最近中央扩大会议的决议使扩大会议决议的精神深入于党员群众中；坚决的改造各级党部，洗刷一切机会主义的遗毒，改造党的成份，使党的核心建筑在工农的身上，如此才能使党成为一个斗争的布尔塞维克的党。”接着，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一日，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党的组织工作》的中央通告第十七号，对各级党的机关在组织上和成份上的改造作了一些具体规定。这个通告在干部政策上完全是十一月扩大会议议决案的翻版。随后，十二月十日，中央发出第二十号通告，指示“改造党的具体办法”：一、重新改组各级党组织；二、选举前要热烈讨论党内问题；三、上级党委要派人到下级指导讨论和改造；四、扩大党内民主；五、上级不必派人到下级作

书记或常务委员。十一月十四日，中央常委会（我出席了这次会议）决定改变中央组织机构。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在八月九日召开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选出的是瞿秋白、苏兆征和我三人，十一月扩大会议将常委扩大到五人，增补周恩来和罗亦农。组织局局长是罗亦农（兼组织部长）。组织局成立后，取消南方局、北方局和长江局。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是苏兆征，秘书是罗章龙，委员是苏兆征、向忠发、郑覆他、王藻文、陈郁、项英、胡×、万兴、黄五一、李立三、黄平、郭亮、许白昊、周文雍、张昆弟。党报委员会总编辑是瞿秋白，秘书是郑超麟，委员是瞿秋白、郑超麟、罗亦农、邓中夏、蔡和森、张太雷、黄平、周以栗、任旭、毛泽东、王一飞、任卓宣、周恩来、王若飞、李立三、恽代英、陆定一、刘昌群、罗章龙、刘伯庄、任弼时、尹宽、李富春、罗绮园、夏曦、夏之栩等^①。

（三）《政治纪律决议案》

这个《决议案》是国际代表罗米那兹提出来的。在十一月扩大会议前，我在党内已工作了好几年，从未听说过有什么“政治纪律”。因此，当罗米那兹为了处罚领导起义失败的同志而提出“政治纪律”这个名词时，我感到很新鲜。恩

^① 《中央通告第十八号——扩大布尔塞维克编辑》（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一日）。（“扩大布尔塞维克编辑”即扩大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杂志的编辑人员）

来同志也说：十一月扩大会议规定了政治纪律，“这也是国际代表提出的。”他当时也“觉得这一条很新鲜。”^①在这个历史文件中，受处分的有十案，其中属于“暴动区域党部指导机关犯了严重错误”的有四案。这四案的性质都关系到是执行还是反对八七会议总方针的问题。八七会议的总方针有三项，即：清除陈独秀投降主义；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土地革命。而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也就是在政治上清除陈独秀投降主义的主要标志。所以，凡是为实行八七会议总方针而斗争，大方向就是正确的。

就当时的情况而论，在实行八七会议总方针的斗争实践中，犯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些起义都是实行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初尝试，都是新鲜课题。土地革命也是新鲜课题。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相结合更是史无前例。在实践中结束陈独秀投降主义在当时也是刚刚开始。在这种情况下，谁能保证不犯“左”的或右的错误呢？

犯了错误怎么办？本来当时中央应该采取的态度是，首先要分清是非轻重，即：要分清是不是错误；如果是错误，还要分别情节轻重，同时还要找出犯错误的原因。其次，既然暴动区域党的指导机关都是在实行八七会议总方针的斗争实践中所犯的 error，而且这些起义又都是实行土地革命战争的初次尝试，那么，对他们的处理方法，最重

^① 《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2页。

要的就应当是总结经验教训，适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尤其是中央领导要有自我检查，决不可以把责任都推在地方上。但是，《决议案》并没有采取这些办法，也没有对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当时的中央领导更没有自己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相反，却简单地指责和处罚下面的有关负责同志。结果，有的不应该处分的处分了，有的斗争过火了。总之，当时是重组织处理，而不是重思想教育。从现在看过去，我认为这是惩办主义。这种组织上的惩办主义，也是为政治上的盲动主义服务的，同样是盲动主义的组成部分。

在属于“暴动区域党部指导机关犯了严重错误”的四案中，这种组织上的惩办主义最重要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负责同志的指责和处罚都是完全错误的。

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用武装斗争的实际行动批判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的旗帜。这是一次伟大的、胜利的起义。这次起义的发动和胜利，是由于以恩来为首的前委，坚决地击退和克服了张国焘主张联合张发奎、企图阻挠起义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结果。但《决议案》却无理指责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执行的是“机会主义的旧政策”^①，

^① 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五册，第266页。

在政治上、策略上、军事上都犯了“极大的错误”^①，是什么“软弱的军事投机”^②，给周恩来同志为书记的前委全体成员(包括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同志)以“警告”处分。这就完全抹煞了周恩来等同志在八一起义中的作用和功绩。当然，南昌起义胜利后，没有就近联合湘东的革命力量，发动和领导湘赣土地革命战争，而是驱军南下广东夺取中心城市，是一个失策，一个错误。恩来在一九四四年说，南昌起义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③，这个论断是对的，但主要责任在中央，不在前委。因为第一，当时党内的指导思想还是城市中心论，武装起义就要占领城市。李立三等同志建议南昌起义，就是脱离张发奎，去占领广州。毛泽东、彭公达八七会议后回湖南的计划，就是要打长沙。第二，还是正规战思想占优势，不是游击战争思想占优势。后来的山地游击战争的思想在全国都是逼出来的，甚至带着某种不自觉性(历代农民起义都有打游击的习惯，统治阶级称为“流寇”。大革命失败后，各地党员尤其是农民党员不能不受这种历史传统的影响)。上面这两种指导思想都是共产国际经过它的代表传过来的，中国同志由于幼稚没经验，无条件接受了。至于南昌起义军要南征去占领潮汕，以便接受苏联的援助，更是共产国际的具

①②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五册，第266页。

③ 《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3页。

体指示。

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起义。这次起义不但保存了革命武装力量，而且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不是偶然的事情。我在前面已经叙述过，在马日事变以后和八七会议以前的七月间，毛泽东对农民游击战争就已有一定的认识。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彭公达回到湖南，代表中央改组了湖南省委，新省委提出了举行长沙暴动的计划，得到了中央的批准。当时，由省委书记彭公达直接组织长沙暴动。前委书记毛泽东去发动和领导安源、醴陵、浏阳、平江一带的起义，组织进攻长沙的敌军，加之吸收了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组成一个约有五千人的师，准备与省委发动的长沙近郊和粤汉路的暴动里应外合，相机夺取长沙。后来见势不可能，便放弃了这个计划，而集中力量在平、浏一带创造割据局面，但没有成功，而且因反复激战，部队减员，只剩下千余人枪，被迫地却是机智地上了井冈山。

至于省委直接部署的暴动，在此种形势下则只能有零星的发动。那时有个“马同志”（即国际代表马也尔）住在长沙，规定湖南省委要某天举行暴动，以配合前线。彭公达等人认为条件不成熟，没有暴动。后来国际代表又一次叫暴动，彭公达他们又没有执行。由于彭公达和省委两次停止预计的长沙暴动，便受到了马也尔的严厉指责，并向罗米那兹和党中央作了反映。彭公达受到指责后，对于第一

次暴动没有搞起来，他没有承认错误；对第二次暴动没有搞成，他承认了错误。现在看来，当时的长沙暴动计划，无论从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来说，都是冒险性质的，停止和放弃它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同时，从土地革命战争的开端及其以后的发展来看，毛泽东率部把红旗插上井冈山，实在是具有伟大战略意义的转变（还有一些同志或前或后在若干地区展开或大或小的游击战，在当时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可是，《政治纪律决议案》却指责湖南省委“完全违背中央策略”^①，是“单纯的军事投机”^②，并宣布给予如下的处分：“湖南省委委员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应撤销其现在省委委员资格。彭公达同志应开除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并留党察看半年。毛泽东同志为八七紧急会议后中央派赴湖南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暴政策的特派员，事实上为湖南省委的中心，湖南省委所作（犯）的错误，毛同志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③（附带说，这也可能就是毛泽东同志曾经所说开除了他的党籍的说的由来。十一月扩大会议给毛泽东同志的处分，我过去记不得。在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谈到这个问题时，毛泽东同志说，开头听说是开除党籍，后来又说不是，究竟怎样不清楚。周恩来同

①②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五册，第267页。

③ 同上，第268页。

志对这个问题也不清楚，他便发问：罗迈，你记得吗？我答：不记得。现在我重新阅读了这个《决议案》的全文，对于在十一月扩大会议上谁受了处分，因何受处分，就一目了然了。）

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决议案》严厉地指责八一起义军前委犯单纯军事行动的错误，毛泽东、彭公达等人犯军事投机的错误，都是由于他们不发动农民实行土地革命。这种指责不是实事求是的。第一，当时的政治形势是革命处于低潮，到处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在遭受国民党反动派残酷镇压的地方，群众的革命情绪已经低落下去了。湖南原来是农民运动最有基础的地方，浏阳、平江更是处于前列地位，但当时从浏、平巡视回来的夏明翰说：“这次我军所到之地农民并未起来，远不及北伐军到时农民的踊跃。大多数农民甚恐慌不敢行动，恐怕军队失败大祸临来的心理充满了农民的脑筋。”^①“所有前在农协工作农民，除一部分外，已被土劣送解省城县署枪决囚禁外，余均逃了不能回籍，妻离子散，居住(处)被封者极多，情形非常凄惨。……这次暴动中，农民不敢起来，这个原因也有极大关系，惟恐失败后又遭土劣残杀。”^②在湖南如此，在江西更不会好些。刘伯承写的《南昌暴动始末记》中说：“广昌以北曾见

① 《弼时报告》(一)(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二期，湖南秋收暴动专号。

② 《弼时报告》(二)(一九二七年十月四日)，《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二期，湖南秋收暴动专号。

农运组织，但极幼稚，曾雇少数农民为力夫，其他无所表现，至在广昌以南为赖世璜的反动军队驻防之下，无甚农运组织，且其他在蒋介石命令实行清党，在民众(中)作反动宣传十分厉害，傍路居民逃避极多，我军来在一地停驻，无从作我们党的宣传，革委各机关及各军中负政治工作者，只得照例写得一些解放农民条例全文，没收二百亩以上之土地，继承国民党正统，打到广东去等等标语，顺道贴在路旁”^①。第二，暴动就是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发动群众，二是发动分田。其一，要使暴动成为群众性的暴动，必须有事前的准备，或者临事有发动的时间。在安源，因为有准备，加上当时主客观条件都具备，才成为群众性的暴动。在搞长沙暴动时，虽有准备暴动的时间，但因为群众情绪低落和党的组织力量薄弱，群众没有发动起来，结果只有几个零星的“暴动”。另外，起义部队边打边走时，只能做些口头或文字宣传，要待部队战胜敌人，取得短时间就地休整的机会，才能放手发动群众。这一层，八一起义部队和湖南秋收起义部队都是做了的，例如八一起义部队之在瑞金和在汀州，秋收起义部队之在醴陵和在浏阳。其二、至于发动农民起来分田，就需要有更高的条件。如果起义部队已经占据了一块地方，粉碎了敌人的进攻，站住了脚，就可以而且必须努力鼓动和组织群

^① 《党史研究》，一九八〇年第四期，第15页。

众打土豪分田地，造成游击战争与土地革命相结合，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和革命根据地。这就是土地革命战争的起点。在秋收起义部队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和八一起义部队南进时，都没有取得这种条件，因为在当时他们都是边打边走，其间在一个地方只有停驻几天的机会。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是经过反复苦战之后，才上了井冈山的，上山同袁文才、王佐部队会合后，才开始了分田斗争。因此，《决议案》批判南昌起义部队前委和秋收起义部队负责同志犯了“单纯军事行动”的机会主义错误，是主观主义的，是没有道理的。

综上所述，这个《决议案》的总的精神，是为盲动主义服务的惩办主义。在这个错误精神指导下，当时错误地处罚了一批党的领导机关和负责同志，这是十一月扩大会议的主要错误之一。

除了上述突出表现“左”倾盲动主义的三个主要决议案外，扩大会议还通过以下几个决议案：

一是通过了《关于土地问题党纲草案的决议》。在十一月扩大会议前，中央公布了《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十一月扩大会议决定征求各级党组织及一般党员对这一草案的意见，尔后提交党的“六大”讨论并作出决定。这个土地问题党纲草案和会后的讨论，为“六大”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思想，也是国共两党关系破裂以后第一个土地法草案。

二是通过了《关于召集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之决议》。这个决议对召开“六大”的时间、代表选举法、议事程序、各省党的代表会议的日期及议事程序等等，都作了明确的决定。

三是会议还特别组织了一个委员会，专门讨论和通过了新的职工运动决议案。这个决议案认为，八七会议之后，各地大致都有忽视职工运动的倾向，同时指出了反对反动工会和争取群众的任务，并要各级党组织从日常经济政治斗争引导工人群众认识苏维埃暴动的意义，以及工会的武装准备等工作之重要。这个决议案里的问题，主要是夸张地估计了当时工人斗争的形势，并对职工运动的任务提出了过“左”的要求。

此外，会议还有两项特别的新的决定，即：（一）“一切政权归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的口号，成为暴动的主要口号，而且大城市中斗争剧烈时，即应组织工农兵等群众斗争的代表机关，就是组织苏维埃，以为暴动的指导机关；（二）“没收一切土地，由农民代表会议自己支配给贫农耕种”，在乡村中也实行苏维埃的口号，取消一切政权归农民协会的口号。

总之，十一月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和其他决议案及中央所发出的一些《通告》，以及瞿秋白同志在这期间所发表的文章，一方面，包含着一些正确的思想和主

张，如严厉批判了党内的悲观思想，强调要深入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重申放弃国民党的旗帜，打出苏维埃的旗帜，号召真正革命分子团结在共产党的旗帜下，继续进行革命斗争^①；认为当时中国的革命仍然是“民权主义的性质”，是“彻底的土地革命”^②，而不是法国式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不是陈独秀的所谓“二次革命论”，明确提出了推翻新军阀国民党政权，和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目标；提出中国革命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联合最彻底的民权革命的伟大力量——中国的农民”^③，组织“工农革命军”，在军队中建立“党代表政治部的制度”^④；并指出在发动农民暴动，进行游击战争时，一定要“树立创造革命地域的目标”^⑤，等等。这都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另一方面，从这些文件的主要倾向来看，却是发展了八七会议以来加强起来的“左”倾情绪。因而提出了中国革命是“民权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无间断的革命”^⑥，中国革命“不能不同时推翻资产阶级”，“不能不超越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的范围”^⑦，中国

① 《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2月版，第121—126页。

②③ 瞿秋白：《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2月版，第118页。

④ 《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2月版，第135页。

⑤ 瞿秋白：《武装暴动的问题》，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2月版，第142页。

⑥⑦ 瞿秋白：《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2月版，第119页。

革命的形势是“不断高涨”，由此得出的全国总暴动的策略，以及在组织上采取惩办主义政策，等等，则是互相联系和一贯性的严重“左”倾错误。这样，在十一月扩大会议上就形成为以瞿秋白为首的“左”倾盲动主义，并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

盲动主义“总策略”的执行和 我去两湖巡视的情况

十一月扩大会议所规定的“现时形势之中中国共产党的总策略”，实质上是幻想全国总暴动的策略。这个“总策略”的执行情况，从十一月扩大会议后至共产国际一九二八年二月来信传到中国，中央的政治态度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十一月扩大会议后到停止两湖年关总暴动以前，具体来说就是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旬到十二月中旬。这个时期贯彻执行“总策略”的情况，我记得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十一月扩大会议以后，我们几个中央领导同志于当月制定了一个《中央工作计划》。这个计划明确规定：“目前党在组织上的主要任务为严格的执行最近中央扩大会议的决议使扩大会议决议的精神深入于党员群众中；坚决的改造各级党部，洗刷一切机会主义的遗毒，改造党的成份，使党的核心建筑在工农的身上，如此才能使党成为

一个斗争的布尔塞维克的党。同时要特别注意恢复和发展各重要省份的工人运动，以及组织并发动各重要省份的农民暴动，创造新的军事工作的基础。而组织中央本身之坚固的建立以及引导各地党部走入组织之正轨，亦为中央目前之重要的工作。”根据这一总的要求，《计划》规定了三个月内应做到的十七项工作和分三期订出具体工作计划。在第一期(从十一月二十日到十二月二十日)，中央决定派人巡视两湖、江浙的工作，布置这几个省的工农暴动的局面。这样，随着十一月扩大会议精神的下达和《中央工作计划》的贯彻执行，就使“左”倾盲动主义在实际工作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第二，广州暴动问题。南昌起义后，在起义部队南下广东时，中央曾指示广东省委，如起义部队在东江地区取得胜利向广州进军时，广州即应举行起义，夺取广州。后来，由于南昌起义部队攻取东江地区的军事计划失败，中央又通知广东省委说，广州起义的条件暂时丧失，但仍应积极准备，以待时机。十一月扩大会议之后几天，中央又与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同志讨论了广州暴动问题，根据粤、桂军阀战争即将爆发，工人运动迅速发展的形势，决定了广东总暴动的计划。接着，十二月十一日，在张太雷、叶挺、叶剑英、周文雍、恽代英、聂荣臻等同志领导下，发动了广州起义。这次起义，是广州工人与革命军人联合起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武装夺取政权的又一次英勇尝试。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广州起义是可能取得胜利的，后来的事实证明，起义取得了胜利，占领了广州，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给敌人以严重打击，对革命群众则给以很大的鼓舞。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①但当时党中央还是以城市为中心，想保住这个胜利，而在广州的共产国际代表纽曼（德国人），又力主起义后坚守广州。所以，在起义的当夜，当叶挺看到要坚守住广州并不容易，正确地主张把队伍撤退到农村时，纽曼便大骂叶挺动摇，说广州起义是进攻的，应该“进攻进攻再进攻”。结果，本来可以是英勇的胜利的一战，却由于盲动主义的指导，终于失败，使广州的广大人民群众遭受了极其残酷的大屠杀，而成为“退兵的一战”。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从总的方面看，对这次起义还是应该肯定，它是开始土地革命战争新时期的三大起义之一，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的影响。当然，不能否认，在起义的指导思想上也直接接受了“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

第三，关于两湖暴动问题。十一月扩大会议后，中央曾对两湖的工作作了多次指示。十一月十五日，《中央致两湖省委信》指出：“唐生智系军阀已日趋败溃，据沪报载唐已出亡，武汉交何键，湖南交刘兴，八军亦退湖南。这虽

^① 《战争和战略问题》，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12—513页。

不足证明唐系军阀纯全溃败，亦不足证明南京系军阀程潜李宗仁等之大胜利。但两湖大小新军阀从此混战的局面将益趋激烈而不可收拾。”

在对这种现状的估计之下，中央认为“在极短的时期内有造成两湖工农大暴动夺取政权之可能”，因此特命令“两湖省委注意两湖革命最近发展之前途，同时命令两湖省委利用唐生智系军阀崩溃与大小军阀混战，工商业财政破产的局面，更积极的发动两湖的革命，创造部分的暴动，汇合而成为总的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兵士代表会议的政权的暴动”。

在城乡主张采取“左”的政策，信里写道：在城市中当战争激烈以及某一部分军队败溃时，应当“杀尽改组委员会委员，工贼，侦探，以及反动的工头”；“尽量发动工人的经济罢工以至总同盟政治罢工”；“领导失业工人捣毁失业救济局，劳工部，警察局”；在汉口和长沙可领导工人“打外国人”。在乡村中则要“发展游击战争，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烧地主的房子”，如此等等。

至于两湖农民暴动的部署，信中说：“鄂省委应当在极短的时间内领导农民割据公安、石首、当阳向极西发展。并与湘西联合，割据天门、沔阳向四周发展，割据麻城黄安向鄂东与京汉路发展，恢复鄂南的工作成为一独立割据的局面，与湘北联合，恢复鄂东的工作；湘省委，应当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割据湘西，湘南，湘北各数县与鄂西、

鄂南联合。应当恢复长沙附近数县的农民运动，以至与长沙工人联合扑城。”

现在看来，中央这个指示是推行盲动主义的一个典型例子。这个文件只讲客观条件，不讲主观条件，不问群众情况。一味强求暴动，提倡烧杀，不计影响和后果。这种烧杀政策，后来在湘南造成极坏的后果。

至于两湖暴动的执行情况，其中盲动主义表现得比较突出的主要是两个问题：

一个是**武汉暴动**问题。一九二七年十月，爆发了宁汉战争，南京下令讨伐唐生智。十月二十三日和二十七日，党的湖北省委和党的长江局第九次委员会先后开会，讨论唐生智败退时党的政策，主张利用宁汉之战趁机在武汉三镇举行暴动。二十八日，中共长江局书记罗亦农自长沙回到武汉，召集长江局（罗亦农、陈乔年、任旭、刘昌群）会议，讨论长江局工作，次日通过了罗亦农起草的《长江局最近政治决议案》，认为“目前绝非继续总的暴动时期”。我认为长江局和罗亦农的这一决定，从主要的方面来看，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唐生智败退时虽然给了革命力量的发展以可乘之机。但就武汉当时的情况而言，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根本形势并未改变。当时，我们在武汉只有六百名党员和三千名工人群众，要想夺取敌人的中心城市是不可能的。但是，共青团湖北省委的一部分人却认为，唐生智溃败是两湖暴动的唯一时机，无论如何不能放弃。针对这

种情况，中共长江局于十一月一日召集长江局及省常委联席会议，特请罗亦农报告长江局十月二十九日的政治决议案，和答复共青团湖北省委一些人的怀疑。会议决定取消党、团湖北省委关于立即准备暴动的计划，改为从十一月八日至十四日举行武汉三镇反新军阀战争政治宣传周，但团省委的同志不同意。十一月九日，团湖北省委常委认为，唐倒已迫在眉睫，党应下令举行罢工和实行红色恐怖等等。在他们的压力下，党的湖北省委常委为“避机会主义之嫌”起见，决定十三日上午八时武汉三镇总同盟罢工，同时下午集合群众攻友益街。但群众的情形实际上还是不能暴动，因此直到十五日，武汉三镇罢工的很少。十五日至十七日，中共湖北省委开扩大会议，讨论罢工事件，认为省委未看清形势，党的组织太差。但共青团湖北省委一部分人却指责这是长江局政治决议案的错误和省委书记的错误，并认为：如果利用这次时机，“在武汉我们不仅可以推翻敌人的政权，而且可以把革命的政权建立三天至五天之久”^①。显然，当时共青团湖北省委一部分人的意见是错误的。后来，团长江局、团湖北省委代表刘昌群、韩光汉曾向中央控告罗亦农和党的湖北省委在唐生智溃逃时“畏缩不前，临阵退缩”，“犯了极严重的机会主义之错误”，要求中央“彻底

^① 《湖北C Y代表刘昌群、韩光汉对于湖北问题的报告》（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见《湖北纠纷问题专号》，《中央政治通讯》第二十期，第14页。

查究”^①。据此，中央派出了一个由苏兆征、贺昌、郭亮组成的三人特别委员会前往湖北查处。特委赴湖北后，采取了错误的党内斗争方针，对武汉暴动问题作出了错误的结论。由于中央和特委对湖北问题的处理引起了湖北党内广大党员和干部的不满，同时全国总暴动的方针在实践中也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因此，在听取了争论双方的意见后，十二月二十四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确认：唐生智崩溃时，武汉不能举行夺取政权的总暴动，罗亦农对湖北的政治指导并没有犯所谓机会主义的错误^②。

另一个是长沙暴动问题。根据党中央对两湖工作的多次指示精神，中共湖南省委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发出了为夺取全省政权总暴动的总动员通知，“决定于最近期间，开始夺取全省政权之总的暴动。”接着在十二月一日发出省委第二十一号通知，号召长沙暴动。到了十二月七日，省委又决定七日至十日为暴动日期，命令各县按时尽量暴动起来。但三天过后，长沙并未罢工。时至十日中午，在省委委员伍桐亲自指挥下，铁路工人才开始罢工，而人力车和码头工人仅在街上停着。晚七时，省委组织了二百人的敢死队，进攻电灯公司、军事厅和卫戍司令部，并由省委书记王一飞、省委委员伍桐亲自指挥，各打一路，结果只破坏了电灯公司。当晚，敌人调来一个师，暴动很快

① 《中央政治通讯》第二十期，第15页。

② 《罗亦农给中央常委并转政治局信》（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就被镇压下去了。

第四，关于上海暴动问题。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初，江苏宜兴、无锡的农民相继暴动起来，斗争是英勇的。这就引起了上海暴动问题，即以上海响应宜兴、无锡暴动的倾向在江苏省委中发展起来。十一月九日，江苏省委发出第八号通告说：“上海暴动时期……，现在确确实实的到来了。”^① 通告还说：“今日上海举行暴动，可说比从前三次大暴动的时机尤为成熟”^②。因此，通告提出“应以最迅速的手段加强主观的力量(如党的组织，工会组织，军事组织)，同时变小的经济斗争为大规模的经济斗争，纱厂丝厂便须做成整个的总罢工，由这种斗争很(迅)速的达到暴动。夺取武装，夺取政权。”^③ 通告最后要求各区委接到省委十一月九日通过的紧急决议案后，“应即召集活动分子大会讨论执行。绝对不准丝毫犹豫，凡犹豫不积极执行者，省委必决不容情的予以最严厉之处罚。”^④ 他们的天真想法和妄图发动上海群众举行暴动的特别方法是：先用几个武装的红色恐怖队去一厂一厂地威吓工人罢工，如此弄成总罢工，这样，暴动就可以起来而获得成功！江苏省委发出这一“刺激性”的八号通告，使党员同志在领导罢工时，只以强力打厂手段扩大罢工。结果，他们这样做反而脱离了群众，

① 《江苏省委通告第八号》(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见《中央政治通讯》第十八期《江苏特刊》，第95页。

②③④ 同上，第96页。

孤立了自己。后来，中共中央与江苏省委共同开会纠正了这种做法。

第五，关于北方顺直“大暴动”问题。一九二七年十月上旬，在北方发生了奉晋战争。中共北方局便利用这一时机，立刻在十月六日通过暴动计划，决定顺直区域（三特区、南口、京津、唐山、京东）的“大暴动”。当时，他们听到张作霖失败消息的传闻，便立刻下令叫天津、唐山暴动起来，并准备在天津站不住就退往热河去与外蒙联络。对于农民运动，他们特别注意于玉田、遵化，因此，北方局书记王荷波等同志曾带着新方针前去改组那里的党组织和指导农运。结果，只有玉田在十月下旬举行了起义，而且很快就失败了。这次暴动虽然发生在十一月扩大会议以前，但搞的也是盲动主义的一套。

从以上这些情况来看，这个阶段是完全执行十一月扩大会议总暴动策略的。

第二个阶段，是从中央决定停止两湖年关总暴动到共产国际二月来信传到中国，也就是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下旬至一九二八年三、四月间。在这个阶段，我想谈以下两点：

第一，在广州暴动失败以后，曾搞了《中央关于中国政治现状与最近各省工作方针议决案》。这个文件的原文无时间。我一九二八年一月上旬在上海时，这个文件尚未搞出来，但是一月二十日中央致我的信中已经谈到了这个

文件，并把文件寄给了我。所以，可以设想这个文件是在一月中旬制定通过的。

这个《议决案》错误地认为，在广州暴动失败以后，表面上看来革命又受到一次挫折，但从广东的海陆丰、江西的万安、湖南的茶陵、湖北的黄(安)麻(城)等处农民斗争的情况来看，当时中国“革命潮流一般的普遍和高涨”的形势是很明显的，“中国仍然在直接革命形势之中。”

接着，《议决案》按照对客观形势所作的错误分析，阐明了当时全党的工作方针，即：“领导工农兵士群众暴动而夺取某一省或几省的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以扩大革命胜利于全国”，并认为这是“绝对正确而必要的政策”。

那么，当时哪几个省份最具备夺取政权的客观条件呢？《议决案》认为是“两湖和广东，其次是河南等省。”同时，由于广州暴动的失败，湖南便成为“最有胜利机会的省份”。加上考虑到湖南与湖北、江西地域上的关系，以及历来革命运动发展的相互关系，尤其是武汉民众革命的胜利和湘赣边境农民暴动的胜利在维持湖南全省范围胜利中的作用，《议决案》认为“湖·南·与·湖·北·江·西·应·成·一·革·命·的·中·心·区·域”。

至于我党对于这些省份的主要工作，《议决案》认为当时应当利用军阀战争，发动广大农民群众起来进行斗争，造成武装割据的局面，同时要发展“军阀军队中的革命兵士运动，发展城市中尤其是长沙的工人斗争，引导一般贫民

群众到总的争政权的斗争，以至于总暴动而夺取湖南的省政权。”《议决案》还认为，武汉工人群众的团结与斗争格外重要，在那里“必须切实的建立工人的斗争组织，使他们与湖南湖北各地的暴动农民相联络，使武汉的群众运动能够切实准备以至于暴动”。总之，《议决案》认为应当肯定以夺取省政权为目标，但这个目标在当时是无法达到的。

随后，《议决案》指出了在广州暴动之后党的严重使命：要“认真建立党的群众基础”，“指导群众的日常斗争”，“发动领导汇合群众的斗争及其革命意识，以创造总的革命高潮，造成群众力争政权之决心，而勇敢的领导他们到决定胜负的暴动的发动。”《议决案》说，如果不要群众，而是只凭“少数共产主义者的勇敢，施行个人的暗杀，或在乡村中实行与群众脱离的游击以杀人放火，或者不问直接暴动的形势与条件具备与否，轻易号召立刻在大城市暴动起来，轻易的脱离群众，实行少数党员的暴动”，那便是“玩弄暴动的盲动主义”。这些指示基本上是正确的，也是想要防止盲动主义。可是，由于党中央的“总策略”本身就是盲动主义的，这段话在执行过程中就不可能起到防止盲动主义的实际作用了。

最后，《议决案》认为当时的中国革命运动有一个应当特别需要注意纠正的缺点，这就是“客观上好象农民运动超过于工人运动，……工人阶级有不能领导农民争斗，城市

不能成为农民暴动中心的危险”。其实，这种看法是错误的。首先，忘记了农民革命是在工人阶级先锋队领导之下进行的。毛泽东同志后来批评说：“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①

总之，这个《议决案》是在推行十一月扩大会议“左”倾盲动主义“总策略”已经受到挫折的情况下制定的，这时中央的方针已经有后退，因而其中有些论述是正确的，但从文件的基本倾向来看，仍然是一个继续推行“左”倾盲动主义的文件。

第二，关于停止两湖年关总暴动问题。在党中央推行“左”倾盲动主义使革命不断遭受损失的时候，一九二八年一月上旬，中央决定派我到两湖去，停止两湖同时搞阴历年关总暴动（不是停止和取消两湖搞暴动或两湖各自准备的暴动），根据中央的决定，我于一月中旬到达了武汉。

中央于一九二八年二月三日致我及两湖省委信说，中

^①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99页。

央在《关于中国政治现状与最近各省工作方针议决案》中“并未肯定全国的暴动中心(即全国苏维埃政权的中心),而只说从工农革命群众主观的力量与豪绅资产阶级军阀政权的动摇,这许多主要条件之下,以广东与湘、鄂、赣易于举行与得到全省总暴动夺取政权的胜利。因此广东与湘、鄂、赣应为全国革命发展的中心区域。在湘、鄂、赣因为地理的关系,工农兵士群众以及工农兵士群众的领导者——C. P. 力量的关系与暴动发动取得一省政权与维持这一胜利的关系,湘、鄂、赣三省举行暴动应以湖南为中心。”^①可见当时中央的方针,第一是把广东和湘、鄂、赣当作全国革命发展的中心;第二,湘、鄂、赣三省暴动则以湖南为中心。

为什么党中央在十一月扩大会议后要急切地抓紧两湖暴动呢?因为当时那里的军阀混战正在激烈地进行,中央抓紧两湖暴动有配合广州起义的意图。可是,十一月扩大会议前后的两个月以来,武汉、长沙总暴动发动未成的经验,广州起义后失败的经验,使中央看出两湖年关暴动也搞不起来,便不得不决定停止两湖的年关暴动,并对两湖暴动从新加以部署。当时中央给我和两湖省委的信中说:“不但暴动的中心问题湖南应是湘鄂赣三省的中心,并且这三省的暴动形式,也不能象广东一样先以长沙武汉三镇做

^① 《中央致罗迈同志及两湖省委信》(一九二八年二月三日)。

发动暴动的开始。这一要义，迈兄在中央时已讨论过几次，望详细地为省委同志加以解释。总之无论湖南湖北那一省举行全省总暴动，在主观条件上必须要中心城市的群众工作做得很好，中心城市附近各县的农民群众普遍的起来，对于暴动均有相当的认识。各外县的农民必须要有许多县分造成割据的局面，全省都在暴动的恐怖与骚扰中，有确实把握的比较大的兵士兵变才能举行。”^①

显而易见，当时党中央的这些总结性的意见是好的，在暴动问题的认识上比原来提高了一步。这些意见说明，当时秋白等人在暴动问题上犯盲动主义错误，是由于缺少经验，因而是认识问题。同时，这些意见在事实上阻止了两湖总暴动的再提出。并且，这些意见还很可能是随后中央容易接受共产国际批评的主观因素之一，但是，当时中央并没有从议程上取消两湖暴动的问题，我去两湖仍然按照中央的方针和指示执行了巡视任务。

我从上海到汉口时，湖北省委书记是郭亮同志。其他负责人我只记得有夏明翰、苏先骏。我一到武汉，先与郭亮接上了头。那时武汉的形势很严重，连住的房子也找不到。湖北省委只有郭亮租了一栋房子，其余的人都没有地方住。夏明翰当时是湖北省委委员，他住在龚饮冰介绍的湖南商号中。由于省委租不到房子，没有地方招待，我在武

^① 《中央致罗迈同志及两湖省委信》，（一九二八年二月三日）。

汉期间一直住在法租界一个旅馆中。当时我化了装，头戴瓜皮帽，蓄着胡子，身穿驼绒长袍和直贡呢马褂，带有水烟筒和珠算盘，装作是上海坐号商人，准备回长沙结帐，因两湖战争，行旅不便，在此地滞留若干日。平日来我处找我的为郭亮、夏明翰及共其团长江局书记刘昌群等人。为了作掩护，有时我们还一起搓搓麻将。阴历除夕，郭亮和夏明翰到旅馆看我。郭邀了熊季光来搓麻将。郭、熊走后，我同夏明翰买了一瓶白兰地，一边喝酒，一边谈话，谈到天亮，白兰地也喝完了。阴历大年初一，郭亮还要我到他家去吃过一餐饭。

在工作方面，我与省委接头后，随即向省委传达了中央停止年关总暴动的指示，并共同商定了新的工作部署。当时外县的农民暴动，鄂北和鄂东南较有起色。我在一饭店楼上会见过黄安来的同志。他们有的是到省委接头的，有的是到武汉买盒子枪的，一个个都精神抖擞。但都不注意保密，甚至还把买到的枪支放在饭店的楼上。我曾告诉郭亮，这样是危险的，万一被敌人破获，就全完了。

一九二八年一月三日《中央政治局关于湖北党内问题的决议》中谈到：对于湖北省委扩大会议选举的省执行委员会和省监察委员会名单中“郭亮贺昌两同志中央另调工作，加派刘伯庄袁达时加入省委为委员”。此后，中央决定成立湘鄂赣边特委，以郭亮为特委书记。根据中央的方针，我在武汉期间，同郭亮等同志商定了湘鄂赣边特委的区划，

决定该特委辖湖南之浏阳、平江、岳阳、临湘；湖北之咸宁、蒲圻、通山、通城、崇阳、嘉鱼；江西之修水、铜鼓，共十二个县，特委机关驻岳阳，受湖北省委领导。郭亮离武汉后，省委书记由刘伯庄继任。郭亮很快即去岳阳就职，不久因军事部长苏先骏在长沙被捕叛变，带领敌人至岳阳将郭捕到长沙杀害，时湖南省长为程潜。郭亮在岳阳被捕的事，现在还有刘英可证实。

我到武汉不久，就收到了中央一月二十日的来信。那时，共青团湖北省委曾于一月十一日写信给中央说：“湖北已经到了工农兵暴动夺取政权时候……工农群众已经普遍的起来。省委已于十一日决定湖北全省总暴动的日期及一切具体的计划”^①，因此，中央来信“反对即刻举行总暴动”^②。并希望我斟酌情形，按照中央寄来的《中国政治现状与最近各省工作方针议决案》关于湘鄂赣工作的指示，督促湖北省委布置湖北的工作。当时，中央还收到了湖南省委寄去的湘南特委报告，中央看了之后认为，湘南特委主持工作的同志有不正确的非无产阶级的政治倾向。如他们的口号有：“暴动起来恢复农民协会实行农民协会专政”，“暴动起来工人占据工厂自己管理”^③，等等。他们还认为当时的革命环境“已较好于十月革命前之俄国”^④。中央希望我到湖南时加以纠正。

①②③④《中央致罗迈同志信》（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日）。

在中央来信之后，我于一月二十五日晚上给中央写了封信。信的主要意思是说，湖北农村的斗争比湖南深入，湖南乡村豪绅的统治相当的稳定，同时湖北还有其他的条件，如政治经济的意义和工人区域等等，因此两湖暴动应以湖北为中心。中央收到我的信并听了其他同志的口头汇报后，在二月三日给我和两湖省委写了封信，答复湘、鄂、赣三省举行暴动，仍应以湖南为中心。

在武汉住了一段时间，本来我是打算去长沙的。我已派出准备陪我去长沙的郑伯祥去长沙同省委联系，以便作些准备。可是他去后一直没有回音（后来我约在一九三〇年知道，他已被捕自首，但没有供出我来）。当时，军阀战争已发展成为蒋派（在湘）与桂系（在鄂）之间的战争，形势很紧张，武汉和长沙白色恐怖很厉害。湖南省委连续遭到破坏，先是省委书记王一飞被捕牺牲，接着继任书记任卓宣又被捕后叛变。因此，中央通知我说，目前长沙危险，不要去长沙。于是，我在二月四日晚上给湖南省委写了封信。在信中，我首先针对湖南省委在遭受损失后所产生的悲观情绪，分析了湖南的有利条件，说明他们应“一方面急图指导机关的建设，一方面则应根据中央的指示具体指导全省工作。”^①接着，我讲了中央的指示中有两点应加以修正：第一，关于两湖暴动以湖南为中心的问题，根据当

^① 《两湖巡视员罗迈同志致湖南省委信》（一九二八年二月四日），见《中央政治通讯》第二十一期。

时两湖的实际情况应以湖北为中心；第二，关于湘西北割据的问题，我们不能太重视这一区域在两湖暴动中的地位。第一点意见，经中央来信改正，仍以湖南为中心。第二点意见，现在看来也是不对的。随后，我谈了工作安排问题，指出：“湖南亦是外县很好，长沙太坏，与湖北一样。由此可见中央对湖南指示中，关于长沙市工作的一方面是异常正确的，兄处应当把这一指示具体的实现起来”^①。其次对外县工作区域，提出了包括新规定的“湘鄂赣边特委”的区划在内的几点建议。最后，我在信中说：“我因工作上之需和环境关系，不能来长，我预备十五天以外回中央，十天以内召集京汉粤汉二路负责同志规定二路工作计划，十天到十五天之间召集湘鄂赣豫四省委代表在汉开一次会（定本月十四日）讨论四省共同关系。对于湘省工作请省委根据中央之指示及这封信，定出：（1）湘省政治任务及工作方针决议，（2）职工运动具体计划，（3）农村斗争计划，（包括客观分析及批评割据，长沙为中心之区域及一般工作。）（4）长沙市工作计划，（5）党的组织上的改造和发展及人力的分配，（6）军事工作计划等六个草案，派伍桐兄及另一多熟悉点情形的工人同志来汉决定。”^②我去信的方针，仍然是准备两湖暴动。湖南省委收到信后，派何资深（即伍桐）来到武汉，我与他共同商定了一个湖南的工作计划由他带

^{①②}《两湖巡视员罗迈同志致湖南省委信》（一九二八年二月四日），见《中央政治通讯》第二十一期。

回。

我在武汉期间，中共河南省委还派一位负责人带着该省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到我处来过，我从他的口头报告中知道了河南各方面的近况。二月十九日，我给河南省委写了封信。在这封信中，首先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我写道：

“河南目前客观的革命环境异常之好，冯玉祥之统治比较以前更加不稳定，工农群众固然对冯极端怨恨，就是一般穷苦小资产阶级也成了反冯的群众，只有豪绅资产阶级站在冯的方面。……依现在大局形势，北伐已经成了蒋冯阎互相牵制推诿的局面，蒋介石缓北急南和奉除桂的趋势已日益显明，这次蒋冯会面据我个人的推测，蒋的目的恐怕不是真正去促进北伐战争吧！无论冯玉祥在最近的将来继续北伐或者反戈而南，河南的统治必定是愈向崩溃的路上发展，河南的党应抓住这一时机发动一个革命的富于群众的斗争高潮。”^①

根据对河南形势的分析，我在信中明确表示：“大体同意”河南省党代表大会的决议^②，并向他们指出了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其中特别谈到：“在党的力量上看，全省工作的布置，不要取普遍的主义，而应当抓住几个中心去集中力量发展，依我的意思，平汉陇海道清三铁路及其他工人区，郑州为中心一区，开封为中心一区，洛阳为中心一区，

^{①②}《中央巡视员罗迈同志致河南省委信》（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九日），见《中央政治通讯》第二十二期。

卫辉为中心一区，许昌郾城为中心一区，信阳为中心一区，光山为中心一区，南阳为中心一区，每区的范围包括三县至五县，豫南的光山南阳二区虽然过去深有基础，但必须加紧力量去发展起来。造成割据局面。因为这几区在声援湖北总暴动上关系极为重要。其余各区原来都有点基础的，如果能根据新的策略在这几区做了相当的工作，可以说就是河南革命前途上建立了相当的根据。”^①

我在武汉把一切工作料理完毕，即回上海。

我一回到上海，便将我赴两湖巡视的情况向党中央作了汇报。中央对我在武汉的工作基本上是满意的。一九二八年三月十日，《中央致湘鄂赣三省委信》说：

“中央认为中央巡视员罗迈同志对于两湖工作的布置和决议及湖北省委自己的决议大体都是对的，惟尚须指明的：

（一）湖北——在政治任务决议案中大体是对的，惟目前因情势已有变更，故在中央特派指导湘鄂豫四省工作的临委到后须另成一新的决议，在此新的决议中要注意将各项工作说得具体些。鄂中是湖北的一个重要区域，原有决议中对此稍嫌忽略，这是不足的，在新决议中应注意及此。职工运动决议案亦可适用，惟对于各厂各业的斗争策略尚嫌不足，此须在实际工作时详加讨论规定。此外在各

^① 《中央巡视员罗迈同志致河南省委信》（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九日），见《中央政治通讯》第二十二期。

县的决议案中要注意各县应向武汉这个中心发展。

(二)湖南——罗迈与资深同志商草之湖南工作决议案湘省委应当依此决议执行，惟中央尚有下列几点意见：1、在工作要特别注意几个重要的区域：A、湘鄂赣边界一区；B、以醴陵为中心的一区；C、以常德为中心的一区；D、以衡阳为中心的一区；E、郴宜的一区；F、茶攸一区。湘潭为中心的一区取消，因为该区的工作可由省委直接指挥。至于发展的趋势应该注意从广东到湖北的湘赣边界，各区发展的趋势应趋向于长沙。在朱培德部队占据的郴宜等县应注意土地革命之深入，群众向外发展的路线应是西向宝庆，北向衡潭，至其在军事上则应向衡潭发展。其次湘东之醴萍茶攸酃与赣西南之遂川宁冈莲花诸县在工作上应有一密切的联系，湘东特委与赣西南特委必须经常发生密切关系，如将来在这些地方的割据将会合时，临委可以决定此两特委合并归湖南指挥。至毛泽东的军队之分配应看两特委之需要，由两特委共商调遣，不必专于死板的决定其驻在某地。

(三)江西的工作，中央最近已有详细的指示，江西省委应努力实行中央这些指示，并须注意加紧各处割据局面之创造扩大与深入，对于南浔路的工作要特别的加紧，不要只专注意于赣西南的局面。”^①

^① 《中央致湘鄂赣三省委信》(一九二八年三月十日)。

上述情况表明，在这第二个阶段，中央的部署还没有摆脱全国性质的暴动，还是在推行盲动主义。但是，由于广州暴动的失败，使中央已有所觉悟，因此即去停止两湖年关总暴动。可是，中央仍然没有取消湘、鄂、赣三省的暴动（八七会议前是决定在湘、鄂、赣、粤四省举行秋收暴动），并且又加上了河南暴动。但暴动计划和部署，与以前大不相同，即是采取分区创造割据，包围中心城市，同时加强城市工作，而不是象以前一样，首先就是要夺取长沙、武汉。对盲动主义的实行来说，这是一大退步，反之，在认识上却是不小的进步。这是后来容易接受国际指示的历史前提。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执行“总策略”的过程中，还出现了几种重要的错误倾向：一、认为没收一切土地已经是社会主义革命。从前是说忽视土地，这时已经说到没收一切土地了，甚至分配土地给贫民了，这就使一些同志错误地认为，从前搞的是民权革命，这时已经是社会主义革命了。他们这样自己问自己：平均地权的平等主义，还不是社会主义的运动么？他们不明白农民的土地革命乃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因而忽视了自耕农抗捐抗税的民主斗争，混淆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二、主张没收一切资本家的财产。在十一月扩大会议时就有人提议：农民可以分到土地了，工人只得八小时工作制是不够的，不能引起他们暴动的热心的，最好说，汽车夫

没收汽车，工人店员没收工厂商店，各人有所得才好。广东省第一次省委扩大会时，也有许多人提议：没收一切资本家的钱财。这种想法，其实不是社会主义。他们的出发点是：农民得田地可以成小资产阶级，工人也应当分得些钱财，成为小生产者。很明显，当时他们这样做是完全错误的。三、实行烧杀政策。当时，有些地方的农民运动除杀戮豪绅之外，还“必须”加上烧屋的工作。如湖北汉川农民暴动的指导者，要烧去整个儿的城市，湖北许多村庄整个儿的都烧尽。湖南某些指导者，主张烧光县城，只取出暴动农军所需要的东西（如油印机等）。江苏省委的暴动须知也说：“必须挨家挨户告以暴动口号，号召……起来参加，不来者以反革命纪律制裁。”对于这种强迫群众的错误作法，中央曾经纠正过。这种烧杀主义，对革命是十分有害的。四、把民众政权变成了党的政权。以前各地的工农运动，往往只有党员个人领袖的英雄主义，没有党团的作用。到了这时，“党权运动”高涨，变成了党的政权，而不是工农民主政权。海陆丰的情况也是这样。暴动胜利后，仍旧不是群众政权。党组织完全代替苏维埃，没有广大的群众参加政权。如此等等。这几种错误倾向后来才逐渐得到纠正。

以上，就是以“广东与湘、鄂、赣为全国发动中心”的各重要省份准备和发动总暴动的经过简况。它证明了当时临时中央政治局确实犯了盲动主义错误。

共产国际的二月决议 和“左”倾盲动主义的基本结束

我去武汉停止两湖年关暴动后，大约在二月下旬回到上海。在这期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召开了第九次扩大会议，通过了苏联及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斯大林、布哈林等所提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共产国际曾指令我们党的向忠发和李震瀛出席了会议。向忠发于一九二八年九月十四日写过一份《中国工农代表团来苏联经过报告》，其中专门有一节讲了“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中的中国问题”。这个报告我最近已经找到了。

报告说，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扩大会议所讨论的问题共五个，即：反对派问题，职工问题，中国问题，法国问题，英国问题。其中对职工、中国、法国和英国问题并组织了特别委员会。中国问题，在这次大会上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中国问题预备会议上，在特别委员会上，经过很长久和热烈的争论，所得出的决议，把过去丰富的斗争经验作一结论，正确地指出中国革命在目前阶段的性质，并指出目前革命形势和党在组织上及策略上的任务。

报告说，在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上，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和观点：有极右的意见，亦有极左的意见，极右的意见说“中国革命遭了极大的失败，一切群众组织和党的组织归

于破坏，党与群众发生裂口，……广州暴动是军事冒险，是中国革命到了背城借一的形势，……我们现在只有把过去犯错误的党的组织一概都不要，重新再来过，革命工会应取得公开，用群众请愿示威方法，取得合法组织，当利用现有合法工会(黄色工会和政府工会)做我们活动，……”

这样说法，其结果必致走到合法的改良的路上去，其结果必然要反对党的暴动政策，反对组织苏维埃。对这种极右的意见，在中国党内机会主义流行时期，或可以找到一些应声者，但在这次国际会议上，绝没有一个附和者了。至于极左派的意见，倒反有许多人附和，他们说，中国革命无论从他的客观内容、任务、动力来看，都已非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已到无产阶级性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是不断性的革命，……中国资产阶级只有资产者没有形成整个阶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之叛变革命走向反革命中去，反使反革命营垒的力量减少，更增加他们内部的矛盾冲突，反动统治一点绝无稳定可能，革命力量向上涨，反革命力量向下降，现时的革命形势是不断的高涨……中国革命发展的前途只有不妥协的革命的社会主义道路，改良的资本主义道路绝无一点可能……。这种极左的意见，恰与中央十一月扩大会议的决议内容相合……。在这次国际大会上，指出他们(极左的意见)理论的误解，观察的不清，分析的矛盾，和估量的错误等，而定出正确的列宁主义的意见，已如中国问题决议中所言。

报告紧接着说，这个决议案简单明显，而所指示的，各方面都顾到，对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帮助中国革命的意义和必要，更具体的确定的指出来，这个指示绝不是白纸黑字，官样文章，而要切实的积极的去执行，这是决议精神中重要的一点。这个决议，本来为在国际六次世界大会前短时期内适用的，这次国际六次世界大会对中国革命问题当有更详细更具体更正确的决议和指示，不久前中国党第六次全国大会中对政治问题的估量，分析和决定，完全与国际九次扩大会议对中国问题决议一致，从国际扩大会议到现在，国内所经过的实际政治变化，所经过的革命形势和党应有的路线及策略，都证明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对中国问题的决议完全是正确的。

《中国工农代表团来苏联经过报告》，是出席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扩大会议的向忠发在担任我党总书记期间所作的报告。

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扩大会议所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指出了当时我们党的工作中心和党本身的任务，它的内容基本上是正确的。例如：

第一，在革命性质问题上，《议决案》正确指出了“中国革命现时的阶段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①，批判了共

^① 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五册，第291页。

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关于中国革命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的错误主张。

第二，在革命形势问题上，《议决案》正确地指出：“中国工农广大的革命运动之第一个浪潮，大致都在共产党的口号并且大半在共产党指导之下者，已经过去。”^①当时“还没有全国范围的新的群众革命运动之强有力的高潮。”^②这就很自然地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当时是处在两个高潮之间。但“两个高潮之间”的说法是到党的“六大”时才明确起来的。《议决案》还说：“第一个浪潮的终了，是革命运动的几个中心地域，工农受着极厉害的历史失败，一部分共产党及一般革命的工农干部，受着极残酷的屠杀摧残，社会阶级两极端剧烈的发展，互斗的阶级各自确定自己的政治纲领，国民党军阀之指导完全暴露自己是反革命的指导，广大的劳动群众得着极大的革命经验，最后，使中国群众的革命运动，整个儿的进于新的苏维埃的阶段。”^③

第三，关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议决案》正确地指出：“中国革命的经验证实它的一种特性，就是运动的发展在各省是不平衡的，各自有当地历史的条件。它至今的发展，在城市与乡村之间也是不平衡的。”^④这一点非常重要。可以说这是实行农村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

①②③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五册，第291页。

④ 同上，第292页。

道路的重要理论根据之一。但认识了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并不等于就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革命道路，共产国际、斯大林都没有这个认识。

第四，《议决案》正确指出：当时党的主要的政策路线，是“准备革命之新的浪潮之高潮”，当时“党的工作之中心，是在争取几千百万的工农群众”^①。《议决案》还正确地、中肯地、有力地指出：“现时形势之中的最大危险，就是工农运动的先锋因为估计现时形势的不正确，而过于轻视敌人的力量，可以脱离群众而过于前进，散乱自己的力量，而使敌人得以各个击破。如果共产党不了解组织群众与争取群众之必要，如果它不能战胜种种使它忽视准备群众到新的革命高潮之企图，战胜种种使它忽视准备当前的中心任务之尝试，那么，共产党一定要被击散而散乱自己的组织。”^②这是深切的告诫。

第五，在具体的政策上，《议决案》指出要“注意加紧工农之间的群众工作，必须竭力加紧组织工会的群众工作，为此目的而利用工人所谓‘兄弟会’等等”^③。并指出：“如果黄色工会多少有些群众组织的性质，那么，也可以渗入公开的甚至黄色的工会，以夺取阶级敌人影响之下的工人”^④。这可能是第一次提出可以参加有群众的黄色工会。同时还提出：必须“永久抛弃职工运动中的恐怖政策”^⑤，

①②③④⑤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五册，第292页。

必须“最坚决的反对以强迫方法举行罢工”^①，必须“坚决的反对工人阶级某种成份之中的盲动主义，反对无准备无组织的城市与乡村中的发动暴动，反对玩弄暴动”^②。这些提法都很好。

第六，《议决案》指出：党“在‘八七’会议之后，大致纠正了自由的机会主义错误，……。可是它还没有完全适应现时形势的新条件，表现策略上的动摇（看轻盲动主义的危险，职工运动中之恐怖方法，……）以及组织上的动摇。”^③在这里，《议决案》在实际上指出了策略上的动摇的主要方面是“左”倾，是政治上的盲动主义。同时，《议决案》还指出党本身的当前任务是“巩固党部组织，吸收新党员，巩固中央党部与地方党部的联络，建立坚强的党的机关，正确的党与非党群众的关系，反对机会主义的余毒，反对‘左倾高调’（先锋主义，组织‘新共产党’的论调，恐怖主义，盲动主义，强迫罢工等等）”^④，这些都是很正确的。

此外，《议决案》还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意见，如反对各式各样的分裂党的活动，号召各国党要赞助中国革命，等等。

由于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

① 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五册，第292页。

②③④ 同上，第293页。

议决案》基本上是正确的，因此它对纠正临时中央政治局推行的“左”倾盲动主义起了积极作用。

当然，这个《议决案》也有它的错误和缺点。虽然《议决案》中承认广州暴动中的错误共产国际执委会也有责任，但《议决案》并没有对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一些“左”的指导思想进行自我批评。所以一些错误的认识仍然存在，仍然在起着指导作用。例如，《议决案》说：“资产阶级不但进而与封建军阀结合（成）完全的反革命联盟，而且事实上和外国帝国主义者妥协。”^①这种说法，对买办资产阶级即大资产阶级而言，是完全正确的，对民族资产阶级中极少数转到反动的右翼分子而言，也是正确的，但若对民族资产阶级也这样说，那就象八七会议所开始的那样，继续混淆了大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又如，《议决案》说：当时“许多朕兆，都指示工农革命正走向这种新的高潮。”^②这种估计，也是不恰当的。就当时工农革命的实际情况而言，还不能说“正走向”新的高潮。再如，《议决案》认为，中国各省区农民自发的游击暴动，“只有在他们与无产阶级中心之新的革命高潮相联结的条件之下”^③，才可以变成全国暴动胜利的出发点。并认为党的主要任务，“是在准备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因此，

① 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五册，第291页。

② 同上，第291—292页。

③ 同上，第293页。

必须反对对于游击战争的溺爱，反对沉溺于散乱的、不相关联的、必致失败的游击战争（这些危险在两湖等处曾经有过）。”^①这些论点仍然包含着各个地区的游击暴动要以城市为中心的思想，并且批评了当时刚刚发展起来的某些地区有根据地的游击战争。这种城市中心的思想显然是错误的。

共产国际的二月决议约在一九二八年三、四月间到达中国后，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开了会，在会上，大家都表示拥护共产国际的决定，并且作了自我批评。会后，中央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三十日发了一个通告，即《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二月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的问题》。

通告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二月会议的中国问题议决案之后，接受这一议决案之一般方针，并且认为在最短期间，于本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前，必须切实执行这议决案必要的具体步骤”。^②在实践中，中央对那些包含大中城市在内的暴动，确实是停止了，不再搞了。

通告接着说：“中央政治局认为自己过去的工作，正是一面与机会主义余毒奋斗，一面即尽自己的力量指正党内各地所表现出来的盲动主义。——这种盲动主义的倾向，

① 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五册，第293页。

② 《中央政治通讯》第二十九期（一九二八年六月十日）。

不但表现于无产阶级的工商业中心之玩弄暴动，而且反映着小资产阶级式的农民原始暴动的情绪，如杀烧主义，忽视城市工人阶级的倾向等等。——国际的决议亦就是指导我们努力继续战胜这些盲动主义以及青年团之先锋主义倾向，在艰苦的斗争之中锻炼真正布尔塞维克的思想，彻底肃清机会主义的余毒。”^①应该承认，当时的中央有“指正党内各地所表现出来的盲动主义”一面，如上面所提到的，特别是在广州暴动失败以后停止了两湖阴历年关总暴动。同时，虽然中央当时并没有终止继续准备以湖南为中心的两湖暴动计划，但却指出了“无论湖南湖北那一省举行全省总暴动，在主观条件上必须要中心城市的群众工作做得很好，中心城市附近各县的农民群众普遍的起来，对于暴动均有相当的认识。”^②这是在广州暴动失败以后中央所作的一个好的总结。这种思想认识使中央较为容易地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但也应当承认，当时的中央还有推行“左”倾盲动主义的一面，而在这段话里，中央本身却缺乏自我批评。

通告在部署各项工作时还说：“中央政治局认为不但要切实的准备城市与乡村之间邻近省区之间相配合相适用的发动，而且要加紧的领导自发的农民暴动，加紧的执行城市工人中之群众工作及宣传，加紧的执行兵士运动，使这些斗争相配合相适应起来。……苏维埃的区域之中要切

^① 《中央政治通讯》第二十九期（一九二八年六月十日）。

^② 《中央致罗迈同志及两湖省委信》（一九二八年二月三日）。

实实行土地革命，并且要努力建立红军，联合农民及革命兵士的力量。”^①中央关于当前各项工作的部署基本上是对的

最后，通告对十一月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革命是所谓“无间断革命”的提法进行了解释：“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问题，则中央政治局向来明白的认清中国革命还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土地革命）。脱洛茨基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无间说’，认为‘俄皇倒了，政府是工人的’。确是要跳过民权革命的阶段（工农民权独裁制）。而直接进于社会主义的革命。这种观点如果移到中国革命上来，是显然不正确的。中央政治局去年十一月扩大会议的政治决议案，指出中国革命是无间断的革命，只是要指出：中国之反对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是有确定的生长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趋势与前途。”^②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前面论述过，十一月扩大会议和秋白的论文有正确的一面，也有不正确的一面。看来，共产国际的二月决议只注意其中不正确的方面，而当时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则只注意其中正确的方面。

总之，我认为这个通告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也有缺点。其中最大的缺点。就是对十一月扩大会议决议及其实践中的盲动主义没有自我批评。有的同志说，这个通告是“羞羞答答的接受”共产国际的二月决议，事实确实是这样。一方

①②《中央政治通讯》第二十九期（一九二八年六月十日）。

面，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基本上执行了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另一方面，又不认真地作自我批评，并且对错误有点遮遮掩掩，甚至对十一月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革命在政治上组织上形成那么严重的盲动主义没有进行深刻的自我批评。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后来瞿秋白他们在六大会议上对这个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至于推行盲动主义和惩办主义的主要责任，都在以罗米那兹为首的共产国际代表。但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只是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指出了国际代表关于中国革命是所谓“不断革命”的错误主张。而中共中央关于接受共产国际二月决议的通告，则一概未提及国际代表的事，这可能是出于对共产国际的尊重。

以上，就是我对中央第四十四号通告的一些看法。其中，材料和观点都可能有缺点、错误。当时，这个通告是中央常委一致通过的。在发这个通告时，我记得还把共产国际的决议附在上面，发了下去。这样，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所推行的“左”倾盲动主义，就在全范围内的实际工作中基本上结束了。

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 思想根源和历史背景

从以上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八七会议产生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受命于危难之际。当时，全国一片白色恐怖，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而是“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①在这个过程中，以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坚持八七会议关于清除陈独秀投降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率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英勇奋斗，开辟了中国土地革命战争的新时期。它号召和指导有些地方由于大革命失败和陈独秀主义影响而趋于或接近于涣散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重新振作精神，保持了革命传统。在整个临时中央政治局时期，许多地方的农民暴动，经过“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②，直到创造和扩大工农红军，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工农苏维埃政权，成为以农村包围城市的起点。凡此种种，都是应该肯定的。

但是，秋白等人也实行了由八七会议开始的一些“左”的错误，并逐渐发展到十一月扩大会议，而形成政治上

① 《论联合政府》，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85页。

②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424页。

的盲动主义和组织上的惩办主义的严重错误。其中，主要表现在“主要省份”特别是两湖的总暴动，其次还有不问主客观条件的地方暴动。这些严重错误，曾给予党和革命事业以重大的损害。对此，我在前面已经夹叙夹议地进行了分析和批评（同时也指出决议案和秋白论文中某些正确的东西，没有给以抹煞）。还应当看到，以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所犯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既不同于因胜利而骄傲起来的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更不同于篡党夺权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因为我们是在执行八七会议总方针过程中所犯的错误。

我写这篇回忆录，把上述情况全部摆出来，其目的在于解剖和批判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的盲动主义错误，同时也是解剖和批判我自己，因为我是临时中央政治局主要成员之一。下面，我将对盲动主义发生的思想根源和历史背景试作分析，这同时也是我的自我反省。

以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所以会犯政治上的盲动主义错误和组织上的惩办主义错误，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据我观察，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

第一是马克思主义太少。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这是自党成立的时候就确定下来的。但是，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地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解决中国革命一系列的新问题，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这需要有一个认识

和实践的过程，甚至需要一个多次反复并付出相当代价的过程。既要不断地、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掌握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又需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对中国社会及其特点做深入细致、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并制定出符合中国实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只有这样，中国革命事业才能得以逐步发展并走向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面临着许多极关重要的新问题。例如：中国革命的形势，是高潮还是低潮？中国革命的性质，我们已经抛弃了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那么继续要进行的是胜利后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彻底的新式民主革命，还是允许所谓“超越民主主义范围”的“不间断革命”？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民族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应不应加以区别？中国革命的道路，是否应当继续以“城市为中心”，还是应当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新道路？再如，怎样反对陈独秀主义，怎样贯彻八七会议的正确方针，怎样举行秋收起义，怎样搞土地革命，怎样建立军队，怎样打仗，以及在斗争中联合谁、打击谁，等等。总之，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特别是在革命情势的转变关头，遇到的这许多特殊问题，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决议，照搬苏联经验，是不可能解决的。

那时，秋白等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一定的了解，

对中国革命问题也提出过一些正确的主张。但是，总的说来理论水平不高，还缺乏经验，也有些教条主义。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没有很好地研究，对于过去的经验教训没有很好地领会，未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这是犯错误的根本原因。当时，毛泽东同志已经开始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观察和处理问题，但是未被公认。八七会议他只当选为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十一月扩大会议更被撤销了。虽然两次都是国际代表的提议，但又都是与会的中国同志举手通过的。

第二是“左”倾急躁情绪的发展。

在大革命失败以后，我们党已经懂得了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主要是由于陈独秀等人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在以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领导期间，同陈独秀主义彻底决裂了，并进行了坚决的反陈独秀主义的斗争。但是，并不懂得清除陈独秀主义要从思想上清除，才能肃清其在党内的影响，而是简单地主要地采取组织处理的方法。结果，一声吼，陈独秀被打倒了，但陈独秀的思想和影响还在，而且在反右的同时，“左”的情绪又滋长起来。

当时，我们党的许多同志对大革命失败的痛苦经历有非常深切的感受。在极端严重的白色恐怖下，要革命的人日子很不好过，甚至连自己的头都保不住，然而他们凭着

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崇高信念，凭着百折不挠、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继续进行革命斗争，希望迅速冲破失败的局面而复兴革命。并由于对白色恐怖的极端仇恨，不能冷静地总结教训，尤其是在农村的武装暴动中不能不带有冒险性。这样就产生了狂热、拼命和冒险情绪——革命者的急躁幼稚病。当时，这种“左倾情绪”，在革命者内部乃是普遍现象。除了这种“左倾情绪”外，还有一个认识问题，即所谓“左”比右好。“‘左’是站着斗，右是跪着降”，当时在党内（一定范围内）已经形成了舆论。而“左”倾情绪和“左”倾认识（理智）结合起来，就成为盲动主义发展的动力。这个动力有两重性，站着斗争，这是正确的；但是这种斗争受“左”倾情绪支配，便带有盲动性。由于这种急躁幼稚病，又由于接受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一些“左”的理论和政策思想，例如，在八七会议《告党员书》里面，就存在着一些“左”的形而上学的偏激论断，而这个《告党员书》和罗米那兹的政治报告，在八七会议上是受到一致拥护的。拿我自己来说，在八七会议前夕，秋白彻夜翻译《告党员书》，他译一页，我看一页，最后翻译完毕时，秋白问我：“怎样？”我答：“一剂清热散（意指清醒脑筋），好极了！”这样，就没有能够在党内正确地树立起反投降主义的旗帜，开展既反右又防“左”的两条战线的斗争，而只是树起一个“右是跪着降”的对立面——过左的“站着斗”的旗帜，于是，盲动主义代替了投降主义。

第三是对革命形势和敌我力量的对比作了错误的估计。

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秋白等人并不认识当时是敌大我小，敌强我弱，革命处于低潮时期。相反，他们却认为当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①。在广州暴动失败以后，他们也不认识广州暴动是退兵一战，而仍然宣称当时的革命形势是“继续高涨”。由于他们从主观主义出发，对中国革命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盲目乐观，不恰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在伴随而来的行动问题上，就制定了举行全国总暴动的冒险计划。其结果，就必然走上了盲动主义的道路。

后来，到召开党的“六大”时，对这个问题还有争论。当时，“中国代表曾争论到斯大林同志面前。斯大林同志说，现在的形势不是高潮，是低潮。李立三同志则说，现在还是高潮，因为各地还存在工人、农民的斗争。斯大林同志说，在低潮时也有几个浪花”^②。实际上，在低潮时的几个浪花，就是在革命失败后重新点燃起来的星星之火。而秋白等人的错误，就是把低潮时期的几个浪花当作革命的高潮。

经过以上这一番争论，最后，党的“六大”《政治决议案》才指出：“广州武装起义，客观上是革命失败过程中的‘退

① 《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2月版，第127页。

② 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5页。

兵战’，但是这一点我们党底指导机关却没有估计到。”^①当时的指导机关“轻视了帝国主义及反动派底势力，夸大了农民运动底胜利，对于革命失败程度的估量也是不够，因此，例如没有估量环境的两湖武装起义计划，就是错误的。”^②这一段论述，虽然还有点自我宽恕，但终究说明了问题。

第四是不懂得中国国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

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旧中国“是在强大而又内部互相矛盾的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和中国封建势力统治之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其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不平衡性和不统一性，这就规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之极大的不平衡性，使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不能不经历长期的曲折的斗争；同时又使这一斗争能广泛地利用敌人的矛盾，在敌人的统治比较薄弱的广大地区首先建立和保持武装的革命根据地。”^③这是中国社会的重要特点之一。

可是，秋白等人在当时并不了解这一点。然而，这却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指出：红色政权的发生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

①②《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2月版，第158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23页。

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种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①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加上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而农村特别是几省交界的偏僻山区则是反动统治锁链中最薄弱的环节，这就造成了反动统治的缝隙，使革命力量有可乘之机。后来的实践告诉我们，一九二七年秋毛泽东把红旗插上井冈山，经过短短的三年时间，我们党就在全国创造了几个大块苏区和几支强大的红军，以至能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这是我们当时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但是，这并不是说秋白等人的认识没有变化。在广州暴动后，中央的认识有点进步，停止了两湖年关总暴动，明确对湘、鄂、赣三省的暴动不是从占领中心城市开始，而是先从分区割据做起，同时加强城市工作。不过，当时还不懂得利用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不统一的特点，从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做起。实际上，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落后，正是革命发家的条件，只看我们能否正确认识和能否正确利用。

关于政治发展不平衡，包含两个方面：敌人统治力量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49页。

的不平衡，革命群众基础的不平衡。例如，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在政治上造成了南方和北方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南方九省经历了广大群众的革命高潮，北方农村却只是一般发动起来。可是，后来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代表者们却否认这一点，错误地反对所谓“北方落后论”、“北方特殊论”，要求在北方乡村中普遍建立苏维埃政权，在北方白色军队中普遍地组织哗变成立红军，结果给革命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失。而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情况发生了相反的变化，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紧紧抓住这一点，因势利导，结果排除了所谓的“北方落后论”，使北方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第五是机械地搬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北伐战争关于城市中心和正规战争的经验。

毛泽东同志说过：“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①但是在同一个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中，实行的是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然后把革命从城市推向农村。中国则不同。在这里，“共产党的任

^① 《战争和战略问题》，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06页。

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①

但是，以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在领导期间，并没有能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的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便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在中国实行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相反地，却照抄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盲目追求以中心城市暴动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或者幻想北伐时期正规战争的再现。正因为如此，我们当时特别强调要发动城市工人暴动，并极力主张“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② 当时所谓重要省份的暴动，都是这样要求以城市为中心的城乡结合总暴动。

同时，当时所有有关文件和文章都贬低农民暴动，如把农民暴动称之为“自发的”农民暴动^③，或称之为“农民之自发的游击暴动”^④，意思都是指这些农民暴动还没有得到工人阶级的直接领导（当然不是没有得到共产党的领导，因为不是经过共产党组织和发动的纯粹自发的农民暴动，事实上虽然也有，但那是极个别的）。共产国际一九二八年的二月决议还以“反对对于游击战争的溺爱”^⑤ 来反对小块割

① 《战争和战略问题》，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07页。

② 《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2月版，第130页。

③ 同上，第127页。

④⑤ 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五册，第293页。

据,反对由点到面的路子(即由点发展到面,或由点的结合而成面)。

总之,以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对武装起义固无经验,也缺少研究。他们不懂得我们党领导的秋收起义是农民武装起义,是打游击战争,而只是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北伐战争的经验:占领中心城市,打正规战争。

不过,秋白等人的主张,在当时是并不奇怪的。毛泽东同志在领导秋收起义过程中,开始也是主张攻打长沙的。后来他感到在敌强我弱、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下攻打长沙不行,便很快放弃了搬来的公式,把秋收起义部队带上了井冈山,并在斗争实践中不断总结全党的经验,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公式——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这是毛泽东的伟大功绩。而当时以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则虽经一再挫折,仍固执地坚持搬来的公式。因此,秋白为首的党中央所犯的盲动主义错误,以此带有浓厚的教条主义色彩。

第六是无论政治上的盲动主义,组织上的惩办主义,以及其重要的“左”倾政策,其创造者都不是中国同志,而是国际代表,主要是罗米那兹。

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罗米那兹,在帮助我们召开八七会议,结束陈独秀投降主义,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等方面,是有功绩的,这要加以肯定。

但是,他们对盲动主义和惩办主义负有重要责任。据

我所知，八七会议上的政治报告是罗米那兹根据国际的指示作的，八七会议《告党员书》也是罗米那兹根据国际的指示起草的；十一月扩大会议上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和《政治纪律决议案》，都是罗米那兹等人搞的。他们不仅是盲动主义和惩办主义的创造者，而且是强迫推行者。因为，我们相信和尊重共产国际，同时也相信和尊重它的代表。据我的记忆，我们当时对国际代表，确实是言听计从的。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列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你们面临着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必须根据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情况来运用一般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措施，必须看到农民是主要的群众，要反对的不是资本而是中世纪残余，要根据这种情况来运用一般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措施。”^①列宁的这个指示是非常正确和非常重要的，但上述情况表明，当时共产国际特别是它的代表，违背了列宁的指示。

第七是“左”倾盲动主义能在全党贯彻执行，主要是中央自上而下强迫推行的结果。

盲动主义在全党的贯彻执行，固然是反映了基层组织

^① 《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见《列宁选集》第四卷，1960年4月第1版，第111页。

和党员群众的拼命、冒险情绪，但主要的是来自中央和自上而下强迫推行的，因此在组织上相应地产生为政治上盲动主义服务的惩办主义，错误地处分了一部分负责干部。

在推行“左”倾盲动主义时，中央领导成员之间的情况因职务不同而各异。但是，那时秋白同中央领导班子里的几个人经常在一起，中央在作出什么决定时，他是能够听取别人意见的，在作出决定后几个人就分头去执行。因此，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左”倾盲动主义的批评，当时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中央领导班子里的几个人都是有份的。

第八，关于瞿秋白。

秋白同志是我们党的著名政治活动家、理论宣传家和才华横溢的文学家，也是我们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在党内外、国内外都是一个有声望的共产主义战士。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积极反对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戴季陶主义”和党内的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在中国革命危急关头，他主持召开了党的八七会议，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新的方针，这个作用在当时来说是很关紧要的。在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使党的工作遭到重大损失的情况下，他与周恩来等同志一起，于一九三〇年九月主持召开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对停止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起了积极的作用。

一九三一年一月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三年里，王明等人对秋白进行了无情打击，但他并没有因此消极下去，相反，他根据自己的特长，主动地为党在文化战线上做了许多工作。当然，我们也应该承认，象一切杰出历史人物都有他的缺点一样，秋白同志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他犯过“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但是，如同我在前面论述过的，这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也不是他一个人负主要责任，主要责任更在国际代表。况且，当时党还不成熟，秋白还年轻，他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只有二十八岁，犯错误的时间也只有短短的几个月，而且很快就改正了。他犯错误主要是认识问题。我认为秋白是一个正派人，他没有野心，能平等待人，愿听取不同意见，能团结同志，不搞宗派主义，事实上，临时中央政治局是一个五湖四海的班子。他的弱点是在接触实际上有点教条主义。临时中央政治局顺从国际代表，他有一定责任。他遵守纪律，四中全会上撤销他的政治局委员职务后，我问他准备怎样，他说听从党的分配，以后几年果然行如其言。一九三五年被捕以后，他在敌人面前宁死不屈，英勇就义。因此，正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他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①

列宁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16页。

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①。这个夹叙夹议的回忆录，特别是以上八条，究竟对不对，符不符合列宁指示的原则，有待指正。

(刘经宇、叶心瑜、颜广林协助整理)

^①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见《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第2版，第512页。

黎川事件的真相

——访肖劲光同志

李泽才 张 炜

肖劲光同志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就遭受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领导的迫害，被公审，判刑，到一九三五年六月才彻底平反。这段历史，不少书刊、教材、革命回忆录均有记述和披露，但多与事实有出入。为弄清这一事件的真相，我们最近访问了肖劲光同志。肖老说：“这段历史我从未对人谈过，但是，为立准党史资料，我可以提供一些历史材料，供编写党史军史参考。最近，有的老同志让我写个追忆，我也感到有责任把历史的经验教训和事件的真相说清楚。”

黎川是怎样失守的

我们向肖老提到，李德（奥托·布劳恩）在《中国纪事》一书中作了这样的记载，说是在敌第五次“围剿”面前，“肖劲光在黎川城不战而弃，带领他的独立部队仓惶撤退，而让

地方部队听任命运的摆布。”当时中央苏区的报纸还作了完全歪曲事实真相的报道，说什么肖劲光“把赤色的黎川城，以及红军用血肉换来的一部分军用品送给敌人，做了敌人的内应。”对此肖老以翔实的史料作了有力的说明。

一九三三年九月，当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围剿”时，瑞金是当时的临时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政府所在地。黎川位于瑞金的东北，东与福建毗邻。第五次“围剿”，敌人接受第四次“围剿”“长驱直入”遭到失败的教训，采纳了德国顾问建议的“堡垒主义”作战方针。敌堡垒体系：北部从赣江延伸到永丰，直到黎川；西部的堡垒线沿赣江到赣州，继续向南，到信丰以北和会昌以南，直至福建边界；东部，在我根据地军民的打击下，堡垒体系没有构筑完成；东北部的堡垒线也未构成；敞开一个大缺口，敌人准备拿下黎川后，继续构筑，以封住这个缺口，形成对瑞金的包围圈，再“稳扎稳打”，歼灭红军。

当时，闽赣军区司令部设在黎川城，肖劲光同志是这个军区的司令员兼政委。这个军区是由建（宁）黎（川）泰（宁）警备区发展起来的。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肖劲光同志根据敌人进攻的态势，估计敌极可能要进犯黎川，就给前总发电，建议红军主力及早集结于黎川东北的光泽、资溪一带，从侧面歼灭进犯之敌，不应死守黎川。当时，毛泽东同志也认为应该放弃黎川，诱敌深入到建宁、泰宁一带，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中消灭敌人。这些正确意见，均遭“左”

倾冒险主义者的否定。他们不顾敌强我弱的现实，执意坚持“御敌于国门之外”，分散兵力，拼消耗，处处防守，与敌人争一城一地的得失；他们实行“短促突击”，两个拳头打人，使主力部队疲于奔命，被动应付。肖劲光同志说：“我的主力部队已随三军团到福建去了，剩下一个独立师，在敌人进攻前的一个星期又调往峭石，归前总直接指挥。当时我手上只有一个七十人的教导队和一些地方游击队守黎川。”“在敌人进攻的前几天，中央又命令闽赣省委和省政府撤出黎川城。随即，顾作霖（省委书记）、邵式平（省政府主席）两同志率党政机关撤出了。为不致引起群众恐慌，只留一个合作社没撤。”这期间，肖劲光同志正带领部队在城外围和敌人周旋，当他回到城里时，黎川已是一座空城了。

进攻黎川的敌人是蒋介石的周浑元军三个师。敌先头部队占领了黎川外围阵地，又派别动队插到黎川的后面。在敌我力量异常悬殊，后路将被全部切断的情况下，肖劲光同志才带着七十余人的教导队撤出，退到城外六十里的溪口，避免了遭敌包围消灭的命运。关于黎川失守的时间，有不同说法，肖劲光同志认为《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所载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八日的说法较为准确。

浒湾战斗后被解职

关于肖劲光同志因何故被撤职，有些书上说是因黎川失守。肖劲光同志说：“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那是把因果关系搞错了。撤职的‘因’不对，‘果’是对的。黎川失守后并没有撤我的职，也没有追究我的责任，而且还让我负责组建红七军团。”根据中央关于把小团小师整编成大团大师的决定，肖劲光同志奉命以原赣东北的红十军、闽北独立师和他领导的闽赣军区的部队为基础，组建了红军第七军团。七军团共有三个师，即十九师、二十师、二十一师。十九师师长周建屏，这个师原是方志敏的红十军，是主力师。二十师师长是粟裕。二十一师是原闽北独立师，师长是黄理贵。肖劲光同志当时是闽赣军区司令员兼红七军团的军团长兼政委。有的材料记载，红七军团的组建是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军委正式命令成立的，以寻淮洲为军团长，肖劲光为政委，指挥十九、二十、三十四三个师和十军南下独立团。肖劲光同志说，红七军团没有三十四师，寻淮洲同志没有到职。浒湾战斗后，我被撤职，七军团改组，由寻淮洲同志任军团长，乐少华同志任政委，粟裕同志任参谋长。

肖劲光同志说：“我被撤职是浒湾战斗失利之后。”

浒湾，位于黎川西北，抚州东南。黎川失守后，肖劲

光同志率部配合红三军团在此打了一仗。时间是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一日至十三日。战略意图是先攻克黎川外围的敌据点，再“收复赤色黎川”，御敌于中央苏区之外。当时，红七军团的主力十九师，由彭德怀同志带到福建打仗去了，肖劲光同志那个时候手里掌握的只有二千多兵力。当前总获悉敌一个主力师要到浒湾时，即命令肖劲光同志带部队阻止敌人进浒湾，等待三军团主力赶到，以便对敌发起主攻，歼灭敌人这个师。肖劲光同志接到命令后，即部署粟裕率二十师在浒湾南十多华里的地方建立阵地，他率几百人在另一面构筑阵地阻击敌人。部队在这一地区（八角亭）展开后，即与敌激战，坚守阵地一天一夜，将敌阻止在一个森林地带。在战斗过程中，粟裕的部队还主动出击敌人，缴获了机枪等战利品。第二天傍晚，彭德怀同志率三军团赶到。这时敌人已在森林里做了工事。彭德怀同志感冒了，由彭雪枫同志指挥战斗。三军团当即对敌发起猛烈突击，没有成功，伤亡七百余人。由于部队伤亡大，无力再突击了。三军团这次回来以及向敌人发起突击，肖劲光同志都没有得到通知，只是听到枪声激烈，他和粟裕同志估计是我主力部队赶到，即主动对敌发起攻击。经过战斗，敌人又缩回森林地带固守。第三天，敌人派十二架飞机，轮番轰炸。到了晚间，守卫浒湾的敌人在一辆装甲车的掩护下出来接应，对我阻击阵地形成前后夹击。我阻击部队也伤亡了三百多人。粟裕一个师摆了个“长蛇阵”，横跨十余里，

被敌突破，敌终于打通了去浒湾的道路。肖劲光同志说，“浒湾失利后，博古同志他们想整彭德怀同志，但不敢动他，就把战斗失利的罪名强加在我的头上。他们下令撤了我的职，调往前总审查”。

公审、判刑，“罪责”易为黎川失守

浒湾战斗失利，彭德怀同志向前总说明了情况，说责任不在肖劲光。可是肖劲光同志已被撤职，抓起来了。怎么办呢？“左”倾冒险主义者就追查黎川失守的责任。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李德的一段话颇能说明问题。李德说，黎川失守要问罪肖劲光，“博古警告我，不要在革命军事委员会谈及这个问题。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反应很敏感，因为从根本上说，他同罗明和肖劲光执行的是同一条路线。”李德还说：“博古和洛甫把这种情况称之为过时了的游击战方法的回潮……”不难看出，他们为什么对肖劲光同志在浒湾失利无罪的情况下，又找出黎川失守的问题作文意，其目的是抓一批人，加以处罚，证明他们路线的“正确”，好在党内斗争中亮出“砝码”，攻击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

肖劲光同志说，“问题不是我个人，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件，问题是从罗明路线引起的”。罗明同志，福建龙岩人。一九三一年肖劲光和罗明曾在闽西苏区一道工作过，肖劲

光任闽粤赣军区参谋长，罗后来任闽粤赣省委书记。一九三三年初，临时中央在上海呆不下去了，就迁到中央苏区来。博古、洛甫、凯丰三同志路过福建永定时，检查了闽西的工作。他们是带着“尚方宝剑”来的，并要用他们的那套办法改造军队，指导战争，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路线。他们到了闽西，看到罗明把战场布置在苏区内地，坚持诱敌深入，打游击战，而不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很不满意。博古等一到瑞金就抓住这件事，说这是“退却逃跑”，是“右倾机会主义”，是路线斗争，称之为“罗明路线”。实际上他们的矛头是对着毛泽东同志的。但慑于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不敢公开提毛泽东的名字，而提罗明。于是，一九三三年二月，他们就在地方和军队里展开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撤销了罗明的领导职务。同年五月，他们又开展反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路线，说他们的路线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翻版。邓小平同志当时是江西会(昌)、寻(乌)、安(远)三县中心县委书记。邓与毛、谢、古三同志在江西党内是坚决执行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苏区党代表大会前后，“左”倾教条主义者胡说什么“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时，邓、毛、谢、古等就针锋相对地说：“大城市里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上全都是马克思主义。”“左”倾教条主义者反罗明路线时，还把当时军队中的政治委员撤换了一大批，如罗荣桓、滕代远等。教条主义者撤

换、打击、迫害一大批同志，都是为了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各个方面贯彻他们的错误路线。

肖劲光同志说：“我到建宁后，前总一位负责同志接见了我，给我一本杂志，叫《铁拳》。这是前总办的一个刊物，我注目一看，是《反肖劲光机会主义专号》，上面刊载顾作霖等三位同志的文章。阅后，心里不是个滋味。事情还没有搞清楚，问题却定性了，批判的文章也出来了，而且快得惊人。这不是早已准备好了的吗？”肖劲光同志向这位负责同志讲了浒湾战斗的经过，进行了申辩。这位负责同志说：“虽然事实有出入，但是党已决定在军队中开展反对以你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以教育全党。你应该服从党的决定。”肖劲光同志说：“如果不讲事实，如果是这样的说法，我还有什么话可讲呢？！”接着他就被关了起来。

不久，肖劲光同志被送到瑞金，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六日上午，在最高临时军事裁判法庭召开的公审大会上受审。参加公审的有红军各部队、中央一级及各后方机关的代表。主席宣布开庭后，由书记读控告书，接着让肖劲光作简单口供。肖劲光同志说，书记宣读的控告书只讲撤离黎川的事，而《铁拳》上刊载的文章讲的却全是浒湾的事，不知怎么回事，变了。主席最后问肖劲光同志有什么意见，肖答辩说：“我手上的兵都被调走了，敌人是一个军三个师，我怎么能守住黎川呢？再说上级也没有让我死守黎川。我到

差不多被敌人包围的严重情况下，才带领七十余人的教导队撤出，这有什么错呢？”这时，原告问肖：“为什么不发动群众？”肖说：“省委、省政府都撤走了，我靠什么发动群众；群众发动起来赤手空拳怎么对付得了那么多武装的敌人？”肖劲光说明了情况，会上喊口号的群众也没有原来那个劲头了。就这样宣布公审结束，肖被判五年监禁徒刑，开除党籍、军籍。

遵义会议后彻底平反

公审判决后，肖被关押起来。毛泽东同志派贺子珍同志前往探视。贺子珍同志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话，大意是黎川失守是“左”倾军事路线错误造成的，你应该撤退，做得对。肖劲光同志说，当时毛主席坚决不同意处罚我，王稼祥同志也几次拒绝签字。我被关了一个月。二月初，一位负责同志突然找肖谈话，让他到红大当战术教员。

肖劲光同志说：“我得以释放，能活到今天，是毛主席同‘左’倾机会主义者坚决斗争的结果。”

肖劲光同志到红大后，教战术和政治两门课。后来当政治队长（又叫科长）。准备长征时，把红军大学缩编成上千队，肖劲光同志任队长，下辖三个科，即政治、军事和地方工作科。肖劲光同志说，“为什么要我到红大当教员，我也不清楚。可能因为我在苏联学过军事。我讲课，学员

反映很好，很满意。”他说：“我这个上干队长还是个‘犯人’哩，党籍、军籍都没有恢复。”当时，宋时轮、成仿吾、徐特立、苏静、周士第都是红大的教员。

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时，肖劲光同志带领上干队从桐梓到遵义去。罗炳辉同志带一个连和电台也随后去遵义。当途经娄山关脚下时，敌贵州教导师一下子插了过来。罗炳辉同志在后面大喊，“上干队的同志，顶住敌人！”肖劲光同志指挥部队展开，顶住了敌人，把罗炳辉同志接了过来。这股敌人若过了娄山关，会危及遵义安全。肖劲光同志向罗炳辉同志要了一个连，坚守娄山关，将敌阻击在关前，守了一个夜晚，使敌人偷袭的企图未能得逞。第二天，周恩来同志派五军团的一个营来接防，肖劲光同志即带部队进遵义。当天晚上，周恩来同志接见了肖劲光同志，首先说：“你这次主动坚守娄山关，为遵义会议顺利进行作出了贡献，是有功的。”接着又说：“你的问题过去搞错了，处分都不算数，恢复党籍、军籍，中央准备安排你的工作。”

遵义会议后，肖劲光同志继续率上干队长征。一九三五年六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县境内胜利会师时，总政组织部指示方强同志（当时任军委干部团总支书记）通过组织手续恢复肖劲光同志的党籍、军籍。方强同志立即召开总支会议，并代表组织和肖谈了话。肖劲光同志的冤案彻底平反了。一九三五年八月，到毛儿盖时，肖劲光同

志离开上干队到三军团任参谋长。肖劲光同志说，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时，博古在一次会上，突然问他“黎川失守撤退时，丢了伤员没有？”肖当即回答“没有，一个也没丢！”那时黎川没有伤员，伤员都在离黎川六十里的溪口医院里。浒湾战斗时有三百多名伤员，突围时，肖劲光同志派一个营的兵力掩护，通过敌人封锁线送到了苏区，清点人数时，发现少了三四个掉队的伤员。

肖劲光同志说：“周总理是个好人，大大的好人。”当时李德、博古主张杀肖劲光。公审以前周恩来同志征求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毛泽东同志坚决不同意，说这件事不能怪肖劲光。那时毛主席虽然没有权，但威望很高，影响很大。肖老说：“如果没有中央这些领导同志的保护，在红军离开中央苏区长征时，根本不会留下我这个‘罪犯’，很可能杀掉了。”

访问将结束时，肖劲光同志说：“我个人没什么好谈的，王明‘左’倾路线迫害的好人太多了，对他们搞的那一套方针政策，我认为不符合当时的国情，是错误的，这是第一。第二，至于对我的迫害，我深信他们所依据的材料不符合事实，是为了‘斗争’的需要，强加于我的。我藐视王明路线。第三，毛主席、王稼祥等中央领导同志是支持我的，保护我的，而且有许多正直的同志象彭德怀、伍修权等，多次为我申辩，说明事情真相，这都给我以极大的鼓励和战胜困难的勇气。第四，我从十七岁参加革命，在党的关

怀教育下入了团、入了党，党就如同我的父母。党组织有怎样的错误，我都没有不满意的地方。博古、李德他们以为我会消极、动摇，会跑到敌人那里去，长征时，还派学员秘密监视我，实际上我心安理得，工作得很好。我负责上干队，在长征那么艰苦的环境下，没有掉队的，圆满地完成各项任务，就是一个明证。”

回忆周恩来同志和美国记者 李勃曼谈话的一些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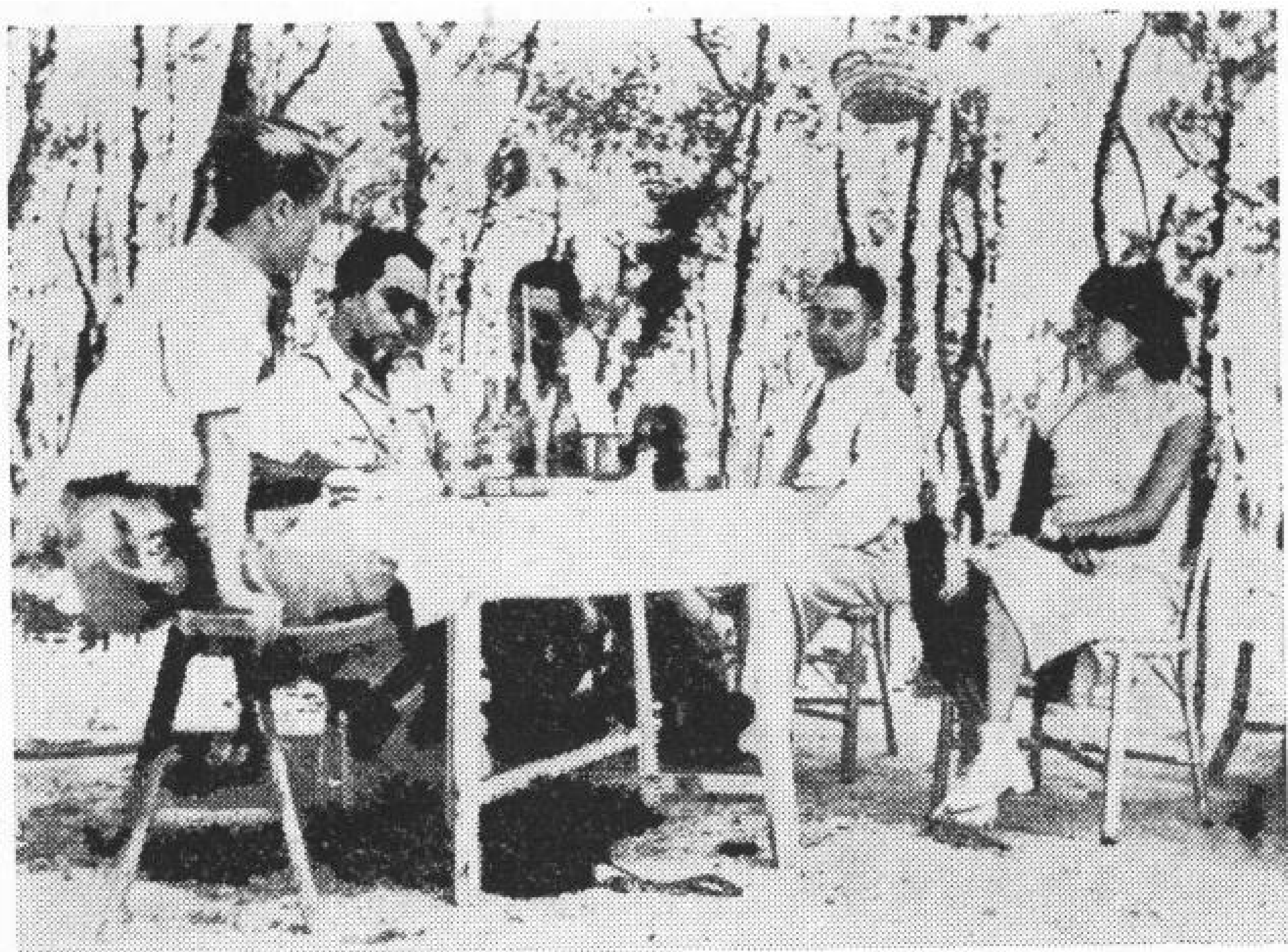
吴 青

编者按：去年本丛刊第一辑发表了《周恩来同志谈个人与革命的历史——和美国记者李勃曼谈话记录》(以下简称《谈话记录》)一文之后，章文晋同志曾邀吴展、陈浩、王凝、吴青等几位当时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的同志座谈，共同回忆了谈话时的情景和周恩来同志革命活动的一些情况。本文是这次座谈内容的一些要点。

一、对《谈话记录》的补充

(一)李勃曼是《纽约时报》当时驻南京的记者。这次谈话是周恩来同志应李勃曼的要求，谈他个人的经历。

关于谈话时间，《谈话记录》上写的是“一九四六年九月”。据我们回忆，谈话分三次进行，时间在一九四六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第一、二次谈话在梅园新村，第三次



上图是周恩来同志和李勃曼在南京灵谷寺谈话时的照片
左起：吴展、李勃曼、章文晋、周恩来、吴青

谈话在灵谷寺。每次谈话都是由章文晋同志担任翻译，吴青同志作记录。

《谈话记录》未经总理亲自核对。李勃曼采访后未发表过文章。一九八〇年章文晋同志在美国遇见李勃曼，曾问他当时采访后为什么不发表文章？李勃曼答：因为报社不同意发表。问他原稿现在何处，他说已经找不到了。

(二)《谈话记录》中谈到“四·一二”之后，周恩来同志“搭一艘英国商船去武汉”。据回忆，谈话时李勃曼曾问周恩来同志是用什么办法避开国民党监视的。周恩来同志说，

他是穿了长袍、戴上礼帽，扮成商人模样才登轮的。

(三)《谈话记录》中谈到一九三〇年周恩来同志从上海去欧洲，绕道到莫斯科办出国护照时，照了一张相，叫陈赓同志认，陈赓同志“想了半天认不出来”。据章文晋同志回忆，当时周恩来同志说，他是把头发从中间分开，再戴上一付眼镜照的相。

二、回忆周恩来同志活动的一些情况

(一)据章文晋同志回忆，当时德国共产党按照共产国际的一些习惯作法，除将在德国留学的中共党员分别编入个人所在的支部外，还编成一个中国语言组过组织生活；一些共青团员也编入这个语言组。一九三〇年在柏林留学的党员有张罅(张澜的儿子，抗战初期去世)、成仿吾、谢唯进等同志。当时周恩来同志从上海去欧洲再到苏联。经过柏林时，张罅参加接待。周恩来同志特地去看望了中国语言组的部分同志，介绍了国内的大好革命形势。他所谈的，与他在一九三〇年四月下旬，用化名在德国共产党党报《红旗报》上发表的《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之际》的内容大致相同。

章文晋同志还回忆起，当时张罅对他说，恩来同志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很注意节约，一路上每花一分钱都要记账。恩来同志说，因为这是党的经费。

(二)据陈浩同志回忆，解放后周恩来同志曾谈起过，他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由于工作忙没有抓紧机会去游览巴黎的铁塔，后来又走得匆忙，终未去成是一件憾事。一九五四年恩来同志去日内瓦开会，在那里他终日忙碌，不知疲倦地工作，从不抽空去游览名胜古迹。

三、对《谈话记录》的意见

(一)《谈话记录》中有一句话“使我们和马歇尔无法取得协议”(见《中共党史资料》第一辑第十七页)。我们认为如能改成“使我们和马歇尔无法取得一致意见”更好些。因为“协议”二字可能被误解为正式的文字协议。

(二)《谈话记录》中周恩来同志讲“我出生后，因叔父周贻淦已去世”，但据《周总理与故乡》(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淮安县委编写)一书中称：总理出世后不满周岁时，他的叔父去世。两种说法有些出入。

对《一九三五年前后北方局的情况》一文的补正

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高文华同志所写《一九三五年前后北方局的情况》（刊《中共党史资料》一九八二年第一辑一八四页）中有一段不甚确切，特作如下补充更正。

我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到一九三五年五月，先后以党中央代表的名义（当时代号田夫）恢复主持北方局工作。前后参加过北方局工作的人有柯庆施、饶漱石、朱理治、高文华、薛尚实（罗根）、李华生（毕根）、洪灵菲、李培南等人，没有姚蓬子。可能把洪灵菲同志误作姚蓬子了。他们曾同是上海左翼作家联盟和反帝大同盟的中坚分子。洪灵菲同志于一九三三年春被党调为中共驻北方代表秘书处处长——即秘书长，同年七月河北临时省委遭受大破坏时被捕，于一九三四年夏同省委书记赵琛（又名罗森）一起牺牲于南京。

北方党的组织和领导机关，由于白色恐怖的严重摧残，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特别是王明路线的危害，遭受了多次大破坏。新恢复的北方局只管河北省委、陕北特委、

内蒙特委，对其它河南、山西、山东等地，只是同个别地方组织有领导关系，没有包括东北在内。

孔 原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启 事

经文化部批准，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最近在北京成立。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系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直接领导下的专业出版社。

原定由法律出版社出版《中共党史资料》第五至第八辑，自本辑起，移交我社出版，由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本社今后将办理邮购业务，以满足读者的需要。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3年4月

本社通讯处：北京 1924 信箱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中共党史资料 第五辑

作者 =

页数 = 1 0 0 0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正文